

雅典娜思想译丛

[英] 乔治·莫尔 著
孙宜学 译



我的 死了的生活的回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0124728 K835.615.6

04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

[英] 乔治·莫尔 著

孙宜学 译



北航 C054339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FN30/3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英)莫尔(Moore, G.)著;
孙宜学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
(雅典娜思想译丛)
书名原文: Memories of my dead life
ISBN 7-5633-3173-5

I. 我… II. ①莫…②孙… III. 莫尔, G.—回忆
录 IV. K87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19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电子信箱: pressz@public.glptt.gx.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黄坎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怀柔县黄坎乡西三公里 邮政编码: 101403)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172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 001 ~ 12 000 定价: 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者序 等待复兴的天才

乔治·莫尔(1852—1933)是在20世纪初与英国唯美主义文学思潮一起到达中国的英国作家,虽然他没有像王尔德那样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但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却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独特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唯美主义思想。当然,乔治·莫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并不很大,实际上,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10年期间,莫尔几乎是个无人问津的英国作家。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才受到某些中国作家的青睐,尤其以邵洵美为主的“狮吼社”对他的介绍最为卖力,其中又以邵洵美为最真心的崇拜者。正是出于这种崇拜之情,邵洵美在主持《狮吼》和《金屋月刊》两个刊物期间,对乔治·莫尔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集中、系统的介绍。1928年8月16日,在《狮吼》半月刊复活号上,邵洵美发表了《纯粹的诗》一文,对乔治·莫尔的纯诗理论作了详细介绍;稍后,邵洵美又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信》(1928年11月《狮吼》第九期);回忆录《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片断)(1929年1月《金屋月刊》第2期),在1929年5月,他又在金屋书店出版了这个回忆录的中译本;小说《和尚情史》(1929年2月《金屋月刊》第2期);在1930年6月出版的《金屋月刊》第1卷第9、10期合刊号上,邵洵美还发表了《George Moore》一文。除了邵洵美外,其他人如曾虚白、费鉴照、赵勉之等也都对乔治·莫尔有所介绍,但都不如邵洵美那么专心致志,乔治·莫尔能为中国人所认识和接受,主要得力

于邵洵美。

然而,自那之后,作为颓废作家的乔治·莫尔就慢慢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到了我们又能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时,乔治·莫尔才又和其他英国唯美主义作家一起重新受到我们的关注。但对莫尔本人来说,他的实际文学成就和他在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并不成正比,比如在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中,大多对摩尔只字未提,倒是翻译过来的外国人写的文学史教材略为点到,但也只是生平创作简介而已。在中外文学交流愈来愈成熟、全面的今天,应该是我们重新介绍和研究他的时候了。

莫尔是个自然的文学家,也是个富于想像力的作家。他天生不会按照别人给他安排好的道路循规蹈矩地走下去,而是不受任何成规的羁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发展自己的天才,从这一点说,他显然和王尔德一样,是天生和整个时代不合拍的人物。他在学校读书时没有按照老师和家长的期望成为一个好学生,而总是被老师分在最差的班级,而又总是班里最差的一个学生,结果惹得校长不止一次给莫尔的父亲写信说“乔治的情形确实很糟糕”,但他同时也想让莫尔的父亲帮他弄清楚一个困惑:莫尔是学不会(Could not),还是不愿学(Would not),因为只要是与书本无关的事,莫尔都表现出很高的天分。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莫尔能够学好任何一种他想学的东西,但任何一种别人给他选择好的东西他都学不好。他对知识的渴求来得快去得也快,像田野里倏忽而逝的风。这是一种谁也不能理解的性格。他父亲常常把他关在卧室里让他专心学习拼写,但这一切努力最终都证明无济于事。他父亲最终放弃了对他的努力,并对妻子说:“乔治只是个 Chrysalis(蝶蛹),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变成一只飞蛾或蝴蝶。”但令他震惊的是,他的儿子虽然不会拼写,却对“平庸的诗”很感兴趣,如雪莱的诗。实际上,莫尔所缺少的就是对一切约定俗成的东西的接受能力,而就是这种缺乏成就了

他这样一个独行不羁的天才。他有一颗处女般的心,一颗优美绝伦的心,他生命的能量来自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他主张一切都应返回自然,自然才是艺术的源泉,自然才是最伟大的艺术,若没有艺术,没有源于自然的情感的源泉,人不会变得更美好。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不无绝望地喊道:“眼下的时代是个没有艺术的时代,因为机器正在取代阿波罗的伟大天才,也就是说机械文明正日益取代艺术的灵感。”他对艺术的看法也很独特,他认为艺术不取决于和谐与对称,而来自于触觉,没有触觉,就没有绘画艺术、文学、音乐;艺术不在脑子里,而在手上。他的意思,是说人只有先与自然接触,与鲜活有力的自然生命相接触,才能触到艺术的真正源泉,才会创作出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正是因此,他向往文艺复兴时期,向往当时天才们的无羁无束的创作活力;他也向往前拉斐尔派,向往密莱西、米勒、罗塞蒂对艺术的独特理解。他不无自豪地宣称:技匠成为时髦的时代不会久远,虽然目前自然与艺术的和谐暂时消失了,但不久这种和谐就会出现。

对莫尔的人生观、艺术观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巴黎学画的10年(1872—1882),这10年间,他深受法国唯美画风的影响,而在同时的英国,以王尔德和《黄面志》为中心的唯美主义文学正盛。就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莫尔形成了以唯美主义为主,兼顾其他艺术风格的艺术特点。在这10年间,他还广泛结交巴黎文人名士,尤与马拉美最为相知。他称马拉美为文坛圣人,说他一生中从未嫉妒过一个人,没有说过一个人的坏话,从没有愤恨和不满;他在巴黎的艺术圈子里,地位就像耶稣死后的彼得和约翰的地位一样。马拉美在当时已是声名鹊起的象征派诗人,莫尔与他志趣相投,从中不难看出他的艺术旨趣。巴黎10年学画,用莫尔的话说是在作画上一事无成,但在文学上,他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初露锋芒的,其间,他出版了两本诗集:《情欲之花》(*Flowers of Passion*, 1878)和《异教徒诗集》(*Pagan Poems*, 1881)。1880年

他到了伦敦,随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诗、剧、评论,自传《一个青年人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Young Man*, 1888),小说集《独身者》(*Celibates*, 1895),《未开垦的土地》(*The Untilled Field*, 1903),以及小说《伊维琳·伊尼丝》(*Evelyn Innes*, 1898)及其续篇《特丽莎妹妹》(*Sister Theresa*, 1901)和回忆随笔《回忆印象派画家》(*Reminiscences of the Impressionist Painters*, 1906)。10年学画的经历和知识,使莫尔获益匪浅。之后他不但凭依这些知识做过报纸专栏的艺术评论家,而且还在1893年出版过《现代绘画》一书。1899—1902年,英国发动对布尔人的战争,莫尔为表抗议,于1899年离开英国返回爱尔兰。莫尔从小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但当他返回爱尔兰时却变成了清教徒,并投身于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其突出的成就是筹建了爱尔兰国家剧院,这段生活经历都反映在他后来出版的三部曲《致敬和告别》中(*Hail and Farewell*, 1911—1914,包括“欢迎”、“欢呼”、“再见”)。1911年,莫尔又回到伦敦,在伦敦的日子里,莫尔还被称为文坛圣人,但不是因为他在宗教方面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圣绩,而主要是因为他出色地创作了一部以耶稣为题材的小说《凯里斯溪》(*Brook Kerith*, 1916)。他的其他一些作品还包括短篇小说集《说书人的假期》(*A Story-teller's Holiday*, 1918),随笔集《埃伯利街谈话录》(*Conversations in Ebury Street*, 1924),小说《爱洛伊丝和阿贝拉》(*Heloise and Abelard*, 1921),剧本《创造不朽者》(*The Making of an Immortal*, 1927)等。

在莫尔创作正值高峰时期,也正是法国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日盛的时期,莫尔幸逢其世,也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自然主义文学所提倡的以不动声色的平实笔触展露生活中的脓疮和悲哀的写法,尤其投合莫尔的口味,所以他一气写了七部明显受到左拉影响的小说,包括《现代情人》(*A Modern Lover*, 1883),《演员的妻子》(*A Mummer's Wife*, 1885),《麦斯林一剧》(*A Drama in Muslin*, 1886),《纯粹偶然》(*A Mere Accident*, 1887),

《春日》(*Spring Days*, 1888),《迈克·弗莱契》(*Mike Fletcher*, 1889),《空喜一场》(*Vain Fortune*, 1891)。而他被公认的一部最优秀的作品,是1894年出版的《伊斯特·沃特斯》(*Ester Waters*),也是自然主义小说。但莫尔并不纯粹是自然主义作家,其艺术观主要是唯美主义的,而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可以说是英美意识流小说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过:“我追逐自己的思绪,犹如孩子追逐蝴蝶。”他1895年完成的短篇小说《米尔德里德·苏森》讲述同名主人公在巴黎和伦敦的艺术家圈子里的种种经历及其婚姻生活,通篇充斥着主人公的内心独白。1889年发表的《迈克·弗莱契》,也是以单调的内心独白贯穿全书,只是偶尔有几段间接叙述穿插其间。可惜的是,现在人们谈到意识流时只知道普鲁斯特、乔伊斯、沃尔夫,而忽略了莫尔这位开拓者的功绩,这是不公平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可以说就综合了莫尔的这种复杂的艺术观,其中唯美色彩特别明显。只不过他的文风没有王尔德那样流畅华丽,也没有他那种一泻千里的情感激荡,而是采用不动声色的自然主义的纯客观叙述方式和意识流的情感描写方式,把他生活中的几段难忘的、不乏颓废色彩的情感生活赤裸裸地展露出来,从中不仅可以让人看到他的精神追求、矛盾,他的生活的无聊、空虚,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他那一代英国作家是怎样生活和创作的,了解他们所代表的生活观、艺术观在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回忆》的结构很容易使人想起卢梭的晚年作品《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作品用串珠式结构,以主人公“我”的一段生活历程为经,同时以“我”为中心辐射开去,把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人物与“我”穿插起来作纬,从而构筑出当时上流社会、特别是艺术家的生活世界,脉络清晰,人物关系明朗,特别是对生活于中心的“我”的精神世界,更能从各种参照系加以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和审视;其情感流动,犹如一条缓缓流过的小溪,在我

们理性或感性的目光下,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和仪态,迤逦而行,只是偶尔翻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在我们已不再容易平静的心里,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在我们面前,作者好像肩扛录像机,面无表情地把他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一一摄下来:巴黎社交圈中的恩恩怨怨,艳女美妇的附庸风雅、心如枯井的萎靡生活;“我”与几位性格各异女性的或悲或喜,但都缺乏浪漫激情的“爱”或欲的生活;“我”回家参加母亲葬礼时的无动于衷,以及送葬者的冷漠;巴黎艺术家的各种奇行异态;“我”对过去与现在、存在与死亡、现实与虚幻的种种思考,这些都被作者以客观、不动声色的描写方法展示了出来。

在这部回忆录里,作者还描述了巴黎的春天,描述了美丽的大自然中小鸟快活的鸣叫,以及作者欲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大自然中寻求永恒的归隐心怀。在貌似笨拙、单调的描写中,实际上蕴含了作者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片深情;他像一个孤独的漫步者,在人世的浊浊洪流中起伏跌荡。他不是圣人,他也没把自己当作圣人,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对艺术有偏爱、有七情六欲的人。他描述的基调是阴郁忧伤的,也许正是这种低沉刺激了他冲破庸俗的想像力。他一次次地追求有欲无情的爱情努力,实际上就是他欲打破平庸的坚决努力。

从《回忆》里,人们不难听到他发自内心的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对自然美的向往,这是一位被忽视了的天才的真正的心声,只要我们耐心倾听,这声音依旧是意志消沉的失眠患者的最好伴侣。对这样一位朝气蓬勃,充满想像力的人,一位把他的一生全部贡献给写作事业的人,人们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

这个天才,为了他的复兴,已经等了太久的时间。毕竟:

他可以使詹姆斯与叶芝相形失色

但却被扔进远处的黑暗之中

目 录

译者序 等待复兴的天才	(1)
第一章 伦敦的春天	(1)
第二章 灵魂不自然的女人	(12)
第三章 梦巴黎	(23)
第四章 与皇室女演员共进晚餐	(27)
第五章 俄国王子的情妇	(35)
第六章 艺术的游戏已经结束	(48)
第七章 女人是男人一项严肃的工作	(54)
第八章 过去只是一出舞台滑稽戏	(70)
第九章 温柔的南方爱情之旅	(81)
第十章 伤感的寻觅者	(153)
第十一章 农舍里的圣母	(171)
第十二章 在灌木丛中为情人诵诗	(179)
第十三章 为得克萨斯分娩文学	(185)
第十四章 想有个小小的偶遇	(201)
第十五章 葬礼上的遐思	(206)
译后记	(220)

第一章 伦敦的春天

星期天早晨,我坐在窗前慵懒地看着窗外的麻雀——它们在王座街角的老树上飞来蹦去,在我眼里慢慢变成了一群闹闹嚷嚷不安分的黑点——我开始辨识出有一层淡淡的绿雾。是的,树枝间有那么一层淡绿;一种冲动攫住了我——是那种意识到春天就在我脚下的冲动;我走到窗前,脚下像被橡胶粘住了似的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的伦敦,想像着漫步坦普尔公园,不时停下来看群鸽从屋顶飞掠而过的快乐,然后就可以叫辆马车,穿过斯特兰德大街,看看圣·克雷芒·丹尼斯后而的小树,它们映在被烟熏黑的墙上,绿得可人。

看伦敦最好是在星期天;你可以仰靠在马车上,独自与伦敦相伴。伦敦的小街是美丽的,其不道德的文学也是举世闻名的。湛蓝的天空辉映在17世纪的三角墙上方。我们到达特鲁里街不久,晴朗的天气就引诱出一群群面孔冷峻的伦敦人。跳绳在到处飞舞,孩子们跑来跑去,跌倒了,再站起来接着跑;而花枝招展的姑娘们,以及他们的妈妈则裹着头巾舒适地坐在家门口,就像兔子蹲在洞口;他们的父亲们则一声不响地吸着烟管,双眼定定地盯着门已关上的酒馆门。在大剧场的拐角,一个卖冰棒的小贩正以惊人的速度把邻居们节省下来的不多的几个便士聚拢起来。马车从小巷拐入大街;一种落日余晖的亮光洒满街道,路边是一排三角形的砖瓦房以及圣伊莱斯教堂,教堂的尖塔耸入淡蓝色的柔和的空中。我不禁想到,这些尖塔这样美丽,它们一

定比教义本身存在的时间还要长久，或许它们已经超过了教义的生命；不管有没有宗教，我们都必须有尖塔，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尖塔在树林间闪映，在市区的繁华地带傲然直立。

春气在上升；杏树在开花，某家庭院的一株杏树像一件日本式的饰品点缀在墙头。在古老的街道两旁，树篱笆也都已争先恐后绽露了新绿——这是如何流泻一片的绿啊！伦敦城里的绿比乡村的绿更逗人！要看春，就必须在伦敦看。在圣·约翰林，人们可以看到春天正从远处翩翩而来，太阳和淡雾像一对可爱的青年男女在戏耍逗趣。甜美的空气是多么令人沉醉、多么令人激动啊！它融化在甜蜜亲吻的唇中，注入优美涌动的生活之潮；看到姑娘们穿过阳光普照的林阴道，看到她们手拉手走着、蹦着抓树枝，就像梦中见到情人的姑娘那样甜美可人。看到这一切是多么令人舒心畅快啊！啊！公园里没有姑娘了，但又出现了一些黄水仙花！花的形状美丽；这种古老的花把我的思绪带回到过去——不是回到希腊时代，因为这里的黄水仙已经失去了古代的可爱之处，所以她让我想起的是韦奇伍德陶瓷而不是希腊的花瓶。

我沉湎于胡思乱想的愉悦之中；我像一个孩子追随蝴蝶一样追随着我的思想；我自己的以及我周围的所有狂喜都是健康的快乐——我的健康以及世界的健康。这个4月的日子点燃了人的脑子和血液，我只能靠在这条古老的运河边思索！这条运河看起来好像已被废弃，它却因此而魅力无穷，因为一条被废弃的运河是——我不知是什么的——完美象征。河会流动或奔腾，甚至一个人工湖也会栖息许多水鸟，孩子也会泛舟其上；但这条运河则什么也没有。

我看到一个黑点渐渐逼近了，那是什么？原来是条船。它是来打断我美妙的遐思的。我感到很沮丧。我本希望在20年前运河上就已驶过了最后一条船，可你看，这儿不又来了一条：它的帆绳松松垮垮地斜拉着，船头激起股股细浪，舵旁靠着一个

隐约可见的人影。这不由使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当时的每个孩子都喜欢运河,我们都还记得带着一脸惊奇看着烟囱冒着烟的大大小的船只破浪前行的情景。我记得父亲问过我为什么喜欢从运河乘船而不是乘火车到都柏林,我当时也回答不出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我为什么喜欢运河。难道是因为它像时光一样悄悄滑过?还是因为它像一匹辛勤劳作的马那样,四蹄前伸、奋力前行呢?

这时有人来访——当然是女人,来访的总是女人。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直到6点,我才又获得了自由。当马车穿过黄金广场附近的古老的砖砌街道时,我又开始沉思起来;这些街道的名字我们在旧小说中都能遇到;街道上到处是画室,在这些画室里,海顿·塞福利和历史上与他齐名的那些一流的艺术家们大谈艺术,并借酒打发绝望的时光。他们至死都还在奇怪世界为什么认识不到他们的天才。孩子们在围着一个被弃置的牌楼爬着玩,人人都竭力想够到牌楼上的一只旧时代的灯笼。这些干燥衰颓的街道所散发出来的味道是伦敦特有的,其中有种沼泽地的气味;这种气味弥漫在街道上,与各种各样的烟雾混为一体。在每天的迟暮时分,我脑中都会出现一个接一个的幻想,一种接一种的图像,直到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似真似幻,直到某种神秘笼罩了一切;连白色的拱门似乎都在对我讲话,我相信,非常高兴地相信,它一定有什么秘密要向人倾诉。伦敦被笼罩在一层淡淡的薄雾之中,伦敦肯定有个秘密!且让我透过伦敦脸上的面纱仔细读读她的秘密。且让我凝神静思破译——破译什么?我不知道,但一定有某种东西。但我无法集中自己的思想来做这件饶有趣味的工作,因为我很快沉湎于大理石拱门的美和幽灵般盘旋在大树间的林中小径的神秘了。

我转过身,刺骨的寒风迫使我加快了脚步;走着走着,我的思绪才慢慢集中起来,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海德公园能体验到这么多的感情真是幸运,因为,即使我的朋友,当然是不太幸运

的朋友，一直走到瑞士，爬上布兰克山，他所感受到的也顶多与我现在的感觉一样多。我抬头向公园的远处看去，只见一轮隐约可见，雾霭迷蒙的落日。最后一抹红色的光带消退了，只留下这座灰色的公园，以及公园后蓝色的郊野。雾在飘动，人也在飘动，在苍凉的晚霞映衬下，一切都显得朦胧和哀伤。人群像一条条黑带子散落在各处，而围绕着一一条条栏杆，这些黑带子又缠成了一个黑色的球，而球的螺栓毫无疑问是某个宣称只要放弃春天，人性就能远离罪恶的传道士。但不管传道士如何向人们宣教，春天却毫不在意，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恣意弥漫着。春天漂浮在绿叶飘拂的枝条间，也渲染在吵闹不休的麻雀嘴里；春天激励着那些穿着不合体的宽大衣服、扣眼里别着黄水仙花的男孩子们，让他们在春风里恣意嬉戏；春天唤醒了花枝招展的小姑娘们，使她们也失去了平日的矜持；各种各样的生物也都随着春气的上升而骚动不安起来，它们匆匆忙忙地离开自己沉闷的家，加入到春天的大合唱里。它们这些神圣春天的侍从，比传道士更能理解这个世界，更懂得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位穿着紧身绿衣的女士从我面前袅娜走过，她是去赴一位年轻小伙子的约会的，她的肩上披着一条昂贵的毛皮围脖；他们漫步在莱恩公园，在有低矮的阳台和在空中低垂着花篮的别致的小房子间流连徘徊。这儿有多么精致整洁的小花园啊！在一座有18世纪希腊雕塑的花园里，走来了那个穿着紧身绿衣、披着昂贵的毛皮围脖的女士，她的围脖几乎遮住了她美丽的腰肢。她本人就是莱恩公园，她的双眼和举止写满了莱恩公园的神韵；她的老情人好像害怕感冒似的快步走着，他的胡须显然染过了，他的腰间肯定扎着一根皮带，他也是莱恩公园。那两个年轻人快乐地交谈着——他们是可敬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标本，他们双腿修长，靴子闪亮，充满着年轻人的健康活力——他们就是典型的莱恩公园。

很久以前，实际上早至18世纪，这儿曾是一个质朴无华的

国家公园。在各种各样规格不一,交错杂陈、有着弓形窗和带游廊的阳台的各种建筑物之间,人们不时会发现一些仿制的旧时代的农舍,就像狗站在高贵的“第戎的名人”中间一样。虽然人们不会在意它们,但人心已经在这些充满人性的小房子内受尽了痛苦——因为这种小房子似乎不适合容纳 20 世纪人的深厚感情。就我所知,在 6 月的某个夜晚,当夏日的凉风神秘而静谧地卷起丝质窗帘时,就在其中一所幽静的小房子里曾流过一条潺潺的泪水之河。

“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们应该会很幸福,”她说,“但顶多也只会幸福六个月。”“只有六个月?”我不相信地问她。我很钦佩她的直言不讳。“那就是说我很快就要失去你?”她没说话。我接着说,“这必然意味着,当我再伏在桌上写小说时,你就不会再深情地看着我正慢慢变宽的背了。你来到这个世上注定是要在社会上闪光,注定要成为一束光,注定要成立一个沙龙,在自己身边聚拢起一群群聪明的男人。伊丽莎白,你像我一样,既有行动方向,又有目的。”她的圆眼睛里写满了问号。我一直认为我们的目的和方向不一样,我们的爱情故事最终要在巴黎或别的什么地方奏完最后一曲。我们在海德尔堡城堡的护城墙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早晨;我们在荷兰漫游,寻找有历史价值的壕沟和图画。三个月后,我们返回伦敦,她听从我的建议,租了一座我所喜爱的那种任性的小房子,租期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內,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一起坐在那种有游廊的阳台上。就是在其中一间那种幽谧的木客厅里,我们根据切尔西的牧师和村姑的建议,上演了我们爱情的最后一幕。

亲爱的读者,在本书的末尾,即在意为“我将东山再起”的最后部分,你还会遇到这个漂亮姑娘。而在这一部分,我将只讲讲我的爱尔兰之行,以及我是如何满怀两种悲伤到达爱尔兰的;你将听到我在一个雾蒙蒙的湖岸上向一群模糊不清几乎已被我忘却的人们作我的回忆与遐想。她给我写了一封信,信是追踪

至拉弗·卡拉的,这使我想到自己最好赶快回伦敦向她请教我将来的生活命运,即我们是彻底分手呢还是继续保持我们之间的肉体关系。在那个有走廊的阳台后的客厅里她曾投身到我脚下说:“现在向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将是朋友。”她说这句话时并非漫不经心,而是一脸热诚。我被她的行动所打动,就发誓说:无论什么也不会终止或干扰我们知己般的友谊。我已说过,当我漫步在湖岸沉思遐想的时候,她的话和举止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问自己:是否纯洁的丈夫只存在于法国的小说之中。“毫无疑问,”我说,“小说之外也有,但这种好事不会落到我头上。”我的情绪一点儿也不轻松,因此我一到伦敦就尽可能快地去见她丈夫。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如何被送回到过去的——即是在思想里回到过去。一切皆为思想,一切皆始于思想并终归于思想;生活是个万花筒,我们很难说自己是生活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思想像风向旗一样转换不定。我现在忘掉了拉弗·卡拉和那种阳台,心里只想着叫辆出租车去看刚返回伦敦的她。从我叫车的那一刻起一直到到达她门前止,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思想如翻江倒海一般回忆与她在一起的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我还想到,如果她一点策略也不懂,准许她丈夫留在我们身边的话,我该采取什么态度。

我的伊丽莎白啊!你现在已是个小妇人了!当我走进她的房间时,我看见她正站在炉前地毯上。她说她丈夫刚刚怒冲冲地出去了。她显得很快活,但她的快活或许是假装的。我常常想,既然我早就应该把她拥入自己的怀抱,那就完全不用在意她结过婚。我想她也一定希望我这么做,但谁又能知道究竟是不是这样呢。然而,我敢肯定的是,在这种场合是不应谈判、也不应谈文学,而只应该爱的;我们应为自己的肉体之爱辩护,并视之为最崇高的美德。每个女人都是这样想的,但谁也不曾明确说过这句话,因为每位女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她在尘世的存在

的全部意义都融化在男人对她的爱里,如果我们男人舍弃对她的爱,她在人面前立刻就会矮一半,她会肩膀低垂,屁股宽大,并且总是有一双短腿;正是因为有了我们的爱,她们才会衣罗绮、饰丝带、带手镯、穿耳缀,颈围珍珠,发缀钻石。即使世上真有女人崇拜女人的事,那也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启示,有了我们,才使她们能在拉斐尔、拉宾、雪莱、屠格涅夫、肖邦这些世界上的奇妙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就是因为有了天才们的超然思想,我们才能用大理石雕刻我们对女人们的梦想,为她们建造宫殿和奇妙的坟墓。实际上,女人们既然得到了我们如此的爱怜,她们就不应该再抱怨我们中间还有傻瓜迫使她们围着锅台转,而是应该认为:这些流于愚蠢的爱之烦恼与她们从爱中所获得的好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想赞扬性别美德的不会是她们,因为正是这种所谓美德残酷地说服了她们,把她们变成厨娘,洗衣工,护士或妻子。过去的女人更理解爱,那时她们会成群结队穿过鲜花盛开的树林去把花环挂在潘巨大的生殖器上。

我的思绪游荡不宁,从那座阳台又转到了古老的塞洒利,我刚才还躺在那儿的一个山洞里的森林女神旁边,看星星在树叶间闪烁不定。我想知道是什么想法促使我到塞洒利的,又是什么想法促使我回到伊丽莎白身边的。在她结婚后回到伦敦,并且不再说什么让她或我不愉快的事,不再谈文学和音乐时,我就应把她揽入怀抱了。如果我曾这么明智的话,她可能早就又成为我的森林女神情妇了,因为她肯定无疑是森林女神的后裔。或者说是我的运气不佳?也很可能是这样。我不禁想到我的运气的来去;想爱中的运气和牌中的运气。当我们不会再做错事,或当我们像初涉爱河的乡下愚汉似的举动失措的时候,或当我们突然跌入不幸的深渊的时候,我们都禁不住要问自己是不是个傻瓜,就像我在某个星期天下午的所作所为那样。那天下午,我坐着马车穿过荒凉的街道去肯定顿,而她则坐着另一辆马车走到我的车旁。她又年轻又活泼(她的孩子那时已两岁了),头

发浓密,比以前更亮、更像真金一样。当我与她面对面地站着谈话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际:这儿离我的房子并不远,要邀她去那儿喝茶显然是再容易不过了。但事实恰恰相反,亲爱的读者,如果我告诉你说我邀请她一道驾车的话,你会相信吗?你觉得我的举止如何?即使你猜上一千年恐怕也猜不到我会这么愚蠢。我竟邀请她与我一道在弗汉姆路上驾车!为什么选择弗汉姆路呢?因为当我们背运时,任何愚蠢的念头都会钻进我们的脑子,任何曾被情妇撵出来的情人——我们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游荡的情人在想方设法让情人重新接纳自己——都会理解我的错误,虽然没有一个人会犯我这样的错误。我还可以说出其他一些同样古怪的事,但只说下面这一个就足够了,因为当她来看我时,我不是邀请她留下来与我共进午餐,而是把她带到了一家餐馆。这真是莫名其妙地愚蠢。我竟对一切都觉得心怀罪孽感;在思想疏忽的某一瞬间,一个恋爱中的人会思来想去,最终会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某种自身之外的东西,因为人们太容易相信超自然的东西了。

但正当我在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某个罪恶之神时,她却又开始悄悄地走进了我的生活,就像春天悄悄走进冬天一样。天仍是灰蒙蒙的,但云层间不时会露出一条小裂缝。我们都盼望能有一个晴朗的夜晚,但第二天和第三天都不是晴天,天气似乎不会有所改观,但好天气毕竟快来了。一天早晨,当我们走出房间时,就一下子走进了那种美妙的温暖之中,是在每年的3月底突然来临的那种温暖。夜晚的风也已经悄悄地改变了性情。“昨天还是冬天,今天已是夏天了。”我们喊道。我的厄运就是以这种突然的方式在一个让我嫉妒沮丧的日子就要结束时突然闪烁出极度幸运的光芒。当我内心一切都暗,街上一切都亮时,她来信邀我去乡下见她。我驱车到车站,想到就要见到她了,心里非常高兴,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她离我似乎已那么遥远了。当我等着她时,我看到原出站台的边上有一位妇女,她的时髦的

长风衣,漂亮的帽子和面纱,清楚地表明了她的身份。我在心里说:“她是某一现存系统的象征,她的长服和步态表露了她的故乡、趣味、职业、习惯和朋友群。”我的脑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若是能和她一起乘火车旅行该是多么愉快呀!与这个欲望相伴的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我可以希望与任何人一起旅行,但就是伊丽莎白不行,因为我正在等她。这个优雅的女人离我越来越近了——她不是别人,正是伊丽莎白,她正要和朋友们一起旅行,我能看出这一点。但谁也不会知道自己的运气如何。她的同伴们挤在一辆车里,而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伊丽莎白的安排,我俩的座位在另一辆带篷马车里。夏天来了,光辉灿烂,我们注意到树篱正绿意盎然,我们也可能谈到了田野里谷物正茁壮成长,但我记得最清楚的——令我欢喜和惊奇的——只是她允许我把手放在她膝上的那一刻。当一个女人准许你把手留在她膝上时,无疑会给你留下某种值得回忆的东西。伊丽莎白的的话是:“好了,过了这么多年,现在你又得到我了。”

是的,夏天真的来了,4月转到5月,6月转到7月,7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灰暗的8月,我不喜欢8月,因为8月里既没有万物明显的生长,也没有什么衰败的迹象。当8月变成9月时,我们会注意到早晨的空气里已有了一丝凉意,然而这种凉意稍纵即逝;在9月和10月,有些时日好像夏天重又来临了,但在其落日里总有一些死亡的气息,总让我们想到马上就会来一阵狂风。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是一个朋友在警告我正处于危险的边缘,“一个像你这样年纪的男人,”他说,“竟不穿外套走在刮着风的街上!”“像你这样的年纪”这句话真令人恼怒,然而我还是扣上了我的长外衣的扣子,并加快了步伐。走着想到恭维人的想像是非法的,不顺从的。每个女人都梦想被匪首强奸,每个男人都想成为一个海盗,最吸引我们的季节是无法无天的季节,即是春季,“春天的一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像她,从我看到王座街旁的菩提树正在发芽我就觉得这一天多么像她。”

但春天里也有悲哀。年轻人不知道如何满足他们的欲望，中年人的思绪则回到很久以前的春天，而我则回到了15年前，一个在巴斯克乡村度过的秋天。那时春天正在我心里，秋天则与我无关，现在顺序正好颠倒。从我们一起乘马车旅行的那日起，我从她身上得到的爱或许都比我们以前的爱更丰富、迷人；但在秋日的天空里，总有一种死亡的气息，使人在死寂中，生出一种对冬日来临的恐惧；春天的爱只有颤栗、笑和一点狂热，秋天的爱则充满回忆，而对冬日来临的恐惧则提高了其价值。在秋天，在树叶纷纷落下的时节，一个男人跪在他恋人的床边，就像圣徒跪在神像前一样；我们的想像把她圣化、高尚化了，她成了理想化的人物。我急匆匆地沿着公园街走进伦敦饭店，在楼梯口等了一个小时，直到她的女友离去，听到我们约好的口哨声。

我又听到了门在天鹅绒而的地毯上开开的温柔的声音，这声音让我想起了以前那种同样的声音。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有时使人想起一个森林女神而就得出结论说她换个时候就不会让人想起布歇或弗拉戈纳尔，那天晚上的伊丽莎白在我看来就正是一个弗拉戈纳尔，当她坐在床上读书时真像弗拉戈纳尔笔下的一个丰腴的女人：她的金发扎成辫子，手里拿着一大本书。我问她在读什么书，以为我们或许可以谈一会儿文学。但她扔掉了名不副实的亚麻布衣服，裸露出青春的身体。在8月的那个时候，我在她的裸体里看到一种永恒的精神使她通体透光，就像一具雪花石膏雕像里有一盏灯。

我们根据自己与生俱来的性情发现神性。我们中有些人在艾凡赫身上找到神性，另一些人则在基督身上找到，而还有人在菩萨身上找到，我与生俱来的性情使我于一日晚上在伊丽莎白的卧室找到了神性。我们在哪儿以及如何找到神性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找到。爱是上帝。这句话是那么经常地被人吟诵，基督教的圣·约翰又说得那么好，他敢说起上帝的色

欲,因此使他的读者大吃一惊,因为几乎没人理解,神的色欲应该是人努力的目标,就像人的色欲始终是神的崇高目的一样。异教和基督教启示录只讲了一个故事,即神对人的爱,我的故事与此不同之处仅在于它讲的是人对永生不死者的爱。

我们都是秘密的寻找神性者——说是秘密的,因为如果某个沿着公园街走着、惟恐感冒而把长风衣扣扣得紧紧的中年男人告诉别人,说一天晚上他在伦敦一家旅馆的情妇床上找到了神性的话,他会被送到疯人院的。然而我并不觉得这种信仰惟我独有,每个有价值的男人都这么想,它比基督徒都还古老和流行。正是这种信仰,在年轻小伙子寻找并在海伦、莫德、梅身上找到神性时,帮助他们忍受对冬日的恐惧,年轻人!身边总是年轻人。就在昨天她还说起一个引起她兴趣的年轻人。10月变为11月,我只是她的花束上落下的一朵残花。

一朵夹在书中的玫瑰,

一个纯洁的人却不会看这样一本书。

不管这是一种自负还是一种实情,整整一晚上,我都在翻来覆去地问她,这儿是皮卡迪利大街,我忘了伊丽莎白、忘了会感冒,只顾站着看。我想皮卡迪利大街还没有变俗,只是增加了一点现代气息,与格林公园的美有点不相协调;我记得自己20年前就习惯在这儿游逛,喜欢看树叶间月光的阴影在那个美丽的幽谷间飘荡,一边还想着威切利的喜剧《圣·詹姆斯公园的爱》。我现在仍在思考:阿盖尔·罗姆斯和凯特·汉密尔顿的《在潘顿街》和《摄政时期的酒馆》何以在当时那么时髦。巴黎把我引向其他乐趣,引向新中学和爱丽丝·蒙特马特街;当我10年后回到伦敦时,我发现了一个新伦敦,一个更少英国味的伦敦。

第二章 灵魂不自然的女人

在从皮卡迪利走向坦普尔的途中,我的思想如同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样都颇不平静。终于走完了到我家途中的陡峭的上坡路,我点上灯笼,拨拨火,然后一屁股坐在圈手椅里,开始想从书架上拿下什么书来帮我消磨时间。“文学作品比学术书更易消磨时间,”我说,“读者也会有兴趣听,”一个声音尖声喊道;“读者有什么权力质问我?”我回答说;那个声音根本无视我的插话,继续说:“读者想知道你的灵魂状态……”“伊丽莎白进来了吗?”我喊道。“一粒种子落下来,”那个声音又继续说,“死了,另一粒种子又落下来死了,又一粒,又一粒,是的,如果大地没准备接受它们,即使一百粒种子也会死在落下来的地方。但在合适的时间总会落下一粒新的种子,它会发芽、开花、并——”我打断他的乏味说教说:“我看,读者想听到的是伊丽莎白之前的那个她,那个铺路的我,她——”那个声音回答:“是的,曾是这样。”“那么我是想让好奇的读者只要高兴就可以随意刺探我的隐私吗?”我问道;就这个问题,我体内的那个声音回答时很安静,静得甚至平息了我的怒火,“读者是客,因此有权力受到像你从星期六直到星期一直敞开门欢迎的客人那样的亲切接待。”“那么既然我最珍贵的酒、饮料和香烟都随意让欲壑难平的客人拿取,我又怎能合理地保持什么能娱乐我的精神客人的秘密呢?”我问,“一个最出色的诡辩家,与阿贝拉德或阿瑟·巴尔弗齐名的诡辩家,你的是艺术,我的是良知。刚开始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奇怪,但现在

我辨别出那是你的声音，良知，因此我要问你，如果我最后的秘密，也是我惟一的秘密被揭示出来并展示在市场上，那么该由谁决定所有敏感的问题呢？因为虽然我的书写有‘私人’的字样，但它们并不好立刻讲出来。”我的良知回答。“但请让我再说一句，良知，有些事是不能实讲的，不能向人们解释的，只有神的大智慧才能测量、估量和理解，你要我讲出来的秘密就属于这种事，我已在审判台前把这个秘密讲给神听了。”“有说服力的说法是，”良知回答，“你既然已选择要袒露内心，流露真情，你就必须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噢，我的良知，说的真厉害。”于是我立即开始叙述起来。

许多许多年以前，大约是 25 年前，我收到一封信，写信人告诉我，他（她）写了一本书，想让我看看他的书能不能改编成戏剧，信中有两句话吸引了我的注意：“的确，我无幸与你相识，但在目前这并不重要，”以及“我需补充说明的是我给你寄的这本书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对第二句话我不敢太肯定，是的，这句话的意义，只有“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这几个字似乎不是作者的风格。但我扔下信不管了，并且告诉读者，我的客人说：当我发现信的末尾署个男人的名字时，我很失望，因为我期望是个女人的；因此我给写信人马克·安格勒伍德说，我在他的书中发现了罕见的独特的才华，但没有人能把他的书改变成剧本。信寄出去，我就把这个名字忘了，直到阿瑟·西蒙斯告诉我书的作者是个女人，而且是个漂亮女人时，我承认这个消息让我心里一沉，因为当我回想起那本书及随书寄来的信时，我禁不住意识到我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获得一个可人伙伴的机会，或许还更多。我第二天就寄出了一封信，为我的误会道歉，说如果我能预测到马克·安格勒伍德的是个女人，而且是个漂亮女人的话，我的信就要换种方式写了。“你可能已完全忘了这件事，但我刚刚知道你不仅是个女人，而且是个漂亮女人，这不由使我想起你信中的一句话，你写道：‘我无幸与你相识，但目前这并不重要。’这句话

似乎暗示几个月前你就想结识我；如果你现在仍这么想（假定你以前也这么想），我会非常愉快地拜访你。”

这位名为艾凯蒂的女士也毫不拖延地回了信。在驱车前往一处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区途中，我不禁奇怪地想到她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理假名，这不但欺骗了我，还欺骗了其他人，让我们都弄错了她的性别。她住的街又阴暗又壮丽，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她的门牌号，然后被领着穿过一座巨宅到了一间客厅，厅里摆满了多雷的版画和大理石雕像。“毫无疑问，我置身于家庭趣味之间，”我想，“但她一定有间私人会客室，因为她不可能在这儿写作。”

等了几分钟后，仆人又走进来，邀请我跟着他上楼。我们上了许多层楼梯后，到了一间稍正式的会客室。看到她使我想起了马克·安格勒伍德的僵硬、精确、造作的字体。“她的卧室像她的会客室吗？”我自言自语，“她像她的房间和文学风格吗？”她确实两者都像；她是一个精心穿戴的女人，她的法国长袍禁不住让我想起“中产阶级”这个词。“艾凯蒂是中产阶级，而且是非常常见的那种中产阶级。”第二个跑到我心中的描述性形容词是“不雅观”。当我们坐着谈话时，这个词又回到我脑中，我说：“不雅观是一个与平凡의思想和式样过时的不漂亮的衣服相关的词。但她的长袍是最新的款式，她的思想则像新型的饰针，那么为什么我对她的第一印象竟是‘不雅观’这个词呢？”当穿过公园回家的途中我就是这样问自己的。

在我与她相处的两个小时里，我们谈到了她的名字艾凯蒂，我这才了解到原来这是她的绰号，而不是她的教名，这是她出于偏爱自己选择的一个名字，她的真名叫玛丽，但她说没一个人曾想到叫她玛丽。我的第二次造访使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困惑，因为我发现她是那么风趣、那么充满魅力，穿得那么漂亮（我现在已能接受她的长袍了），以至于我开始认为自己是傻瓜，几乎可以说是个白痴。我独自坐在房里，一边想着她，一边问自己

“不雅观”这个词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的脑子里,因为如果我要我在英语中找一个能够代表她的天才和美丽的词的话,那么再也没有比“不雅观”更合适的词了。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一封信,信写得精确而整洁,她在信中要求我去看她;随后又有一些信接踵而至。我们约好两个星期后见面。在快到约定的时间时,我怀疑自己是否又陷入了情网,我无法相信这种灾难会再一次落到我头上,因为我已38岁,已经体尝过许多思想和肉体上的愉悦;“难道我最终又要成为一个受害者么?”我说,然后想到了自己目前的状况,并在心里对爱与恋爱作了区分。显然,虽然我并不真的爱艾凯蒂,但也毋庸置疑我爱上了她。但我怎会爱上一个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常的、中产阶级的、几乎是不雅观的女人呢?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然而却总不能得到答案,我再次放弃考虑自己的错误。在最后的时刻,我仅是靠着运气才没有相信艾凯蒂;我错误的心理状态对我来说似乎非常有趣,非常有教育意义,因为有一次我想自己几乎就要向她坦白我对她并非一见钟情,而是二见钟情。我估计自己的这种诚实坦白根本不会取悦于她。在这个爱情故事中,我对她和我自己的描述都是不全面的——如果我故意隐瞒不说自己常常怀疑她在欺骗我,那我的描述也同样是不真实的——但我对她的行为的解释与事实正好相反,因为一个女人不会为了得到欺骗她的无谓的快乐而每天都与一个男人一起呆四个小时的。

仅靠某个词或某封信,有时甚至仅仅只靠一个动作,她就能够使我的怀疑烟消云散,使我几乎要说是我对她的爱把我带上她的床的。刚开始她还信誓旦旦地暗示她已对性事失去了兴趣,但女人们常常做这种暗示,而男人们并不真的相信这种暗示,或者最好从反而来理解,即她们对性事非常感兴趣。谁也没有像艾凯蒂那样动不动就谈性;她承认性是她生活和创作的主题,她肯定自己的脑子完全被性占有了,虽然有时候、特别是当

我们乘马车从剧场返回时她似乎忘了这个话题。我不敢肯定我们的关系会受到越来越少的限制,我在她身上留下的惟一痕迹是教会了她反对进步思想。现在我则常常回忆起她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曾爱过她的某大学教授的故事,只是现在这个故事已经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能记得她告诉我说教授有个情妇。艾凯蒂相信她是个好女孩,但只是个肉体动物,既然艾凯蒂是他的精神上的情妇,他自然可以为她而忽视了他的肉体情妇,故事的结局是两个女人在教授的房间里相遇,而教授已自杀。我忘了她是否告诉我教授当时在不在场,我只记得那个肉体情妇在艾凯蒂抛弃了教授后,为了他的需要又回到了教授身边,并且坦率地向艾凯蒂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让艾凯蒂明白她的所谓美德十足是一种罪恶。“你是他的情妇吗?”我问,艾凯蒂的回答是:“不,我不是他的情妇,我不会与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除非我想靠他要个孩子。”这些话迫使我艾凯蒂进行深刻的思考,因为她的聪明才智尽管敏锐得像个新做出来的针,但还不足以把一个无私女人的灵魂表露得那么清楚明了。巴尔扎克或屠洛涅夫或许凭想像力能做到这一点,但艾凯蒂不能,她只能说出她自己想说的话,也就是她知道的一切。

艾凯蒂为她圈子里的人感到羞耻,她知道他们都是平庸的中产阶级分子,她的全部生活就是试图逃避他们。她一月又一月地不让我看见他们,因此,除了她整洁的起居室外,我对整个大宅所知并不多。终有一天,她自己对我说了:“我一直在尽可能避免让你见到我的全家人。”但她说这句话时正在家里举行一次盛大的晚宴,自然不能把我排除在外——她害怕自己的家人会向我提一些让她难堪的问题——也确实有人向我提出了问题。在这次欢宴中,我结识了她的一个堂妹,一个当时正怀着孕的漂亮的金发女郎,艾凯蒂叫她小荡妇,我奇怪她为什么这样叫她,因为那女人是她的堂妹呀。一天,我恰巧在街上遇见她,于

是就陪她一起走了一小段路,当话题转到艾凯蒂时,这个金发女郎显然急于想知道我和艾凯蒂究竟是什么关系。等我坦白一番后,她才开始告诉我她所知道的有关艾凯蒂的一切。她说,虽然艾凯蒂有时为了把一个男人从另一个女人那儿夺过来可以一天换三次衣服,但驱使她这样做的只是虚荣心,“她只有脑袋,”这位小巧的金发女上说,“脖子以下就什么都没有了。在女人们看来,她是一个积极行动的、亵渎爱的恶例。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我说理解,并进而想起艾凯蒂对我说过的话:“我一会儿也离不开男人,如果我一周左右得不到男人,我就会衰弱不堪。”

对像艾凯蒂的灵魂这样不自然的灵魂是无法进行分析的,但通过一件事我们或许能对之有些许了解,但条件是故事的讲述者有让·雅克那种揭露以前从未展示过的男人和女人的种种秘密的能力,只有在他的讲述中,丑陋的事情才能获得伯利安瓷雕像的那种美,并且他,而且只有他能够讲清楚一个看到我们一起在画廊漫步的老朋友如何一见到艾凯蒂就把她当作敌人并变虚弱的。让·雅克的笔不会只揭示这一主题的一个简单方面,我毫不怀疑他会解释艾凯蒂从自己所施予的痛苦中获得的精细的乐趣。同天晚上,她在给我的信中不无快乐地说(她每天晚上都写信):“你的朋友在恋爱吗?”我一时对艾凯蒂充满憎恶,因为我知道,她以轻蔑的语气谈论的女人倒是个可以真正做朋友的女人。当我问到她对艾凯蒂的看法时,她的结论是:“思想狭隘,目光短浅,喜欢搞阴谋诡计。”她对艾凯蒂的性格作出的结论说实话是与我心有戚戚焉的,但我却无法与艾凯蒂断交;而且,随着春天已逝,我却越来越爱她了。我每天都要与她在一起呆四或六个小时,与她一起吃中饭、晚饭,一起请客、散步、谈话、欣赏艺术作品,一起在杜金镇度过许多美妙的下午,一起坐在温和的山坡上,在她充溢的爱意里陶醉,虽然她可能此时正在挖空心思计划某种新的酷刑。艾凯蒂有无穷无尽的小发明,我们一起在博物馆探索,一起研究世界文学名著,一起在皇后礼堂听瓦格纳

的歌剧(当时正是伟大的瓦格纳时代),终于有一天晚上,当我们步出音乐厅,置身于波特兰广场怡人的落日余晖中时,我们发现自己除了去到拜罗伊特听全场的《戒指》外别无他事可做。对我来说,与艾凯蒂一起欣赏《戒指》似乎是一种崇高的享受,在我看来,我们赴拜罗伊特的旅行可与乔治·桑与阿弗雷德·德·缪塞的著名的威尼斯之行媲美。

艾凯蒂也愿意去,而且车票都已经买好了,但当行期临近时,我开始注意到,每当我提起拜罗伊特这个词时,她脸上就显出一种困惑的神色。艾凯蒂从未困惑过,我这样说明显是误解了她,倒不如说是她脸上出现了一种黯然神伤的表情。她的举止一向矫揉造作,但在冈特斯,我毫不怀疑她有心事;我想,当我们绕着伯克利广场驱车游览时,或许我可以迫使她向我吐露她的秘密。虽然她费了很大劲才说出心里话,但她毕竟说出来了:“我认为我不想再看到你了。”这些话让我悲哀痛心,虽然我相信她只是一时情绪冲动才说这种话。我像任何恋人那样请求她告诉我说我们之间的疏远只是暂时的,是由于离婚之事或某种其他不幸情势所迫她才这样说的;但在去大理石门的整个途中,艾凯蒂都坚持说她决心不再见我了,直到我们到了海湾路,她才稍稍温柔一点,答应去公园里把事情谈谈清楚,虽然她有点不太情愿:“恐怕脚下有点湿。”“天没下雨。”我回答,并叫车夫停下车。

铅灰色的天空低低地压着公园,绿色的大树在雾中傲然直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们一次次在漫长的小道上走来走去,她听着我乞求,说着任何愚蠢的恋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说的话。毋庸讳言,我自己扮演了一个有点可笑的角色。直到最后,我愚钝的头脑才开始清醒了,我明白了,她是在享用着我的悲哀,就像在欣赏一出她自己发明的喜剧一样;她意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穿着中国黑绸显得很美丽,带的帽子与衣服也很般配,因而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我们在朝肯希顿方向走着,我在她右边,靠着围栏。我从她的帽子下窥见到她脸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压抑不

住的微笑,这微笑令我魂不守舍,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结果,不由自主地,我抬起左脚向她的背部踢去,正踢在她后背中心偏右的那个部分。她发出一声尖叫。我与她双目对视,但令我感到奇怪是,她眼神里流露出来的不是憎恨,因为她从来没有过自知之明。我想她引以为骄傲的是,她的魅力已让我摆脱了一切俗务,从而把我变成了另一个乔治·莫尔。(我后来才知道她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但我对艾凯蒂内心灵魂的这种瞬间透视很快就成过眼烟云了,这种短暂的清醒很快就被淹没、消失在漫漫长夜中摆脱自身、摆脱啮人的痛苦思索、摆脱虚幻的梦想、探索灵魂秘密的无望挣扎里了。我这时迫切渴望得到另一个女人,至于这个女人是谁并不重要,我想自己应该能在阿尔汉姆布拉找到她,于是我就到了那儿,挑选了一个看起来最善良的女人,与她共度良宵。我的床上伙伴慰藉了我的不幸,或似乎起到了这种作用,虽然我的痛苦与她毫无关系。我开始想弄清楚她是同情我,为我觉得遗憾呢,还是憎恨自己被挑选出来做一副安慰心灵失落的良药。但世事不就是如此吗?万事万人不都是在彼此寻找安慰自己的良药吗?慢慢地,从我的记忆深处又浮现出另一张女人的脸,许多年以前,她曾离开家到街上找人倾诉:“无所谓,现在一切都无所谓,我已经死了。”她说说着着眼泪就会流下来,就是在那样的晚上,我明白自己也只好做一副良药了。

“换换环境,听听异乡的语言,或交交新朋友都可以让我死里逃生。”我从昏死般的沉迷中清醒过来后对自己说。我已一整天就这样昏昏沉沉地坐在房子里,注意力无论如何也集中不起来,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对我漠然相视。“换换朋友,换换语言,换换环境,”我说着站起身,蹒跚着走到窗边,“巴黎应该可以治愈我。”于是我就到了巴黎。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在巴黎这样一座大都市里,我竟然意外地遇到了我和艾凯蒂一起参观画展时见过的那位女人。她问我最近见过艾凯蒂没有,我仅敷衍了一

下；我记得我俩随后去了布隆尼公园，一起划船到一座小岛上。公园的湖里真有一座小岛吗？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我只牢牢记得湖边树林里的一角，但这一角空地就是岛吗？我不知道，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角空地上我们一起躺在了树丛下有一人高的草丛里。在那儿她谈到了艾凯蒂，我虽然最怕谈这个问题，但又无力回避这个问题，怕的是她会猜出事情真相。实际上，我真是无谓地恐惧了，因为她一定早就明白我实际上是个很脆弱的男人。话题转到我们最近在画展上的那次偶遇，我问她对艾凯蒂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她的回答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女人。”

她的知人之论让我惊奇不已。我意识到自己在返回伦敦时就已带上了脆弱的印记。我一遍遍问自己：我的痛苦是否会离我而去，我是否还能享受到遇到艾凯蒂之前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生活。人性复杂至极，虽然我渴望愈合爱情给我造成的心灵伤口，但我并不为已过去的一切感到悔恨，如果我已经历过的过去并不曾发生过，那我可能还会重新再来一次，再踢她一脚，哪怕我只有一瞬间的时间来考虑我的所作所为，我也会做出这种选择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说，“这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我的眼前只出现了我的靴子在中国黑绸上留下的痕迹，这是我留给她的永恒纪念品。“即使我当时就预感到此后我要遭受的痛苦，我也会踢她那一脚的。”我喊叫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我站在那儿，毫不怀疑自己的心灵创伤正渐渐愈合。我应该在萨瓦酒店外面的那个与河流遥遥相对的台阶上找到能治愈我的那副良药，现在我必须马上去那儿，因为明天有个朋友要与我共进晚餐，而我忘了预定了。

我们总爱想到某一位命运之神，认为我们的命运是由他手里的梭子支配着的。那么，既然我们的每一种命运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那我就没有理由不相信是他把伊丽莎白送给我的，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出有别的原因。我要感谢他让她在那天穿上了

那件优雅的长服,以及那件暗红色的丝绸短服,我本应该在她决定扔掉这件短服之前就请求她把它送给我的,因为在我精神沮丧的时候,它可以成为我衣橱里的一件足以让人心情愉悦的东西,尽管我再也不会像第一次遇见伊丽莎白那天轻松自在了。在那天,她精神饱满、神采奕奕、金发飘飘、纤手细细地走进饭店,并坚持让我留下来与她共进午餐,而且还让我答应准许她偶尔陪陪我,我本来不想答应她,因为我已决定重新开始写作,这才是能治愈我的消沉之病的惟一一副良药,但她的这种任性的冲动征服了我。我想,她一定猜到了我的心病,她善良的心灵一定告诉过她,说她能治好我的病,或许也是我的哪一部书激发了她的这种想像力吧。

如果我的记忆力尚未背叛我的话,我记得巴尔扎克说过男人的初恋是通过眼睛获得的;男人必须讨得她的眼睛的欢心,虽然让她欢心的并不必然是美(完美本身就包蕴着不完美);在赢得女人欢心方面,怪异比相貌平平更让她们动心,一个奇异的念头比凭着良知赢得的爱情还要长久。因为虽然男人会一见钟情,但他欢迎的是情妇身上的高贵天赋,即自然赋予的,或他想像出来的那些品质。这些都是他快乐时慢慢吮咂的调味剂。然而女人则是通过想像而不是靠眼睛来爱的,她会凭想像把骆驼转化成一个强壮的英雄,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女孩,她在自己的美丽青春年华时期嫁给了一个4英尺6英寸高的聪明的小男人(这种身高还坐不到桌边的椅子上),但她并没觉察出自己嫁给了一个侏儒。“我以前从未注意到他的身高,”对反对他们结婚的人,她总是这样回答,“但现在经你们一说,我才看出来他是真有点矮。”

她话里透露出的天真无邪是很感人的,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看作是高贵的,或据此建立一种道德规范,在每一种恋人手册中都要包括的规范。但若真是如此的话,对他却并无益处,因为尽管很多人从理论上会理解和支持这种规范,但没

有一个人会将之付诸实践的。如果我们想留住情人们的爱,我们就要永远不要从她们给我们竖立的高台上走下来,不要说:“我厌倦了我的高台,亲爱的情人,让我下来吧,我愿做你脚下的地毯。”如果他的情妇不喜欢擦鞋,那他想把自己变成可供情妇休息的地毯的念头,是许多恋爱故事开始崩溃的导火线,因为虔诚的女人很快就会厌烦这种生活,她会从你身边走开,去崇拜另一座圣坛上的新神,因为这个神是她用平常的泥巴,以自己的想像创造出来的,她相信他代表着她的最终愿望的实现,就是她一直在寻找的偶像。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在讲述中我一直联系着我自己的故事。回顾一下我与艾凯蒂和伊丽莎白的爱情经历,我发现,在头六个月,我爱上了艾凯蒂,而伊丽莎白则不顾一切代价要击败她的对手,但当这六个月快要结束时,艾凯蒂已死,我呢,则厌倦了我的高台,我从台上下来,我感到,即使从圣坛上走下来的上帝亲吻并触摸圣·特雷萨时后者所感得的厌倦也就像我此时对爱情的厌倦吧。她在自传中也承认神父一度赢得了她的芳心,但只是一度而已,为此她恳求上帝宽恕她对教徒的不忠。

伊丽莎白是个坚定但不忠实的情妇,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不喜欢一成不变”,而是宁愿重新拾起个线头,重新编织爱情玫瑰梦。我宽恕了她的某些反复无常的言行,并且感到高兴的是,我比她们活得都长。当我可怜的小线轴已被抽空,当线轴上再也没有纠缠的线需要绕开时,一种伟大的爱情慢慢变成了一种完美的友谊,就像酷夏慢慢变成宁静的秋天那样美好和安详。在这个过程中,我忘掉了她给我造成的一切痛苦(她给我造成了很多痛苦,因为她有时极其自私自利),我只记得自己从中获得的神灵般的酬劳,就像我在前一章提到的那些酬劳,我甚至也开始慢慢原谅艾凯蒂了。我应该著文表示我的宽恕,或更诚实地说,我开始认为是她为我的更伟大的爱铺好了道路,她对我的作用就如罗萨兰对罗米欧的作用一样。

第三章 梦 巴 黎

巴黎仍然对我充满了诱惑。每天早晨7点,我都要快活地沿着火车北站灰色站台漫步,脑海里充溢着关于大海的回忆。我记忆中的大海就如一个蓝色的平原,既没有起点也没有尽头。轮船在水面划出一轮明亮的小光圈,她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流动着,其前其后都只有黑暗。在我走上站台的时候,我想起了我们乘船在黄昏开始驶入又长又弯的海港前的那一瞬,因为在绿色苍穹的映衬下,沿着峭壁有一排弯弯曲曲破破烂烂的栅栏,一颗星星在晨曦中闪烁,其倒影在寂静的海港里摇动,除了响亮的溅水声外没有一点声音。由于风小,渔船无法扬帆出海,帆半张着的船在微波里摇荡着。我们站在汽船的甲板上,看着那些奇怪的水手,那些斜靠在墙上、长相粗野的男人和男孩子们。我想起自己曾千方百计要寻找一座树木环绕的小城,结果却一无所获,但我又明明知道她就在绿色天空下、被尘土包围着,她的每一条街道都通向一座大教堂,而每一座大教堂都有扶拱垛,其圆顶则消失在一片烟囱群中。狄普是一座奇怪、伤感的小城,满街都是修士和修女,三角墙和无顶窗。在一度聚集过法国贵族的院子里,现在正卖着鱼。我们看着绿色的天空慢慢变得更加宽阔,城市也慢慢显出其轮廓,但直到我们被招呼在火车上落座时,仍只能看见一些房顶。我们沿着码头进入郊区,随后进入一个寂静美丽的村子,这个村子的周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和涓涓流淌的小溪,以及与峭壁相连的山坡。田野和山还没有倒影,仍还

是灰蒙蒙的，即使花团锦簇的果园似乎也笼罩着悲哀。但当第一抹玫瑰云在山际出现时，我又该如何说出它的美呢？世上再没有像在5月的一个早晨从狄普到巴黎那样美的旅行了。没有人会忘记他第一眼看到金光灿烂的卢恩大教堂时的心灵悸动，以及看到奔腾的河流和泊在急流中的大船时的感想。当卢恩大教堂已被我们远远地抛在身后之后，我们仍长久地梦想着她。当我们从梦中惊醒过来时，我们已是行驰在一个平坦的绿色乡村的中间了。河流绕着小岛蜿蜒而行，并穿过了矗立着孤傲的白杨树的原野，柯罗和杜比尼从前常去的那种原野，我们甚至看到了他们放置过画架的地方——上面有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的小山丘是柯罗用过的，而开阔的河岸和隐蔽的幽静处则是杜比尼常呆的地方。

第一道拦河坝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内不久，我们就看到了第一艘干草船，每一刹那，河流都变得更加晴朗、更加优美。她用自己的手臂护绕着一个平坦、树木郁葱、栖息着白嘴鸭群的岛屿。有时，我们看到它就在我们前面，青绿的树木将之团团围绕，使其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女人穿的长袍，而河水则像一条白丝带穿岛面过；而在那边，绿色的长袍则消失在萦绕在低平的地平线上的美丽的薄雾中了。这种美丽的风景令我们乐不思返，所以，当第一座房屋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都觉得深深的遗憾；随后，一座接一座的房屋出现在花满枝头的栗树间，房屋的阶梯上常有蓝色的花瓶，有时在木阳台上还会挂着用金属丝扎的灯笼。这种房屋的窗户是我们熟知的那种笨重的法国式的窗户，它赋予法国房屋一种舒适、轻松的气氛，让人想起悠久的传统，有条街的外观甚至使我们依稀想起了巴黎。我说：“我们有可能正经过阿斯奈河吗？”这个名字飞快地滑过我的脑子，我很高兴自己辨别出了阿斯奈河，因为就在长路的尽头就是我们很早以前吃过饭的餐馆，在餐馆和桥之间，就是我们曾旋转过的舞场，我就是在那儿看到了美丽的被崇拜者包围着的布朗什·德昂蒂

尼的,就是在那儿,她坐在为她谱出那种荒唐的音乐的作曲家身旁——在那些日子里,我想她唱得是令人销魂的,因为那正是她如日中天的日子。曾有一次,我和她并肩经过那所肮脏的郊区小舞场,我因此而深觉荣幸。如今她已告别人世,朱丽亚·拜伦亦已撒手尘寰,惟有霍特丝还留在人间,但她一定也很老了,至少应有85岁了。听她唱“向你发誓,我亲爱的恋人”真是一种奇妙的享受,因为她是以85岁老人的颤音唱出的。听她唱这首歌时的感觉真是美妙极了,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是个多么美妙的人儿:过去的爱之欢乐需要一个解释者,而她已拥有许多这样的解释者;许多伟大的诗人已经唱出了她的腐化与堕落。

从舞场走不到5分钟就到了哈维住过的那座小房子,就是在这里,他常常邀我们共进晚餐,而在晚饭后,他常常给我们演奏他最新创作的音乐。我们洗耳恭听,但公众却不再愿意听他的音乐了。他已经使音乐不再有美妙的声音,可怜的打击乐作曲家再也引不起公众的关注了。我们听着他快乐的歌曲,相信它们一定会重新唤起过去的那种紧张的狂热,这才是霍特丝的帝国。当她将这个帝国当作一个新起点时,整个巴黎都在喊:“卡思凯特,我的女儿,霍特丝,卡思凯特。”伟大的霍特丝·希内特,伟大的傻瓜的女神过去常常来这儿唱歌,目的只是想恢复往昔的荣耀,她那时已变老了,她的辉煌时刻已成过眼烟云,鼎盛时期也已成为过去。他徒劳地堆砌着一首又一首的模仿作品,徒劳地抓着指挥棒,他们的辉煌早已成明日黄花,连阿司涅荷本身也已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音乐厅已被推倒,再不会有交响乐团来演奏这些可怜的乐曲了,人们甚至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了。我倒记得一首合唱曲的几小节乐章,只有我记得它们,其余的一切都已随时光而消失了,就像霍特丝·布朗什和朱丽亚本人一样已在人的记忆里荡然无存。

但不管怎样我现在是在巴黎了。几乎还是那同一个巴黎,几乎还是那同一个乔治·莫尔,我的感觉依然像以前那样耽迷于

一切享乐，我的灵魂依然像从前那样对生活中的神秘刺激心旌神摇。我的青春一度在苍白的城市中游荡而过，我也曾在充满梦想的城市中自由地做过许多空幻的梦！日月流转，逝者如斯，一年复一年，但每年我都只在春天幸福的狂喜中来看城市和平原，并在布谷鸟的叫声响起之前就离开，尽管树上的花儿此时仍在盛开。我总以为巴黎和5月是融为一体的。

第四章 与皇室女演员共进晚餐

当斯蒂文森预感到自己再也看不到苏格兰时，他就在一本书的前言中写到：“在幻觉中，我依稀看到了我父亲的青年时代，看到了我父亲的父亲的青年时代，以及整个生命之流在遥远的北方翻涌流动的情景，其中既有笑声也有哭声，我好像是被突然爆发的山洪冲击到了这些终极之岛上。在命运的神奇面前，我低下头表示我的敬畏。”太好了，说得真是太好了，我喊道，但这句话读起来难道不像是他好像在压抑着某种热烈喷突的感情吗？这使我想起扑灯的飞蛾。但不管这句话包含着多么矛盾的感情，它毕竟也包含着一些漂亮的句子，尽管人们所记住的或许并不是原句。斯蒂文森想要表达的感情只表现在“命运的神奇，终极之岛”这两句话里，因为如果有人不觉得他的命运是种神奇，如果他不敬畏他的终极之岛，那么命运将会把他抛向哪里呢？加柯默·钦挈是被教皇明令剥皮处死的人，无疑是敬畏把他送到终极之岛——一块竖起的木板的——这就是命运的神奇。因为他被绑在木板子上，刽子手才便于像卷围裙一样卷起他肚子上的皮。我曾在摄政王街上看到有一只野兔在击铃鼓，它愁眉苦脸的看着我，以至于使我相信了野兔也是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敬畏那把它从树林里赶出来，并把它扔到其终极之岛——一辆独轮车上——的神奇命运的。但这些奇怪的与神秘命运有关的例子似乎都没有一名忧郁的爱尔兰姑娘的命运更奇妙。我曾在拉丁区的某一家最偏僻的酒馆看见过她，她当时正在给学生

们上酒。毫无疑问,她也敬畏她的命运,那个抛弃了她、命令她应死在烟雾中的命运,那个命令她为学生上酒、想方设法逗学生乐的命运。

有一次,杰维克斯、达瓦丽小姐和我在看完演出后曾一起到这家酒馆放松了半小时,我本认为这种地方太粗野,似乎不适合达瓦丽小姐去,但杰维克斯说我们应找个安静的角落,结果我们碰巧挑了一家由一位又瘦又娇弱的姑娘当炉的酒馆。这个姑娘的慵懒、娇弱和优雅吸引和感动了我;她双颊瘦小,深潭似的灰眼睛充满忧郁,就像罗塞蒂的一幅画,她飘逸的棕发披散到太阳穴上,像诗人那样在脖子处打成了小卷。两个女人彼此对视了一下,一个健康富有,一个贫穷多病,因此我们很容易猜出她们现在在想什么:为什么生活待她们如此不同。但我首先必须告诉你达瓦丽小姐是谁,我是如何认识她的。有一天,我去了托托尼,这是坐落在泰伯街角的一家一度很有名气的餐馆,是罗西尼进过晚餐的地方。当罗西尼有了每年2 000 镑的收入时,据记载他曾说道:“现在我与音乐的缘分已尽,它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以后我将每天都到托托尼进晚餐。”即使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托托尼依然是文学界和艺术界幽会的场所;每天晚上5点钟人就都到齐了。我到巴黎的当天就去了托托尼,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我又回到巴黎了。托托尼就是一种发布消息的方式。我在那儿发现了一名年轻人,是我交往最久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位天才画家(卢森堡就保存着他的一幅画)。他抓住我的手,急切但明确地告诉我他正在找我;他已听说我要回来,并找遍了从玛德兰到托托尼的每一家酒馆。我从他口中得知,他之所以到处找我,是因为他希望我能陪他一起与达瓦丽小姐共进晚餐。于是我们就去卡普西内街接她。我在这里之所以把她住的街名写出来,并不是因为她住在那儿对我的小故事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这个名字易于引起人的兴趣。喜欢巴黎的人就喜欢听巴黎街道的名字。与彩墙紧紧相接的楼梯,楼梯底部过道上涂成棕

色的门,钟绳等都是在巴黎人的生活中易于激起人的想像的东西。达瓦丽小姐本人就是个让人感兴趣的尤物,因为她是皇宫的女演员。我的朋友也是个有趣的人儿,因为他是那种不以把钱花在女人身上为荣的男人,他的生活原则是:如果她想来你的工作室,而你又已工作完毕,那不正好各得其所吗?但是,不管这种生活观是多么情有可原,实际上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认为,当我欣赏着他的客厅,而她又刚好走进来时,他可能差一点没说出她手上的镯子不是他送的,没说出他客厅里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要送人的礼物。他的客厅装饰着16世纪的铜像、德累斯顿细瓷器、有银饰的搁板、三幅布歇的画——三幅画代表了布歇三个时期的风格——法国人布歇时期,佛兰芝人布歇时期和意大利人布歇时期。在我看来,他竟提醒她说他没礼物送她,这真有点低级趣味。他的话扫了她的兴,我能看出来她不再像刚才那样一想到要与他出去共进晚餐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是在“弗依特”吃的晚饭。这是一家旧式餐馆,还没有按新的时尚把墙涂成白色和金黄色,也没有电灯和小提琴。晚饭后我们到邻近的剧院看了一出话剧,剧中的牧羊人逢人便说起会唱歌的小溪,不忠实的女人们互相打着趣。剧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葡萄架呀,游行呀,马车呀以及颂歌。在演出期间,杰维克斯去看剧院的各个结构部分去了,留下达瓦丽小姐本人让我赏心悦目。对我来说这太容易了,因为我非常喜欢陪着一对被爱情搞得晕头转向的恋人散步。演出结束后,他说“去喝杯啤酒”,于是我们就拐进一家装饰着挂毯和橡木桌,用着旧式的壶和美第奇罩衣的酒馆。在这家酒馆里,偶尔会有一个学生用牙咬着一只高脚啤酒杯,然后将酒一饮而尽,接着就会头重脚轻地跌出门外,却自始至终一点笑意都没有。达瓦丽小姐的美丽和时髦吸引了酒馆的所有学生的注意力。她穿着一件绣花衣服,宽大的帽子下,是一头如黑夜般的黑发;她那南方人的皮肤流光溢彩,色调或淡或浓,有黄色也有深绿色,而她那美丽的秀发则

披散在她的脖颈上，她的网眼长裙上点缀着豪华的丝带，从肩膀一直垂到腰部；就我来说，我感兴趣的是把她的成熟之美，与侍女的苍白过时的美作一对比。达瓦丽小姐坐在椅子上，扇子遮盖着胸；她双唇微启，两片红唇间露出细碎的牙齿；侍女也坐着，瘦胳膊支在桌子上，她也非常愉快地加入了交谈。仅仅从她无意的一瞥中，我就能看出她已明白自己和达瓦丽小姐孰胜孰败了。我沉醉于对她们生活的对比中了，竟很长时间没听到身边的声音，当我听到耳边响起一个声音时，我竟难以辨别出是哪国的语言。最后我才听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英国语调，于是我说：

“你是英国人。”

“我是爱尔兰人，我来自都柏林。”

想到一个在都柏林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子却被命运之神抛到这个偏远的酒馆，我一时无话可说，就只能问她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她告诉我，她16岁时就离开了都柏林来巴黎做托儿所的保育员，后来有一次她和孩子们一起去卢森堡公园，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学生，他——随后发生的事就很容易猜到了。他没钱养她，她只好来这家餐馆谋生。

“这种工作不适合我做，烟雾弄得我总是咳嗽，但人总得活下去吧。”人活着就是要走向死亡。她喜欢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不生不死的生活。我坐着，一边看着她，一边这样想到。她一定是猜到了我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因为她告诉我，她只有一个肺了，医生曾建议她去南方疗养。

看到杰维克斯和达瓦丽小姐谈兴正浓，我就俯身全神贯注地观察眼前这个忧郁的爱尔兰姑娘。她的痨病，她的美第奇红罩衣，有褶皱的长袖，都使她充满魅力。我根据本地的习惯请她喝酒，但她说喝酒会损害她的健康。当然，我也不会介意给她换买一份牛排，但她又被限制只能吃生牛排！我只得闭上眼睛，从眼角里看着她走到餐馆一角切下一片生牛肉。她说在睡觉前，也就是在大约两小时后，她就会吃掉这片牛排。

“我倒愿意把你带到南方并照顾你。”

“我怕你很快就会不愿意照料我。我对你的回报将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医生说我不再爱任何一个男人了。”

我们一定是谈了一段时间，因为当杰维克斯和达瓦丽小姐起身要走时，我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看到我对侍女如此感兴趣，杰维克斯笑着对达瓦丽小姐说最好把我留给我的新朋友。他的打趣话令我不快，虽然我真想留下来，但我最终还是与他们一道走到街上。明月正当头。就如我前面所说，我非常愿意陪着两个被爱搞得晕头转向的恋人散步，但据说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午夜的马路上。我本应该返回酒馆，但我踱来踱去，想着我刚才看到的女孩，以及她确定无疑的死亡。我敢肯定，她在这家酒馆里活不了几个月了。在午夜，当月光下的城市看着就像一尊雕像时，我们都想想点什么；而当我们观看翻卷着的河流时，诗神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那天晚上，我诗思奔涌，站在桥上诗句像河流一样欢畅。睡觉前我匆匆写下了几行诗，第二天又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写出了下面的这首诗：

就我们俩了！听，别出声，
听我告诉你为什么你那倦怠的微笑和
诗琴般的声音是那么甜美，
为什么我对你的爱比任何恋人的爱都更完美。
他只迷醉你眼中荡漾的迷蒙而甜润的温柔，
以及你纤细优美的身姿，或其他
诸如此类的怪念头，那种所有恋人都能想出来的
幼稚的借口——而我的爱则另有原因。
听，听我说，我喜欢看世界沉入苍白的静谧时晚霞的消
散，
喜欢看天空残留的忧郁和沉静，
那种庄严的神色就像在唱赞美诗；

你的生命也是这样，它会像肉感的幻像慢慢消失在遥远无际的远方，

像某个夜晚的悲哀的宁静一样回归永恒……

我要拥有你陨落时的时光；我的爱确值得接受这种馈赠。

我渴望得到它们。虽然我不曾恋爱过，
但我想我爱上了你，我已感觉到我们所剩时日不多。
我的温柔，把我的怜悯变成了悲哀。

圣洁的悲哀又变成一种快乐，一种魔力，
这使我的爱超越了其他一切爱，因为现在
死神的手臂已经环绕住你的病床，他要娶你
做他的新娘。也许，我的灵魂误解了自己的激情；
这或许不是爱，然而

看着你像蔷薇花
或某种甜蜜的思想一样慢慢凋谢，
对我却是一种非常奇怪而昂贵的快乐，
是常人的感情难以承受的快乐。听，听我说，
我要选择乡村的某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黑麦和小麦在一望无际的黄色平原上沙沙作响，
平原间躺着郁葱的山和绿阴遍地的小道，
我们要在那里度过我们的蜜月。

那里会有一座小屋，门廊和窗户上
垂挂着漂亮的蔷薇叶，并且遥遥相对着一座
阴凉的花园。

在秋日晴朗的傍晚，我们独自在里面漫步。
我们走得越来越远，一直走到公园尽头，那有
橙树的地方。不时地，
你把你百合花似的脸庞埋在我胸前小憩。再往后，
我将把你衰弱的身体带到窗台边的沙发上，

这样,当空气里充满着鲜花的香味时,
你就可以畅饮傍晚最后一抹飘逸的闪光;
我的灵魂充满悲哀。就像某个晴朗的日子,
光线愈弱愈可爱,
当沉寂的夜悄悄来临,你已得到了你所需要的
安详和色彩,
你可以拥抱甜蜜的梦乡了,
永远,永远;我会在早晚为你擦去脸上
大颗的泪珠,然后
把你安葬在玫瑰花遍开的地方,在这儿
我可以沉思冥想献给你的诗篇;
我知道,你已远离任何卑劣的欲望,就像一颗
漂亮的星星高高地挂无际的苍穹。
死亡带走的只有那么一点点,你的死给了
我深深的平静,和人在尘世间永远也找不到的纯洁的
财富。

这首诗好吗?当然不是,但它肯定是一篇好散文。除了倒数第二音节,其他的每一行都不错。删改诗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而只靠压缩“AND”也不会写出令人满意的诗句。

死亡带去的只有那么一点点,我感谢
死亡给了我回忆,让我拥有一份纯洁无瑕的爱。

我低吟着这一句诗,急急忙忙跑到卢森堡公园附近的一家酒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鼓起勇气邀那个女孩去南方生活。我既害怕自己有勇气,又害怕自己不敢开口,但我的脚却一刻没停;诱惑我的不是那种想法,而是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诗人的灵魂不是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灵魂。我真的为这个忧郁的爱尔

兰姑娘感到遗憾,因而现在急急地去找她,虽然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当然不是要给她看诗——这种想法让人难以忍受,我在去她的酒馆途中常这么说。“那么我为什么去她那儿呢?”我徒劳地问自己,并自问自答说:“因为我不会带她去南方——肯定不会。”但我仍然一刻不停地走过大桥,沿着伏尔泰码头往前走,我感到,我想是盲目的感觉,我要探求的就在我心里。她不在酒店,我坐在她负责照看的一张桌子旁等她。但她并没回来,我问身边的一个学生是否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他说知道,并且告诉我说,如果我想救她,惟有给她输血。他描述着如何把血从一个健康人的手臂中抽出来,然后再输到她那几乎没血的血管里。“如果他不停地说到血,我就要晕倒的。”我心里说。这时我听到有人说:“你脸色怎么那么苍白?”“但她已无可救药了吗?”我问,他回答说很难找到人给她输血,而且即使做手术也可能救不了她,实际上谁都无能为力了。他给我要了杯白兰地,我一路想着她回了家。

20年过去了,我又想到了她。可怜的爱尔兰小姑娘,最终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洪流冲到这个偏远的酒馆里,现在只剩下一小堆白骨了!我低头敬畏神奇的命运,是他让我这个只见过她一面的人做最后的一个想起她的人。如果我不是写了这首诗,或许我也就忘了她。现在我就把这首诗题献给她,以作为对这位不知名的姑娘的回忆。

第五章 俄国王子的情妇

奥柯达夫·巴赫斯喜欢让朋友去他的画室，几个相信他的天才的人已习惯在下午造访他的画室。慢慢地，我对他的每一幅画、每一幅素描也都相当了解了。但谁也不可能对画家做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有一天，当我走进他的画室时，我一眼看到了一幅以前从未看到过的全身肖像画。“这幅画原先是挂在后屋墙上的，”他说，“考虑到订帕加索斯装饰画的俄国王子可能也会买这幅画，所以就把它拿出来了。”他转过身，表示不喜欢听我对这幅画的赞美，因为听到自己的早期作品被人赞美，画家既不会高兴，也不会觉得受到了羞辱。“我是在知道怎样画画之前画的这幅画。”他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调色板，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新的美学发现：一直到19世纪初，所有的绘画都是先着单色，然后再上釉，我们所谓的纯色画是大卫发明的。一天，他在罗浮宫德拉克洛瓦的画中忽然感觉到某种东西，某种他不完全满意的东西，就是这种东西促使他思索起来。然而，揭示这个秘密的则是鲁本斯！是鲁本斯教给他如何画画的！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才承认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重新开始自己的教育是件危险的事；但既然学校不教授绘画，它对他又有什么用呢？

他以前的论调我都听过了不知多少遍，但我仍然相信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在自己所处的时代的风格中，不管这种风格是好还是坏。只说些什么我们必须只采取鲁本斯的方法，并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个性不受侵害等话是轻而易举的，但我们的艺术个

性实际上取决于我们采用的方法。奥柯达夫的画就比帕加索斯的装饰画或三个身穿淡红色衣服、头上顶着花篮的维纳斯更令我感兴趣。奥柯达夫的肖像画天然不事雕琢,狂暴不事精细,但这才是奥柯达夫·巴赫斯;他画这幅肖像画时还是莫奈的学生,他画得很出色,把莫奈的方法与自己的性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今天的我们都是印象主义者,我们都急于想记下我们所看到、感到的一切。罗宾斯的那种精雕细刻的方式与奥柯达夫的性情是无法谐和的,就像约翰·弥尔顿的方式与我的性情水火不容一样。奥柯达夫肖像画的背景是戈雅式的,颜色是用了灰与黑的对比色,人物面孔有莫奈的简洁,但所有这些相似处都是不明显的,而且也不重要,因为它们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奥柯达夫在观察模特时已经看过、感觉过了,就已迅速、粗略地记下了某些东西,但不管是否粗略,他毕竟记下了。他这样做是抓住主要的东西。我说是模特儿给了他灵感。“给灵感”这个词伤害了他,我收回了自己的话;我说他有这样的模特儿真是幸运。他承认,那个瘦弱纤细、容貌姣好,深黑色的头发羽毛般披散在脖子上的姑娘——她飘逸的黑发就像山鸟振起的翅膀——确实迫使人想把她画下来;在欣赏完面相后,我又欣赏起画上的她身上穿的黑丝衣服——那是一件覆着黑丝带的黑丝衣服——以及她耳朵上以及脖子上的珍珠。

我首先感兴趣的是画的品质,那是一种与奥柯达夫现在的画非常不同的品质,但画面中浮动着的灵魂是那么亲切地吸引住了我,以至于我忘了这是一幅画,而是想起了活生生的“她”,我无法将她与在巴赫斯的画室——为女人所爱的画室——里常见的任何一个女人联系起来。他总是邀请所有他偶然遇到的女人到他画室去。她们大约在下午4点钟开始在他那儿集合,然后唱歌、弹钢琴、谈论她们身边的画家,给我们看她们的鞋和袜带,而他呢,则一边挑剔地看着他的这些女人们,一边来来回回的走着,构思着他的新作品,即一幅古朴的画。我已说过,这幅

画就是他连续盯着女人看的结晶。我常常想弄明白他的外表是否能说明他画中反复出现的现代手法,因为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现代人,而是像个16世纪的贵族——他的胡子、鼻子、僧侣一样的气度都表明了这一点。他穿着毛织的紧身上衣,就像穿着一副铠甲。他即使在挑选住处时似乎也在竭力回避现代的嘈杂。他在一条以前谁也没听说过的街上找了一间画室,画室就隐藏在崩塌的高墙之后,在长满甘蓝的一块空地中间。他有时会采一些甘蓝做汤。他这样做,用他一向引以为自豪的说法,就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可怕的贫穷之中”。然而说归说,他仍还是想法在花园尽头的马厩里养了一匹马。只要天一开始转暗,这匹马就要被套上马鞍,“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这时他就会对人说,“我很抱歉,我的马正等着我呢。”

我们都出去看他骑马。我敢肯定,当他骑着马跑开时,许多女人一定会想:他看着真像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

“但这个有茶青色面容的女孩是谁呢?”我自言自语道。我的思绪在她脸上绕来绕去,好像她是拉斐尔画中的圣处女;我记得奥柯达夫曾把这幅画拿出来,希望已预订了帕加索斯画的俄国王子能把它买去。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她可能是俄国王子的情妇。那她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我心急火燎地想听听奥柯达夫谈谈这一点,所以虽然我厌烦他无休无止地夸夸其谈其绘画手法,因为我以前不知听他谈过多少次了,但我仍又耐心地听他谈了一遍,并劝慰他不要因为这幅画没有采用他目前的手法而遗憾,“因为这幅画也有其优点,”我说,“还有这个模特——你能有这个模特似乎很幸运。”

“对,她很配合,但很难让她坐下来。她是一个看门人的女儿,你想不到这一点吧?”我很诧异,这却令他很开心,他笑起来。“你不认识她,”他说,“她就是玛丽·珀莱格琳啊。”当我问他是在哪儿碰见她的时,他告诉我说是在阿尔丰茜娜家,但我不知道阿尔丰茜娜的家在哪里。

“今晚我就去她家吃晚饭，你在那儿可以见到她；她就要与王子一道回俄国了。神圣的名字！想想看，五点半，我还洗不好画笔！可她就已呆在布黑达区度假了。”我问他去布黑达区度假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

“我在马车里把一切都告诉你。”

但我们刚坐进马车，他就想起必须给一个已答应做他模特的女人留句话。他发誓这不会耽误我们几分钟，因为他不过就是说几句话而已。他给车夫指明方向。马车停下。“在二楼。”看门人喊道。我们被引进一间客厅，奥柯达夫要找的那个女人正从卧室跑进来，边跑边穿着罩衫，进来就和他讨论在发亮的打蜡地板上坐着画像的事。好不容易等他们讨论完了，我们也坐回了马车，他却又想到了另一个约会，于是他又在看门人的小房内匆匆写下些什么，这倒使我想起《一个年轻人的自白》中的马歇尔。在这段时间内，奥柯达夫把他所知道的有关玛丽·珀莱格琳的故事全告诉了我。我说过玛丽不会属于蒙特马特家族，但奥柯达夫则向我保证她是一位门房的女儿，她15岁时就已从家里跑出来在哀利赛·蒙特马特跳舞了。

但有一天，一个俄国王子看见了她，于是就为她在广场建了一座宫殿。这就是我们在驶向阿尔丰茜娜家途中奥柯达夫坚信不疑的、与她有关的故事——但他所讲的只是空架子，如果不是因为马车停下来打断了他的话，他会加上有趣的细节，让这个故事血肉丰满的。“我们到了。”他说着跳下车抓起挂在门下的铃搥起来。崩塌墙上的绿门都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矮个女人正在逗弄着两只正绕着她的腿转的小猫。她的真人一样的肖像画是由奥柯达夫画的，画中画进了她的猫，它们正从鸡棚的白墙那儿看着我。

她的花园是用碎石铺就的，在花园的墙与墙之间搭起了一个帐篷。一个穿着破烂的黑衣服的侍者已经在这儿摆好了两张桌子，现在正在每一份刀叉前面放上酒和面包片。响个不停的

门铃显然在不断地干扰着他的工作,因为他不得不跑到门口迎接客人。我不时在人群中认出我已经在画室中见过的面孔:克劳蒙蒂娜,她去年在埃尔莎学绘画,今年正在酒店的歌厅里唱“新逝的女人,厨娘”;马格里特·拜伦,他最近刚从俄国回来——但大部分客人都在外面。阿尔丰茜娜的花园是给年老的高等妓女开的,而切立萨医院则是给老年士兵准备的。“这是一座充满10月的声音和色彩的人间花园,”我想,“我在巴赫斯的画室中见过的那个肖像上的女人,她的趣味可以在我周围的这些女人身上找到。”我挨个儿仔细审视了周围的男人一遍,但在他们中间,我却找不到一个玛丽的朋友和情人——那两个长着连鬓胡子、可能曾做过证券经纪人的强壮的中年男人显然不是;那个日落西山的记者,我在奥柯达夫的画室里曾听他讲到 he 最近与人进行的一场决斗,他显然也不是;那个余日可数的苏格兰男人,他的法语女人们不懂,他的英语连我都听不明白,他显然也不是;那个看着像领班的男人——阿尔丰西娜的情人,显然也不是。他做过侍者,他用拿破仑描述滑铁卢似的神气告诉我们:他在布尔瓦多“创建”了一家时髦的酒馆。又有几个男人走进来,但没有一个是我可以划归到玛丽一类的。奥柯达夫继续冷淡地谈到她:是她引起了她作画的兴致,现在他希望她能设法让俄国人买她的画像。“她不在这儿。”我说。“她很快就会在这儿。”奥柯达夫回答;然后接着和卡门及另一个女人谈。卡门是一位漂亮女人,在“鬼”酒馆里,我每天晚上都能见到她;另一位女人则每天早晨都出现在“殉难者街”上,她总是穿着灰色外衣,手里挎着篮子去赶市。但直到我们桌上的汤盘被撤走我才看到一个黑衣女人穿过花园走过来。

她就是玛丽·珀尔格琳,她与她的肖像画是那么相象,就好像她刚从画中走出来一样:黑绸服、白丝带,头发披散在她的小脑袋上,与画中的她一模一样。她就是画中人,但又多了点什么。奥柯达夫忽略了她的微笑:一种任性、悲哀、与她的严肃面

孔一致的微笑,这种微笑与她的声音也是一致的,她的声音就像知更鸟的声音一样忧郁而甜美。她坐在桌子的尾部,成了一群女人的中心。我注意到她有时好像忘了自己在说什么,她的心不在焉似乎令她自己也很快活,但很快她就又在一片低沉、悲哀的笑声中重新拾起话头说下去。她的美给我的眼上蒙上一层薄雾,我看不见她了,或者说几乎看不见了,我继续机械地吃着,直到最后一道菜上完。晚餐终于结束了,但我又觉得晚餐结束得太突然了,因为当我还不知道晚餐已经结束时,我们就已都从桌子旁站起来了。

在我们往咖啡室走时,玛丽问我想不想打牌,但我婉言谢绝了,说我倒愿坐下来一动不动地看着她;接着她就将一个红头发的苗条女人介绍给我。她刚才是与玛丽一道来的,晚餐时就与玛丽坐在一起。玛丽告诉我这是她的亲密朋友,无论玛丽什么时候回到蒙特马特,她们都要住在一起。人们都叫她拉·格鲁,但她的真名叫维多利亚。她曾给莫奈做过模特,但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她的脸很瘦小,但我还是认出了她。她那一头红发、挤在一起的小褐眼,总使人想起一只小白兰地酒杯。人们正在传阅着她的素描本,当传到我手里时,我才注意到她没穿束腰,而是穿着旧式的灰毛线衣。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还把手搭在玛丽的肩上,建议她出什么牌。我看到玛丽一会儿就输掉了许多钱,再稍后我注意到拉·格鲁试图劝她离开牌桌。

“再玩一圈。”这最后一圈输掉了她放在桌子上的最后一个金路易。“得有人替我付车费了。”她说。

我们要去哀利赛·蒙特马特了,阿尔丰茜娜借给她两个金路易,以“消磨她的一夜”。我们都乘上马车离去,小马在陡峭的街道上费力前行;女人帽子上的羽毛在车篷上飘动。玛丽坐在前面的一辆马车里,现在正在连接着街道和舞场的高台阶上等着我们。

“这是我在这儿的最后一夜,”她说,“我要有好几个月见不

到哀利赛了。”

“你很快就会回来吗？”

“你们知道，我得到 50 万法郎，而我要去俄国过三年。想想看，要有三年看不到哀利赛了。”她环顾四周，就像一个被赶出天堂的天使看着失去的天堂一样。“这儿的树真美，”她说，“它们就像一个美好的传说。”她的比喻太恰当了，这些树伸长在夏日的夜空里，在电灯光的映衬下显得不自然的绿。在一圈白球之间，乐队正在演奏《游荡者》。

每个男人都把他的舞伴像陀螺一样旋转着。“我总是坐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她说就要邀请我去和她坐在一起。就在这时，一阵欢呼声和低语声响起来：“那就是玛丽·珀尔格琳。”跳舞的人们一下子拥到她身边来。她的侍者开始把桌、椅拉到一边去，几分钟后她就坐在了她的树下，和拉·格鲁在一起。玛丽分发着苦艾酒、白兰地和香烟，没有注意到经理和一些客人又想出一个不错的主意。经理带着一个花篮，为她的到来表示莫大的荣幸。当她接过经理的花篮时，又响起一阵更大的欢呼声，随后又有许多声音喊起来。

音乐重又奏响，人们又冲过去看四对舞，舞场中央，两个女人在踢着两顶男人的帽子；我正观看着这种表演，又听说根据客人的特别要求，有人正在准备燃放焰火。据说这是她在这儿的最后一夜。不一会儿，人们就听到一阵噼噼声，烟火飞进午夜的高空，然后稍稍下降，接着就爆炸开来，颜色则由青绿色变成了红宝石色，下落的火花就像花的颜色一样漂亮，既像玫瑰，又像郁金香。在玛丽心醉神迷地站着观赏焰火的过程中，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直到焰火的最后一片火花完全消失。

“她看起来难道不像我的一幅画吗？”奥柯达夫说。

“你似乎凭知觉就抓住了她的灵魂。”

他轻蔑地耸耸肩。“我不是心理学家，我是个画家。但我必须给她说话。”说完，他漫不经心地、也几乎可以说是傲慢地往

人群中挤去，一边挤一边叫着她的名字。他对她的魅力的冷漠也让我失去了耐心，我也向人群中走去，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他是否总是如此冷漠。不一会儿，他们就一起返回来了。

“我会尽力而为。”我听到她说了这么一句话。接着她就跑回到自己那一群人中了。

“我想你已看够了？”

“啊！这里很好，我很快乐；但俄罗斯更好，我在那儿会更快活。”

奥柯达夫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令我的感情难以接受的话；他在想着他的肖像画。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很遗憾她要去俄罗斯。

“我既然学的是绘画，当然愿意再开始画一幅肖像画。”

“你认为她会去俄罗斯？”

“对，她会去那儿；但某一天她会回来的，我会让她再次坐在我的画室里的。真奇怪人们对绘画艺术知道得那么少；艺术被遗忘了。以往的大师在两天内就能尽善尽美地做完我们需几个星期笨手笨脚做的工作。鲁本斯在二天内就完成了用灰色模拟浮雕画法制作的油画，而在半小时内就自信地、灵巧地、轻松地完成了画的色彩！他给画上的颜色比今天的任何一位画家都十全十美，不管后者往画布上涂多少颜料都不行。过去的大师有条理，现在的则没有。现在的画家一律一模一样地用刷子刷呀，在画布上上上下下地擦呀，只要画布上涂满东西，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这种画风始自莫奈，而塞尚则——好了，不说了。总之一句话：绘画艺术已是名誉扫地。”

我听得有点不耐烦，因为他的这些话我以前不知听过多少次了，但奥柯达夫总是谈他最先想到的东西，在这个晚上显然他想谈的是绘画，而不是玛丽。当我们走到该分手的地方时，我显得很高兴。

“你知道那个俄国佬明天要来我的画室，我希望他能买了那

幅肖像画。”

“我也但愿他这么做，”我说，“如果我有钱我也会这么做。”

“我倒希望你要我画点别的什么东西，除非画像上画的是你追求的女人。但等一等，后天你不是要来我这儿坐坐吗？”

“对，”我说，“我会来的。”

“到时我就能告诉你他买不买我的画了。”

三天后，我站在门槛上问他画是否卖出去了？他告诉我事情还没确定下来。不久我们就听说玛丽和王子一起去了圣·彼得堡，这是数月内我们第一次听说她的消息。但几乎每一周都有什么事让我想起她。一天，我在西比莉亚家的走廊里看到一本打开着的游记，书中讲到，有一个亚洲原始部落的男孩被丢弃在沙漠里奄奄一息，一个绅士发现了他，就把他从沙漠里带到莫斯科。绅士收养了他并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把他从一个野蛮人改造、感化成城市中一个时髦的年轻绅士。收养他的绅士一直没告诉他他的身世，直到有一天他在莫斯科遇见了一个本部落卖兽皮的人，这个秘密才被揭开。兽皮的气味唤醒了他对沙漠的渴望，这个被改造过的野蛮人从此情绪低落下来，尽管他的养父给他许多钱供他挥霍，希望借此来让他重新高兴起来，但都无济于事。钱和爱都无法抚慰他的思乡病；随后他就在莫斯科消失了，许多年内都没人听说过他的消息，直到有一天一个商队回来说在一个野蛮人部落中发现了一个文明人，这个文明人无疑就是那个消失的年轻人。他说法语，就是这一点暴露了他的身份，但当人们再进一步问他时，他却表示他一点也不懂法语，并说他从未去过圣·彼得堡，也不想去那儿。在我看，这个故事也就是玛丽·珀尔格琳的故事，一旦她厌倦了俄国的王子和宫殿，她也会回老家度假的。

几天后，我在巴海斯画室里就听说她从俄国逃回来了；当天晚上我就去阿尔丰茜娜家吃晚饭，希望能在那儿碰到她。但餐桌上除了克劳蒙蒂娜和两个证券经纪人外再无旁人。我急于想

知道有关她的消息,但我又不愿自己亲口提到她的名字,直到沉闷乏味的晚餐就要结束时,才有人提到她的名字。她病了,病得很重,但还不至于死。阿尔丰茜娜把她的地址给了我。她和塞克·弗那多住在同一个山坡上,但还要更高一些。阿尔丰茜娜说这个地方一问就知道。我乘上一辆马车驶向又陡又多石的“殉难者大道”,路旁闪过一家餐馆,随后又是一家餐馆,再往上则是一个接一个的水果铺和照相馆,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些平时不会注意的东西,是因为我心情紧张,而人一旦心里有事,即使对偶然碰到的东西也会多费些思量。马车第一次停下来,就正巧停在我要找的房子门前。仆人告诉我她住在第四层楼上。当我走上楼梯时,我想到了拉·格鲁,想到了她凌乱的衣服和红色的头发。过了一会,她请我走进一间没有家具的客厅。

“她正说今晚去呢。我们这儿有三四个人都要去。你都认识。克劳蒙蒂娜·普提涅和马格里特·拜伦,你都认识她们吗?”她又提到几个我不记得的名字,然后打开门喊到:“玛丽,有人找你,是从阿尔丰茜娜家来的一位绅士。亲爱的,你认识他,是个英国人,是个英国人,奥柯达夫·巴赫斯的朋友。”

她伸出手,我长时间地握着她的这双手。

“英国男人真温柔。自从我生病——”

我想玛丽没把这句话说完,即使她说完了我也没听见;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她说到我不喜欢纸牌。

“我把钱全输光了的那天晚上,你在阿尔丰茜娜家没有玩纸牌。你去看看维多利亚的画吧。她画了一些很不错的画。你去看看这些画吧,让我们打完这圈牌。然后我再与你谈,他们都说我病了,对吗?但既然我回来了,那我很快就会好的。我在蒙特马特总是很好,对吗,维多利亚?”“我的房间也没添置家具。”玛丽说。她说到房子里缺少家具,也送到了立在地板上的钟表和蜡烛。但家具越少,睡衣里不就可以有更多的钱和珠宝吗?在打牌的过程中,玛丽就一直玩弄着这样的一颗珠宝。她的衣袖

是那种有饰边的宽袖,每当她抬胳膊换耳环时,她的瘦胳膊就显得又柔弱又娇嫩。她的娇小之美,象牙一样洁白的皮肤,与她周围粗糙的环境构成鲜明的反差。她的娇小灵巧的鼻子,美丽协调的鼻孔,她的樱桃红的嘴唇,她的犹豫不决、欲说还休的娇羞,都使她周身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魅力。她的脸上不时闪过一种温和的神色。“奥柯达夫,”我自言自语到,“看到了她的本质;他画过她——不但画出了她的形体,而且画出了她的灵魂,虽然他每天至少要有20次否定这一点。”玛丽的灵魂像水花一样在她眼中闪现,随后就沉落不见了,而我看到的则是另一个玛丽,一个荡妇,一个与从阿尔丰茜娜家来的另外五个人一起打牌的玛丽,一个在挥霍着金钱和健康的玛丽。在俄国王子送给她的一张漂亮的“帝国桌”上,放着一瓶苦艾酒,而克劳蒙蒂娜的小狗皮球则卧在旁边一只绣花垫子上。这只小畜生就要生孩子了,因而她一边踢打着自己的丝质外套,一边满腹心事想着就要降临到头上的苦恼。我听到克劳蒙蒂娜的声音比谁的都高,我听到她说牌打得不公平。拉·格鲁(意为“胶水”)告诉克劳蒙蒂娜她并不受欢迎——“最好先清扫地板”,这句粗话由她的粗嗓门喊出来显得尤为粗鲁。我听到她们越来越厉害地互相指责着。在一片乱哄哄的吵闹声中,我还听到玛丽哀怨的声音,她是在求我别相信她们说的话。这些女人们互相撕扯着头发,抓着脸,玛丽跳上床,趴在那儿哭起来。有那么一会儿,她们好像又要坐下来打牌了,但突然间她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钱抓起来,接着又去抓别人的钱;她们一边喊着别人是贼,一边撕扯着走过房门,最后走下楼梯。皮球突然意识到自己就要被主人落下了,于是从椅子上跳下来,追随她的女主人去了。

“帮我找找胸针。”玛丽对我说。我看见她正用虚弱的双手翻着睡衣。她的一些珠宝不见了,包括一个胸针,几颗珍珠,以及她所有的钱。她跌坐在枕头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的小丝手绢很快就被泪水浸透了。我问过她之后才知道,她被偷

去的钱是一位供货商送给她用于修理烟囱的费用——共 2 000 法郎——的四分之一,但现在这笔钱只剩几法郎了,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些钱只够她“消磨一个晚上”。她请求我去服装师那儿去拿她的一件长袍,她和服装师已说好在 10 点钟她去取。她对我说:“我 11 点到。再见,再见,亲爱的心肝,现在让我休息一小会。今晚上我还会再见你。你知道我会坐在哪儿,在左角。他们总把那些位子留给我。”

她的眼睛闭上了,很快就沉入梦乡,她安静合理的睡眠倒使我想到了她混乱无序的生活;看着她,看着她这个孤独地躺在这里的可怜的蝴蝶,这个被她的朋友和伙伴抢掠一空的蝴蝶,我想起了她在找到被她朋友忽略的几法郎时说的话:“足够一晚上用的了。”

她或许可以给俄国王子写信求援,但他无疑对她不能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感到厌倦,并且他也知道,即使他给她送来钱,这些钱最终也不知会跑到哪里去,所以他也就对她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即使她不再在街上卖烤土豆片,那也只是她自己的错。”他可能会这样对人说。但她的堕落真是她的错吗?奥柯达夫的答案可能是:“咎由自取”。“他的话总是这么肤浅,但他给她画的像却不是纯粹的讽刺。”我自言自语地说,接着想起她准备去哀利赛的事。

现在是 6 点正,而她 10 点就要穿她订做的新长袍,因此我现在就必须马上去服装师那儿;不过不去或许更好——她躺在床上,美丽而安详;而在哀利赛她则会喝酒、抽烟,一直要到凌晨 3 点,但我已经答应了她,如果我不履行诺言,她不会原谅我的。

服装师说珀尔格琳夫人 9 点就要她的衣服。10 点半时,我已在哀利赛等她了。我绕着石路走来走去,栗树叶不自然的绿色令我厌烦,舞场里热闹的四对舞也提不起我的兴趣。人们不时会聚成一团,接着人流又会分散到树下的镀锌椅子上和桌子边,愉快地读书或抽烟。我注意到玛丽的朋友们那天晚上坐在

拐角处的一棵高树下,但她们并没邀我与她们共饮,因为她们怀疑我知道她们正在挥霍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等了大约一小时后,我失望地离开了那儿。我边走边想:虽然我警告过服装师,但他还是让玛丽失望了。否则,她的缺席就可能是因为她突然血流不止。我本准备明天早晨再问这件事,但我突然想到自己明天早晨要与奥柯达夫共进早餐,并且下午也要与他在一起,因此我决定晚上再问这件事。晚上,我们正坐着,听到楼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

“不过是几个女人而已,”他说,“我不想开门。”

“但一定要开。”我说,因为我敢肯定来者一定是玛丽的朋友。开门一看,果然如此。她们带来了玛丽已死的消息。人们在她的阳台上发现了她的尸体,身上穿着刚从服装师那儿拿来的长袍。

我希望奥柯达夫不要用某种下流的玩笑轻描淡写地对待这件事,但我没想到他会那么严肃,严肃得让我吃惊。“甚至奥柯达夫都不会拿死亡开玩笑。”我说。

“我不理解的是她到阳台上做什么。”奥柯达夫说。

“我想她是出来看焰火的——燃放焰火的时间大约在 11 点。”

这就是一个曾经有说有笑的女人的命运。

我们沉郁地、静静地站着,眼睛注视着她的画像。

第六章 艺术的游戏已经结束

明天,我将驱车去吃早餐,要看着巴黎一点一点地在我面前袒露她的美姿,我还要欣赏她的一个接一个的景观,欣赏她的草地、白色建筑、花团锦簇的别墅。而今天,我则是驱车经过了布朗什街的白色长道去吃早餐的,看到的则是马车夫昏昏欲睡的后背:如果不是布朗什街的大铺路石把马车颠来颠去的话,马车夫可能早就沉入梦乡了。我觉得拉车的那匹可怜瘦弱的小马爬不上勒匹克街,它不会把我拉到巴特的,于是我就打发了马车。我这样做一半是出于怜悯,一半是想研究一下勒匹克街,因为这条街是典型的下层人中的上等人居住的地方。在布朗什街上有能通过车辆的大门,而勒匹克街上的门都很窄,一部分门还装有栅栏,而门又都是开在狭窄的过道上的。在过道的底部,在墙和楼梯之间,夹着供穿罩衫的门房坐着休息的小房间,周围则堆放着蔬菜和缝制品。木制的百叶窗镶嵌在已褪色的黄墙上,窗户里露出一角白色窗帘和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她正盯着一只罐头桶,桶里有一只睡着的兔子;她的男人,一个补鞋匠,正坐在窗户上敲打着,皮革味在走廊里飘了有好几步远。街上的好几个门上都有一个女孩子在坐着织女帽,她们都因为精疲力尽而脸色苍白。在邻街的拐角有一个酒商,在他对面,一个肮脏的小个子煤商正站在他称作店铺的一个小洞前。一群披着看不出颜色的围巾和穿着厚毡毯拖鞋的女人手臂上挂着篮子走过去。这里到处都是贫穷、低贱的生活迹象,但在我们伦敦街上,哪儿也没

有这么多发狂似的可怜虫——光着脚的男人、小偷、惊慌失措的生灵，以及吞咽着一片面包皮，拉过一件又黑又烂的衬衣披在饥肠辘辘的肚子上的流浪汉。

路上的沥青正在融化，铺路石的反光让人难以忍受，我的脚又热又疼。在街的尽头，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片更贫穷的居民区，这儿的街道也更陡了，但也更窄了，窄得路上已有阴影了。在这条街的尽头是一个楼梯，楼梯上是一处杂草丛生的土丘，土丘上则立着一架风车，风车的风叶黑糊糊的，一动也不动。因为风车现在纯粹是一个不出声的摆设，一个“烘饼屋舞会”的标记。

越往上走，街道显得越白，到巴特时，除了白花花的阳光外再也看不到其他什么东西了。忽然，我的目光被几件旧家具吸引住了，那是一个破旧的门面和一些断柱子；它们立在破败不堪的公园中间，周围环绕着坍塌的白色高墙。透过一个破旧的门口，我看到有一股正喷溅着的泉水，但这些房子里却没住人——只有一个女工，一个年轻女工和一个在灰尘中哭着的小孩。但这里一定曾住过许多人，我甚至开始想弄明白以前山顶上是否有过一个国家。

在我左边有一扇铁门，门的铰链已经锈迹斑斑。门通向一个大平台，平台边上是一排房子，我的朋友就住在其中一所房子里。我在拉响门铃时还在想，看到他所获得的快乐足以补偿我爬坡的辛苦；我的思绪还飘回到了我与保罗相识的漫长时光。从我们开始真正生活，也就是说，从我们开始写作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仆人来开门了，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他又有一个孩子了！仆人告诉我，先生和夫人出去了。早餐没有了，香烟没有了，也没有关于文学的高谈阔论了，我只有再穿过灼人的阳光走上漫长的归途——在这个地方连马车都找不到。仆人说我应该事先写信通知他们我要来，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可是无论如何我要休息休息，我请那位仆人离开一会儿，让我独自坐着休息一下。啊，仆人给我拿来了酒和一支吸管，这真是太好了。她告诉

我坐在书房里要比坐在门房舒服，这话是不错，因为太阳的白光这时正穿过房子的裂缝，像尖刀一样横在地板上。真是个好心的姑娘，我真要好好谢谢她。坐在舒适的书房里，喝着鲜美的酒，我才注意到这所房子是建在陡峭的山坡上的。在 50 英尺——或还不止——在 100 英尺下有一座不知是怎么建在山凹中的公园，公园里种着树，都是很高的树，因为它们上面挂着秋千，否则我就不会知道它们是高树了。从这个窗口往下看，它们就像灌木丛一样。在包围着这样的公园的一层层房子之外，巴黎就平铺在平原上，模模糊糊的红色的一片，就像一个巨大的砖场；再远处是山脉，山上则是像灰色的香烟一样的又苍白又迷蒙的天空。

我无法无动于衷地看这个城市，她曾就是我的生活，因为我年轻时就像一个情人一样来到这里，把自己交托给巴黎，我的冒险没有一次是在巴蒙东、达维瑞城、弗旦尼布鲁之外进行的，我已把她当作了我的故乡，因为她是亲自选择的故乡，所以对我来说她比我的出生地更加可亲。有个可以亲近的国家真是一种奇妙的快乐——这样，当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庸俗不堪时，我们就可以到那里去，并一定能在那儿找到所有失去的感觉，以及那种不负责任的人性的自由。我在蒙特马特找到了一种属于我但又不完全是我的文学，一种像一个高雅的情妇一样的文学，我在其中发现了可以抚慰生活中的一切平庸的东西！这种对比是真实的，因为虽然我对这些法国人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世界上其他任何人的了解，但他们也一定只是保留在我的假期日记中而非我的日常生活中。事情竟是如此，真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实际上我了解的是活生生的日复一日生活着的他们。譬如保罗，我了解他的思想中惯用的色彩和每一处色彩暗淡的变化，然而我却没有把他当作我小说的主人公。我了解他何时起床，穿衣服要用多长时间，穿什么。我知道他早餐吃什么，他走哪些街道——这些街道的形状、色彩、气味。我能确切地了解他是如何生活

的,以及生活是如何影响他的,我还记得与他在伦敦相遇的日子!他当时来巴黎约会一个小女农场主,他去诺曼底写小说时就迷上了她。他们在伦敦结了婚。这就是他们的住所,那边是餐厅,里面有一张质地很好的橡木餐具柜,还有配套的六把椅子,左边是他们的卧室,婴儿床是伟大、卓越、敬爱的一家之主送的礼物。

保罗和保罗夫人大约 12 点才挣扎着从被子里爬出来,然后慢吞吞地吃早餐和把玩一些小巧的玻璃酒杯。随后就会有朋友来访。在大约四点的时候,保罗开始写文章,在晚饭前他要完成或接近完成这篇文章。然后两人又慢吞吞地消磨晚饭时间,直到保罗不得不起身去把文章送到报社为止。送完稿子,他会在印刷所或酒馆里再消磨一段时间,直到他的文章校样出来。等把校样看完,他就会在许多酒馆里流连忘返,没完没了地抽烟,喝酒,在凌晨三四点钟之间才摸索着回家。保罗体胖,性情温和。他信奉自然主义,全天的生活都尊奉顺其自然的原则,特别是在早饭后总要来上几小杯酒,从不间断。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一句难听话,也从未在背后说过谁的难听话,我敢肯定他连想都没想过。在过去,他喜欢青年劳动妇女,但自婚后他就只想妻子了。他的作品枯燥乏味,但在巴黎没有比他更好的丈夫了。现在你和我一样了解他了。他写的书有:《露丝·珀尔格琳的末日》,这个故事我也刚写好。这本书怎么样?读者会问了,我的回答是:我曾写过保罗也写过的一个故事,这本书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作品,因为当我向他说起玛丽·珀尔格琳时,他奇怪他听到的名字竟是玛丽,他一直以为她的名字是露丝;然后我才知道他根本没去过阿尔丰茜娜的家,他所知道的与她有关的故事是从那些在午夜拐进“吝啬鬼”酒店喝洋葱汤的妇人口里听来的。真遗憾,他说,他写这篇故事时我不在巴黎,因为我讲出来的她的故事要比“吝啬鬼”里的女人们讲的更让人同情,而且我还可以给他补充许多她们没注意到或忘掉的绝妙细节。对我来说这很

容易,因为玛丽·珀尔格琳就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只需按一下发条,就能看到她那小巧玲珑的漂亮脑袋,苍黄的脸,黑眼睛和黑得发蓝的头发。玛丽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故事中的一部分,所以我要毫不犹豫地说:任何取笑她的人本身就是荒谬可笑的。我是她的朋友;我在她的灵床边观察过她,从此我自然就是她的历史见证人。谁能否认我对她的故事的所有权?谁会不赦免我的“剽窃”之罪呢?

我在他那儿看到了《卢贡·马卡尔家族》。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作者本人送的,龚古尔、于斯曼、杜兰特、西阿拉、莫泊桑、埃纳克等人的书他这里都有。这些书曾伴随我长大,并在我脖子上围上了第一张文学围涎。但他这里也有朱罗斯·拉法格的《传奇道德剧》和兰波的《感悟集》。保罗从未读过这些书,我估计人家送给他是让他写评论的,他却原封不动地把它放到书架上了事。

这就让我想到,除了自己生活的时代外,其实人们对别的时代所知甚少。当然我对象征主义者的了解比保罗稍多一点,因为我是最年轻的自然主义者,最老的象征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影响了绘画艺术,象征主义者影响了音乐艺术;自象征主义者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艺术形式出现了——游戏已经玩完了。当于斯曼、保罗和我自己都已死了时,如果还有谁要写一部自然主义小说,恐怕和复活大懒兽一样是不可能的了。埃纳克又在哪里?当莫奈不在人世时,如果还有谁要再画一幅印象主义的作品,恐怕和复活鱼龙一样是不可能的了。每一种小规模的思想运动都只能独领风骚5~20年,随后再出现的就难以让人理解了,就像莫奈、柯罗说的那样……昨晚滑稽歌剧的音乐就是新一代的吗?如果是的,我就要真感到遗憾了。与我一道去歌剧院的一位朋友在中途愤而离去,但他是因为别的原因:他耳朵疼;我是心疼。当剧中男孩说:这真是一条大船时,长笛为什么演奏半音阶的曲调?当女孩回答:这或许是别的东西时,为什么所有的大提琴都

拉响了呢？我觉得受罪是因为歌唱者和管弦乐队的脱节，或许直到剧终两者才统一起来。歌唱者是通过音乐来说话的，他们的声音或高或低，与音乐配合以表达不同的感情。在《罗英格林》中，人们会听到有个和弦在延续艾尔莎的声音，另外还用—个主题来吸引人们注意故事的某一部分，而且，当奥楚得在教堂门口用尖声唱出歌剧的秘密主题时，或许会有人批评他采取的方法是粗糙的，但最粗糙的情节剧也比那种病态的音乐要好。但说不准某一天我会有不同的想法。当我沉思着新一代音乐，想着它给我带来的困惑时，在游廊的另一边传来一个流浪者的歌声：

我，我疯了，我留在我的洞里。

我说：“我听到了流浪诗人嘴里唱出来的真理，他或许连躺下的洞都没有。”“我也是，我歇息在我的洞里，我的洞足够我容身，因为我的洞在东方”——理查德·瓦格纳。我的洞是拳击场——神圣的拳击场。我再一次陷入沉思。

瓦格纳和施特劳斯的目的一都是要写出音乐。不管沃顿对着故土沉思多久，一旦小提琴开始演奏，剧场中的机关接着就要打开，而恋人们则飞向了树林！……

流浪汉又继续着他的悲鸣，忘了保罗，忘了巴特诗人哲学外的一切，我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往回走，边走边重复着流浪汉的话：

我，我疯了，我留在我的洞里。

第七章 女人是男人一项严肃的工作

我要去见我亲爱的朋友们了。滑稽可笑、裙带一样的小铁路火车会把我带到他们那儿去,但错过圣·拉萨尔站让我有点小小的遗憾,因为每到星期天早晨这里就很热闹,巴黎人就是从这里登车,带着他们的妻子和情妇到他们喜欢的郊区去。在穿过这些通向书架琳琅、又宽又大的画廊的宽阔楼梯和蓝色小门时,我没有一次不体验到一种幸福和快乐的颤栗——是那种与巴黎的5月有关的轻浮晕眩的感觉。但贯通“一致广场”的有轨电车一直通到帕塞,所以,虽然我也爱这个滑稽可笑像裙带一样的小铁路,但我更爱这种电车轨道,因为电车是沿着塞纳河和哀利赛广场公园之间的码头轰隆隆驶过的,并且还穿过数英里长、盛开着花的栗树林。道路沿线几乎全被栗树叶荫蔽着,地上露出斑斑点点的花纹。我一阵兴奋,抓住了一朵花,抚爱了一会又把它扔掉了。大胆无忌的小汽船现在正驶向码头,屁股后荡起一股股水波。我更喜欢这条明丽的小河,而不太喜欢忧郁的泰晤士河,因为她沿岸阴郁的淫荡像宽叶香蒲一样繁茂!看哪,那白色的建筑,廊柱,两边有栏杆的台阶,蓝天下的圆屋顶,立着纪念碑的草地!巴黎像所有有异教味的城市一样到处都是雕像。一会儿,我们又隆隆驶过高墙围绕的公园。终于,帕塞的街道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都是普通的街道,和伦敦的街道一样,我并不喜欢它们;但车站则是快活的,它被各种各样的矮树围绕着,就像个纸盒子。火车冒着浓烟驶进驶出,就像一顶时髦的女帽。

巴黎的一切都令人愉快；车夫躺在车座上睡觉，拉车的小马们则在栗树下打盹；穿罩衫的工匠斜靠在棚架下的桌子上，喝着16升一瓶的酒，奥特猗的别墅，豪华的木制品，豪华的铁栏杆……这一切都让人赏心悦目。在夏天，绿树环绕的别墅一片静寂。奥特猗就像一朵花，她的花蕾伸展开去接受空气的亲吻，它的根则在富饶的土壤里摸索前行。各种思想在巴黎畅通无阻，我的思想也加入了这种合唱，虽然我几乎还不明白他们在唱什么。我的思想像太阳一样歌唱，但请不要问我唱的是什麼；它们就像我也是其中一分子的太阳那样意味深长，或什么也不意味——我就要可以享受30天法国的快乐阳光了，因为5月我就要去巴黎，更重要的是去见见在奥特猗等着我的亲爱而温和的朋友们。6月将把我从他们身边带走。但6月尚还遥远。在郁郁葱葱的树丛中有别墅、有穿着浅花色的衣服、站在画架前的朋友在等着我。在那里，阳光穿过树叶，照射在茂密的高草里。一个4岁的女孩，即他的模特，正坐在杜鹃花丛中，在一望无际的美丽绿树绿草的映衬下，她的上衣和帽子显得尤其白，白得让人难以相信。

年年复年年，我每次都受到同样热情友好的欢迎，那种在杜鹃花丛和栗树花丛中的自发的欢迎令我心动不已。我会在花园中留恋徘徊，但也可能不会，因为早饭已经备好，而且在女士们做弥撒时缺席确实失之恭敬。弥撒！多么温柔的名字，每次看到老太太乘马车去做弥撒都令我很受触动。涤除了信仰的宗教是件令人愉快的、几乎可以说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对有些果实来说，干的要比生的好吃；宗教就是这样的果子，宗教如果纯粹成为一种令人愉悦、习以为常的习惯，那我们就应当保护她，为她辩护，因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习惯生活，历史就不会留下任何踪迹、记录，就像我们在谈论一幅画时可能会说的：那样生活就太平板无味了，即没有透视效果了。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的故事，它能告诉别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成了现在这个样

子,等等。看看,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绪论,但我没有时间仔细想透这件事了,因为这儿有个医生正举起他的颅骨图,脸上带着出于心地善良的美丽的尊严。他的善良是一种纯洁的天性,是独立于任何程式、法则之外的东西,是自由自在的,就像莫奈的绘画一样。用狄盖斯的话说就是“一个谁也不曾睹其芳容的人”,这句格言使我们想起他脸上浮现着的美丽的善良,那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光。但为什么是从天堂来的光呢?天堂是丑陋的教士们的发明,天使是丑陋的希伯莱人的发明。在奥特猗想到天使是不可饶恕的;与亲爱的医生相比,天使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天使有翅膀,这只可敬的鸡也有,家禽生来就是要作桌上的美餐,它的作用与蔬菜一样。一个被禁止四处跑动的可爱的鸟就像我们孤苦无助的英国鸡一样连自己都会厌烦的,它活着就是为了长肥一些,不需要对生活有任何无用的了解或欲望;它在幼龄时就被阉割了,接着就被送进养鸡场,在那里它只需不停地吃啊,吃啊,直到它肥得几乎走不动,直到它只能蹒跚地走到自己的床上,它躺在那儿,幸福地消化着腹中的食物,直到它的肚子被再次塞满。就这样,它不需对生活有什么理解、感觉,只是不停地长着,逐渐到温和地走向其命运的结局——成为一顿美餐!什么结局能比做一只肥鸡更好、更伟大、更荣耀呢?羊肉店里的羊尸开始让欧洲的良心感到震惊了。砍断羊的喉咙毕竟是冒犯众怒的事,但是如果用特制的长剪刀剪断鸟的舌头则被上流社会认为是有失教养的事。当然,这样做也会使鸟扑打一会儿翅膀,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鸟的翅膀扑打扑打就大发善心。人是仁慈的,是他救了家禽的命,家禽长得像棵芦笋!谈到芦笋,这儿就有从阿金图依运来的像雨伞一样厚而新鲜多汁的芦笋!不妨再谈谈酒。法国红酒在英国品尝起来总好像是墨水,但在法国则能品尝出太阳的滋味。6月的甜瓜最好——但最好的肯定是阿尔及利亚的甜瓜,这是我最喜欢吃、也只能在法国吃到的那种肉肥汁多的瓜;但这种事只是瞬间留存,过后就被人

忘记了；但鸡却永远不会被人忘记；在以后的20年里我仍要谈到鸡，因为变成肥鸡就能在20年内声名永驻——我们谁还能奢望更多呢？

当我们从桌边慢慢站起来时，医生把我叫进他的诊所。他在与我说再见前总会给我一支香烟。点着烟后，我跟着他走到花园顶端的工作室，这是一间被他装饰成浅黄色和蓝黑色的通风畅亮的画室。墙上挂着那些伟大的现代大师——莫奈等——的作品。莫奈的那幅草原风景画就像日本的水彩画那样流畅：地平线融化在昏暗的阳光下，远处一所教堂仍隐约可见。但我们不妨看看狄盖斯的《舞蹈课》。一个跳舞者正走下螺旋形的楼梯；我们只能看见她的腿，因为楼梯把画一分为二了。在她的右边是男舞蹈老师；学跳舞者的动作出了差错，因为他正恳切地伸出手教；画的前景是一群跳舞者正坐在椅子上，她们的妈妈用围巾盖住她们的肩膀——多么好的妈妈，她们担心女儿的健康，也担心着她们的生活前景。

这幅画透露出一种好奇、探询和暴烈的心态。那种方格子围巾就像福楼拜小说中的形容词一样出人意料。紧挨着这幅画，挂着一幅莫奈的肖像画，这幅画画面广阔，像大自然一样神秘永恒。狄盖斯是属于思想型的画家，但与莫奈这样的天才相比，他的思想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昨天我在罗武荷，我是负有特殊使命到那儿的。但在那儿，无休止的试探和争论令我厌烦，于是我就转到萨拉·卡黑以作休息。我在那里漫步游逛，等着出现什么能吸引我的东西。很久以前，《蒙娜丽莎》是我的一次心灵冒险，我还记得提香的《葬礼》是如何令我心醉神迷的；但今年引起我关注的则是瑞布郎特给他妻子画的肖像画。画上她妻子的脸告诉了人们她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作为女人，她似乎意识到了她的性别给她带来的压力，以及她自己的特殊命运给她造成的压力——她是瑞布郎特的妻子，也即意味着她是他的仆人、附属物和护理者。这幅画唤醒的感情冲击几乎可以让人

捉摸得到。它就像音乐、像突然冲入鼻子里的空气那样刺激着你。当我走近前去看时,我才发现她的眼睛淡成了褐色的阴影,但一当我退回来,它们就好像在向我讲述她的故事了。她的嘴只不过是一个小暗点,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她面部的颜色是白色,稍稍着一点沥青;面颊则是黄里透着玫瑰红,仅此而已。她穿着一件皮夹克,但画皮衣难不倒瑞布郎特,因为他并不想把画画成现实主义的。他只要画出皮衣的意思就行了。她耳朵上挂着灰色的珍珠,胸前别着一枚胸针;画的底部是一只手,但手掌部分是在画框外。她的下巴、手和臂都好像不是精心画成的,面是自然天成的。画面上的人好像正在画布上休息,画家好像给她注入了生命。不是有个伟大的诗人说过上帝吹口气就使亚当有了生命吗?这幅画也是如此。与这幅画相比,其他的画则显得干巴巴的,根本不值一提。但也有一些文化名人无法接受画中人沉闷的微笑,后来我听说,因为人们知道了她的微笑是针对关于她的流言蜚语的,所以才原谅了她。在这些聪明的道歉者中不包括佩特,因为他把画中人的微笑描述成神秘的,而当作家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时,他们是最喜欢用这个形容词了。但我们为什么很难找到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个全世界都厌烦的东西呢?《蒙娜丽莎》就是一个谜、一首诗,是诗人心血的结晶,一首拟叙事诗,一首回旋曲。因为她留意的是文学界而非画界,所以她把许多诗人吸引到自己周围,激发了许多平庸诗人的灵感,导致了許多平庸的诗。但我们必须原谅她这一点,因为在大约5~20年前(我总是记不准时间)她神秘地造就了佩特的不朽散文。狄盖斯正在憔悴下去,年年复年年,他会一直这样衰弱下去,直到有一天出现了一位新的伟大的散文家取而代之,使他退回到自己的灵魂能适应的媒介——文学。《蒙娜丽莎》和《舞蹈课》都是理趣画,它们是用脑而非才情画成的,与莫奈这样的天才相比,谁还敢自称聪明?!里奥那多造路,而狄盖斯则制造妙语。我昨天就听到了他的一句这样的话,这比任

何路都更令我高兴,因为我已不骑自行车了。当有人对狄盖斯说不喜欢杜米埃时,他沉默了很久一会儿。“如果你给拉斐尔看一张杜米埃的画——”他终于说道,“他会表示尊敬,脱下帽子;但如果你给他看的是卡班纳的画——他会叹息一声说:‘那是我的错!’”

一阵钢琴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的朋友正在演奏,在这所通风的房子里听音乐是一件快事。但还有女人在等着我,我必须去看我每到巴黎必去看望的女人们。我在这间画室里呆的时间太长了——我必须走了。

但我到哪儿去呢?我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帕塞的小街道,估量一下从帕塞到凯旋门有多远。有一会儿我想干脆就坐在树下看来来往往的人们算了。如果她没死的话,我就会驻足在她那坐落在丁香花丛中的小房子前面。莫奈画的这个女人的画像就挂在墙上,她就戴着常戴的那种无边帽。这幅画的风格真是太奇妙了。我一边欣赏着画的奇妙技巧,一边想着他的画室。正当这时,一个高个子漂亮女人——玛丽·罗兰——走进来。她是位农民的女儿,是当时所有优秀的男人的情妇——或许可以说是所有杰出的男人的情妇。我常称她是“所有人的里拉”。

上一次我们见面她时曾谈到了莫奈,她告诉我每年她都要把第一束丁香花献到他的墓前。我不知道她的诸多拒绝空虚度日的情人中将来是否有人把花献到她的墓前。我印象中的她是一位追求享乐的女人。她渴望享受一切快乐,她的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满足欲望。伊文斯是位伟大的牙医,他每年要给她2 000英镑。可以想像,当他在楼梯口截住她和莫奈时他会多么恼怒。她是为了摆脱一个美国人才邀请伊文斯共进晚餐的,晚饭后她故意说自己头疼,要在床上躺一会儿。她的客人刚一离开,她就脱掉了罩在舞衣上的浴衣,用手绢给在街角上等着的莫奈发信号。但当他们一起走下楼梯时,却碰到了他们最不想见到的牙医,原来牙医把车票簿忘在她家里了,这时正好回来取。

见到他那既美丽又虚伪的情妇，牙医真是太失望了。他一连有三四天都没去找她，但他的愤怒对玛丽来说无足轻重，因为她的另一个情人已经答应每年给2 000英镑了；玛丽现在一年有了4 000镑收入，这样她就能一心去与那些写书的、谱曲的、画画的人交谈和恋爱了。

我们人比动物的复杂之处在于：我们是通过想像来爱的，想像至少会刺激我们的感觉，对我们的爱起到了辅助作用。酒吧女爱上了NO1，只因为他擦玻璃杯比NO2擦得好。玛丽爱上库柏是因为他写的十四行诗“百合花”，而当他写出像“奶妈”这样的诗时，她就对他冷淡起来了。我就是在她的这则恋爱故事接近尾声时成为其情夫的一个竞争对手的。但有一天，阿尔比兹夫人来到莫奈的画室。她说她马车上的马是从大草原上挑选出来的纯种俄国马；但谁又能辨别出一匹马是从大草原上挑出来的还是从马贩手里买来的呢？并且与这样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漂亮女人相比，这也并不重要。这是一个适于做情妇的女人，但莫奈并不这样看；然而即使他用了淡而柔和的色彩画她，她看起来仍像一个情妇。画上的她拿着玳瑁扇，扇子遮在胸前，莫奈就是在其中的一根扇骨上签的名，因为伟大的画家总是知道在哪儿签名最合适，而且他从不在同一处签两次名。她是来告诉莫奈说她那天不能来做模特的，因为她马上要去布瓦斯。在与莫奈谈过话后，她要求我和当时碰巧也在莫奈画室的一个年轻人与她一道去。她的俄国马把我们拉到那儿，我和那个年轻人想着她会选谁作她的情人。我们因为她而竭力卖弄；但那天我比他要聪明些；我让他谈话、朗诵诗，把他数年来收集到的格言警句都倒出来。我感到他的妙语徒劳无功。

我们是在庞德街的拐角处甩掉他的。几天后她就给莫奈作了模特。现在这幅水彩画就挂在我的一个朋友的房子里——是我买来送给他的，因为一个自己熟悉的女人的画像总没有自己从未见过的女人画像那样可爱可亲。人的记忆和画家的幻想是

相冲突的,而我喜欢的是长而精致的鼻子、闪亮的眼睛、红果子似的嘴。这幅水彩画一度属于我,就挂在我房间里。因为有一天莫奈以他一贯的善良心肠对我说:“我一直答应送你一幅画的。”他在排在墙上的画中找了一番后对我说:“好了,我想这幅画最适合你。”当我急匆匆地逃离巴黎,把我的东西拿出拍卖时,她来买去了她的画像,数年后她又把画卖给一个画商,原因是画商给莫奈的画出价很高。我听说这幅画要卖,就去买下来,送给了我的朋友。我把整个故事讲完了,什么也没有遗漏,只是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数年后,我在独立街上写完了我的《一个年轻人的自白》,这是玛丽·罗兰要我做的事——噢,她真有魅力,她把我的书送给了《杂志》的编辑,等出版协议签好了,我却发现她正在一个公园里与杜加旦相偕而坐。“亲爱的杜加旦,现在你得走了。”

玛丽很漂亮,但她更喜欢她的情夫能欣赏她的才智。当我问她在那个伟大的牙医伊文斯立下每年给她二千镑的遗嘱后,她为什么不离开他,她回答说:“那样做太愚蠢了,因为欺骗他能使我快乐。”接着我们又谈到恋人这个难题,她说:“我不是女人,而是人们在公园里栽的一束花(原文为法语:Qu'on tresse dans un jardin)。”这句话很难译成英语,法语教授或许会为翻译这句话而写一篇研究文章。我当时很是困惑。“为什么不是‘truss’或‘untruss’?”有人喊道。当教授正在沉思如何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时,我说话了。我说玛丽的花园是掩藏在丁香花丛中的一个隐秘的角落的。就是在我对她的这一次造访时,她突然心血来潮,让我参观一下她的卧室。我们走进她的卧室,在那儿继续我们的谈话,我不知道自己是该拥她入怀呢,还是强抑住自己的冲动。一个30岁的年轻人应该有主见了,但我没有;我们一直努力将谈话继续下去,直到玛丽累了、倦了。她的声音里透出一丝烦闷说:“我想我不应再把你留在我卧室里了。”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不安起来,我感觉到自己没拥她入怀真是愚蠢。是因为害

羞阻止了我这样做吗？是的，但也有其他原因。我自从在莫奈的画室见到玛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对她心怀仰慕，而10年后，我们对一个女人之美的仰慕就从肉体转到了思想：爱很容易理智化。我摆出所有的理由，在一个接一个地摆出这些理由时我找到了真正的原因。当玛丽说她在等着马拉美（我知道他是她现在的情人）时，她是不愿做不检点之事的，想到引诱她之后还得等着马拉美，我就更加犹豫不决了。那天下午，我们从卧室出来后又回到花园，继续我们的毫无目的的交谈，一直到马拉美来。他手里拿着一块馅饼。馅饼让我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也使我为自己的节制暗暗高兴。我把自己想成一个吃晚饭的人，一点一点地吃掉了我曾——10年前——热烈渴盼的冒险的热情……玛丽和马拉美陪我到车站，第二天她就写信让我去看她；但当我急匆匆赶到她家时，她的仆人却说她去亚美努比公园了，并让我到那儿去见她。“我的里拉要取代马拉美的里拉了！”我说，并遗憾地放弃了对这个漂亮女人的追求。一年后她又爱上了一位年轻的音乐家。她把牙医给她的钱都留给了这位音乐家。

我想到女人，女人是男人思考的合法对象。当我们坐在吸烟室，嘴上说着彼此都厌烦的什么“失去通货资格”之类的话时，我们心里想的则是另一回事。女人是男人的一项严肃的工作，但说实话，我们在想到艺术时有时也会忘掉女人一会儿，但只有一小会；其他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我的朋友现在正试着演奏的婆罗姆斯的音乐。我开始想这样一个问题：在我过去数年里结识的女人中，哪一个最能引起我拜访的兴趣。

在暮春的这天傍晚，我从帕塞走回尚蒲斯·哀利赛，一路上脑子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念头、回忆。一些出人意料但我都熟悉的景物撞入我的眼帘：草地、白杨，用高高的铁栅栏围起来的别墅，高台阶两边的花瓶。巴黎这个词是多么让人浮想联翩啊！巴黎本身就是法国的一个唤人想像的城市。从法国的北海岸一

直到地中海,到处都激动着一种古代精神;法国到处都充满着一种异教精神,这种精神从未在法国消失过。能在这样的日子看巴黎真是再好不过了。在走往尚蒲斯·哀利赛的途中,我的思想与我的脚步一样警觉,因为在这条路上,随处都可发现名胜古迹。然而,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则是一个小山坡。在这个山坡上有一排房屋,大约有八九座,就紧临着凯旋门。这是街上最普通的那种房子。因为她喜欢普通,我常常想弄明白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吸引我的难道只不过是她垂至脖际的金发吗?还是她芳香袭人的皮肤?还是她反复无常的微妙的感觉?一定是别的什么东西,一定是,因为我喜欢回忆她走动时身上用花装饰的衣服发出的沙沙声。她像一阵香气在飘动,从她轻浮的卧室走进一间毫无趣味的房间,一个僵化的、中产阶级的房间,尽管房间挂的肖像画都以花环衬托。在一个墙角,挂着一幅画,画上是两个孩子。乔盖特是比较漂亮的那个。在她苍白的眼睛和微微弯曲的嘴唇里,透出渴望和烦躁的双重情绪。

我一度习惯于坐在她卧室的阳台上读书、谈话,或看着天空在远方慢慢变白,看山的影子慢慢移动。在现在这样的日子里,当我们在画室里做着梦时,我们不由会想起那些欺骗过我们的人,那些使我们痛苦的人;在这样的日子里,人的面孔,面孔上发出的香气,都从过去的屏幕上出现了;弯下去的脖子,苍白的手也都一一出现了;还有那些眼睛。我记得她的眼睛。有一天,在一个果园里,我和她在6月的芳香和舒坦中并肩走着,她的丈夫和一个朋友则走在前面。这时我恳求她让我亲近亲近,“你现在就可以吻我。”她说完就抬起了她苍白的眼睛。但她的丈夫就在前面,他又是一个胖子,而旁边则是一条小溪。我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异常不愉快的挣扎:向他坦白并从此身败名裂!我承认自己当时不敢吻她,我想她永远不会原谅的我的缺乏勇气。当然,整个下午都想这种无聊的事也是愚蠢的!然而如果我们不在生活中制造一些这样的无聊游戏同样也是愚蠢的。她淡黄色

的头发里还没开始出现灰发,她的头发似乎永远不会变灰,但当我去年最后一次看见她时,我却发现她正在皱缩。在她这样的年龄,一年等于两年。但即使我今年不去她那儿,明年我也会去的。

在想像中,我走过她的房子,心里想着她常谈到的一个男人。“她虚室以待的那个男人!”伦敦街头女孩总是这样说。他最近成了一个不光彩的谣言的中心,这是19世纪的唐璜得到的悲哀但独特的结局。或者说,她爱的可能是那个高大有胡子的男人,他曾把他的照片给我看过——一个因没钱过上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而自杀的男人,她就是这样解释的。她喜欢那些看起来好像能扛起大树的又黑又粗俗的男人,或者说她喜欢女人。她曾对我说过:“与男人相比,女孩子是更好的情人。”这些寻找感官快乐的美国女人就像兰花一样。置身于一株兰花和一束玫瑰中间,谁还会犹豫呢?

在想像中,我离开了尚蒲斯·哀利赛,穿过了龚古德广场。塞纳河静静地流过去。一千年前和一千年后,人们都会像我现在这样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水流,想着金发碧眼的小妇人,以及由此引发的肉体的一阵阵的颤栗。可敬的夫人们说过,有些幽灵不长头发,只长肉体;对我来说,她们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因为她们还使我想到明天和明天的明天,想到即使欲望会有萎缩、死亡之时,人们对性的兴趣也永远不会消失。

人到中年,我们总喜欢回想青年时代的快乐,我现在正在想着她生活在遥远的拉丁区,住在一个过去常把我坐的马车颠来颠去的一条不平整的街上!看门人依旧,只是稍胖了些;她过去手里常抱着一个婴儿,现在她手里没有孩子了;我想她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吧。楼梯脚下有一团黑污,过去我常那样急促地爬到四楼上去;那口钟仍在我记忆的耳朵里叮当作响。她的房间也在我的想像中出现了——她的房间是那种整齐而刻板的房间,桌子上堆放着精美的书籍,但看起来好像从来没

有人把它们打开过。甚至连书房也是布置得整整齐齐的。她只有一位女仆,是个红头发的小女孩,曾有几年她突然不知去向,但后来又回来了。我让丽丝谈谈她的事,我从她口中得知,她的这位女仆这段时间是去结婚了,在过了10年不幸的婚姻生活后,她又回到了从前的女主人身边,回到这个拘谨的、谨慎的、躲躲闪闪的新英格兰人身边,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女主人,却一定有过许多情人。但我除了了解她的淫荡外——因为她不得不让我知道她的这个秘密——对她其他的一切就一无所知了,

她信教,并且是个虔诚的新教徒。我一边想着她,一边任思绪飘到大海的彼岸。我现在正在国家美术馆看凡·爱克的画,研究着画上人脸露出的严肃表情——他正像布道坛上的牧师一样在举着手说什么,从他的手势和表情来看,我们显然好像听到他在教训妻子(他正沉浸在训诫的快乐之中),他在告诉她,她目前的处境——又怀孕了——是上帝神圣的旨意。她听着,但令人颇觉奇怪的是,她脸上浮着一种不完全理解的神情,是那种豚鼠式而非兔子式的神情。画中两个人的表情迥然不同。画家的目的似乎是想向我们表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丈夫显然非常痛苦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妻子则显然非常幸福地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画上的一切都很讲究条理;男人的脸暗示了一种年年月月日日一成不变的内心,他永远有同样的激情,同样的祈祷;他的服饰,宽沿帽,直线下垂并有褶皱的斗篷,尖头鞋等都与他本人融为一体。我们几乎在画面上看不到房间,但谁都不会忽视镜面里反射出来的挂在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这些反射出来的映像已经存在300年了,但仍像刚画出来似的栩栩如生;那个男人也一样,他也获得了再生,他是那种自然的从不会因为再生而感到厌烦的人,因为我想他就是生活的本质。这个严肃的佛兰芒人的家庭背景也能表现出我情妇的性格,因为这好像就是她自己的房间似的。我常常在她刻板的会客室里站着等她。会客室里光线很暗,因为窗户上挂

着厚重的窗帘，墙上也挂着挂毯。每当门被打开时，我都有有一种颤栗的感觉。过道里立着几只橡木柜子。亲爱的读者，你可以想像这个女人正坐在一张橡木桌子旁等着我。她有点羞愧的样子，但又情不自抑。有一次，我在听她弹钢琴的过程中，内心涌起一种像爱的感觉。当我任思绪在过去的生活印痕中搜寻时，一些已被遗忘的东西又出现了。看，我眼前出现了她的一件长袍！一件深绿色的像男人的斗篷一样的橄榄绿色的长袍。她把头发剪得像男人的头发那样短，虽然她的短发都打着小卷，但仍不过是说着圣经中语的新英格兰女人的一种发型而已。巴黎没能改变她。她是画上的虔诚的清教徒；读者会注意到我这里用的是“虔诚的清教徒”，因为除了她的性别以外，这个温顺、孩子气的小妇人就一无所有了。由于她的本能与理智是冲突的，所以她的举止都是装出来的；她从未耽于信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与她仍属于陌路人。只有当恋人们说出彼此的幻想和孤独时，他们才能互相了解；最刺骨的痉挛能告诉我们的并不多，即使有一点点，也会很快就被我们忘掉，而一种单纯的信仰却年复一年地存留在我们心中，并在她已葬于地下或已远在千里之外时，仍能把我们已失去的爱带到我们面前。丽丝从不轻易相信别人——她只相信自己的灵魂，如果她有灵魂的话。然而她是个真诚的现实的女人，也是个聪明的女人，所以我每年都要到她家里去一次。

我们的交谈常常很费力，中间总有一些让我们尴尬而痛苦的停顿，在没话可说时我们就坐着看着对方，无疑都在心里感慨时间带给我们的变化。她最迷人的是她的身材——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身材之一；她仍风姿绰约；但她手上的皱纹暴露了她的年龄；她那一度曾是那么修长的手指上的关节变肥变厚了。去年她就说自己是个老女人了，当时我听到她的话还觉得很优雅，因为没有任何男人愿意听他所爱的女人说自己老了。当并没有人注意你的年龄时，你为何非要让人注意呢？去年，她说自

己已 55 岁了,但看起来却出奇地显得年轻。她问我的年龄,我有点不高兴,就不由自主地撒了谎,而我又好像觉得她知道我撒了谎,于是我拿起帽子就要走,但她又问我能否去看看她丈夫;“当然,当然可以。”我说。于是我们一起到画室,发现那个老人正一个人呆在那里。他正在灯下看着一幅版画,这幅画比他所有的作品都更像一幅画。她问他是否还记得我,他站起身,嘴里咕哝着。为了帮助他想起我,我告诉他我曾是他的学生。这位可爱的老先生说那是自然,并说想让我看看他的画,但丽丝说——我想她是因为紧张才说的,但奇怪的是她的话却一点也不得体——“亲爱的,我想……先生不会在乎你的画。”不论是多么有名的人,听别人——不管是多么低贱的人——说不在乎自己的艺术作品,都会觉得受到了侮辱。但我把大家从尴尬中解脱出来了。并不是人人都能言语得体的,为了改变她给我造成的尴尬,我像每一个喜爱艺术的人一样,在参观他的画的过程中多次变换自己的观点以迎合他,然后再拐弯抹角地说出实情;为了欺骗那位老先生,我谈起了安格尔,我说我一直都喜欢他的画。停了一会后,我又补充说:“我怎么能爱安格尔的画而不爱你的画呢?”我说我不知道任何一个我不尊敬的安格尔,并且问他崇拜谁,于是我们愉快地谈起了荷马的奥浦修斯和蒙特班美术馆的画。随后这位老人说:“我必须给……先生展示一下我的画。我必须让他看看我的圣母玛利亚。”并且解释说圣子耶稣的脸部还没完成。

观察这个几乎已有 80 岁的老先生真是有趣,他对自己的画所保持的兴趣与 50 年前一样强烈。也许会有愚蠢的读者认为我爱过她妻子是件了不得的罪恶。但这种事又怎么能称得上是罪恶呢?亲爱的读者,你不妨想一想——所有的读者都是亲爱的,即使是最愚蠢的读者——然后你就知道自己仍纠缠在世俗与偏见之中。亲爱的读者,难道你认为我们应跪下来坦白吗?不,你再想不出比这还愚蠢的事了,因为如果我们真这样做了,

他就会认为我们两个都是不开化的人,是有低级趣味、喜欢流行文学作品的人。或许,想想他死后她会怎么做才更有意思些。那时她会返回波士顿吗?如果不,我还能再见到她吗?去年我曾发誓永不再回来,以为她不高兴我在她身边;而当我不在她身边时,她却又来到我身边,虽然还是在同一个房间,周围还是我们熟悉的家具,但无情的岁月已把我们分开了。为了保留住她,我只好把她送走。现在到哪儿去找一个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占有物更完美而把情妇送去的男人呢?或者这只是我的想法?不可能,因为我并不想这样写,我更感兴趣的是博·布鲁梅尔那样的花花公子,这种人每年都要来巴黎,每次来都要与每一个情妇过上一天。

有一位某某妇人,她的名字本身就是美丽的,有着特殊的法国风味,她的名字把我带到了中世纪的法国中部,因为我一直认为,像她这样一个说话又快又真诚,心地毫无遮拦的高个女人,一定是来自法国的中心,如巴尔扎克就是来自图尔。坐在她身边你就好像真的到法国了;若你能成为她的情人,那你就无时无刻不在体尝着法国式风流韵事的风味了。她曾在一家被称做巴黎的旅馆里住了许多年,我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段时间里。那家旅馆有一个守门人;虽然旅馆声名狼藉,但我却喜欢听守门人说:“是的,先生,侯爵夫人在。”无疑,在她那装饰有路易十四时代的蓝色玻璃吊灯的卧室里等她并不是令人讨厌的事。每次见到我时她都要说:“我怕你正想着我吧。”说话的时候她总把手放在我易于抓住的地方。我握着她的手喃喃而语:“多美的手。”她总是回答:“这双手至少500年没做过家务了。”

她的客厅正对着一座几乎把花园都占满了的大暖房,侯爵夫人常常在暖房里接待她的客人,但我现在忘了在她举行最后的盛宴时她的情人是谁了,也忘了当时剧院正上演什么剧目,我只记得一些普通的客人流连于她提供的点心、晚餐。为了摆脱这些人,我们总是先与侯爵夫人道晚安,然后悄悄地溜到楼梯旁

的小房间里藏起来。一直等到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没法再拖延下去终于走掉了,我们才又回到暖房。盛宴和狂欢已在等着我们了,于是我们通宵达旦,乐不思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时刻。当我们与女主人告别时,都已神态憔悴,形容枯槁了。我们总要到早晨八点才离开她家。盛宴的费用来自侯爵夫人残存的财产。自然,这样没用多久,她就穷得身无分文了。没办法,她的女儿苏珊娜走上舞台,并被发现有一定的表演天才,这种天才直到今天都还是她的无价之宝,今晚我就去轻歌舞剧院看她。但我这次要有七次奇遇,也就是说我要去看七个女人,某夫人排在第四位;我听说她快失明了。她就住在路易十三时代建造的古堡里,古堡里有高高的屋顶,有许多窗户,有整齐的花园,漂亮的栏杆,有鱼池和林阴小径。在修建的整整齐齐的小道上与一位几乎失明的女人一起散步,并且与她谈谈过去,这确是一种远远超过正常人感情所能忍受程度的“冒险奇遇”。夫人某是打断了我们的爱情故事的女人,她是另一位、也是第五位我要拜访的女人。晚饭间我还会想起更多的女人,但现在我必须动身了。听到某人演奏的《特里斯坦序曲》奏出了最后的音符,我说:“又一天在对艺术和女人的沉思中过去了,明天我仍将沉思艺术和女人。我要请她演出后在院剧门口等我,如果她到时不能见我,她就会另约好时间,因为她会乐于谈谈她母亲以及过去的时光的。这样,后天我就能沉湎于亲爱的教士们在布道时所谓的‘堕落的爱之激情了’。”

第八章 过去只是一出舞台滑稽戏

白昼的酷热让人倦怠无力,而晚上温暖的微风则让人无比畅快。在没有了光和声音的城市里,人们的耳朵和大脑却异常地活跃。

我回到家时天色尚早。我坐在窗下,不由自主打起盹来,直到黄昏降临,我才从梦乡中惊醒;我看了一会儿书,直到眼前的字慢慢变得模糊起来,我才一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托着头往窗外的花园看去,一任自己的思绪在梦想中漫游。我手里拿着的那本书是一位画家写的,它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各种各样的记忆:令人心醉的挣扎,青春的激情,痛苦的失望;它使我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绪和幻想。过了一会儿,书中的各种图画就让我厌烦了,我不再费神思索,索性放下书,沉湎于温和的薄暮带给我的遐想之中。

倦怠而悠闲的现在像件衣服一样从我身上滑落,过去在我看来就像是一次小规模演出,一种充满了挣扎和痛苦的演出,我就像观赏一出舞台滑稽戏一样冷漠地看着这出我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演出。过去的一幅幅画面在我面前轻松地飘来飘去,其中有许多是习惯性的回忆,但尼奴·德·卡尔维多侯爵夫人,这个在我内心深处潜伏了15年之久的贵夫人,却也趁着这股回忆的浪潮浮现到我脑海中来——我与她的第一次会面是我的朋友奥古斯塔·荷麦斯撮合而成的。我记得那一天是她生日,我买了一大束玫瑰去看她。当我看见她时,她正和一个宽肩

膀、黑皮肤的年轻人呆在她的卧室里。年轻人在画一幅新潮的印象主义画,而她则正俯身看画。她是个有黑色头发和浅黑色皮肤的女人,身材高大,丰满的胸部披着一件晨衣。她的年轻人走到屋角,好让我能更好地欣赏他的画:画上是使用粉红色和黄色的小圆点画成的一个火车站。显然,她是她的情人,难怪在那天晚上我就听人说他名誉不佳了,因为即使是在蒙特马特,让一位女士为你付晚餐费也被认为是不名誉的。维立叶·德·里斯勒也曾是尼奴的情人,但当别人指责他接受了她太多的慷慨帮助时,他却回答说:“吃不到牛排就说牛排腥。”他的越轨行为因了这句俏皮话而为人所原谅,因为这句话似乎总结了这整个地区的人们为维护道德秩序所做的努力以及实际上遇到的困难。

尼奴在维立叶受宠时还很年轻;但当我这样的人成为时代的宠儿时,她则正处在对年轻一代产生兴趣的年龄,她与她所有的旧情人都保持着友谊,从来也不拒绝他们坐在她的餐桌旁,尽管他们对她的床再也不感兴趣了。

我们不妨听听某一个印象主义者对维立叶的愤怒指责,这也不失为一件很有趣的事。他指责维立叶挥霍了尼奴太多的财产。实际上,可怜的维立叶不该受这样的责备,因为在文学和艺术上挥霍无度是尼奴性格的一部分,她房间里到处堆放着作画用的帆布,这就可以证明她在现代绘画方面花了大量的钱。尼奴当然一度很富有,据说她每年要花5万法郎,就她本人来说,传言说得并不过分,因为要过她那种生活至少需要那么多钱。她的家是当地所有的文学家、音乐家、画家和雕刻家的乐园。乍一看她的慷慨似乎是不合理的,但只要想一想,我们就能明白,她的慷慨与所有的慷慨都是一模一样的。当然这种慷慨也是有选择的,有原则的,但问题是,难道她喜欢的人就没有我们在格罗夫纳广场或香榭丽舍大街遇到的人有趣吗?在任何场合,朋友介绍朋友都是常有的事,但在尼奴家却有一条我在别处没有遇见过的限定:她的任何朋友都不能带别人进来,除非新来者是

只“耗子”——换句话说,他必须写过诗或音乐,或绘过画、雕过像,正是因为这种奇怪的风格,她的沙龙才不会吸引一般公众;而超凡脱俗、不流于世俗趣味正是莫万街流行的评判标准。

尼奴卧室的窗户正对着花园,当我对花园的规模之大、树之多表示惊奇时,她就慷慨地允许我去参观一番;我走到池塘边,看到有许多鸭子和猫,还有白鸚鵡。在花园凉亭后面,我碰到一只睡着的熊,不远处有些被拴着的类人猿则搔首弄姿竭力想引起我的注意,说实话,我还真的被它们吸引住了,要不是听到奥古斯塔·荷麦斯在唱歌剧,我还真不舍得离开呢。

人们都在谈论着她。我正站在窗户边听着,尼奴的猫突然胡作非为起来。我打开窗户,但通风仍不够。这时一群花枝招展、围着披肩的女人走过来。与她们结伴同行的有位诗人,他把黑暗的天空比做一片趴着金甲虫的蓝面纱。其中一位女人带着一把吉它。奥古斯塔的声音这时又穿过寂静飘过来,美妙的歌声把我们拉到一起来了。但当作曲家开始演唱自己的歌时,大家就更加无所顾忌了。在一群模糊不清的面孔中,我看见了一张极其漂亮的脸,她是尼奴的堂姐——尼奴记得她是,因为她们已好多年没见面了,但至于她是如何在莫万街发现了多年未见的堂姐的,连尼奴自己也说不清楚。有人悄悄告诉我说她是图尔的一位丝绸富商的妻子,这就更增加了她的神秘性。到了晚上,这位夫人对我产生了信任感,并坦言告诉我以前她从未在艺术家社交界的圈子里出现过,她请求我好心向她指出在场的著名人物,并告诉她他们为什么出名。“那个正往池塘走的人是谁?就是那个穿着灰色裤子和黑夹克的那个——噢!”

我女伴的惊呼是因为刚看见了魏尔兰。他正忧郁地走着,手里拿着帽子(晚上很暖和),他那光秃秃的大脑袋,经他像荆豆从一样乱蓬蓬的眉毛一衬,就像连杂草也不生的峭壁,直楞楞地安在他脖子上。他的这副尊容让她害怕。我们继续观察着他。“他看起来是多么无聊啊,为什么他要那样子子独行,不跟任

何人说话？是不是他把我们看得太愚蠢了？”我的女伴问我。几乎就在同时，魏尔兰看见了我，于是他走过来加入到我们的谈话，说着谁都会说的无聊话：“今晚天气不错……”“如果我爱着一个年轻姑娘或年轻小伙子……”我女伴脸上闪过一丝惊恐的神色，她把我拉到一边说：“你一定不要让我单独和他在一起。”在这样的场合，她的举止显得过于无礼了，我怕魏尔兰会因恼怒而冒犯她，但他脸上只闪过一种厌恶的神色，一种极度的厌恶，这反而更令我的同伴害怕（他无疑把她看做外省人了）。他似乎不愿再理我们了，嘴里嘟囔着什么慢慢走了。一直等到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我的女伴才急切地问我这个可怕的人是谁。“他是牧师吗？我是说他做过牧师吗？”“没有，但他相信牧师，这更糟。他就是诗人魏尔兰，是用法语唱出最甜美的诗歌的歌者，他的歌是像旅鸫唱的那种甜美的歌，旅鸫在细枝上唱出的是它的小小灵魂，而他的歌只是他灵魂的窗花格。魏尔兰以同样的单纯描画出他的灵魂，而根本不管他描画的是好还是坏；他有时是个好色之徒、饕餮之徒、野兽，有时又是个诗人、幻想家，是自但丁以来天主教孳生的惟一的诗人。看那边那个又瘦又小的男人，那个前额垂着一簇浓密头发的男人，他叫于斯曼，他是15世纪的那个怪物吉尔·得·汉斯的辩护者，后者据说也是童话故事蓝胡子的原型。于斯曼小说中讲述的是中世纪的白灵魂，自那之后的大约两年内，英国所有的年轻人就都谈起中世纪的白灵魂来，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白灵魂是什么意思，这并不奇怪，因为它确实没有任何意思。魏尔兰说自己是个中世纪的天主教徒，但因为他并没有割断许多小男孩的喉咙，人们就无法确知他的灵魂是否像吉尔的灵魂那样白。他像他的中世纪祖先一样，不停地争论上帝祖父的问题，他像孩子沉湎于美丽的故事一样全身心沉迷于教堂。他喜欢与教堂有关的一切，因为它们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感到对教堂的信仰已成为他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诗歌天才就是为了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他是一个伟大

的心灵歌者。从文学角度看,与实践脱节的信仰有许多好处,接受教理可以使人免受争论之苦;魏尔兰的忠诚使他能心无旁骛,专心创作,并使他不受理念——现代文学最受谴责的地方——的支配,而能自由真实地歌唱自己的生活和灵魂;他是个神圣的流浪者,是在酒馆和医院消磨时间和生活的那种流浪者。只有那些摆脱了一切偏见的人才能真正接近生活,才能体会到生活之真味——就像陈年老酒的芳香。有时他想:自己本可以多写些诗。但他接着总是叹息着说:“我毕竟已写过许多诗了,没有生活和爱,艺术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从这个灵魂里流出来的诗总是像白桦树一样迷人、柔媚和微弱,也象白桦树一样哀婉。魏尔兰有杰出的表现才能,他的天才就是只为羞耻本身而羞耻,就像莫奈一样,他的最美的诗是谈无耻的结晶,都是在阁楼、酒馆和医院——对,还有监狱——里写成的。

“在监狱!但他没偷东西,对吗?”商人妇惊恐地看着我说。我想她说这话时可能正用手护住钱袋。

“不,不,纯粹是件风流韵事,是因为与兰波争风吃醋。一把小刀一闪,兰波被他刺伤了,魏尔兰为此在监狱里呆了三年。至于兰波,据说他因此厌恶和拒绝了世俗之爱,进了隐修院,并为了上帝的荣耀在红海附近的海滩上掘土造田,但这些说法都是假的,只有魏尔兰知道他在哪儿,但他不会告诉别人。我们所得到的兰波的最新可靠消息是说他加入了旅行队,正准备进入沙漠;但魏尔兰更喜欢做文明的野蛮人,所以一直留在巴黎——住在盗贼出没的地区,喝得酩酊大醉,在医院里写出优美的诗,出院后又混迹于花柳巷中乐不思返。他诗中写了很多这样的女人;他虔诚,但一旦虔诚妨碍了他享乐,他就憎恨虔诚。”

“但你认识这些女人吗?”

“噢,当然,我们都知道可怕的萨拉,她有时还打魏尔兰。”

商人妇问她是否在这儿。

“不在,尼奴不会接纳她的,尽管她有次叫魏尔兰把萨拉带

过来一次,但她最后喝得醉醺醺的,连门槛都迈不过去了。尼奴的情夫,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位画蒸汽机的男子,据说曾对诗人说:萨拉的性情使她在整个社交界引人注目,‘我知道她有缺点,’诗人喃喃地回答,‘我知道她有缺点,’他重复着,‘但别人也有缺点,我们都有自己的缺点,如果你们不接受萨拉的话,那我在这个地方的位子将来也要空起来了。’但饥饿最终又把他带回来了。”

“那个露出肚子的男人是谁?他的山羊胡使他看起来多么忧郁啊?”

“那是著名的卡巴奈。如果你同他说话,他就会告诉你他父亲是个拿破仑式的人物,甚至比拿破仑还厉害。他创作了许多格言‘要用音乐表现出安静的效果必须用三个军乐团’,诸如此类。他是新雅典娜神殿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每晚都在那儿,并会告诉你他的叙事曲‘腌鲱鱼’是用一种连瓦格纳也无法理解、但李斯特可能会理解的方式写成的。”

“他的音乐上演过吗?有卖的吗?他靠什么生活?我想不会是靠他的音乐吧?”

“恰恰与你想的相反,他就是靠他的音乐,靠演奏华尔兹和波尔长舞曲生活的。他的收入是一天5法郎,他以每月35法郎的租金租了一间房子。一无所有的艺术家——也是这些花园的常客——就睡在这种房子里。他的房子装饰着——噢,你自己去看吧!如果卡巴奈想要一张带抽屉的柜子,他就会买一个人造喷泉,他打破了“麦洛的维纳斯”的头,并说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在欣赏她时想起他在街上遇见的人了。要是讲起他的无私,他对艺术的热爱,他的奇怪的音乐,他的奇怪的诗——因为他的音乐都是根据他自己的诗谱成的——那要好几个小时呢。”

“在公众看来,他是太聪明呢,还是太不聪明呢?”

“你问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近10年里反复问我们自己的问题……那边摸着衣领的男人是著名的维立叶·德·里斯勒·亚

当。”

我记得在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维立叶的一切告诉给这个单纯的商人妇时,我是非常愉快的。

“他没有任何才能,只有天才。”我说。

但这个女人并不是像我想像的那样头脑简单,她向我提出的一两个问题竟至于让我难以回答,最后只能告诉她维立叶的天才只像石英上的金色条纹那样偶尔闪现。

“这种对比是老生常谈了,但却最能解释维立叶的特点,因为一旦他灵感不发,他的作品就像石英一样硬。”

“他的全名是……”

“他的名字也是他天才的一部分,他选了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则影响了他的创作。我听他这样说过,他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出身名门望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国王的后裔’。”

“但他是合法后裔吗?”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比那些合法享用这个名字的人更想得到这个名字。”

这时维立叶正好从我们旁边经过,我把他介绍给她。很快,他开始告诉我们他的《夏娃》刚刚完成,它将取得伟大的成功。

但维立叶常常对鸡毛蒜皮的琐事喋喋不休,这难免让人厌倦,所以我一得到插话的机会就赶紧问他是否要给我们讲一个他的故事,并提醒他我最近在啤酒店刚听他讲过一个——是关于一个男人的——要寻找一个安静的小村子来休息的男人。他写出来了吗?没有,他还没有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但既然他知道我喜欢,那他明天就早点起床开始写。这时有人把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我不得不亲自替他给我的女伴讲这个故事。

“最好,”我说,“最好他永远也不写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一半就在他的声音和手势里。他写的东西是一年比一年少,喜欢他的人不得不去酒馆听他讲故事——在他讲的故事中,最有趣的是刚才那个蠢货插进来把他带走时他正要讲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说：有个男人，刚大病一场，他的医生建议他到乡下休息休息，他就在地图上找他想去的地方，结果有个村子的名字激发了他的想像力，于是他决定就去那儿。他坐在火车上，相信自己将会找到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单纯与明净，但当他从车窗里看见那个村子时，却发现它显得既忧郁又孤零零的。而比贫瘠的荒野更糟的是，他在车站看见的每一个人都盯着他的脸，并且可疑地搬弄着他的行李。他开始把他们当作伪装起来的强盗和行刺者了。他想逃跑，但又不敢，因为在去村子的路上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怀疑，他问村民是否能给他指出一处可以寄宿的地方。他的询问无疑给他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大包小包裹装的都是用来制造炸药的原料，因此他们尾随着他去了他们指给他的农舍，并把他们的忧虑与恐惧传给了男女主人。维立叶午夜在酒馆里可以即兴演说他的故事，但一到了天亮他就写不出来了，那时他的脑子已空空如也。你必须在某个晚上到新雅典娜去听他接着讲，他会告诉你：那对夫妇相信他们的房子将被炸掉，于是坐下来开始考虑对策。夜幕的降临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周围的寂静好像就是不详之兆。他们开始往楼梯上爬，他们的脚步声使刚恢复健康的可怜的旅行者内心充满恐惧，他坐在床上，听着人上楼的声音，额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维立叶能给你描述出脚踏在楼梯上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那个旅行者恐惧万分，就把家具顶在门上，门外人心中的恐惧也不逊于他。等他们鼓足勇气破门而入时，发现那个人已经死了。你必须去新雅典娜听听维立叶讲他的故事，明天晚上我在那儿见你……你明天愿意与我共进晚餐吗？”

商人妇犹豫了一会，她答应来，并且真来了，但事实证明她并不是个有趣的情妇，至于原因我则记不得了。我很高兴自己不再想她了，因为我想谈谈那个正在朗诵诗的金发碧眼的诗人了。他正站在山杨树下，树上住着一个类人猿。我看到他漂亮

的头发正飘拂在他肩上。他鼻子瘦小，眼睛苍白，其中一只总是有点充血。不是有人曾把他说成是耽于声色口腹之乐的救世主吗？他也在追求商人妇；为了赢得她的芳心，他以她为主题创作了一首无法无天的诗——读者，请放心，我说他这首诗无法无天纯粹是从诗学的角度来说的。

商人妇忘了我，她被诗人迷醉了。听到自己成了诗人诗歌的主题，她兴奋得不由越来越靠近诗人了。在诗人朗诵这首诗时，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手抱在膝上，似乎被迷住了。夜给了诗人灵感，他不停地玩着一个又一个小游戏。只可惜我现在记不得他的诗了，倒是卡瓦奈的《鲱鱼诗》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走来，脏兮兮，脏兮兮，脏兮兮的手里拿着一枚尖尖的、尖尖的、尖尖的大钉子，
和一把重重的、重重的、重重的大锤。
他把一架高高的、高高的、高高的梯子，
竖在白白的、白白的、白白的墙上。
他爬上高高的、高高的、高高的梯子，
去把尖尖的、尖尖的、尖尖的钉子，
钉到墙上——咚咚咚
他在钉子上拴上一段长长的、长长的、长长的绳子，
在绳子末端他系上一条干干的、干干的、干干的鱼。
然后放下重重的、重重的、重重的大锤，
走下高高的、高高的、高高的梯子，
拾起大锤走开了、走开了、走开了。
一条干干的、干干的、干干的鱼，
慢悠悠、慢悠悠、慢悠悠地摇摆。
现在我写出这个简单的、简单的、简单的故事，
来激怒严肃的、严肃的、严肃的人们，
并博小孩子们一笑、一笑、一笑。

这就是卡瓦纳创作的那首“连瓦格纳也不会理解,但可能李斯特会理解”的音乐的歌词。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卡瓦纳,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你的山羊胡,以及天刚黑时摔断了下巴的类人猿。我们怎么也无法让它从树上下来,这个畜牲似乎心意已决,认为我们不应该听音乐、诗歌什么的。客人们喋喋不休,一直到午夜,直到公鸡开始打鸣,彼此唱和着,沿着或穿过紫罗兰花丛三三两两地散着步。它们尖利的叫声把我惊醒了,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正坐在王座法庭街自己房子的窗户旁,而刚才我还在尼奴夫人的花园里,完完全全就像我现在在王座法庭街上一样。

当我坐着凝视着窗外的暗夜时,我想起了总是在别人晚饭吃到一半时才来的维立叶。他总是摸着衣领,抱歉自己来迟,并向我们保证说他已吃过晚饭。他还把他的一个天才朋友介绍给我们,并说他也吃过了;正好那晚盘子不够,有人就从猫嘴里抢过一只盘子给了维立叶的朋友,而没给他。维立叶本人并不介意,但他的朋友介意,为了强调他的厌恶,他用拳头狠狠地击了一下桌子,并怒气冲冲地接受了别人的解释。他说:“好吧,我把一切都打碎。”他在《吉尔·布拉斯》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尼奴的旅馆》,尼奴就是看了这篇文学杰作,才知道世上还有人把她的慷慨好客看做是愚蠢的行为,她为繁荣艺术和资助艺术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惹人发笑。有人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不记得是谁告诉给我的了,因为时隔太久,但我依稀记得有人说就是这篇文章害死了她。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尼奴的花园,花园中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拂晓时渐渐现出轮廓的树,树枝间毛蓬蓬丑陋的类人猿,枯萎的草坪边一群嘎嘎叫着往水塘跑去的鸭子,与商人妇密谈着的诗人,靠在恋人手臂上的尼奴夫人,这一切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脑海里。如果我手里有画板,我

会画出黄昏郊区的美景；如果我手里有支笔，我会为这些旧时代的人写出一首首诗；但最好还是坐在窗边享受记忆里留下的过去的情感和激动，回味曾沸腾过的情绪。现在情绪几乎已经逝去，但行动的欲望却正在来临。我还想更详细地回忆另一件像刚才谈到的那种事，但回忆是无法强行召唤来的，它需要等待契机。我的思想现在一片模糊，就好像那边的公园一样模糊。我窗边那条摇摆着、像扇子一样的树枝现在已是一片葱绿；最后一只麻雀也已恬然入梦，我只听到斯特兰德大街上一匹马小跑着的声音。

第九章 温柔的南方爱情之旅

我不远千里——或许更多，几乎有1500英里——而来，只是希望重拾一个纠缠不清、盘根错节、突然中断了的爱情故事的丝丝缕缕。这是一件奇怪的意外灾难，因为多丽丝在拒绝我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多，但她的断然拒绝最终令我失望地逃离了这桩单相思的风流韵事，这种纯粹单相思的爱情令人难以再忍受，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但要逃离她那张漂亮、蛊惑人的媚脸谈何容易！她的脸快乐而迷人，就像德国的早期大画师画板上的美人的脸。这些大师笔下的美人像都以淡笔画成，脸颊泛着洋红色，并以玫瑰花丛为背景做映衬。画了这些玫瑰花丛中美丽处女的大师是谁呢？我想这位大师应是科伦。但是谁并不重要，因为多丽丝的头发比处女们的颜色还深，那是一头浓密的金发，一头生机盎然的金发，她的眉毛依然有金泽，她的眼睛还仍像一双学生的眼睛，她小巧的鼻子上有星星点结实而美丽的斑点，她的嘴恐怕是世界上最生动、温柔的嘴，像花一样美丽和娇弱，她的长而柔和的手握起来很让人愉快。亲爱的读者，她也有幅肖像画，一幅栩栩如生的美丽的画像，而这画就是我画的。这幅画上的姑娘是十七八年前的一个下午与我在伦敦分手的姑娘，我想我是永远见不到她了。唉！但她却一直生活在悔恨中。许多文章会把这种故事演绎出下面这样的主题：她结婚了吗？如果结了，那她幸福吗？为什么偏偏我也不给她写信？但如果我们的恋爱故事进展顺利的话，就不会有遗憾、悔恨的问题了，而没

有悔恨与遗憾,生活又会平淡无趣。悔恨就像是我们可以凭依回顾我们死了的生活的山顶,是我们可以上面沉思与休整的山顶。我们常常看着曙光自言自语:是否最好送封信或信物?我和她曾约定,为了避免因天长日久而彼此疏远,我们应互相寄送舒曼的《胡桃树》中的几小节乐曲,不管是谁先收到,都应立即回送对方,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有隔阂了。但我从未给她寄过这种信物,这或许是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涂写音乐曲子,或许也是因为自尊心阻止了我这样做。无论如何,五年不算短,她也似乎已完全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但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个认识她的女人,是她又使我想起了那个姑娘。我问她多丽丝是否结婚了,这个女人也不知道,她也好几年没见她了,她们也已疏远了。在回家的途中,我自言自语道:“多丽丝一定结婚了。她婚后幸福吗?有孩子吗?噢,这真是可耻的念头!”读者朋友,你们应还记得,巴尔扎克写到 Massimilla Doni 的最后一页时,他说他不敢再往下写了。他说,对理想的崇拜者来说一个字就足够了:“Massimilla 正‘怀着孕’。”随后,在一段更多哲理性而非文学性的话里——每当巴尔扎克谈到艺术,他就成了一个知识浅薄的人——我们了解到,许多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和雕刻家的思想都离开了他们的地位、圈子,现在正围在 Massimilla 的床边哭泣。从我给多丽丝画的像,你们应该相信,多丽丝要是也“怀着孕”的话,她就会与 Massimilla 一样可耻的。我喜欢沉思冥想仙女啊,风精啊,古代传说中的美女啊,她们都是她的血亲,她们都围在她床边,哀叹她的不幸,把她看做自己的损失。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我应悲痛难抑地跪在她们中间,就像巴尔扎克对 Massimilla 的看法那样,觉得多丽丝“怀孕”,或者说她结婚都确是亵渎神圣。我只给她写了信,但我没有告诉她我为什么突然决定打破我们之间的静寂。我只给她寄去一张便笺,上面只有几句话,是说我很遗憾这么长时间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这是一张普普通通的便笺,或许我只是靠它流露的愁闷与渴望来解脱我的遗憾。

我把信交给信使时,要求他一定要带来回信。信使确实带回了她的消息,说她已不在原地了,但信会转给她的。“她没有结婚,”我想,“如果她结了婚,她的名字就会让我知道。或许她还没结婚。”我的脑中又涌进其他的一些念头,但在随后的两天内里我没再想到她,直到一封长长电报送到我手里,我才想起这回事。多丽丝!电报是她发来的,是从千里之外发来的。“真是不惜代价,”我说,“这封电报至少要花掉她 10 或 12 先令。”她说收到我的信很高兴,她一直病着,但现在好多了,电报末尾用的是她常用的结束语“晨写”。两天后到我手里的这封信就像她本人一样,充满冲动和爱;但其中也有句话让我心中掠过一种不祥的疑虑。她在信中描述了她的病,说她刚恢复健康,说到她在某个遥远的南方城市呆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问题时,她暗示说这一切都是命,并说如果我去那儿,一定是为善最乐。“给我谈为善真是愚蠢,”我咕哝着,“因为她一定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她偏颇的为善才导致我们长久的分离和疏远。”我坐下沉思起来,试图弄明白这句话是否适用于她自己或她现在呆的地方,以及它又是如何适用于她现在呆的地方的?所有的地方都是天堂,如果……

在一个漫长的 11 月之晚就要过去时,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将根据她的回信决定是否作一次长途旅行。“返程将是可恶的,”我咕哝着,拿笔又写道,“你信中有句话令我很失望:你说‘为善最乐’,你似乎决心比以前更柏拉图化了。多丽丝,这确实是个不幸的消息,你也不会让我把它当作一个好消息,对吗?”

她的信一封接一封接踵而至,但直到我踏上火车,我也没有真正弄明白她说那句可恶的话“为善最乐”,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但不知怎的,我似乎得出了结论,这才是主要的。我们的行动是遵循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规律的。在去火车站的途中,我边想着我的斯宾诺莎边说:“如果滚下山的石头有了意识,它就

会认为是它自己在滚动。”紧接着我又想到：多丽丝美丽的面孔或许不再依旧，然而她不会改变很多的。她在信中已经说过，我们只需用 10 分钟就能像以前那样交谈了。但即便如此，除非疯子才会去寻找千里之外的一张美丽的面孔。我们人人心中都有这个疯子，正是这个疯子，或是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某个角落的原始人在驱使我。我敢肯定的是，我不再是 19 世纪的一个普通市民了，我似乎是在一个什么地方遇见了我自己，在某本书，或诗或歌剧里。在我登上火车时，我又把自己等同于古代传说中的英雄——梅内莱厄斯或伊阿宋——了。《伊利亚特》或《奥德修记》中都没有提到海伦头发的颜色，但伊阿宋追求的是金羊毛；我的追求亦如此。当我最终高兴地发现我的生活与伟大的传统并不和谐时，我更渴望开始这次旅行了。我几乎不再沮丧，虽然我觉得这世上再没有比乘火车长途旅行更令我厌烦的事了。

25 年前，我曾计划做一次长途旅行，但乘火车从加莱到巴黎已令我筋疲力尽，结果我在巴黎一休息就是八年，除了中间回家处理一些经济上的麻烦外，我一直呆在巴黎。在那 8 年里，我常常想去意大利，但 16、17 或 18 小时的旅行对我来说总就像炼狱一样可怕，所以意大利之行尽管一直诱惑着我，但我却从未成行。有人陪伴也不行，因为谁能一谈就是 15 或 16 小时呢？在是否应该去普拉塞旅行这个问题上，我同样经历了思想矛盾斗争，就像海潮一样时涨时落。但我知道，在人的想像中，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会比实际的大——由于我事先已在心理上做好了进行漫长乏味的火车旅行的准备，所以在车上的第一个小时似乎过得并不慢。实际上，当火车再次停下时，我觉得好像刚在车上呆了一小会儿，虽然我也知道从巴黎到拉罗什乡村小站绝非一个小时就能到达。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蓝色海岸”在这里停。“蓝色海岸”是我所乘火车的高贵名字。想想管理着一列火车并称之为“蓝色海岸”的英国公司吧！想想你乘“蓝色海岸”去

尤斯通或卡灵·克洛丝时的情景吧！只要这列火车的名字保留下去，人们就会始终相信法国思想比英国思想更独特，这样就谁都不会觉得法国人需要学绘画有什么奇怪的了。

一个水果贩手上挂着篮子叫卖着走过站台，我因为在登车时已准备好了早饭，所以就想买一篮子法国葡萄消磨消磨时光。露天长熟的葡萄不像我们在英国吃的那种在密封的温室里长熟的葡萄那样果肉一团团粘在一起。但果贩的葡萄已开始腐烂了，只有葡萄串顶端的才能吃，这样的葡萄不值一吃。我不再想葡萄了，而是想铁路公司应集中整治这种欺诈行为。而如果我真的给公司写信反映这种情况，那公司的回答肯定是：“铁路公司的头头们认为顾客在买葡萄之前应自行检查一下葡萄的质量。”报纸是绝不会刊登这种信的，因为法国报纸不喜欢我们的信——它们从不刊登“人民来信”。我真为法国公众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没有表达自己不满的途径。毫无疑问，这是法国人的不幸，但我们不妨想一想，英国虽然准许公开发表市民来信以矫正时弊，但收效甚小，这样一看，法国人的这种不幸或许就不那么可悲了。

直到火车到了里昂，我才发现火车又停下了，在这期间我一直坐在窗边欣赏外面的景色——法国农民一代代开垦出来的广阔无垠的大平原。就是这个平原，提供了法国人在巴拿马丧失的全部钱款，以及投资在俄国公债中的全部资金——50亿法郎。我们穿过香巴尼，或是它的一隅，左拉在写《大地》之前或许就来过这里研究法国农民。大师的名字把我带回到某个晚上，那天晚上，于斯曼以其惯有的善意的刻薄说，左拉的所谓调查只不过是和左拉夫人一起坐马车出去兜兜风而已。

从我内心深处的某处丛林中站出来的原始人并没有善意地看待这个庞大、被高度开垦过的平原，在他看来，这里和城市没有多大的差别，也是由人完全支配着自然，并把自然分割成一块一块的。这种问题可以让我们思索良久，直到火车停下，我才从

沉思中醒过来。我们终于到里昂了，这里高大的白房子使我想到了巴黎——在12月的一个灰蒙蒙的傍晚，从“蓝色海岸”的窗户往外看，里昂似乎就是巴黎。它们的天空都是湿漉漉的，好像随时都要下雨；火车停靠的位置，恰好可以让我俯瞰一条偏街。仔细审视一番之后，我得出结论：里昂比巴黎更粗俗。我想到了伟大的丝绸贸易和商人愚钝的头脑，想到了他们的晚餐会以及他们的妻子和情人。里昂的一切都尽收我眼底，但可看的又少得可怜。我闲极无聊，就写了一封电报，跑到邮局拍发了，因为多丽丝不知道我乘哪一列火车。想想在一群陌生人中能看到她可爱的面孔真是令人高兴的事。开车哨声响起时，我的脚刚踏上脚板。坐在座位上，想到自己差一点没赶上火车，还真有点后怕，但我总算避免了这次可能的灾祸，这不又重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了吗？我对自己说：“现在来研究一番窗外美景吧，因为你再也不会遇到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那个广阔无垠、被农民们日复一日辛勤开垦着的平原，就在我们面前一片片地铺展开去，似乎永无尽头。看着那些一片片一模一样的田野，我自言自语说：“如果我是个经济学家，这个平原就会吸引住我，但自从我收到多丽丝的信后，我就变成原始人了。这个原始人憎恨棕红色起伏的田野，他渴望追随他的同类到绿色的峡谷中去倾听金雀花丛中野蜂的歌唱。这个平原一定繁衍了一种没有灵魂的人；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回家吃、睡、生育。”最后，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条河，她蜿蜒爬行在树林、芦苇、草丛中间，这是那种河岸很低，水面很宽水流又缓慢的河，慢得你都感觉不出它在流动。一群白嘴鸭飞过去。但白嘴鸭不能说是野鸟；我们看见一只乌鸦，我则把它想像成是从某一个芦苇丛生的岛上慢慢飞出来的一只苍鹰；我想像中有个非法捕猎者在不停地捉兔子，野兔一定是快完全消失了；在长着苞谷的土地上，甚至连鸟群和羊群都很少看到。法国与英国不同，它不是个风景如画的国家，只有诺曼底似乎有牧场，只有塞纳河沿岸的

羊群幸存下来了。皮卡特虽是个沼泽,但谁也不会把它与荒凉联系起来;我是第一次看到法国中部,但所见所闻令我震惊,因为我已说过,原始人在我身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将目光从漫长的草原上收回来,“沉闷”,我说“像寄宿舍一样沉闷”。

在这个漫长的平原上,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座山。可当我再往窗外看时,整个伊斯特瑞勒山脉就一下子扑进我的眼帘,山谷里不时露出奇形怪状的小山头,映照着落日的余光,那是一种暗红色的光束,稍一绽露就又迅速地消失在厚云里。这时乌云密集,似乎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不久,夜幕就降临到窗外的风景上了。“从此以后,”我说,“我将只从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快乐。”以我目前的处境,除了多丽丝外,想谁都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在我快要在站台上看见多丽丝时更是如此。于是我开始想她,或许还沉入了梦乡,因为当列车员喊“晚饭准备好了”时,我猛地一惊,醒了。

据说我的同乡从来不习惯在火车上与人交谈,但我对此种说法持怀疑态度。谈不谈话,关键在于第一个打破沉默的人采取什么策略;如果他的言谈举止使邻座的人产生了信任,他们就可以先简单地谈上一二分钟,经过这段时间的试探,他们两人就会决定是将谈话继续下去呢,还是到此为止。关于在火车上如何交谈的问题,可以写成一本很好的小册子,但我现在写的是关于找金羊毛的故事,不允许我进一步偏题。好了,言归正传,我仍接着谈我在“蓝色海岸”的餐桌上遇到的两个人,即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妻子是典型的法国女人,愉快而随和,她显然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上层,她的习惯、偏见就明明白白地写在她的脸上、手上、声音里、服饰上和神态上,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她丈夫的口音说明他是个法国人,但当他脱下帽子时就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他来自热带地区——我想是阿尔及利亚。他说他自14岁起就住在沙漠里,对此我并不觉得奇怪。“几乎可以说是个撒哈拉人。”我说。在晚饭期间以及吃过晚饭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内,我们都一直在谈着东方民族和欧洲人的区别。他说了几句突尼斯方言,还写出了通用于撒哈拉、苏丹,以及麦加的“可兰经”中的语言。我感兴趣的或许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他因发现了两口罗马古井而成为富翁的故事。“因为在古代,”他说,“那儿并没有三处绿洲,而是只有一处,因为使绿洲赖以存在的牛被努米底亚人毁掉了,他们是为了摆脱追击他们的撒拉森人才那样做的。”我从他的口里得知,如果政府投上必须的资金,三口井之间的沙漠都可以得到开垦。所有的古井都可以重新被发现,对这一点他深信不疑。一旦我厌烦了布拉塞,他对我说,我可以从马塞乘船去他那儿,与他一起在荒野中度过一段时光。

“去那里的来访者很少,”他说“你会受到欢迎的,你乘火车可以一直到离我家一百英里的地方,然后你可以坐骆驼到我那里去,我会送给你一匹轻快的骆驼及一个护送人的。”“这太好了,”我回答,“我好像看到自己正戴着头巾坐在高高的驼峰上,在我们约定的日子里到达你的住所——我想你们住的地方应有枣椰树,对吗?”“你想看看我的头巾吗?”他说着打开了旅行袋,让我看他的头巾,他的头巾不禁让我肃然起敬。我记得自己还是小孩子时,就坚持要戴着头巾骑着小马出去炫耀,腰部还挂着父亲从东方带回的大马士荣长刀。我总是想弄明白我性格中的这种爱幻想的天性。这种天性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因为时隔20年后的今天,它又在我体内苏醒了;我一阵冲动,禁不住想请我的旅伴让我戴一戴他的头巾,最后费了很大的劲才抑制住自己的这种冲动。所有这些都已是20年前的事了,我至今没去造访他的绿洲,但在想像中我不知有多少次已踏上了他的绿洲,看到自己坐在高高的驼峰上喊道:“啊!啊!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然而,虽然人们尽可以年复一年地想着他的头巾,但人们可不能就同一个话题一连谈上两个或三个小时,虽然我渴盼能与我的朋友至少一起度过两星期,我们一起在沙漠中漫游,并像弗

罗蒙汀所说的,在那里寻找夏天,但火车到马塞时,我还是很高兴地与他及他的妻子道了别。我的旅程还很远。我已谈累了,所以刚开始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必要再重新与人交谈,但正在这时,我的车厢里走进来一个看起来很让人喜欢的绅士,我只稍稍鼓励了他一下,他就要请我听听他的故事了。他故事的开头是:他曾是个地位低贱的人,但现在是个富有的商人了。这开头就很有趣,如果不是他那坐在另一个车厢里的小女儿因厌烦了母亲而跑来坐到她父亲的膝上,现在我就能够讲讲他的故事了。他女儿的头发披散在肩上,就像五年前的多丽丝一样。我记得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小巧的嘴微微地笑着,眼睛里闪出一种好奇的光芒。她说她累了,但这不是病,她父亲告诉我她坐火车或乘船长途旅行时总是这样。她说话很快,很动听,说着说着忽然又跑掉了,我想这下可好了,但不过半小时她就又回来了。她看起来有点虚弱,嘴唇发绿,也不常笑了。但人们不可能把旅行中遇到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和他们父女分手的地方大概在马塞和帕莱塞之间的某个车站,因为他们在给我道别后还说再过两个半小时我就能到帕莱塞了,但在下一站一定要转车,我为此还谢了他们。但我此时的情绪已极低,因为如此漫长的旅行已快要使我失去耐心了。帕莱塞车站是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特别是在我等着迟到的被弄混了的信件时,似乎失去了最后的忍耐力。一切似乎都无所谓了,甚至多丽丝也无所谓了。但这些情绪都只是一时的麻木和迷茫。当我在站台上看到她那张漂亮的面孔时,我不禁高兴地想到,自己事先给她发电报真是太明智了。我与她并肩向她的旅馆走去,与独自漫步相比,这是多么愉快的事啊!“她还是那一个漂亮的女孩,”我在心里说,“五年前我在卡布兰广场激烈地谴责过的那个女孩。”我恭维着她的美貌,告诉她看起来一点也不老——只是稍瘦了一点,稍苍白了一点,但仅此而已,她还是那个魅力四溢的多丽丝——是那个轻而易举就能让我这个归来的恋人激动不已的多丽丝。我们边谈边

走出车站,我的话里满含温柔的责备:为什么她为了等我一夜不睡?一定会有一个理由;“她就会对我说,”我说,“我不能进她的旅馆了。”只有傻瓜才会像我那样提前给她发了电报,因为就是那封该死的电报才把她带到车站,并告诉我她不可能允许我呆在她的旅馆里。但与一个女人就一些细节问题争论不休,或生她的气,任何一个稍懂得点恋爱艺术的人都不会这么做的,即使时隔25年也不行。

我们总是被女人牵着鼻子走;决定权总是掌握在她们手中,我们最好选择另一家旅馆住下,并丝毫不表现出失望的意思,或尽可能少地表现出失望的意思,但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未见面了,我们无法立刻就分手。多丽丝说我必须到她的旅馆去吃晚饭。但我在车上已吃过了,她只能劝我喝一杯巧克力奶。我们谈了一小时,随后我就离开了她。我的心里渗进一丝凄凉的感觉,因为我终究不能赢得多丽丝的芳心。“上帝!我在寻求什么?就是要在旅馆的房间里度过一个个柏拉图式的下午和晚上吗?”那天晚上我一定睡着了,而且睡着得一定很快。当我睁开双眼,透过隔蚊窗往外一看时,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阳光轻盈地照在爬满墙头的鲜花上,让人不禁心旷神怡。我冲动地立刻从床上跳起来打开窗子,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在迷人而朦胧的晨曦中立着一排排高大的棕榈树,在它们身后则是几乎和天空一样蓝的大海,还需问我此时的感觉吗?温柔而清香的空气弥漫在我周围,(在我的想像中),淘气而恶作剧的空气带来了沉浸在海水中的女人胸部散发出的令人陶醉的香味。但这样美的气息和幻觉为什么要来侵扰我这个昨夜失望至极,或许命中注定只能在梦中才有快乐的无辜的受害者呢?我闭上了眼,因为维纳斯这时好像正在从海水里浮现出来并来到我的卧室。

亲爱的读者,请原谅我的敏感,请你记住我这是第一次呼吸到南方温柔的空气,第一次看到棕榈树和橙树;也请你记住我是个诗人,一个寻找金羊毛的伊阿宋。“这是赫斯珀里得斯的金苹

果园吗？”我问自己，因为那些挂在黑得油亮的树叶间、像精致的黄毛纱球一样的金色果子，似乎非人间所有，它们使我想起了自己在孩提时代在房子的玻璃窗后常常看到的那种果子，但我知道我看到的是橙树，绿叶间悬挂着的果子是我在童年时代常从果贩子手里买来的那种水果，我在童年时代吃这种水果太多了，结果弄得我再也吃不下那种果子了。这种水果也是我们在剧院常能闻到其甜味的那种果子，也是女人们从不会厌烦的果子，不管是上流社会的女人，还是下层社会的女人都不会吃厌。对我来说，我觉得奇妙的是我终于看到了长在树上的橙子了。那天早晨我真是幸福，幸福得我都奇怪这种幸福感究竟是从何而来的了，于是我追问自己这种幸福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我突然想到，幸福或许终不过是一种能感觉到惊奇的能力。仆人带我去洗澡，在洗澡和穿衣服的过程中，我还在想，做一个仍能对蓝天感到惊奇不已、仍发现阳光如此迷人的中年男人是多么幸运啊。但谁不会迷醉于照在帕莱塞公园的阳光呢？而且，我知道我就要和多丽丝一起去到一个像剧院中的垂幕一样蓝的海边散步。当她向我走来时，她手里的阳伞倾斜着，似乎就是影幕上的人物。“难道我们不都是影幕上的人物吗？如果我们不是影幕上的人物，那么美丽的海伦或许就是惟一的现实中人了。”在帕莱塞，想到伊阿宋、帕里斯或梅内莱厄斯这样的人物让我很感兴趣。我问多丽丝本地的交响乐团正在上演什么音乐，她说每天晚上都上演“阿伊达进行曲”。“用短号演奏。”我说，并立刻就明白了帕莱塞的使命就是要将人们从日常的平庸生活中、从希伯来语文学和与此相关的什么主教啊，牧师啊、副牧师啊什么的東西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特别是主教，一向被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法国的小说、有血有肉的人、漂亮女孩则代表着生活中琐屑的一面。一个女孩只有在准备结婚时才被人看重；租房子养家被看做是严肃的事；——事实上，所有偏见都是堂而皇之的。每一种不正常的、离群的行为都被看做是微不足道的。我

想这是对的：世界不能没有牧人，牧人也不能没有我们——我们这些去帕莱塞寻找金羊毛而不是在郊区教堂修建火炉的怪人。（火炉和报纸一样被看做是极其重要的，它们也确实重要。）我和大主教曾就《但以理书》谈过一次话，我说如果我要写一部关于其博学多识的书，那我也会被认为是严肃堂皇的，严肃得甚至可以在《教堂报》上写评论文章了。我一直认为我们已经在巴勒斯坦传说方面花太多的钱了，这将会惹我们的后代——或我们的前辈——耻笑的。我们来自何方，又要走向何处？这是我给自己提出的另一个棘手问题，这个问题就像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那样难以回答：为什么人们会认为马修、马克、路加、约翰比美丽的多丽丝悦耳的谈话还严肃，或者说，为什么人们认为教堂上阴郁的微光要比洒在海岸上、照亮彩色的房子、使多丽丝摇动阳伞的美丽的南方日光更庄严呢？关于何为严肃何为肤浅的问题可以写一篇很好的文章，但争论本身总是微不足道的。对我来说，值得认真对待的是回忆她腰身的优美摆动，以及阳伞下她脸上的表情。当然，在充满阳光和阴影的蓬松的丝织衣服的映衬下，几乎每一张脸都是漂亮迷人的，但多丽丝的脸最漂亮！梅姆灵本人从未设计出比多丽丝的脸还迷人的小脸。“但梅姆灵的修道生活与这个像神话传说中的大海一样的大海以及伸进蓝色海湾的红山是不和谐的，”我说，“她的优美是爱奥尼亚人式的，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我走在她身边，想找一家餐馆吃饭。我感到生活有时对我似乎出奇地好，甚至可以说是慷慨，否则，凭我的粗心、错误和草率，我是不应该获取，或更准确地说，我不值得获取这么多报偿的，如果——

“看，那儿有家餐馆，”她挥了一下伞说，“就在那些石头边上。”生命在噼噼啪啪地燃烧，我说话时喉咙里好像塞着一团东西，我说：“三周后这里就会住满人。”“三周后，在帕莱塞会到处都是我们这样的人。”她说。“那我们就不呆在这儿。”我回答说。

我们属于第一批到帕莱塞的旅客，所以饭馆就好像专门为

我们开的似的,侍者和厨师全身心地为我们服务。我们想在玻璃房中用早饭吗?我不知道除了这样称呼我们用餐的房子外还怎么称呼它,因为我们周围似乎全是玻璃。大海的气息从窗户里漫进来。看着海湾,我觉得多丽丝的美似乎在萎缩,“是被海湾和山头那种广阔而迷蒙的美比下去了。”我说。亲爱的多丽丝,如果我只顾着看这个海湾而不是看你,那请你原谅,因为我以前从未看见过像这样美的东西。我感到自己目前的感情对多丽丝来说有点不太公平,于是我对多丽丝说:“所有这些对我来说好像既是新的又是旧的,难道这不让人觉得奇怪吗?可以说,我好像走进了自己的领地一样。”

“你的领地!难道我……”

“我最亲爱的,你也是我领地的一部分,说,你是我的领地,我美丽的领地。为此我等了多少年啊!”当我把她揽在怀里时,她看见侍者正朝这边走来。我转过头去看远处的海湾,我的欲望慢慢消失在吹过海面的无限甜美的空气中了。

“碧蓝的山,蔚蓝的海,到目前为止,我在这里只看到蓝色。”

“它们今天看起来呈蓝色是因为有一层薄雾,但实际上它们是红色的。”

“一个由红山环绕而成的海湾,”我说,“所有的山坡都被房子的白色墙壁点缀得斑斑点点的。”

“看那些橄榄树。”

“橄榄树,当然要看了。我还没见过橄榄树,橄榄树的发源地在阿维尼翁或其附近,对吗?我经过阿维尼翁时正好是黑夜。”

“你在这儿能看到的树不多,只有橄榄和冬青。”

“冬青我知道,再没有比冬青还美的树了。”

冬青树下的番红花呀,

还像蜜蜂采花时那样美丽而芳香吗?

“今天早晨,当我们走过公园时,一直追着我们的香味是一

株越过公园墙的桉树散发出来的，风一吹，香味就一直跟着我们了。”

侍者端着冷盆走过来，我们的注意力从橄榄树转到橄榄果。我平时连摸都很少摸橄榄，但那天早晨我却吃了很多。我们还要羊肉片或小羊肉吗？多丽丝说南方的羊肉很难吃，而当我们决定吃小羊肉时，我的脑中出现了一个想法，即我对多丽丝之美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梅姆灵的画板上，人们找不到一张与她的脸孔相似的脸。她像古代的某个美人，但我又无法预测到她的美属于哪一个世纪。

“若是有只船，海湾的美就会遭到破坏。”我说。侍者端来咖啡后就走了——我希望他这是最后一次来。“但没有船的海湾是多么美丽，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却说不出所以然。”我们手拉手走到窗前，坐下往外看。

“为什么你希望海湾里没有船？”她问。

“并不是非没有船不可，在海湾的拐角处若有只 50 人划的大画船看起来也不赖。海湾是古典风格的，每天早晨，在我与你谈话的时候，就会有某种回忆，或者说是某种回忆的影子像窗玻璃上的苍蝇那样在我心里嗡嗡直叫，让我烦躁不安。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希望在我们吃早饭时，会从那些波涛中出现一位仙女了。数千年来，人们都相信仙女是从那些岩石上出现的，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和他们的子孙是在丛林中或山坡上相逢的。这些信仰并无多少虚饰的成分。你只需看看那碧蓝的海水，就会相信仙女们正在岩石四周游弋；当我们驱车在那些山坡间穿行时，我们一定会睁大眼睛，凝神寻找那些森林之神的。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国家了，因为它是异教徒的。那些山与我曾经过的爱尔兰的那种高低不平的山不同！而你，亲爱的多丽丝，你可能是昨天才被挖掘出来的，虽然你只有 40 岁；你是过去时代的人，一点也不像梅姆灵画笔下的小脑袋，而当我乘火车来这里时，我则想你一定是这样的；你也不像纽伦堡的画家

笔下的人物,你是个塔纳格拉陶俑,而且是最漂亮的。在你身上,我读到了古典艺术品的所有迷人的东西。但现在我必须看看这个海湾了,因为我可能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东西了;以前我也从未看见过像这样的东西。原谅我,因为你应该记得三天前我还在爱尔兰,前天我是在英国,昨天我则在巴黎。我是从灰蒙蒙的地方来的。我离开巴黎时一切都是灰沉沉的,当火车经过里昂时,那是一个灰暗的夜,现在这里则是万里无云。因为前三个星期你一直在看着这个海湾,当然无法理解我的惊羡;对你来说,“蓝色海湾”只不过意味着棕榈树和散步。而对我来说,它仍是古典艺术品,我会始终把你与那个海湾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我活着,你就会永远美丽,但几天后帕莱塞就会失去她的美,让我尽情地欣赏她吧。”

“或许我不会活过帕莱塞。”

“能,你能,因为你还是同一个多丽丝,一点也不比我第一次见到你时老,那时你穿着白色的衣服,穿过房间走到钢琴旁;你金色的长发披散在肩上,只不过你的头发稍黑了一点,仅此而已。”

“让你看到我瘦时的样子真让我生气。但愿你去年能看到我,那时我刚休养回来,体重增加得像块石头,人人都说我看起来还不到16岁。我知道是这样,因为所有的女人都嫉妒我。”我坐观正慢慢消融的地平线,不由沉醉在梦一般的遐想中。正在这时,我听到我的女伴说: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很久以前就在那个海湾发生的事。”

“告诉我是什么事。”她的手在我手上摩挲了一会。

“你想听吗?我也很想告诉你,但那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要回忆起来很费力。这儿有海和天空的颜色就足够了;温暖的阳光浸透我全身;我想要一株树;我和一株棕榈树的惟一不同是——”

“我敢肯定那些可怜的棕榈树听了你的话正浑身颤抖呢。它们在这里得不到充足的阳光；它们来自南方，而你则来自北方。”

“我想是这样。它们在这儿可以生长，但却无法繁茂。但我并不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在现在这样的時候，我甚至无法同情一棵棕榈树。看我喷出的烟圈是怎样转着圈消失的吧！多丽丝，真奇怪我会在这里见到你，许多年前就注定我要来这儿——”

“与一个女人一起？”

“对，当然是这样。还能是在别处吗？我们的生活总是与女人们纠缠在一起的。有些男人在女人身上找到了生活的真理，其余的男人，就如我刚才所说破的，则在主教身上找到了生活的真理。”

“告诉我是哪个女人邀请你来这儿的？能否给我谈谈她的情况？她爱你吗？你和她来这儿的阻力是什么？”

“这是那种最独特的故事——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故事本身就像我自已，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就像卷轴一样，每支卷轴都是用不同颜色的线缠起来的。我们的故事就是这样，它发生在维多利亚街上，时间是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的晚上。故事的起因是一封信。她写信邀请我与她共进晚餐，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我那天晚上正好没事可做。你经历过那种奇怪的生命颤栗吗？当门铃响起时，这种颤栗就刚把它的手指放在我肩上。往往说：‘我总是欢迎来访者的，不管他或她是谁。’我的来访者一般只在我这里呆几分钟，而格特鲁德在信中则答应与我共度一个漫长而愉快的夜晚。她在信中写道：‘我没邀请别的什么人与我一起去见你，但请你不必介意单独与我共进晚餐。我希望你能来，因为我想请你帮我解决一件我认为你能解决的问题。’我在梳洗打扮作准备时，心里还在想她还会对我说什么。我的好奇心被激起来了于是我就很快朝她家走去。夜色真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她住的地方离我住

的地方并不远,我们竟是邻居。你知道我非常了解格鲁特德,我喜欢她。我们之间的故事是理不清头绪的那种。当我向她走去时,我希望最终能解开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死结。能做格鲁特德的情人的确是一种快乐,因为她虽然已是40岁的女人,但希望被男人取悦的自然欲望,聪明的才智和优美的举止却使她仍青春永驻;她的外表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便宜的法国外套和内衣使她仍是一个让人乐于爱恋的女人。虽然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做她的情人是非常快乐的,然而做她的情人也有许多不利的方面;因为格鲁特德本人虽然并不粗俗,但她却喜欢粗俗的东西。她的朋友都是粗俗之辈;她的房子——因为她刚离开丈夫——华丽而雕琢太过;窗户上挂的窗帘过于厚重;电灯似乎从未关过;至于房子里挂着的画——我们还是不要谈它们了,因为格鲁特德本人就在其中——都是沙龙中常见的一些画。但且住,我要解释的是,我对格鲁特德没有一点偏见。她天生就有优美柔情的仪态和浑圆的臀部,她穿的白礼服优美的盖在她屁股上,特别是她走动起来时,她的衣服就会散发出一种尾根的味道,同时她会樱唇微启,说出这样的话来:‘坐在我身旁,告诉我你最近在做什么。’谁也说不清她是不是在故意挑逗别人。”

“可能既是故意的也是自然面然的,两种因素都有。”多丽丝说。

“我知道你明白,你总是能明白。”

“为了避免你把手放在她胸脯上这种过于亲昵的举动,她会说‘我希望你不必介意单独与我共进晚餐’,并立即会提出一种小小的理论,即两人为伴,三人在一起就成了市议会了,除非这三人是由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的,因为一个女人只有在同两个男人谈话时她才会快乐,女人从内心里是希望一妻多夫制的。”

“多丽丝,你真是太了解我了,你连我想爱的女人都能虚构出来。”

“是的，我想我能。你还没变，我还没忘了你，虽然我们彼此五年没见面了；好了，继续讲下去吧，再告诉我一点格鲁特德的事。”

“好吧。我紧挨着她坐在沙发上……”

“在昏暗的灯光下。”多丽丝插嘴说。

“……我试图找出她请我吃饭的原因，因为她在信中说她希望能给我谈谈她认为我能对她有所帮助的事。格鲁特德还要向我借钱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借的一定是笔大数目，是我借不出一笔数目。认识富人的好处就在于：当你找他们借钱时，他们总是拿不出你要借的数目，于是只好实话实说：‘如果我借给你五百磅的话，那我今年就会捉襟见肘，维持不到年终了。’但格鲁特德不是要借钱的那种人。我催着她告诉我原因。就在仆人就要走进房间之际，她转过脸对我说：她送信给我的原因是她希望能给我谈谈一艘快艇的事。想想我听到她的话时是多么惊奇吧。‘给我谈谈一艘快艇的事！’我说：‘是一幅画吧。’”

“过了一会儿，仆人说晚饭已准备好了，我不得不等到仆人离开房间后再继续听她讲故事。她希望去游览希腊和希腊群岛，但她又不敢独自一个人在希腊旅行六个月，而要找一既空闲又可靠的男人做伴又很难。她认为可以信任我，并说她记得我一度喜欢过她。她说：‘或许你现在仍喜欢我，若你说有占有我的权力，我也不会讨厌的。我不介意你爱我，但我不喜欢什么权力。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一旦我们返回英国，你就不会再追求我了。你知道这种追求给我造成了多大的痛苦；你一定清清楚楚地记得最近的那场追求是怎么一回事。’女人有时只需一句话就能活化出她的肖像；不是画出来，而是只用几句话就表明了她的整个道德品质，格鲁特德的道德品质就隐含在我刚才引述的那几句话里，就好像上帝刚把她创造出来似的。但我现在不得不给你讲讲她提到的‘最近的那场追求’的来龙去脉了。如果不是她提起，我倒把这事忘了；我脸上一片茫然，她说：‘难

道你不记得了?’‘当然记得,当然记得。’我回答。”

“一天午饭后,格鲁特德起床后不知不觉向我走来,而我则自然而然把她抱在怀里,当我告诉她我是多么喜欢她,以及与她在一起是多么快活时,她答应在林肯的一家旅馆与我幽会;但在约会时间的前一天,她却写信告诉我她不得不与我分别。我一下子被击懵了,因为我喜欢格鲁特德。我用了长长的一小时求她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说了过火的话,我谴责她是个残酷的女人,诘问她是不是像猫玩老鼠一样玩弄男人。我的谴责虽然让她很痛苦,但她却拒绝对她的行为作出任何解释;她眼里溢满泪水——看起来像真的泪水一样——她难以相信自己费了这么大的麻烦却只得到这样的一个无法解释、极不愉快的结局。几个月过去了,我没听到格鲁特德的任何消息,直到有一天她送给我一件小礼物,同时还有一封信,邀请我到乡下去看她。在我和她并肩走过伯克郡的一处美丽的森林时,她告诉了我她没去林肯的原因。当时,她在蒙特·卡洛的赌桌上遇见过的一个波兰人正在追求她,并威胁说,如果他看到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他就杀死她和那个男人。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等她讲到细节时,我就无法不相信她说的是实话了,因为她说有一次她几乎被那个男人杀死。他们一起去了德国,她和那个波兰人;他把她锁在一间房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不给她东西吃,然后突然走进来,把手枪对着她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幸运的是,手枪没响,‘真是九死一生’,她说,‘子弹都装好了。我决心已定,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我就不得不告诉我丈夫了。’‘但手枪上膛有一次就够了,哪里还会有第二次,’我说,‘只一次你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你告诉我的事真是太可怕了。’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树林里走来走去,时刻担心那个波兰人会突然从某个灌木丛后面站起来拔枪对着我们。但他最终没有出现;她显然知道他在哪儿,或已与他有君子协定。在这样的一天快要结束时,我驱车穿过夏日的夜晚,除了格鲁特德答应一旦自由了

就给我写信的许诺外我一无所获。时间一星期一星期、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期间我只偶尔能看见格鲁特德;你知道,恋爱故事一旦成了一团乱麻,它就一直是那么一团乱麻了;所以我害怕我们永远打不开我们故事的死结。祸不单行。在我看来,我在许多场合都举止失措,出尽洋相;你想知道我在剧院是如何举止失措的吗?以及有一次我是如何碰巧得了重病的吗?等等,等等,讲这些事要花去很长的时间,我就不细说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样的事一直延续到格鲁特德决心把事情作个了断,她这才送信给我,邀请我共进晚餐;我们离开餐厅,谈着她租的快艇的事——纵帆式帆船啦,船长啦,水手啦,以及供六个月用的一切一切。我无法接受她这么长时间的殷勤接待。格鲁特德比我有钱,但保养快艇所需的费用有三分之一一定是要从我的钱袋里拿出来。

“在希腊群岛间漫游六个月的愿望激起了我的想像力,在听格鲁特德讲话时,我的灵魂常常飞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我们可能在塞浦路斯登陆,想到就要看到塞浦路斯的神庙了,我们不禁欣喜若狂;我和格鲁特德可能也会站在快艇的甲板上,观赏渐渐消失在东方的星星;这时水手们会唱起歌,在灰白色的月光中会吹来一阵微风,当鼓涨的船帆带着船往东驶去时,我们听到了船破开水流时微波荡漾的声音。在我的想像中,半小时后就会有一座岛出现在金色的天穹下,这是一座有一排排白色建筑物的高贵之岛,或许就是古代的神庙。‘与格鲁特德的六个月旅行会让我写出一部多么奇妙的书啊!’我在往家走时想到,而且书名都由格鲁特德起好了,叫‘无感伤旅行’,这名字本身就让人激动。难道她不曾说过她不介意我爱她,但不喜欢什么权力的话吗?我想像着每天晚上情人离开她时,编史者会怎样坐下来一边听着水击船舷的声音,一边记录他的所见所闻的。他常常一直写到铅笔从手里滑出来,因为他必须立刻记下笔记,否则脑中的印象就会不翼而飞。他知道他的感觉、感情,以及它们的涨、

落都是短暂的,他必须像天文学家观察一个有点不稳定的星星的运行一样观察着它们的变化。他对她及自己的描写会与他曾载着梅内莱厄斯去追求海伦之美的大海的描述交织在一起——而美,是男人最高贵的追求。”

“在我看来,自然只有一次把一件完美无憾的东西交给艺术家了。故事的结尾特别让我高兴,因为我毫不费力就能想像出我们在普利茅斯、或朴茨茅斯、或赫尔、或无论什么着陆的地方分手的情景。‘好了,格鲁特德,再见。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六个月的快乐时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这次旅行。但分手并不意味着绝交。我还有希望再在这个季节见到你吗?’她会回答说:‘当然,悉听尊便。你是个很好的男人。’于是,我们两人都叹息着转身走了,心里当然感到一丝悲伤,因为一切分别都是让人感伤的,但在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解脱的感觉,甚至觉得高兴——这是鸟儿离开栖息的树枝时感到的那种快乐;或许什么也没有第一次振翅飞翔时那样感觉美好。我现在忘了我最期盼的是女人还是书了。书一定是本好书;没有那位女士,我就不会有那本书,如果风更顺畅的话,我可能就会写出一部可与18世纪的文学作品相媲美的书来,因为18世纪在爱方面是崇尚愤世嫉俗的:当一个时髦青年在爱着一个女人时,他常常在考虑一个使她以后蒙辱的计划。龚古尔……”

“但亲爱的,请先讲完快艇的故事。”

“好吧,格鲁特德和我似乎已决定去马赛接快艇了,但从比斯开湾开始的旅行途中风暴不断,而且又无聊乏味;因为途中一直是坏天气,所以她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直布罗陀。她穿过海峡时向劳氏船级社发出电讯;我们收到一封电报: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的快艇服已从裁缝那儿取来了,鞋子也从鞋匠那儿拿来了,各种各样的必需品也都收集齐备了;但电报之后我们再没收到任何消息。一天晚上,格鲁特德对我说她开始感到焦急了;快艇应已到马赛了。又过了三四天,我们在报纸上——我想是《标

准晚报》——读到一则消息：一艘名为‘银鸽号’的大帆船在驶往帕莱塞途中沉没。如果她得到这艘船并也从那儿经过的话，她一定会被救上来，而所有雇员，包括船长、七名船员和我的书将会消失无踪。”

“上帝，真是惊心动魄！格鲁特德怎么样了？你没作过她的情夫吗？”

“从来没有。在等快艇的过程中，我们是相互回避的。随后她就爱上别的什么人了；她嫁给了她的情人；现在他正在哀悼她，她找了个极好的丈夫，并死在了他的怀里。”

在讲述过程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希望多丽丝能问问我为了写一本书是怎么同意与一个我不爱的女人一起旅游六个月的。但有一段时间我是爱她的——那是在到林肯前的那个星期。我不知道多丽丝是否会默认我对格鲁特德修长的身体、幽雅的举止、清丽的服饰的爱慕就是我答应与她一起出去旅游的真正原因；她没问这种让我尴尬的问题。“真奇怪，人们从来不问别人预先想到的尴尬问题。”相反，她问我在过去的五年里与谁在恋爱，这个问题也颇令我尴尬，这个问题虽然不会像上一个问题那样令我非常尴尬。但要说自己自从看见多丽丝就过起了清心寡欲的生活，那是谁都不会相信的，而且也是很可笑的。我叹息一声，谈起了一段持续了多年但最终毫无结果的情感经历，因为怕多丽丝问我们是否是因为厌倦才分了手，我补充说那位女士有个女儿已长大成人，就是因为她的女儿我们才结束了我们的恋爱故事。然而我们发誓以后还做朋友。多丽丝的沉默使我有点尴尬，因为她没有问与那位女士及她的女儿有关的任何问题，从她的举止也难以看出她是否相信这个女士就是我五年里的全部的爱，她是否相信我与那个女士真的绝了交。对我来说，明智的做法似乎是不看多丽丝，随后我就感到她信不信并不太重要，只要这不会减少我赢得她的概率。我想到，在这么蓝的天空下，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大自然之间，人的道德性会像窗帘一样打盹。

然而在帕莱塞有一家英国教堂，是货真价实的教堂！亲爱的小城，我的心灵之城，本地的交响乐队正在这儿演奏《阿伊达进行曲》和《美丽的海伦》！亲爱的读者，如果我能向你灌输优美的田园曲的感伤情调，你就会明白我在帕莱塞期间是始终把自己看成传说中的主人公的，至于这则传说是关于阿尔戈英雄的还是特洛伊围攻的并不重要。我在想像中描述了一番拿着金苹果的最漂亮的女人之后，我说道：

“你问过我一直在爱着谁了，现在该你告诉我你一直在爱着谁了。”

“在这三年里我都准备要结婚了。”

“你才订婚吗？”

她点点头，双眼盯着蓝色的大海，我笑着说，我说的不是什么结婚或订婚，而是那种美丽的节制不住的变化无常。

“你不会是让我相信，在过去的五年前，从来没有什么激情控制着你，就像猫拉着一只小老鼠那样把你拖来拖去的吗？”

“很奇怪你会问我那种问题，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真的吗？”

“只不过我比任何老鼠遭受的痛苦都要多。”

“多丽丝，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是多么富有同情心，你知道我会理解你，人的一切都使我感兴趣，如果你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爱我，你的故事将……我必须听听它。”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她的双眼溢满了泪水，“我痛苦极了，不要再对我提起这事了。再重温一遍痛苦有什么好处呢？”

“是的，有好处，说说有很大的好处，如果这个恋爱故事结束了，如果没有再恢复的可能了，那请你告诉我，讲讲会减轻你的痛苦的。这个男人是谁？你是怎样遇见他的？”

“他是阿尔贝特的朋友。是阿尔贝特把他引见给我的。”

“阿尔贝特是要与你订婚的男人？老故事，真是老得不能再老的故事。为什么总应是朋友呢？世上有那么多男人，但引起

女人注意的总是朋友。”我给多丽丝讲了一个曾抢劫过我的朋友的故事，我的故事使她止住了眼泪。但一旦她要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了，她的眼泪就又止不住地流出来。毫无疑问，她受到的伤害太深了。若将事情的结果与我们身心投入的数量作一对比，那一定是很有趣的事，多丽丝显然是曾全身心地投入到她要讲的故事之中。在某些人来看，这一定是个悲惨的故事，一个欺骗和谎言的故事，因为理所当然阿尔贝特像许多其他的好男人一样受到残酷的欺骗。但多丽丝也一定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因为她一想起她的痛苦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看着她的眼泪心里说：“真奇怪她会哭成这个样子，因为她的故事与许多毁掉了男人和女人幸福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会告诉我她那被命运驱走的情人的平常而美丽的故事，毫无疑问，这在她的故事中是必不可少的情节。”我抬头远眺，不禁再一次深深地被低垂的海岸和环绕着海湾的锯齿状的山峦吸引住了，沐浴在麝香兰一样浓郁的香味里，它们显得分外迷人。当我的思绪再回到多丽丝身上时，我能看出她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之中了。

“你一知道了自己爱他，就决心不再见他了吗？”

多丽丝点点头。

“你是在屈身于他之前把他送走的吗？”

她点点头，泪眼婆娑的看着我，这使她的眼睛越发迷人。她告诉我说，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可能欺骗阿尔贝特。

“我们强忍着，直到我们的血肉之躯再也无法忍受。”

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如此；它们都包含着评论家所谓的“悲惨的细节”。但如果特里斯坦没有利用马克王外出打猎探险的机会，世界就会更加缺乏伟大的爱情故事了。马克王的幸福终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不过是已成过去的故事，他的生命也只是在这一点上有价值，它只不过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爱情故事而已。如果瓦格纳没有爱上维斯顿克，那就不会有歌剧《特里斯坦》了。而谁会为了维斯顿克的荣誉而破坏《特里

斯坦》的演出呢？特里斯坦的故事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最著名的。另外还有海伦的故事。如果梅内莱危斯的妻子没有对他不忠，世界就会缺少最伟大的诗歌，即《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亲爱的读者，想想这些，你就不得不承认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通奸。孩子是婚姻的产物，故事源于通奸之床，世界二者都需要——故事和孩子。如果多丽丝是个忠贞的女士，即使我在这里讲的小小的故事也不会有；如果她不告诉我她对阿尔贝特始终不渝的爱，我也不会在那天有兴趣在海边听她讲故事了。她的故事算不上是伟大的故事，如果有哪个速记作家记下了她讲的故事，并说这种故事可与伊索尔达和海伦相媲美，那也是虚妄。但我是从她自己口里听到的，她的眼泪和美代替了瓦格纳和荷马的语言，她的眼泪和美是那样具有说服力，我相信我在听她讲述时所体验的感情不逊于我在开始一项艺术工作之前体验到的那种感情。

“你知道吗？”她开始说了——“或许你不知道，或许你从未爱得那么深，所以你从未体验到他不在时我感得的焦虑。有一次，我们一整天都呆在一起，分手的时候我们约定两天内不再见面，即到星期三再见面。但分手的当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非常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感到自己必须听到他的消息，一句话就够了。但我们已约好了啊！是愚蠢也罢，是疯狂也罢，总之我拿起了话筒，当我接通电话时，你猜他怎么回答？——‘感谢上帝，你终于打电话了。我刚才一直在你房子周围走来走去，几乎什么也记不得了。我感到，如果再不发生奇迹的话，我就要疯了’。”

“如果你爱拉尔夫远胜于爱阿尔贝特……”

“为什么我要放弃阿尔贝特？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就会毁掉阿尔贝特的生活。你知道他爱我已爱了那么多年，他的生活已是以我为中心了。他不是那种爱拈花惹草的男人。除了他的工作之外他就只有我了。他本不太喜欢读书，但他却读我喜欢的

书。我知道他不太关心音乐,但他却喜欢听我唱歌,只是因为是在我唱,他才喜欢音乐。他从未注意过别的女人,我想他都不知道她们穿的是什么衣服,但他喜欢我的服饰,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衣服漂亮,而是因为是在穿着它们。谁也不会牺牲这样的一个人,否则她会怎样看待自己呢?她会羞愧而死的。所以别无选择,只有让拉尔夫走开了。这几乎要了我们的命。”

“恐怕我不会给你这样的爱,在你经历过这样惊心动魄的感情后,我对你的爱会证明是不热烈的。”

“我不想再要这种感情了,我再也无力忍受这种爱了,它们会要我的命的,即使其中的一部分爱也会杀了我。拉尔夫离开后的两个月里,我只是有点沮丧。我当时比现在还瘦,我心乱如麻,几乎活不下去了。”

多丽丝的话使我们都苦笑了一下。我们看着它们像香烟的烟圈一样盘旋着消失在空中。

“但难道你没有从这次伟大的爱中得到一点幸福吗?”

“我们的幸福只有一小会儿。”

“多长时间?”

多丽丝想了一下。

“只有六个星期可以说我们是真正幸福的,这段时间是阿尔贝特不在的时候。他一回来,悲哀和悔恨就又开始了。我必须每天都看到他——不是阿尔贝特,而是另一个,阿尔贝特开始注意到我变了。我们常常一起出去,我们三人一起,最终阿尔贝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羞辱了,于是他对我说他再也受不了了。‘我希望你一个人与他一起出去吧,如果这能使你得到幸福,我可以放弃你。’”

“这么说你几乎因爱而死!好吧,你现在必须为爱而活下去了,你必须抓住快乐的尾巴。生活现在是美好的,而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则感到悲哀,憧憬未来则感到恐惧。但我想,若是要你这样的小基督徒像仙女那样不做任何结论地生活,那是毫无希望

的。擦干那些眼泪,忘掉那个男人,你告诉我那个故事已经结束了。除了蓝天、碧海,忘掉了一切。我给你的幸福会把过去的一切从你脑中冲刷干净,让你闭眼不看未来。我想让你多吃多睡,去发胖,去梦想,去读忒奥克里托斯的诗,这样,当我们走到山上时,我们会沉浸在对古代的遐想中了。你必须忘掉阿尔贝特和使你不幸福的男人——是他让你追怀过去,幻想未来的。”

“我想我应该得到一些幸福,你知道,我已牺牲了那么多。”

她的这些话使我心中又升起了希望——我是否可以说就像一只抛掉了重重的压载物的气球?——我的希望越升越高,以至于失败似乎就像罗塞蒂的小羽毛一样坠入下面的深渊。“她应该得到一些幸福,”我说,“我想她是有心想让我成为她的幸福。”她的话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解释,她显然是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是本能的,阿尔贝特不在,为什么她不接受我给她的幸福呢?她是否会理解:如果阿尔贝特和她一起时欺骗他是一回事,如果他在千里之外时欺骗他则是另一回事?而且我们不是在地中海边吗?这是充足的借口,因为阿尔贝特远在千里之外,所以她会轻而易举地爱上我。她说过除了阿尔贝特之外她不可能嫁给别的任何男人,不忠与不专是两回事;如果我发现自己误解了她,我就以此作为一个论点,再谈下去,但目前我不敢再多问,因为如果听她说我误解了她,我会伤心的,但因惟恐她猜出我沉默不语的原因,我一时又想不出什么更合理的理由,于是赶紧说:“你说,你不是说要驱车兜兜风吗?”

“我们正在谈幸福,但如果你想去驱车兜兜风的话,那我们就走吧,因为再没有比驱车兜风更快乐的事了。”

“没有吗?”

她抓住我的手臂。我喉咙里有一种被哽住的感觉,我问她是否让我去叫辆马车。

“日落前我们还有时间做一次短暂的乘车游览,你说过你喜欢山——等一天我们就去一座山城,但我们必须在早晨一早就

出发,因为要爬很长的山路——一条长而蜿蜒的山路。但我们必须用整个上午才能看完你想看的山。你想看看冬青树吧。”

“亲爱的,我想看你。”

“好了,你正看着我呢,来吧,别不高兴了。”

“不高兴,多丽丝!我在生活中从未觉得像现在这样美好,我现在还在奇怪是什么运气把我们拉到一起来的,并且是在这样一个好像精心安排好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现在这样令我高兴。”

“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这儿的风景?”

“我没法想什么风景,多丽丝;我在想着你,想着你刚才说过的话。”

“我说什么了?”

“你说过——我当时想记住她说过的话,但从那以后又有很多思绪滑过我的脑子,我根本记不起她说过什么了——你说过——你说过什么?——在受过那么多痛苦之后,你应该分享一些幸福——”

“不对,我没那样说过;我说的是,我已牺牲了那么多,我想我应得到一点幸福。”

“还是她知道自己说过什么,”我在心里说,“她的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但因为不敢问她是否有意让我成为她的幸福,我就谈起风景来。“你问我为什么喜欢这儿的风景?因为它使我想到仙女和萨梯们(好色的男人),想到那些游荡在树林中的男人们看到树叶间闪露的酥胸,并自此再也无法爱凡间女子的幸运时刻。这种病被称作妄想狂,是一种很常见的病。”

“我不会带你到山上去的。一些乡村女孩——”

“呸!多丽丝,我从未喜欢过乡村女孩。我向往的古代生活是18世纪的。但多丽丝,我的上帝!那些是什么鬼树呀?树干和枝条都是白色的。”

“我想它们叫大蕉。”

“你只是想当然。停下来问问路人吧。”

“那些是大蕉，先生。”

“怎么样，我说过是这样。”多丽丝笑着说。

在这条奇怪的道路两边都是田地，多丽丝喃喃说到：“看，这个乡村多么平坦，一直到山脚下都是如此，看农民在田野劳作真让人舒适。”

我敢说，亲爱的读者，我无法看田野中的农民，如果你坐在多丽丝旁边，并且刚经过数月漫长的劳累的话，我相信你也不能。

“亲爱的，我亲爱的，请别忘了我们是在敞篷马车里。”

“那些农民与我们何干？”

“亲爱的，如果我不喜欢你这样呢？”

“看着你却不能拥有你，不能像拿着花瓶那样用手捧着你的脸，真是……”

“是什么？”

“真是一种悲哀，我渴望拥有你，想想看，当我历尽艰辛爬遍这些山才找到一只美丽的花瓶，而这时则有人对我说：你可以看，但不能摸，想想看，这时我是多么失望吧！”

“你真这么爱我吗？”她回答说，她受到了一点感动，因为我的话表达了一种真正的感情。

“我们可以在这儿下车，我想让你从山顶观赏观赏风景。”

我们告诉车夫不必跟着我们，他可以停下来休息休息他那累得直喘的马，我们则继续往上走，但我自己只想着吻多丽丝，即使“无意义的吻也是甜蜜的”，我引用忒奥克里托斯的话说。她没回答我，我只得研究山路是怎样弯弯曲曲地绕着山肩一直延伸到山涧凹地里的村子里，村子只有两排房子——一点也不多——正对着大海，我们可以到村子里吃早饭。离开村子后，路绕着一些岩石转了几个圈后消失在一片树林里，当它再出现时，正是我们要爬前面这座山的路，然后它又延伸进了另一个村子

——这次是一座山村——是在意大利沿岸地区。即使我在心里想着多丽丝之吻，我也没忘了欣赏蜿蜒的路、弯曲的海湾和美丽的色彩，这儿像巴比桑画派的画一样美丽，因为黄昏现在正在使海天成为一色，或似乎成为一色。

“你不是想看橄榄树吧——那些就是橄榄树。”

“那些确实是橄榄树，难道我最终就是为了看那些树？”

“你失望了？”

“是又不是。那种节节疤疤的白树干甚至使小树也看起来显得很老。橄榄树就像一个跛脚老人，在我看真是可怜，人们不会说它丑陋，因为它并不丑陋，但要说它有什么魅力吧，又会让人迷惑不解，因为它没有阴影，又那样灰蒙蒙的——再没有像橄榄树那样灰暗的东西了。我更喜欢圣栎。”

在路开始下行的地方有一片圣栎，我就是在它们的阴影下吻了多丽丝的。美丽的树有助于我更好地品尝那些吻中蕴含着的柔情，那些吻使我想起了那条路和忒奥克里托斯的一段田园诗。多丽丝——她的名字本身就有古典韵味，所以她在圣栎下被我亲吻是正合适，当然我以前也吻过她，但以前的那段恋情却没有找到一个见证人，或许永远也找不到了。我想圣栎的美或许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亲吻多丽丝——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她娇媚的举止，塔纳格拉陶俑般的美，似乎与圣栎树的美融为一体了，因为我们在这种树上能发现一种其他任何树上都没有的古典美。忒奥克里托斯一定在它下面创作了许多诗，这是远古世界惟一关心的树；如果有可能雕刻树雕的话，我想圣栎树一定是雕刻家愿意选用的树。山毛榉和白桦，以及其他的所有树，都只是在人们发明了绘画之后，才开始美丽风光起来。没有哪一种树像圣栎这样姿态优美，这样枝叶繁茂、自尊自傲地伸向蓝天——圣栎树是穿着丝绒长袍的树中女皇；我们看着眼前的这片树林，惊叹着她的茂密，直到我突然感到脑中的圣栎树不见了；我想到了正在等着我的孤独之夜。

“多丽丝，亲爱的，这是血肉之躯无法忍受的。我发出那封电报真是愚蠢，如果我没发电报，你就不会知道我是乘哪列火车来的，那样，当我来到时，你可能正在床上沉睡，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到你旅馆里来了。”

“我最亲爱的，这种事只可能偶然发生。如果这种事真的偶然发生了，那你会怎么办？”

“我只能说这是最不幸的偶然事件。”

“那我千里而来只会两手空空而返了。这比在伦敦我因你的苛刻而离开你更糟，再无希望了吗？”

“我没有献身于你吗？我们一整天都呆在一起。现在，你却责备是我导致了您踏上了那种愚蠢的旅程，我想你真是太不好了。”我们吵了起来，一直吵到马车旁。多丽丝很生气，等她再开口说话时，她说的是：“如果你不满足，你可以回去，我很抱歉。我认为你要我放弃自己的权力是最无理的事。”

“而我认为你建议我回去是最残忍的，你看，我怎么回去？”

她没回答我——她当时太愤怒了——幸好她没回答我，因为若告诉她我感到很为难会让我很尴尬。我千里迢迢来看她，现在因为她不让我留在她旅馆里，我就说要回到“蓝色海岸”上去，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呢？而且，悲哀的返程也是让我无法忍受的。不，得等一等，只有等待，只有希望总是充满偶然事件的生活会垂青于我，因为多丽丝显然也在焦急地等着机会的降临，她只是希望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力。最好别想它了。唉，如果我们能停下来想想，生活就会容易得多，也会没趣得多了。

幸亏有许多小事情可以助人消磨时光，否则帕莱塞就要受人谴责了。多丽丝每晚都到某个商店去拿两只早晨刚下的鸡蛋，因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早餐中间她必须把两只鸡蛋与牛奶搅拌在一起吃下去。对我来说，拿着她的鸡蛋小心翼翼地穿街绕回到她的旅馆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晚饭她到我住的旅馆里与我一起吃，饭后她就为我歌唱，一旦她为我表演完她在过去常为

我表演的诸多节目,她也就该上床睡觉了,于是我就陪她回她住的旅馆。

“晚安。”她说,然后我就郁郁而归寂寞路,一边走一边问自己是否说过什么不利于促使她委身于我的话。晚上我则彻夜难眠,不停地想着自己犯下的过失,有时还会突然叫道:“上帝啊!我是多么愚蠢啊,我当时怎么没那样说呢?若我说话更温柔点,效果可能会好些,我应多表现出一些基督徒的精神,闭口不谈什么仙女啊,德律阿得斯啊,萨蒂啊,农牧之神啊什么的。”唉!我们在激情难抑时总会说出一些过头的话,虽然我们一般愿意坚持说没有什么劣根性之类的东西,说我们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但我们生来就是要接受习俗的,我们必须做的就是要遵守习俗,就像在歌剧中一样。只要剧中人不说话,歌唱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一旦他们开口说话了,他们就不能唱歌了。现在习俗已经被打破了,在艺术中是这样,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你只要告诉一个女人,说你梦想着她那有完美曲线的胸脯,她就会委身于你,丝毫意识不到什么罪恶。

我一定是想着这些事睡着了,并且睡得很死,因为在仆人敲门之前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甚至忘了多丽丝在和我分手时要我比平常提前一个小时去旅馆找她。我要在10点半到那儿,因为我们还要乘车去弗洛拉克。我在穿衣服时、在坐着马车到那儿去的途中时,我心中又升起希望;或许我可以劝说多丽丝到一间密室去。要找出这样做的理由当然很难,因为公共房子总是空的,成群的侍者会像秃鼻乌鸦一样围拢在我们周围,每个人都想把我们引到他的餐桌上去。

弗洛拉克村高高地坐落在群山之中,是沿着俯瞰着峡谷的岩石边缘建造的。乘火车南行,你就能看到许多像这样建在山坡间的小城,它们像悬崖边上的鸟窝那样突出来,与红色的背景互相映衬着。毫无疑问,这些古老的城镇之所以建在这些奇怪的地方,只是因为这儿比较安全,有山做天然屏障,可以抵挡敌

人的袭击,除此之外,确实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因为人们很难相信 15 世纪的人纯粹会因为迷恋这儿的风景才在这儿建城,并且为此要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把每一件生活必需品都从平原上拉到几百英尺高的山上,而且沿途都是沿着山的边缘的蜿蜒小路,一会儿向左,一会儿朝右,在每一个陡坡处它都要绕上一圈,就像帽子上的灰皮筋,而在建造弗洛拉克时,这些路都没有。在左边,山势与峡谷接连,并一直通向大海,沿着山坡则长满了橄榄树,这儿那儿偶尔也会出现一处橙园,金色的果子在黑黝黝的树叶间闪耀。这个风景如画的山村令我们深深迷醉。如果我们不是彼此渴望得到对方的话,我们会更仔细地观赏观赏的。我们的谈话不时会被一处突然出现的景色打断;从远处看,沿着连绵起伏的山峦的海湾更像一幅画家们还不会考虑什么规则啊、真实啊、效果啊时代的古代意大利画图,是人们还只关心艺术之美的时代的产物。就我来说,我每次看多丽丝时都会想:我从未看见过比她更美的人儿了,不仅她的脸,而且她的谈话都一直强烈地吸引我,她总是急着想告诉我什么,所以总是打断我们的谈话。这样的中断让我乐不可支,我视之为她的本性使然。我现在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走出灌木丛时是怎样开始谈话的。太阳在照耀,多丽丝让我为她拿着阳伞,但由于山路转弯太多,我总是来不及移开阳伞,结果就有一线阳光正好照在她脸上,这可能要增加她脸上的雀斑——她小巧的鼻子上就有一些雀斑,但并不难看。在最后一所小屋的旁边,长着一棵桉树,当我们从树边经过时,多丽丝开始吐露她的小秘密——这种秘密只有那些正爱着你的女人才会告诉你,或者说只有当我们爱着时才会记得这些话——她对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男人外出,也是第一次摆脱人世的纠缠。我在穿衣打扮时会突然快乐地想到:不会有人问我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了,我就像一只出笼的小鸟,自由地离开栖息的树枝向天空飞翔。在家里,周围总有许多人围着我:有人在餐厅,有人在客厅,如果你带上帽子

走到走廊里去,就总会有人问‘你到那儿去?’如果你说不知道到哪儿去,他们就会问你是往左还是往右,因为如果你要往左去的话,他想请你在药店停一下,问问……”

“家庭生活,”我说,“只会使人堕落,它对人的危害仅次于社会主义,因为不管怎么说人们总还能设法摆脱社会主义……但多丽丝,你没病!你看起来很好。”

“今天早晨我称了称体重,又长了两磅,你知道这让我很高兴,因为女人的健康主要就是快乐与否的问题——是否有人爱她的问题。”

“噢!多丽丝,亲爱的,这里没有机会爱别的什么人,这是此地惟一令我不满的地方,这儿的海湾、山城,一切的一切在我看来都完美无憾,但只是缺少了根本的东西,多丽丝,我在想,为了你的健康,我们可以去弗洛拉克呆几天。”

“亲爱的,这是不可能的。这样人人都要知道我到那儿了。”

“可能吧,但我不敢苟同。然而你长了两磅肉确实让我很高兴。我敢肯定你需要的是山风,海边对人的神经没一点好处。我巴黎的一个朋友神经痛,他每年都要去瑞士爬爬马特浩恩山。”

“马特浩恩山!”

“对,马特浩恩山或布兰克山。去年我写信问他为什么我不应该写——我忘了是什么了——他回答说:‘我脚踏在冰雪之上,为了给你解释为什么,我错过了三次捕猎的机会。’”

多丽丝笑了,这个故事显然使她产生了兴趣,因为数年前我曾把写这封信的人给她引见过。接着我们又谈到法语语法,等我们的语法知识山穷水尽时,我们又回到刚才谈到的话题;我们到哪里去,是否有可能在弗洛拉克的旅馆里过三天——当然是为了有利于她的健康。

“或许我真的需要山风。帕莱塞地势太低,让人整日懒洋洋地打不起精神。”

“就是。”

但虽然我使她相信了去弗洛拉克对她的身体康复大有好处,但我却不能说服她和我一起在那边的小旅馆里住三天。当我们驱车穿过村镇时,我惟一希望的是我或许能说服她与我在一间密室中吃早饭。但餐厅里的境况令我极其沮丧:里面是无数不干净的台布,一大群急于想打破自己的沉闷单调生活的侍者——“等燕子从北方飞来再说吧,”我心里这样说着低声问她,“我们在密室吃早饭好吗?”

“不行,在这些侍者面前我不敢进密室。”

我的心又沉下去了,当多丽丝问“我们坐在哪儿”时,我的回答是“随便”,因为我生气了。但当一盘沙丁鱼,一盘黄油,一盘煎蛋饼和一块牛排摆在我面前时,所有这些关于多丽丝的胡思乱想都从我脑子里不翼而飞了,这真是件好事情。我们不停地讲着,讲和听的乐趣对我们来说都越来越重要了。

“我刚才没打断你的话,我想那样太残酷,因为你正谈得得意忘形。”多丽丝笑着说。

“好吧,我保证下次也不打断你——在你沉浸在叙述一个故事的快乐中时。”

很快她就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多丽丝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她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生活,并能活灵活现地讲出她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话题又回到数年前,即我第一次看见她穿着白衣、金发飘逸地穿过客厅的那个晚上。当时,就在她一闪而过的瞬间,我在她眼中看出一丝与我似曾相识的神情,那种神情纯粹是出于本能的,她本人并没意识到,但我却不禁把那种神情理解为她把我当作她的某个亲戚了。我过去常向她谈起她的那一次神情,我们都喜欢谈到这回事,以及我们在巴黎成为朋友的时候,她写信邀我去看她和她姑母的事。我是在一家古怪的小旅馆里找到她们的,然后我们一起去了某个遥远的郊区,到一对老夫妇那里买礼物。他们卖的是瓷器和杯子。多丽丝的姑母解释

说,她在这儿买东西可以便宜一半,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便宜。我们用了几个小时才走到那个又旧又凄凉的地方,他们所住的街又老又怪,我们就像是回到了中世纪,去看两个在瓷器和玻璃杯中间读着《塔木德经》的过去时代的犹太人。

“我来告诉你,”多丽丝喊道,“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两年 before 那个老头死了,而他那与其共同生活了 40 年的妻子因不堪忍受孤独,你猜她做什么? 她给她的妹夫写了一封信……”

“要嫁他?”

“不,不是要嫁给他,而是想与他谈谈她的丈夫,你知道,这对两夫妻已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她实际上已和她刚去世的丈夫融为一体了,她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她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这个故事确实很有意思,”多丽丝突然大笑起来,有一段时间竟然笑得说不出话来,“我真为那个可怜的男人觉得遗憾。”她最后说。

“为谁遗憾? 为她的妹夫?”

“对,你知道,他患有消化不良症,他吃不下他哥哥喜欢吃的饭菜,而她嫂子又不会、也不愿做其他的饭菜。”

“换句话说,”我说,“是对哥哥以往的回忆在影响着弟弟雅各。”

“正是。”

“这个世界真是个奇怪的地方!”然后我的思绪又突然回到现实中来:“噢,多丽丝,我真是太不幸福了,我真希望自己没来帕莱塞。”

“好了,好了,耐心一点儿,最终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永远不会单独相处吗?”

“对,是这样。你怎么想起这事?”

“因为我没法想别的事。”

“好了,你必须想想别的什么事。我们快去香水工厂吧,我准备去买许多瓶香水,是为自己,也是给朋友们作礼物,我们可

以便宜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你不以为我们可以去看画吗?这儿的教堂里有些画。”

我们一问才知这些画已被人拿走了,于是我只好跟着多丽丝去了香水工厂。工厂里只有几个老女人在忙着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我不耐烦地听着多丽丝和她们的谈话,因为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车间又冷又有风,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挑好要买的香水,多丽丝最后终于决定这种买三瓶,那种买三瓶,这些要四瓶,那些要三瓶,还有五瓶淡紫色的。

“你也喜欢,对吗,亲爱的?”

“对,但我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

“好了,好了,别再生气了,不要哀戚戚的了。”

“我不在乎你给朋友买什么东西,但买淡紫色的香水确实太刺激了。”

“刺激了?为什么刺激?”

“因为,亲爱的,因为它使人想起了你,想起你在浓郁的麻纱香中扭动的纤细的胴体,想起你呼出的芳香气息,为什么你要这样折磨我?”

“但,亲爱的?……”

我余怒未消,阴沉着脸坐在马车一角,离她远远的。但她伸出纤纤玉手,用温柔的手掌轻轻地拂去了我的紧张和愤怒。晚上变得冷起来,我问多丽丝是否让车夫停车支上车篷,但多丽丝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车外边正有人走过,有一次甚至把我从她怀里推到马车角落里。我坐在那儿想:如果我这时离开多丽丝,显然是太不友好了,因为她身体很弱,需要有人照料她。当我内心正为去留问题争论不休时,多丽丝说话了:

“亲爱的,在回旅馆之前,我想见个朋友,你不会介意吧?”

在这儿的几家旅馆里,住着她的几位靠救济金生活的老处女朋友,一等这儿到了旅游旺季,这些老处女就要马上离开这里,去找另一处还不到旺季、尚无人问津的“胜地”,一天花8法

郎住下来。她曾给我介绍过托白丝小姐和惠特渥丝小姐,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和她们一起吃的晚饭,因为在这之前,多丽丝至少有一次向我解释我们必须与她们共进晚餐的种种原因。

“但要我们一晚上都陪着她们,我看没有必要……”

“当然没必要,亲爱的,但你忘了自己曾答应和我一起去看弗曼一家吗?”

“弗曼昨晚和我们一起吃过饭了。”我回答。

“但她妈妈没能来,”多丽丝回答,“我知道她们陈腐世俗,但这不是她们的错,而是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你会善待她们的,对吗?因为在你来之前,在我孤独一人时,她们对我都很好。她们对唱歌一窍不通,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她刚说到这儿,马车就突然停在一家门前了。

我从没看到过有谁的生活会像这母女俩那样单调和无聊,我本来想都不愿想这回事,但因为写书的需要,我还得继续说下去。别的且不说,我只想告诉你,读者,当弗曼女士请多丽丝唱歌时,我确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会唱所有她认为会让她们高兴的歌。”我心里说。事实果真如此。当我们起身离开时,弗曼女士说:“你们来给我们唱歌真是太好了,希望你们能再来看我们——一位老女人,一位中年女人——你们俩一起来。”“谁还能让我来看她们?”我问自己,并试图把多丽丝弄走,因为她正和她们在门口拖拖拉拉地告别。她说着她的计划、安排,邀请她们来英国时来看她,并对她们说,如果她的健康需要她再来帕莱塞,她会跑来看望她们的。“既然她知道我们不会再看到她们了,为什么还那样喋喋不休呢?”我心里这样想。弗曼太太坚持让她女儿陪我们到门口,路上多丽丝又恳求弗曼小姐来与我们一起吃饭,因为我们会与她的朋友托白丝小姐和惠特渥丝小姐一起共进晚餐,如果她也能来那真是太好了。我默默祈祷弗曼小姐会拒绝邀请,她拒绝了多次,但因为多丽丝一再邀请,她竟同意了;但当我们坐进马车时,她好像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不,”

她说，“我不能去，因为裁缝今天晚上要来，妈妈对她的外衣很挑剔；她讨厌腰身肥大，上次她因为不满意裁缝做的外衣，竟让裁缝返了工——务必请你原谅我。”

“再见，亲爱的，再见。”我听多丽丝喊道。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看她多好啊！”

“好了，我亲爱的，难道你不来看她们吗？她们不好吗？不善良吗？而你又喜欢善良。”

“亲爱的多丽丝，我喜欢发现你那善良的心，你不会忘记，我说过你漂亮的面孔依赖于你的聪明，但我现在发现我的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因而我要修正一下我的判断了。现在我只是想：你的一部分美，或许是三分之一的美罢，取决于你的心，因为我总是看见你在做善事，你那两位盲女人能自食其力真是了不起的事。”

“当然是这样，对我来说，任何一个能自食其力的人都是了不起的。”

“你知道，亲爱的，你自己从来不必自食其力，所以你了解百分之九十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须自食其力。”

“但一个盲女人！每天早晨从床上一起来就意识到自己必须外出挣吃饭的钱，想想这是什么事吧！黑夜里起床，知道自己必须一天挣四五或十个先令，不管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每天都必须如此，每天这个问题都要摆在她面前，而她又双目失明。”

“你还记得她的故事吗？”

“我想记得。她一度很富有，对吗？结果轻而易举成了穷人，她的钱一点一点地离她而去了。不要告诉我，现在我全想起来了。就像你所说的，在这个故事中，命运就像一个伸出爪子的幽灵，一次又一次地把她的钱抢夺而去，直至她最后一个四分之一便士也被夺去了。即使这样，命运仍不满足，你的朋友又得了天花双目失明了。她病一好就决定来英格兰做女按摩师。我想她并不想在澳大利亚停留，因为那儿的人都认识她。这是多么

迷人的勇气啊！我们到哪儿还能找到堪与这个去英格兰学做按摩师的勇敢的盲女相媲美的人呢？她生活在黑暗中，每天都要出去挣饭钱，常常还要被领路的女孩抢劫。”

“你记得真清楚，亲爱的。”

“当然记得清楚，在这位盲女的生活中也有一段恋爱故事。这个故事不是那种从未发生在她身上的世俗的感伤故事，而只是一种暗示，一种建议，是那种千姿百态、甚至也会走进盲女生活中的那种激情。现在不要插话，我全想起来了，这件事与一个与她住在同一公寓的学生有关，那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但她爱上的不是他，而是与他住在同一房间的一位好友，一个年龄稍大，趣味严肃的伟大的古典学者，他常常在晚上大声给她读希腊悲剧。我不知道她是否希望他娶她。”

“不，她知道他不会娶她，但这没什么关系。”

“他是个医生，对吗？他去了非洲，但到那儿不久就得了热病。可怜的盲女按摩师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她楼上的朋友不敢告诉她真相，但最终这个消息无法瞒住她了。悲剧再次降临到这个命运的受害者身上，以后再也没离开过她。”

“一直支配着她。”

“现在她孤独地生活在黑暗中，因为忍受孤独比忍受那些陪伴她的虔诚的教徒更好受些，因为他们总要给她读《圣经》。怜悯总想得到物质的回报。当然，我只是通过你的描述认识她，但如果我的看法正确的话，我敢说一定属于那种热爱生活而生活却夺取了她的一切的那种人。”

“你还记得另一个盲女人的事吗？”

“说记得也不记得，印象很模糊。她是个歌手，对吗？”多丽丝点点头，“我想她一生下来眼就瞎了，或是她在三四岁时失明了。你给我说她又高、又潇洒飘逸，有漂亮的黑卷发，嘴唇像红丝绒一样光滑。”

“我想我没说过像红丝绒，亲爱的。”

“那是什么让我想起红丝绒呢？是因为你告诉过我她有风流韵事。为什么没有呢，与一个不曾谋面的情人有段风流韵事是多么奇妙的事啊？只有被盲人所爱的人才是神，并且永远年轻。”

“唉，盲人太敏感了，比我们要敏感得多。”

“或许罢。”

“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生活会更认真，也更模糊，盲人的痛苦是我们无法想像的。当她的情人不再搭理她，离她而去时，她却无法跟着他走，只能坐在家里想像着他被其他不盲的人包围着的情景。她不知道眼睛为何物，但她能想像它们像什么——像什么呢？最近我没想起过她，但你给我讲她的故事时我常常想起她。在我的想像中，她正站在平台上，面对着公众，像女像柱一样沉静。她一定有美妙的声音，这才使她能与人订婚，而结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件难办的事，何况她呢！当她的声音也开始离她而去时，她一定非常痛苦，因为声音是她惟一的财富，是她区别于别人的惟一一件东西，是她知道自己的存在、明白自己的个性的惟一凭据，她不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只有当她唱歌时她才知道自己的存在，才知道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活人。教书无法弥补她已失去的东西，不管她的学生是多么聪明，给她的报酬又是多么高，都无法弥补。对了，她又是怎么失去学生的？”

“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她就那样没学生可教了。她真不幸。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对她来说，谋生比我们常人要困难得多；她不再年轻，但也不老，她仍是位漂亮的女人，但几年后……如果要颁发老年救济金的话，一定要给这些盲女人。”

“对，我还记得你为此费了不少心思，但具体情况我记不太清了。你写了许多信——那是怎么回事？”

“我感到最要紧的是为她争取到一笔年金，而我自己又无力提供这笔钱，因此我历尽磨折，最后与一个对盲人感兴趣的富孀取得了联系。”

“你做得对，就该那样做。你一定是写了许多信吧。”

“对，确实写了不少，但都无济于事，她知道我在为她麻烦，但她自己对漫漫长夜的恐惧开始让她神经不安，于是她到帕克堡嫁给了一位盲人——一个很老的盲人，已经60多岁了。他像她一样，也靠教音乐为生，但虽然他每年仅有40或50镑的收入，她也更愿意与他生活在一起而不愿靠年金生活。”

“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失掉了自己的年金。”

“亲爱的，难道你忘了是那个慈善的妇人收回了年金吗？她收回年金并不是出于什么卑鄙的目的，而是因为她遗憾这笔钱用错了地方，因为她抱有一个成见：有人告诉她说，盲人不应该结婚，她认为自己出了这笔钱却促成了这样的婚姻，是钱非所用。

“还有什么能比人性更奇怪的呢？那个慈善妇人的动机是好的，人们不应因此而恨她，其中原因只是她缺乏理解力，只知道遵照成规行事，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做的事，即我们每个人都试图循规蹈矩，只信奉抽象的理念，似乎真理只是一个到处寻找归宿、四处流浪、让人可怜的彗星，但它既未在地球上找到，也没在天堂找到。”

“你总是喜欢那些故事，亲爱的。你说过你要写出来的。”

“是的，但我怕自己写不出那样的感情深度；只有屠格涅夫能写出来。但我们现在是在‘狗之家’。”

“不要那样说——这不好。”

“我并非心怀恶意，但在欣赏某件东西之前我必须想办法认识它。”

这两个矮小的老处女：托白丝小姐和维特丝小姐，似乎并不是应该为我们付晚餐费的人，但多丽丝说她们希望能让我们高兴。托马丝小姐问我喝什么酒，我怔了一下说“普通酒就行”。我忘了，她买酒用去的两先令很可能意味着托白丝小姐在第二天下午5点喝不上一杯咖啡了，这样她的消费才不会超过她的

支付能力。想想她们一年只有 150 镑的收入,人们不难想像她们的生活会是多么艰苦。我不由又想起那些可怜的出身名门而又有教养的人,他们为了找到最便宜的能给她们提供膳食的寄宿所,不得不一家一家地奔走。这些可怜的出身名门望族的人啊,这些世界上的残余生物啊,这些食不果腹的人啊!

夜晚悄然消失,我给十几个老处女谈着文学,她们都是淳朴的老人,当她们听够了我谈的文学时,就请多丽丝唱歌。伦敦的客厅和旅馆一样,人们在其中普遍不多谈什么音乐或艺术。如果不是多丽丝占据了我的心,这种避寒胜地根本吸引不了我,它们对我来说也是毫无意义的。无论你聚在哪儿,都会发现某个令你感兴趣的人,但一旦你只关心一个女人,其他的人就都变成了你的敌人,我现在就把所有这些对我无害的老处女当成了我的敌人。她们提出的什么短途旅行的建议啦、共进午餐或晚餐的邀请啦,都只使我更加忧虑,你不能不时刻留意风流韵事的蛛丝马迹,任何一个女人的嫉妒之舌或某个熟人的到来都可能引发一场灾难,所以我不停地想劝多丽丝远离她的这些朋友们。

一天下午,我对她说:“我怕今天晚上不能去看托白丝小姐了,我们不能再想点别的什么办法消磨掉这个下午吗?”

因为她想出的办法只是再去弗洛拉克短途旅行,所以我们就接受了侍者的建议去参观卡伦公园。这家公园是一位绅士的私人财产,他出于善意,每周向公众开放两次。公园并没引起我多大的兴趣——它只不过是又一处英国式的古老公园而已,但我最厌恶的是公园里保存完好的园艺。当我们的马车停在一座 20 英尺高的锈迹斑斑的大门面前时,我的心不禁沉了下去。这座门后是一条光秃秃的小路,一个女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前面放着一只钱箱,我们每人给她一法郎,她告诉我们说这些钱是用于慈善事业的。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地在石路上散步了。路有 20 英尺宽,向左右分出许多小路,路旁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不时还会有一丛蓬草或外国的冷杉木。“画家”,我对多丽丝说,

“看到这些会闭上他的眼睛的。”作为艺术家,我们是更喜欢与大海遥遥相对的永恒之途的。“即使在这里,”我接着说,“这些杂七杂八的灌木丛也损害了我心中的大海的美。我无法原谅它们。”多丽丝笑了。我开始搞不明白她是否知道它们是多么可恶了。

“能在这里与你在一起确是件快活的事,但这儿阳光不够。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了:昨天,我一个人被吸引到海湾里与仙女们相会了。不要问我是否相信自己应找个仙女来爱我;谁都不会知道自己相信什么。我只知道自己不快活。”

“但为什么不快活,亲爱的,你愿意让自己不快活吗?看看那只金丝雀,它只想得到自己已得到的:光和温暖。看看它吧。”

多丽丝转过脸来看着我,她的眼睛似乎比太阳还美,我说:

“如果我不能融入伟大的和谐之中,那我就死。”

“但你确实吻了我,”多丽丝故意回答说,“就在晚上开始变冷、车夫支车篷的时候你吻了我。”

“狡猾的多丽丝!美丽的小猫!”

“我不是小猫,我不是在同你开玩笑,亲爱的。这些天我一直感到很紧张,但你不会让我把你留在我旅馆里、在所有人面前委身于你吧?”

“这些人!这些寄宿舍!它们快把我弄疯了!还有那个什么弗曼小姐!”

“我以为你喜欢她,你说过:‘她善良单纯,毫不虚伪作态,并且敬爱妈妈。’从昨天的观点来看,这已足够了。你从未像昨天谈到她时那样好过(我记得你说过的话),你说:‘心灵生活比理性生活更深刻。’你记起来了么?”

“没有,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只知道昨天的真理不等于今天的真理,今天吸引我们的是善,明天吸引我们的就会是美;美一天又一天地召唤着我;刚开始时美的召唤声很遥远,就像森林里的号角,但现在召唤声已变得越来越迫切,一切的景物好像

都在演奏音乐。昨天,当我站在那些古代废墟的旁边时,我感到自己似乎被输送回到两千年前的最终本性了。看到那些古代的圆柱,我的灵魂为之一颤、一新,或可以说发掘出一颗被历史遮盖着、几乎已被埋起来的灵魂。死去的从没有完全死去,他们的思想就活在我们心中,我在英国不会像在这儿那样能更好地欣赏你;过错,如果我有过错的话,应归因于这些古迹,是她们占据了我的身心。她们从地下升出来,支配住了我。我要收起你的衣服……”

“难道你不喜欢我的帽子?”

“不,我喜欢,但我现在想的是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多丽丝,她没戴帽子。我不仅想得到你外表的美,而且想占有你全部的美:粉红色的胸花,美丽的小臂,精巧圆润的小腹,浑圆的大腿,灵活的双膝,修长的小腿,滑润的脚踝,小巧而白的双脚,这些都是我的所爱。在你那有着优美弧线的双臂和修着长长的红指甲的瘦长光洁的手指里我看到了我想像中的仙女,虽然我用凡眼可能永远看不到她。”

“为什么你不看我,亲爱的?”

“我开始绝望了,所有这些寄宿公寓和里面的居民都在扼杀这儿的风景在我心中点燃起来的热情。我想与你同去一个我能像农牧之神爱仙女那样爱你的地方,因为就是你使我萌发了思古之幽情,虽然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但事情就是这样。”

“但你确实占有了我,亲爱的。”

“不,多丽丝,你并没遂我所愿。你非常清楚我说的占有是什么意思,我说的占有是视觉、触觉和气味的占有,如果我不与你同到一处只属于我们两人的地方,我又怎能完完全全的占有你呢?而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次旅行对我来说就成了悲惨感伤之旅行,而这种感伤回忆将会维系我一生,多丽丝,我们不仅必须想到我们生活着的日子,而且必须想想在我们前面的日子,我

们必须像松鼠储藏松籽那样保存我们的记忆,我们必须有个冬藏室;如果找不到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我对你的回忆就将像一个收藏家回忆他刚从工匠手里接过来就失手打破的花瓶一样,或就像他回忆一个被偷去的花瓶一样。我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比喻,至少目前找不到;我的话并不完美,但你理解我的意思。”

“是的,我理解,我想我理解。”

“如果我得不到你,对我来说就好像白活在世上一样。”

“但亲爱的,事情并非那样糟,我们不必在巴黎呆些时日,而且,虽然我不能邀请你到我的房间里来,但却没有理由……”

“多丽丝,不要空许愿了。”

“亲爱的,我只是想说,对我来说我们似乎没有必要直接回巴黎。”

“你是说我们可以在某个古老的罗马城停留停留,譬如阿勒兹的那种 18 世纪的房子,噢,多丽丝,这将会是多么让人迷醉的事啊!我想都不敢想,惟恐……”

“惟恐什么,亲爱的?怕我会欺骗你?”

她的声音中充满一种美妙的柔情,那种像临终时的喉鸣一样的爱的低语;她的许诺让我受到激励,我不禁高兴起来。我赞美 18 世纪,说 18 世纪比 19 世纪更崇尚古典,并且产生了自己的灵魂。

“在现实中间,我却总不断萌发艺术感觉,难道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但我真可以占有你了吗?多丽丝?我真有幸能在一座古罗马城与你同宿三日吗?”

“没有理由不这样,在哪儿停留?”

“只要与你在一起,任何城镇都行,多丽丝,但我们想想看,一定要找个美丽的地方。”看着落日余晖笼罩下的海湾,我的眼前浮现出许多古罗马城。古典的遗迹与中世纪的塔楼混杂错陈,大教堂的尖顶俯瞰着昔日的岗楼。我们只能在一个有美丽名字的城市度我们的蜜月——最关键的是名字要美——一个以

后回想起来永远都会快乐的名字。罗克蒙多很显然缺少喝水鸽子的咕咕声,因此要被排除在外。卡豪对我们颇有诱惑,但名字太难听,她的意大利名字达瓦纳倒很让我们感兴趣,但我们毕竟不能把卡豪想成达瓦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阿玛斯、维兹勒、奥罗荣、考黑、瓦拉和该达也都被我们排除了。在这些地方中,只有阿玛斯让我们费了一会思量。阿玛斯!这意味着我们要在铁路上颠簸一个长夜,“阿玛斯!”我说,但多丽丝打断了我的话,她说我们买不到“蓝色海岸”的车票,因为按多丽丝的观点,我们必须乘“蓝色海岸”离开帕莱塞。她的朋友也一定会到车站给我们送行。“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我说,“我们可以在马塞乘一辆与‘蓝色海岸’一样快、或几乎一样快的特快列车,几小时后就能到阿玛斯了,而且,如果……”

她问我阿玛斯是个村子还是座城市,我回答:“那有什么关系?——因为在法国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结实的床,美味的食物和酒——噢,对了,还有煎蛋饼。在每一个村子里我们都能自享其乐。但突然间,有两个名字闪现在我眼前:奥瑞勒和维尔兰古尔。我们一致同意在这两个地方中间任选一个做为我们的蜜月胜地,这样自然就放弃了阿玛斯。”

“哪个地方能给两个不幸的、急迫地寻找独处之所的恋人提供保护伞呢?”

“奥瑞勒的名字倒挺美”。

“就奥瑞勒吧,”我说,“从马塞到那里只需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后……”

“你很清楚,亲爱的,我不能一直乘车回巴黎——这种至少要用一整天的旅行会要了我的命,我很弱,再没有比乘火车旅行更让我厌烦的了,我们必须中途下车,在某个地方停留一下,为什么不在奥瑞勒呢?”

我不得不承认多丽丝为自己找的借口也令我很高兴,或许再没有任何借口能比这更有人性了。她可能会向我袒露她的胸

体——我一直希望看到她这样做；但她不会完全裸露她的灵魂。我们可能只能撩开她的面纱的一角，但不论是谁都只不过展示一具骨骼而已，因为没有借口也就没有生活了。

毫无疑问，读这个故事的既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既有聪明人也有愚蠢的人，既有性情温和的人也有性情粗暴的人，但因为故事的主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习以为常的，所以她应会吸引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教徒——除去某些主要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绅士们，他们对恋人们的仇恨是众所周知的，并很容易为人理解，所以我必须把他们排除在我自己的或多丽丝的崇拜者之外。但幸运的是些绅士在英国很少，虽然某些报纸的评论员中可能有那么一两个，但总的来说很少。除去这些绝无仅有的批评家之外，每个人都将在我的叙述中获得快乐，即使对年老的男人和女人们来说，他们残余的性意识也足以让他们对爱情故事产生兴趣；在现今世界，若一书行世，我可以抱有这样的希望：一个年老的女修道院院长可能公开反对这本书，但内心却热诚地欢迎它，这本书可能会为我赢得她的祈祷，天堂之门会因此为我而开。我希望欣赏我这本书的是苦修的男人和女人，而不是其他什么阶层，因为没有爱情冒险经历的人，会因之被激发起想像，他们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热切地欣赏这本书。与多丽丝一起到奥瑞勒必然要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读过本书之后，读者自会为我们两人祈祷。

从列车时刻表上来看，从马塞到奥瑞勒需要近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将在我与多丽丝的谈话中悄然逝去，我们会无所不谈，当然要除去我们心里最迫切的渴求。我本应该带本记事簿，就像我在想到与格鲁特德乘快艇去希腊群岛旅行时计划要做的那样。但因为我实际上没有做记录，所以就只能求助于读者的想像了。我必须请求你们记住我忍受的那残酷的清心寡欲的一星期，并认真为我考虑考虑。读者必须与作者心灵相遇，而你，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试试的话（当然是用心灵之眼），你就可以看见

我正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找着列车员,并且每遇到一个人就问:

“我们现在离奥瑞勒还有多远?”

“奥瑞勒?差不多还要两小时。”

我们沉重的行李已经被送往巴黎。我们只随身带了一些衣箱和衣袋。那个答应为我们把行李从车厢里弄出来的列车员可能没及时赶到,结果到奥瑞勒后我们发现行李找不到了!这不可能,于是我去找列车员,并终于找到了他——用了多长的时间?——想想看,找遍长长的列车的每一个昏昏晃晃需多长时间。读者,你可以看见我在火车里走来走去,想着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灾难事件——火车可能抛锚,或者火车在奥瑞勒不停,或一种更可能发生的灾难是那位年轻的女人可能改变主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怎么办呢?如果不是为了写这个爱情骗局的故事,我就干脆从火车上跳下来。过渡阶段是最难忍受的,我不知道多丽丝是否也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在来来回回找列车员的过程中,我每次经过我们乘坐的车厢都要停下来仔细观察一下她的脸色,发现她正闭着眼打盹,她在去奥瑞勒的途中打盹是多么无聊啊!为什么她不像我这样兴高采烈呢?

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女人像我们男人一样对恋爱冒险如此感兴趣吗?是否女人像我们男人一样经常问:上帝、地狱或不幸的命运是否会干涉我们的享乐呢?它们是否会把快乐从我们怀里和唇上夺去呢?我以前或许从来没有——无论如何也只有一次——体验到那天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激动难抑的兴奋,但当我这样写着时,我不由悲哀地想到:那种幸福将永远不会再来了。那些快乐时刻已成过去,但留给我的确是快乐的回忆,而且老年人的快乐是年轻人所不知道的——那就是酒想过去的快乐,屠格涅夫就这么说过,但他忘了加上一句,即没有回忆我们就不能了解自己或他人,那我们就只能是像动物一样的活着。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啊!

这是我要对每一个读者都要认真谈到的事,特别是对我年

轻的读者,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在选择冒险事件时,不仅要选择当时使自己愉悦的事,而且要选择那些能在事后回想起来仍心动不已的事,如果多丽丝没有和我一起去奥瑞勒,我的生活就会残缺不全,因为要不是她我就不会知道隐藏在古典艺术中的完美的美。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们还是谈多丽丝吧,我问她是不是睡着了?没有,她没睡着,她只是在闭眼休息,阳光让她有点疲劳,“疲劳”一词唤醒了甚至对自己都不敢说出来的预感,为了掩盖我自己的想法,我就没话找话地与她谈天。奥瑞勒——多么可爱的名字!难道她以为这座城市会维护或掩盖自己的名字吗?她淡淡地笑着说,一等她走出火车她的疲劳就会烟消云散的,想到她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她在当天旅行到比奥瑞勒更远的地方,我和她心里都悄悄得到一些安慰。

我们决定住在瓦洛亚旅馆。车上的一个乘客向我谈到过这家旅馆,他自己从没在里面住过,但他相信这是一家极好的旅馆。但我选择这家旅馆并非因为他的极力推荐影响了我,而是因为这家旅馆的名字吸引住了我——瓦洛亚旅馆!多妙的名字!更令我高兴的是:脚夫和火车站长一致同意瓦洛亚旅馆和其他任何旅馆都一样好。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但如果瓦洛亚旅馆名不副实的话,这些“好”都将毫无价值了。这家旅馆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让人失望的。旅馆的院落平庸无奇,只是几株长在院角的美丽的橄榄树使其稍有春色。但不大一会儿我就注意到旅馆的走廊都是很漂亮、整洁的——这是英格兰那种奇怪的走廊,乍一看使人误认为是18世纪英国的一处农舍。旅馆里到处都是门,门上装着小块玻璃,而在走廊尽头就是旅馆的门厅,这一发现令我们很高兴,当我们走过门厅时我对多丽丝说:这家旅馆很久以前一定是某个贵族的府邸。当时奥瑞勒有自己的社会,或许有自己的语言,因为在17或18世纪,奥瑞勒的书面语和口语主要是普罗旺斯语和其他一些方言。我们欣赏着俯瞰着门厅的画室以及通向画室的楼梯,仿佛回到

了18世纪一样,整个画室的氛围是布歇式的,或许是个外省的布歇,但肯定是18世纪的一个艺术家;阿佛洛狄特画像周围的一群鸽子似乎在为我们引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间大而安静的卧室,在镶木地板的中间铺着温暖的地毯,在房间的角落或被丝帘遮挡着的窗户下是写字台——只有这种房子才配得上我对多丽丝的爱,一间像客厅一样大、装饰也像客厅的卧室,房间里有沙发和圈手椅,我可以围炉而坐,因为我的一部分快乐就是生活在她穿衣、脱衣的亲昵气氛中。如果爱不主要是渴望亲密,如果鸟儿们在筑巢时所体验到的爱不是假的,那么爱就降为动物性的满足,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冲动满足后就各奔东西,相顾不识了。鸟儿们比所有动物(除去人)都能更好地理解爱,有谁不是以欣赏的态度想到织布鸟,以及我们本国的鸬鹚呢?但旅馆给我们提供的房间根本不是我们原先想像的那种,而是法语中所谓的那种“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当然,房间有几把椅子——但那是什么样的椅子啊!我原先的那种令人情欲饱涨的梦想:与多丽丝一起坐在一个美丽的18世纪火炉前,在她为夜晚作着准备时看着她,与她谈着话——看着她美丽头发的漂浮沉落——一个沉醉在爱中的女人在为上床做准备时是那么细心沉迷!在她脱衣时任何插话都只会打破她所创造的和谐;因为从她穿着睡袍把玩着手镯、到她脱下睡袍和丝袜(像牛奶一样白的丝袜)、一直到她踢开小拖鞋、然后蜷缩进像战场一样宽阔的大床的过程中有一种奇妙的和谐——看到那张高床,我以前所有的色欲梦都破灭了。我对爱的所有设想,我们应该享乐无穷的小巢,温暖的气息,细软的亚麻布内衣,醉人的喘息,都随这张高床被一扫而光了。

这番情景既是悲剧性的也是喜剧性的。对我和多丽丝来说,头等重要的事是找到一间可以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卧室。侍者的冷淡让我们很惊奇;一位又矮又胖的老人,一直慢腾腾地为我们服务着,他的围裙几乎把他全包裹起来了,人们只能看到他

的裤脚和头——这是人们看到过的最奇怪的头，因为他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光秃秃的像个鸡蛋，而他的头恰又像鸡蛋的形状，颜色是东方鸡蛋的那种颜色，整个都是深红色的。他的眼睛像白鼬的眼睛，又小又不安分又湿漉漉的。他的鼻子很长，下巴是那种直线下垂式的，他的浓重的外省口音让我觉得很有趣。

“没有其他房间了吗？”

“没有。”

我记得这句回答在当时听起来是那么粗鲁，至今仍让我把它与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死，或是活”(To be or not to be)的价值相提并论，因为它确实达到了这种效果。我看出站在我旁边、像个小雕像一样迷人优雅的多丽丝似乎并没意识到在这样的房间与她相爱是种堕落。我可以坦白地说，当时我真愿我们没来奥瑞勒，而是直接去了巴黎，或者说，我宁愿牺牲对她的爱，也不愿这种粗俗的环境玷污了她。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蜜月对我来说像黑弥撒对虔诚的清教徒一样——是一件讨厌的渎神行为。

“等火生起来时房子就好看多了，”多丽丝边说边打开了我们的包，“等在椅子上扔件衬衣，房子就可以说装饰好了。”

我拿起她的手亲吻着，心里的不满几乎要消失了，但当我看到床时，我不禁又喊到：

“那些床！噢，多丽丝，那些床！你的也不比我的好。”

女人总是容易满足的，或者因为她们善良，或者因为聪明，她们总能一言不发地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

“最亲爱的，让侍者带些热水来。”

我照办了，在他离开后，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脑子中出现的总是那种高床。我不可能不想两个人穿着睡袍爬进大床时的可笑情景，想到多丽丝和我并躺在那床鸭绒垫下，面对着只用粗陋的窗帘遮挡着日光的高高的窗户，我真是难以忍受。我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直到侍者拿着两只水壶走进来。然后，因

为心情凄凉,我就只从包里拿出梳子和牙刷,仅此而已;多丽丝也拿出了一些东西,并洗了手,我想自己也该洗洗手,但我还没洗好就离开了那个可怕的脸盆,手上滴着水走到多丽丝面前说:

“这些房间几乎没什么区别,或许你愿意睡在我房间里。”

“我也能看出来没什么区别。我想我还是睡在我的房间里好。”

她睡在哪个房间对读者来说可能是无所谓的,但并非如此,因为如果我们调换了房间,这个故事就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了。我现在还可以看见当时我像只关在笼子里的野兽那样徒劳地寻找着逃跑的途径。我的爱情冒险使我想起了一部浪漫小说的开头:一阵风把挂毯吹到一边,露出了一个秘密房间。我眼前的这个房间并没有挂毯,但突然,我的眼睛落到壁纸上一处起皱的地方,“是一扇门。”我说着揭开纸,推开门进去往下走了两步,噢!我发现自己正站在我一心想要的那种房间里:一间宽大、华丽的大厅,雕刻过的檐,悬挂着丝缎的红色遮帘,窗户和墙壁也因之熠熠生辉。墙壁用红色丝绒拉成颇具浪漫特色的格子状,与遮帘正好相配。大理石砌的壁炉上挂着一只奇怪的老钟表,在大分枝蜡烛台间报告着时间。我自言自语说:“这只大钟会令恋人们想起多次浪费掉的时光——没人知道浪费了多少,很快她也会让我们产生同样悲哀的想法了。真是色彩和谐,结构均衡的漂亮房间。”我继续在房间里走着,看到另一处门就走了进去,那是一间与客厅同样颜色的卧室,房里遥遥相对地安放两张床,当然,床也很高,但高得恰如其分。看着它们我不由想起了我在给多丽丝的一封信中说过的话:“过分贞节。”“这个房间不是我梦想的那种,”我喃喃自语,“而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这是一间临着院子有两扇窗的大卧室,是连最富于想像力的人们都乐不可支的那种,是配得上可爱的多丽丝的那种卧室:一个又宽又低的大床,“像个战场”一样的床,我们的床就应该是这样。我说着说着脑中浮出古代诗人的诗句:

“夫人,你是否要为这场战争脱去你的衣服?

你今晚引发的战争就是赤裸裸的。”

看着房子,我像个脱胎换骨的人一样站在那儿,心中充满极大的欢乐。从像王宫一样高贵的华盖上垂下来的遮幕,恐怕连画家布歇也会满意。他很少画卧室,至少现在我不记得他画过,但我记得弗拉格纳尔画过许多卧室画,连他也会说:“我觉得那张床无可挑剔。”地毯不是绸缎的,但设计精美,而且其颜色也与整个房间是和谐的;沙发美观,路易十六时代的圈手椅里垫着厚厚的坐垫。我再看梳妆台,担心它会不适用,但它与整个房间的色调却是完美地融为一体的,我顿时想看到当它被拉开,并放上多丽丝衣箱里的那些手镯、银饰之类的东西时是什么样子。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愿意,不妨想想我回到多丽丝身边时是多么轻松愉快吧!她正呆在那间凄凉的房间里,那间更像囚房而不像卧房的房间里。

“出了什么事,我最亲爱的?”她问。

我没直接回答她,而是对她说:“把你的手给我。”我像美丽的传说中王子领着他的刚订婚的新娘那样领着她穿过华丽的大厅,先让她停下了赞叹了一番,然后又接着把她领到我那有双床的房间里说:“这还不算什么,等会儿看看你的房间。”多丽丝停下来,大床和从华盖上端垂下来的高贵遮幕的美使她惊叹不已。

“房间很美,但就是少点快乐气氛。”

“好了,多丽丝,在这儿不必说谎!我们当然要把窗户打开,那样就会进来新鲜的空气,然后再点上灯,想想你我在睡觉前紧挨着坐在这儿聊天的情景吧。”仆人们手里拿着大烛台进来,并很快点燃了蜡烛。置身于他们中间,身边又坐着多丽丝,我把自己的想像成了一位王子,我这样想也并非虚妄,因为只有在最欢娱的环境中占有了世界上最美的东西的人才可称得上是王子,而我已然如此了。还有什么比坐在暧昧的房间里,看着燃烧着的木材把房间烤得暖烘烘的更让人快乐呢?我们很快发现,仆人

们给我们带来的木材不是那种在巴黎旅馆里用的暖木,而是像铁一样又硬又密、像煤一样燃烧的东西,只是比煤更难闻。房间很快就显得不空落落的,就如多丽丝所说,只需在椅子上搭上一件内衣,房子立刻就给人一种常有人住的感觉。不出我所料,她衣箱里的东西立刻把房间带回到了一百年前,她就像某个伟大的女士那样穿着饰花的丝袍坐在一张嵌花的梳妆台前,台上堆着什么粉啊,镜子啊之类的东西。

房间里就有一张那样的桌子,我把它从墙角推过来,打开它的盖子,盖子下有一面镜子,我喜欢在这种桌子上摆上各种各样的化装品、修饰品——如各种各样的海绵啦:擦脸用的平海绵,洗身用的方海绵,及各种各样的小海绵;各种剪子啦,指甲粉啦,香水瓶啦、软丝巾啦,以及很快就要穿上身的长长的丝睡袍啦,等等。我这里的描述对多丽丝来说决不夸张,因为你只要看到她从衣箱里拿出来的那些东西你就明白了,但即使我描述得再全面,也无法描述出多丽丝的娇小胴体给我留下的印象!你不得不看着她安排着她的那些小东西,她长而弯曲的双臂和仔细修剪过的杏仁一样的指甲灵活地摆动着——她最关心的就是这些瓶瓶盒盒的什么粉啊、油啊的东西。有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喊到:你说的这些都太无聊了,但说这种话的读者或者是出于虚伪或者是由于愚蠢,因为他忘了,只有借助于这些香水啦,丝巾啦和小小的计谋啦,我们的爱才能从动物性的本能提升为一种激情。

不仅情妇必须精心修饰自己,即使情人不在身边也要每天花几个小时修饰自己,而且男人也必须考虑见情妇时穿什么衣服,我相信,在我国遥远的北方诸岛上,仍有婚后的男人穿着法兰绒服或耶格尔纯毛料衣服进妻子房间!去你的这种东西吧!我一直有点可怜女人,因为她们是被迫接受我们的——就像有个女人对我说过的那样(她在这些事情上是个艺术家)“我们不得不接受本真的你”。

一百年前,人们还没发明睡衣裤——这种值得让人感谢的服装使我们免去了衬衫式睡衣带来的不便。睡衣裤无疑是项伟大的革新,如果丝的质量和颜色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然后再经过精心制作,男人穿着这样的衣服走进一位女士的房间时不会因之而失去尊严。我在离开伦敦前曾特别注意了一下自己带的衣服,现在我的衣箱里就包括了许多不同样式、颜色精美的衣服。在帕莱塞时,我曾在许多晚上看着这些衣服叹息,想着自己或许永远不会为取悦多丽丝而穿它们,心里真是有点难过。现在在奥瑞勒,我又想到了我的睡衣裤。我在帕莱塞曾告诉一个照料我的仆人把什么衣服放进我的衣箱,他人不错,但就是有点蠢。想到这里,我突然跳起来就要走,吓得多丽丝赶紧问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走。

“亲爱的,我只是想去打开箱子看看。”

几分钟后我就回来了——我是多么清晰地记着那一刻!她说我看起来像刚受了大难一样。“大难”一词可能有点夸张,虽然没有一个恋人像我那么不幸了,因为那位侍者不仅忘了把我向他特别指明的睡衣裤放进衣箱,而且他把所有的睡衣裤都忘了放进去了。

“今晚我怎么进你的房间,亲爱的?”

多丽丝没回答,我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一时还不能完全认识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幸。最后我站起来,走过房间,突然停来说:“我相信叔本华是对的,多丽丝,因为我们所受的痛苦要多于我们的欢乐。吃麻雀的鹰从它的美餐中获得的愉快并没有被吃的麻雀受到的痛苦多。你这可爱的娇小胴体,”我说着把她揽入怀中,“你这甜美的面孔——谁能比我更欣赏你的美呢?——但每当我想起自己在帕莱塞所受的那一周的痛苦,我在火车上所受的折磨,以及当我们被领进那些卧房时我的失望——我永远忘不了那种失望,因为如果我们还呆在那种卧房里,我现在可能还在失望呢。”

“但我们没在那儿，我最亲爱的。”

“一个偶然事件发现了这些房间，另一个偶然事件则几乎令这些房间成为被诅咒的房间。”

“真是很不幸，”多丽丝说，“那个侍者竟把你的睡衣裤忘了。你仔细找过吗？”

“当然，我把箱子都翻遍了，根本没有睡衣裤，现在惟一的补救办法是在奥瑞勒买一些。商店可能还没关门，如果我们现在就出去买的话，说不准还能买到。”

“我怕你在奥瑞勒找不到睡衣裤。”多丽丝说。

“我知道，这儿即使有，也不会是我让那个傻瓜放进我衣箱里的那种，你认为这里的商店卖的那种劣质品有还不如没有，对吗？或许你是对的。”

我们订了7点半的晚饭，当我们走过大厅时，多丽丝说：“你最好留下话，说我们八点才能回来。”

当我们走过奥瑞勒又窄又黑的街道时，寒冷的夜风正呼呼地刮着，我注意到多丽丝穿的衣服太少，她只穿着在帕莱塞穿的那种夏衣，我让她把斗篷裹紧些。

“这儿有个商店，”我们说着走进去，“夫人，你们这儿卖睡衣裤吗？”

“对不起，我们没睡衣裤。我们不卖这种东西。”一位女营业员告诉我们。我们又急匆匆向另一家商店走去，途中多丽丝说，看那位女营业员的神气，好像我们在买某种猥亵的东西。我们一个商店接一个商店地问，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没有。

“在奥瑞勒，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睡衣裤，”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似乎理解并同情我们的不幸，于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走教堂边上的那条道，一直走，走到……广场（我忘了它的名字了），你会在广场一角看到一个名叫‘优雅’的商店，如果那儿也没睡衣裤，你最好买件衬衫式睡衣，先生。”

“谢谢，谢谢。”我和多丽丝急急忙忙去找“优雅”商店；我们

走了有半英里路程，中途还不时在一些小商店门前停下来：“你们有睡衣裤吗？”“没有，我们不卖那种东西，只有衬衫式睡衣。”终于，我们看见了心目中的“优雅”二字，我们把自己的要求告诉给值班的一位年轻人，他告诉我们，他刚把最后一件睡衣裤退还给制衣商了，因为在奥瑞勒没有人需要睡衣裤。

“哎呀，多丽丝，我们到了一个贞节城了！——这里只有高床和衬衫式睡衣。”

“但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种丝质衬衫式睡衣，我们有一些很漂亮的衬衫式睡衣。”

我看看多丽丝。

“可以看看，”她说，“这种条纹很漂亮。”她用又修长又弯曲的手指仔细检查着睡衣的质量，在她检查挑选的时候，我试图从营业员口里弄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睡衣裤。难道在奥瑞勒就没有年轻人穿着睡衣裤进某位女士的房间吗？营业员疑惑地看看我，回答说当然有一些，但这些纨绔子弟都因为穿这种睡衣裤被送到巴黎去了。

“亲爱的，我想这种衬衫式睡衣……”

“好，好，多丽丝，不错，总比没有好。”

当我们急匆匆跑过奥瑞勒并不平整的街道时，街两边黑乎乎的房子似乎都在对我们怒目而视，教堂的圆顶在苍茫的夜空下时隐时现。多丽丝说：“我敢肯定，睡衣裤在奥瑞勒被看成是永恒罪孽的象征，而这种粉红色只卖十法郎的丝质衬衫式睡衣裤或许是可恕的；这需要在炼狱中长时间修炼才行。”

“无疑你是对的。”我们又跑起来，边跑边谈着一个又一个话题。我记得曾对多丽丝说过：“一切不平常之事都被视作不道德的。”——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奇怪，因为“不道德”一词的本来含义就是“不平常”。道德家是比他们自己所想的还要优秀的语法家，因为即使说阴晴不定的天气是不道德的也是对的，虽然我怀疑是否有人理解这种说法。在看到——一个“古玩店”时，我们停

止了谈话,我走进去想为多丽丝挑件礼物,这颇费了一点时间。当我们离开商店后,我们又开始了刚才突然中断的话题。我们谈到,在西欧,女人在晚上袒胸露乳被认为是道德的——这就是女人穿低领口衣服的原因——而在东方,如果她在白天露出了胸脯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更不用说晚上了,但她可以露出脚,因为这是习惯。“因此你看,亲爱的多丽丝,语法才是永久的道德柱石。”

“那么你是认为,”多丽丝说,“我们今天视作罪孽的一度曾被看成是美德?”

“是的,将来还会是这样。”

“我过去常听妈妈说,”她突然说到,“英国女人本来是不穿内裤的,后来欧仁尼皇后从法国逃到英国后,才使穿内裤成为一种时髦。”

“是谁发明了圆环裙?”我喊道,“在多风的季节,没有长及脚踝的内裤就没法穿这种裙子。这就使道德家们和神学家们有机可乘大谈这同一个问题。他们从争论中得到了多少快乐啊!这些好色之徒。”我嘟囔着,并越来越生气,直到到了旅馆我的怒气才渐渐平息下去。

“我想看看那个美丽的红彤彤的客厅,把所有的分枝烛台都点上蜡烛,火炉里噼噼啪啪燃着半打木棒。街上真是太冷了。”

要想心平气和,必须身体舒适轻松。我们坐在火炉边,全身慢慢暖和起来。当我浑身舒坦了时,我开始承认欧仁妮皇后的内裤在英国遭受的敌意并非如表面上那么简单,因为英国人本质上都是基督徒,他们公然宣称内裤不道德时,只不过是表达了——尽管你可以说它粗鲁,但仍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所有基督徒内心深处坚信不移的信仰;讲究本身就是罪孽,一切与优美有关的都是危险的。在他们内心深处,每个基督徒都感到——虽然现今他们都不愿承认——试图把爱变成一种美丽而快乐的东西就是信奉异教。在神学家和道德家眼里,占星术家

比他们更胜一筹,因为后者认为,男人爱女人的惟一原因是:如果没有这种爱,世界就走到了自己的末日,但他们为什么把世界末日看做一种不幸?我从未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为,如果他们的教义是真理,那么这个世界的主要用途就是为地狱提供燃料了,因为确实没有几个人想去天堂。

“但法国不是信仰基督徒的国家,而你看到了,高床却并没有消失。”多丽丝说。

“观念总慢慢消亡的。睡衣裤现在仍被看做是一种重要的奢侈品!睡帽已经消失了,这是事实,甚至在奥瑞勒也是这样,但衬衫式睡衣却还存在着,啊!啊!”我打开包拿出那件睡衣,“爱就要穿得像小丑一样滑稽可笑,我倒愿买一只睡帽,穿着没睡帽的睡衣睡觉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谢谢你看起来并不像个小丑。”多丽丝低声咕哝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看起来可怕总比看起来丑陋好。”

“你会看起来可怕的,亲爱的。”

“多丽丝,我真想看看你穿上画上我们的祖母们穿的那种有边的长睡袍、带上睡帽时是什么样子。”

“我也想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多丽丝回答说。她脸上带着女人们一谈到穿衣打扮就常有的那种严肃表情。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她突然发问。

“我只在想睡帽的事,亲爱的,但已晚矣;我估计商店都已关门了,而且我们在奥瑞勒也根本买不到睡帽,除此之外,多丽丝,一旦戴上睡帽,我们可能要按旧习惯睡在一起。当睡帽流行时,爱,用莎士比亚的话说,是被限制、围绕、幽闭在四腿床中间的,爱的时间一般被控制在接近午夜时分,欢娱过后夫妻两个就掉过头自顾睡了,或许还要祷告一番。”

在情人们是否睡在一起这个问题上,多丽丝没明确发表意见。女人总是偏于保守的,旧习惯永远不会失去对她们的魅力。

“我长这么大,我从没和任何人一起睡过,至少在少女时代

是如此。”

“你引用的是《一个年轻人的自白》中的话。”

“人永远不会改变,我说过这话吗?我已忘了。但自从写了那篇‘自白’后,就不断有恋爱专家对我说,我的清心寡欲无疑使我丧失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所有的朋友都这样对我说。有人还这样告诉我:如果谁没有和他的所爱在早晨醒来一起看从窗户里透过来的阳光,听松树间鸟儿的歌唱,那他就不知恋人之间亲密的痛苦与甜蜜。”

当我把这位朋友的观点讲给多丽丝听时,她的脸上和头发间都闪烁着火光。刚开始我还以为她睡着了。她那又长又密又蓬乱的金发恣意地披散着。多丽丝显然感到有点累,她现在正坐在那里两眼盯着火。她的姿态让人浮想联翩。我脑中翻腾着一个又一个梦想,直到穿粉红色衣服的侍者进来给我们送晚餐,我的梦之链才被打断。下午我曾叫他笨伯,并因此惹怒了他,他向我解释说他不是笨伯,但如果我惹急了他他会完全失去理智的。当然,粗鲁对待侍者是应该道歉的,这样做也令我本人感到震惊,惟一能解释我这样无礼的原因是我们卧室的外观让我生气。在下午,他的喋喋不休还让我生气,但现在则让我高兴,而且我还就酒的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我喜欢听他用浓重的南方口音向我介绍一种本国酒,他说这种酒像波马特酒一样醇厚、浓烈,它的名声已经传遍世界,麻烦的是这种酒不便于运输。

我们太疲倦了,因此不停地喝着酒,希望借此能唤醒我们已麻木的意识,但那种浓烈的南方酒所产生的效果似乎是催人入眠而非让人兴奋。当我们吃完晚饭又坐回火炉边时,我们都倦得不想说话了,可能也是因为都太紧张而不愿说话了。

“时间到了,多丽丝,”我喉咙里有种哽咽的感觉,我的心似乎在动荡,她似乎也很紧张,“我们该回房休息了。我们两个都累了,为什么我们还不去睡呢?”

我曾说过自己是多么渴望能在多丽丝的房间里一边与她一

起亲密地坐在火炉边，一边看她散开长发，解下紧身围腰，把天鹅绒拖鞋踢到一边去，从腿上褪下白得像奶一样的长袜，然后扭动着身子钻进像战场一样宽阔的床。世间事很少能天遂人愿的，但这次确实遂我们之愿了。我已给你们说过，刚开始我看到旅馆给我们提供的房间时觉得非常失望，后来又谈到我丢失了睡衣裤，但现在情人们的恐惧还并未结束。我最大的恐惧是怕爱欲会削弱我肉体的力量，如果多丽丝没有验证我想像的一切，我的命运就会以悲哀告终。她不是个塔纳格拉陶俑，一个泥俑，而是个精致完美的大理石雕像；她是个大理石女雕像，但又根本不是大理石女雕像。等我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后，我就向她走去。请宽宥我！赦免我！她的美可以救赎所有情人们所恐惧的那种灾难。

遗憾的是，我现在无法详细地描述出她的美，因为还有什么比美更难以描述的呢？——一个女人向你张开双臂时的美，也是世上最美丽的动作，以及她像猫一样翻滚时颤动着的屁股的美——都是看着可爱、想着沉醉，但却无法讲述的美。女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美，就像猫一样，而男人也能意识到他们的丑陋。与多丽丝一起躺在那张漂亮的大床上，我的丑陋让我颇为尴尬，“这是美女和野兽在一起。”我说。但她似乎并没有像我这样看我，我像彼拉多似的一遍遍地问自己：“什么是真理？”但我不会让读者像我一样沉思，因为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听你讲述自己所记住的一切而非只那销魂一刻——房子的颜色啦，形状啦，家具啦，还有我们在大火炉里燃着的木材啦，木头的形状啦，以及它的一端是如何被烧成灰，另一端则留下一个多瘤的树茬啦；还有，我们还把烛台移到阴暗处，免得烛光照我们的眼睛啦——所有这些细节现在都清清楚楚地印在我脑子里，但只有那销魂一刻被我忘得干干净净，这真是遗憾！但我还能回忆起我站在床边祝她晚安时的情景，因为当时已是所有恋人们都必须说再见的时刻，除非他们确实是“睡在同一间房里”的已婚夫妇。在穿

粉红色衣服的侍者给我们端进晚餐时,我们已经在讨论“同居一室”这个在恋爱中最重要的问题了。读者一定不会忘记我当时正在对多丽丝说那些恋爱专家是如何告诉我说:没有和他的所爱一起在早晨醒来看从窗户里透过来的阳光,听松树间鸟儿的歌唱,谁就不知道恋人之间亲密的痛苦与甜蜜。有同情心的读者不会忘了这段话,他会看见我正兴高采烈地站在一切世俗之爱的顶峰,因此,如果我对读者说,我当时并没有上她的床,而是昏昏欲睡地到她床边道晚安,读者一定会极度沮丧、痛苦的,而如果真是这样,我以后的叙述不管有多么生动,也都不会使他振作起来了。然而,虽然我在奥瑞勒没有得到瓦格纳所描述的齐格弗里德一吻吻醒布伦希尔德那样的神圣的时刻——但在奥瑞勒我至少知道了,说我在爱情方面只是个新手的朋友,在爱情方面其实只是个助手而已,但他对我生活的批评并非全错,因为在那天晚上,我睡了几小时后,突然醒来了,听到多丽丝在拉我房间的门把手。我大声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她房里没钟表,而我的壁炉台上有一只。她来得似乎正是好时候,我不禁请她到我床上来了,并且发现她并未生气,我就顺便把她抱在怀里,告诉她说我以前从未看见一个这么早就起床的女人。我的话使她很高兴,因为她也不希望我们的爱会因对其他女人的回忆而受到玷污。那天早晨,她对我流露出无限爱恋之情,结果第二天早晨我禁不住又去她房间找她去了。我现在仍能记得那次“拜访”她的细枝末节,当然没有她“拜访”我的情景在我脑中留下的印象深。在我离开她回房穿衣服时,她又跑进来告诉我她刚才忘了说的什么事。当她坐着看我刮胡子时,我们之间的亲密真是到了完美的程度。她不停地笑着,因为她并不总是有什么话要说。而她刚一离开我,我就也想起了某件不幸忘了对她说的事情,于是我不得不放下剃须刀恳求她让我推开她的门,虽然她正在洗澡。

我曾经见过一尊雕像,是一个俯身擦着大腿的女人,我走进

多丽丝的房间时发现她正是这样的一尊雕像。我见过的那尊雕像并不是件无聊的东西,但却缺乏许多内涵,而它所缺乏的我在多丽丝身上都找到了,那就是一种高雅的美,这种美使我想到了弗拉戈纳尔,因为是他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若与男人相比女人是小巧的。多丽丝给我的感觉就正是这样,她蓬松的浓发使她看起来比实际的她还小。她的头经她娇小的胴体一衬,显得特别大,然而这似乎——因为这只不过似乎是——并不会削弱她的美。她魅力四射,光彩照人,因为她就是弗拉戈纳尔——一个18世纪同床人。她让我走,说以前从没有人看过她洗澡,她不喜欢这样,不,她不喜欢这样!想想这些借口是多么迷人吧!情人之间一旦没有这些小小的伎俩,爱情的美妙滋味也就所剩无几了。我正胡思乱想着,听到她说十分钟后就可以与我在一起了,于是我打铃叫侍者送来我们的第一次早餐。

在多丽丝来到之前,这里已经摆好了咖啡,煎蛋饼和奶油。看到早餐变凉时的恼怒心情从逗弄她的快乐中得到了补偿,我恳求她穿上晨衣后再出来,而里面穿什么倒无所谓。

“快点,亲爱的,快点!”我喊着回到客厅里与一个普罗旺斯老人闲谈起来。我的英国口音与他的口音相比显得非常奇怪。在帕莱塞,我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口音,有瑞士人的、德国人的,也有意大利人的,在帕莱塞还有各种各样的巴黎口音。我记得曾对一个巴黎卖花女说——她的丈夫是萨瓦人——我相信她说的是南方口音。但在帕莱塞我却发现了真正的巴黎口音。当多丽丝穿着沾着泡沫的白晨衣进来时,我正听到那个老者喋喋不休地问我是否喜欢昨天晚上喝的那种酒。

“你就像酒,亲爱的,不对吗?他想知道我们在中午12点的午餐桌上是否还需要那种酒。”

“亲爱的,现在已11点了。”多丽丝看着侍者回答说。

“先生和夫人可以出去散散步,你们或许可以在下午1点吃午饭?”

我们同意一点前不吃午饭。侍者建议我们去看看大教堂，这样我们的时间就会既充足、愉快又能有所收益；但多丽丝喝完咖啡后想坐在我腿上与我说话，后来又看见客厅里有架钢琴，她就想为我弹点什么曲子，或不如说我想听她弹个曲子。但钢琴质量不好，音调不准，于是我们又谈起话来，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午饭后，侍者问我们是否打算稍稍散一会儿步，并邀请我们去看教堂。

“这对先生和夫人都会有好处的。”

“是散步还是去看大教堂？”我们有点尴尬地问他。他告诉我们，他也已有好多年没去过大教堂了，但上次他去时，教堂的阴暗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最后只能摸着柱子走出来，并几乎跌倒在几个跪着听牧师诵拉丁语诗的女香客身上。根据他的描述，这座教堂除了顶上有窗子外，其他地方都没有窗子。他把手放在桌上，看着像所有以前的或将来的侍者一样。他的围裙几乎顶到了他的下巴，只靠挂在肩膀上的带子拉着。他告诉我们，他当时不可能看清高坛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但后面好像有人在坐着唱拉丁诗。

“我的好人，”我说，“有你的描述我们就没必要去看了。我为什么要只为证明你的印象而去趟大教堂呢？我相信教堂里的讲道确实就是你描述的那样，我无论如何不会去破坏你的描述在我脑中唤起的那种画面：被世人遗忘的教士在坚固的教堂里的三叉烛台后面诵赞美诗的画面。”

这个可怜的人十分沮丧地走开了，按多丽丝的说法，他像丢了一只饭叉那样失望。

“感谢上帝，这事终于结束了——真是如释重负！”

“这儿有一座展览馆，你想去看看吗？”多丽丝说。

我换了一种脸色说：

“好吧，多丽丝，侍者说这座展览馆里有大卫的一幅著名的习作《奥瑞勒的仙女》。”

“但我不就是你奥瑞勒的仙女吗，亲爱的？”多丽丝双手抱住我说，“难道我还没有展览馆里的画好看吗？”

“你好看得多，”我说，“好得多。现在我们自由了。多丽丝，我们可以不必受什么教堂、展览馆的束缚了，整个明天都属于我们了，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在床上度过去。”

“那就这样吧。”多丽丝沉思着说；我渴盼着在多丽丝的床上度过一个有趣并有启发教育意义的一天，希望能够积聚许多美丽而珍贵的回忆，进而将美学与卫生学结合起来，因为在奥瑞勒只要不感冒，当密史脱拉风刮起来时事情就容易做了。直到第二天晚上我们才想起自己的包。“该打打包了，”我说，“时间总像长了翅膀，多丽丝，明天早晨我们就要离开奥瑞勒了。”

“坐火车走，”多丽丝颇为遗憾地说，“我们可以乘马车走吗？”

“我看没什么理由不这样做，”我停止打包，手里拿着一件叠了一半的衬衫式睡衣裤看着她。

“啊，那件衬衫式睡衣！”她笑起来。

“我该怎么处理它？”

“你不舍得扔掉它吗？你想保存它作为对奥瑞勒的回忆？”

“是的，我不会让别人再穿它，”我看着这件有淡红色条纹，乳脂一样的丝质睡衣，觉得它并不难看了，“它会一直让我想起这些房间的，这些我们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房间，多丽丝，难道这不是令人悲哀的事吗？我们在这儿度过了三个日日夜夜，三个同样销魂的日日夜夜，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分别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若没有性——不管是浪漫的还是愚蠢的——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多么凄凉的地方啊！”

“我不知道我们如果没发现这些房间还会不会在这儿呆三天，亲爱的，在那些鄙陋的房间里，我想你不会对我情深意长的，你太重视这些檐柱和挂毯了。”

“我会一直爱你的，多丽丝，但在这儿我会更好地爱你。”我

们手里提着包从卧房走到大厅,欣赏着其已逝的辉煌。“亲爱的多丽丝,你必须为我弹奏一曲,我想听听这架旧钢琴弹奏出来的音乐。弹吧,弹吧,但既不要太悲伤,也不要太快乐。”

“你想让我以哪种方式演奏,是轻松还是严肃?”

“要有一丝淡淡的忧愁,多丽丝,现在正是弹奏这种乐曲的恰当时刻……不,别离开钢琴,多丽丝,再给我唱几首歌吧,接着唱舒曼或舒伯特的曲子吧,我喜欢他们的浪漫感伤,喜欢他们曲子里的橘子园、南风和丝带似的湖。”

“还有一只夜鹰在孤寂河岸上的树林间唱歌,”她接着说,“这就是他们所感、所梦的东西。”

我的幽默折服了她,她一首接一首地为我唱歌,直到我们最终从对音乐和对过去的回忆的长久冥想中醒过来。我说:“给我弹曲华尔兹,多丽丝,我想听你在这个房子里弹曲旧时代的华尔兹;它那浪漫的旋律会激奋失意的灵魂。”很快,我微闭着双眼坐在椅子上,好像看到了在地板上轻快滑过的圈环裙,穿着白袜子的脚,斜倾的肩膀,头上闪亮的发髻——天鹅一样的女人,长胡子的骑士,他们穿着上宽下窄的裤子和有睡袋的外套,与女人们跳着、谈着。……音乐声突然停住了。多丽丝说:

“如果我们想赶上火车的话,我们必须去打包了。”

“不要给我谈火车。”我内心产生一种舒曼似的渴望与忧伤,不禁把她拥入怀中。切尔西或德勒斯顿的艺术家们也享受不到我这样的眩晕、快乐或轻松。她就是舒曼和德勒斯顿细瓷器,但她是一种比舒曼还早的德勒斯顿细瓷器。但为什么要把她与别的东西作比呢?她就是她,就是多丽丝,她的名字就是她的化身。

“啊,多丽丝,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这儿?为什么我们不能永远留在这里呢?”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呢?”她说,“我像你一样感到了这些高贵房子的魅力,的确,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但亲爱的,我们快

要赶不上火车了。”

穿粉红色衣服的侍者来了,我答应尽快走,但我对多丽丝的爱把我们的时间耽误得太多了。等我们赶到火车站时,只听说火车 10 分钟前就已开走了。离去的火车是当天惟一合适的车次,错过它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奥瑞勒再呆 24 小时。但多丽丝很迷信,她说:“我们已在这儿过了三天。如果我们今天不走,那我们明天再走,因为第四天走是不占利的。我们该怎么办呢?时间已被打乱了,旅馆的房间也已退了,所以我们必须乘马车赶往邻近的火车站。阳光在照耀,乡村景色美丽怡人,”她请求说,“从火车上看去,这儿的乡村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红色,橄榄树则又把它们衬得灰蒙蒙的。这儿的橄榄园,一直延伸到山脚下,与山坡上的松树杂陈相处。”

“山坡!”我说,“那种陡峭的山壁!我怎么会忘呢?——顶部像狮尾,直冲蓝天,像斯芬克斯一样高高在土地俯视着广袤的平原。”

“这一定是次快乐的旅行。”

“我们乘坐的马车应有法兰西古代流行的那种富有浪漫色彩的车厢。对了,说不定我们还能找到一辆驿递马车呢!”

大自然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有时总能遂人所愿。虽然在圣栎树掩映下的后院马车房里没有那种名副其实的驿递马车,但我们却有幸看见了一辆大概有 25 或 30 年车龄的老式马车,它又旧又笨重,用 C 型的弹簧支撑着,连车夫似乎都怀疑它的安全性。他看都没看车,不屑一顾地告诉我们车主一直想卖掉它,但没人愿买,因为它太笨重了,太过时了,连他都不想驾驶它。我们并不在意车夫给美下的定义,但多丽丝却担心车轮会掉一个。经过仔细检查,我们发现它还可以上路。我在帮多丽丝上车时说:“即使这不是一辆驿递马车,里面也一定坐过穿圈环裙的女士和穿着上宽下窄的裤子、佩着绶带的绅士们。仁慈的上帝啊,多丽丝,如果你也穿着圈环裙的话,我会死不改悔地

爱你。在我的孩提时代,人人都穿白袜子;我仅是听人说到黑袜子,我一直希望能遇见一个穿黑袜子的女士,但现在我则希望遇见一个穿白袜子的女士。”

“我们可以在城里寻找圈环裙和一双白袜子。”

“是的,但我可能会找到一双黑丝袜。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买这种东西,多丽丝,”我说,“我们已经错过了我们爱情冒险中最精彩的部分,我们忘了按我们正在扮演的角色装扮起来了——想想看,我们是奥瑞勒的情人。”

我说,如果爱情冒险不举行必要的仪式,譬如戴假发、束紧身腰带,还有袜子、马裤什么的,那它就是不完美的。有谁会不同意我的观点呢?每个人都喜欢装扮自己,不管是为了参加化妆舞会,还是为了参加某个奇怪的仪式。读者朋友,你见过参加这种仪式的人吗?如果你见过,你就会原谅恋人们之间表演的那种小喜剧,并相信这是自然而然的——我和多丽丝在从奥瑞勒驶往魏尔兰古尔的旧马车上上演的就是这种喜剧,我们希望到魏尔兰古尔吃早饭。

不要说我们坐在马车上有多兴奋了。多丽丝在想自己穿上圈环裙会是什么样子,我则想着巴尔扎克早年写的一本书中描写的那种穿着紧身裤和黑袜子的迷人男人。我们都把自己想像成《人间喜剧》中的人物了。我们在想着人类有史之前就吸引着人思考的问题——人类的变迁,一代代人的消失。尽管多丽丝尚年轻,但她已经在想死的问题了,她这样想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一旦到了会思索的年龄,他就随时会想到死的问题,而死也会随时光顾他,虽然此时他可能正在舞厅中狂欢,或正躺在情人的臂弯里。如果他当时正在大厅,他只需向外看一看,夜就会提醒他,几十年后他就要归于永恒的黑暗了;如果他正在卧室,他情妇的酥胸或许会让他想起另一个与他现在情妇的酥胸同样美丽、但现在已没人泥上的情妇;生活中的一点点小事都会使他想到死——落到大理石桌上的玫瑰花瓣,走进花园时看到的死在

路上的鸟儿,都会让他想到死。想过死后,他最自然的想法是自己的肌体衰落了。对我们来说,发现第一根灰发可能是件有趣的事,但用不了几年,我们头上就会出现一根接一根的灰发。如果这也不足以提醒我们肌体的衰落已经开始了,那么牙齿上的斑点总不至于起不到这种作用吧,当我们去找牙医治疗时,我们实际上就已是在开始人为地修复我们的肌体组织了。年轻人的活力和柔软很快就会成为过去。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听到一个运动员说他不能再跑百米时感到的震惊;而他说这话时的成绩只比去年慢半秒或四分之一秒。我看着他,说:“但你才21岁呀。”他回答说:“是的,事情就是这样。”我相信,足球运动员的运动年龄不会超过28岁,一到28岁他就过时了。过时了!想想看!这句话是多么让人同情啊!——过时了!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悲哀的因素,传达了一种秋天的气息,有一种幽灵似的让人恐惧的东西。帕莱塞的景色把我们带回到古代,让我们梦想着仙女和德律阿得斯,但奥瑞勒金色的檐口、挂毯和沙龙却使我们梦想上代人的时光,想着我们父辈的青年时代。

在沉思着我引出来的这些抽象问题时,我突然想起了现在。“上帝啊,”我对多丽丝说,“再看看后面吧,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到奥瑞勒了!”我们各从一个窗口往外最后看了一眼奥瑞勒的尖塔,差一点就要与它洒泪而别,但幸亏在这时路拐弯了,奥瑞勒从我们的视线中永远消失了。我们坐下来,不禁悲哀地想到: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完结了,这是我们生命中美丽的一部分,现在已被我们抛进虚空中了,被我们抛进感情的大石碓中了。仅此而已。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你的心思好像飘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分开,而我们离开奥瑞勒还不到5英里。”

“5英里!啊,只有5英里!”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看着中午的太阳,我想它离我们或许并不比昨天远。如果我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多丽丝听,她的

回答一定是：“在巴黎也一样。”但如果她这样说了，那她就犯了第一个错误，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事物永不会相同——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但总在变。

这最后一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老套，如果我要继续写这篇故事，我的笔就会滑向其他许多表面的、肤浅的现象，但我对这个故事不再感兴趣了。我不再想它了，而是问自己我们是驱车去魏尔兰古尔吃早饭呢，还是直接去巴黎。稍一想我们就决定了，在魏尔兰古尔吃早饭。我们问车夫能否在我们吃完早饭后接着把我们送往巴黎，他抬起头说：“马车太旧了，先生……”多丽丝和我都笑起来，因为说实话，这辆马车已快把我们颠散架了，我们早就巴不得打发掉这种我们的父辈才会坐的光彩照人的老马车，而转乘火车呢。

这些故事都是回忆，不是杜撰，纯粹叙述我在巴黎的日子不会让人感兴趣的；所有细节都已被我忘记了；杜撰和回忆就像山羊和白菜一样情投意合。因此，我省去了所有那些我不感兴趣的东西——如果连我都不感兴趣，又怎能让读者感兴趣呢？——我只是想告诉读者，我和多丽丝的爱情冒险没引起任何谣言或不愉快的后果。她的母亲是个从不多疑的可爱的女人——我不清楚她的轻信是极其愚蠢呢，还是过度聪明。世上有许多这样的母亲，我祝福她们！——她从我手中接去自己的女儿，俩人一起回英国了。如果我说自己没与多丽丝谈及婚姻之事，读者恐怕会失去对我的好感，因为他自然以为，与多丽丝这样可爱的人儿的风流韵事值得用一生去追求，但我要请这种读者注意这样的事实：多丽丝在帕莱塞告诉过我，除了阿尔伯特，她不可能嫁给别的什么男人，这就让我想到，她牺牲了一生中最伟大的爱，就是为了保持对阿尔伯特的忠贞不渝。那么，当我与她做了那种事后，是否就能希望她抛弃阿尔伯特而把绣球抛给我呢？她可能会这样做，男人和女人做事都是不合逻辑的。这一次他（她）可能因为羊肉上有污点而拒绝吃羊肉，而下一次

他(她)可能就是因为羊肉上有污点才吃羊肉,但多丽丝是用比较坚硬的原料制成的。几个月后她给我写了一封冷静而理智的短信,告诉我她就要结婚了。对她来说,嫁给阿尔伯特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几年过去了,我没看到或听到任何能证明她不是个忠贞、可爱的妻子的事。阿尔伯特常对我说,他发现多丽丝身上的所有美德在他第一次看到她那美丽、光彩照人的面孔时就已预感到了。不要皱眉,读者,请不要谴责我浅薄的犬儒主义。阿尔伯特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你自己可能就是阿尔伯特,每个人都曾是或将是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就像我在你们所有人的身上一样。亲爱的女士们,多丽丝也在你们身上,在你们这些正读着我的书的女士身上——多丽丝在奥瑞勒做了我三天的情妇,而在伦敦的一个冷清的郊区,她却做了阿尔伯特 20 年的忠诚伴侣。

爱追根究底和对闺阁之事感兴趣的人可能想知道多丽丝有没有孩子。大约在我们分手的两年后,我听说她“怀孕”了。这个词是自发地涌现在我脑子里的,这可能是因为我在故事的开头谈到过这件事,至于以后的事,亲爱的读者,则只能靠你的想像了,因为你们都是有非凡想像力的艺术家。至于我,则不愿再提这件事了,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

第十章 伤感的寻觅者

有一段时期,我的梦想并不是文学,而是绘画,我记得有个美国人曾教过我绘画;我还记得自己在卢森堡坐在高凳上画海滩情景的细节:那些挥动着的手臂,那些嶙峋的礁石,那些迎着海浪走去的美丽的脚,都令我着迷又让我手忙脚乱。但我为什么想起这些呢?只是因为记忆中的某些有趣的事与此有关。

有一天,工作了整整一上午后,我离开了展览馆。我对自己上午的绘画还算满意,但又害怕午饭后会有有翼魔鬼等着我。那时我很穷,虽然在那个地区还算富,因为这个区住的主要是学艺术的学生。他们常常在一个奇怪的小酒馆里吃早餐、会面。我现在就走进了他们之中,这顿饭大约花了我一先令。我离开这家酒馆时已快12点了——那天早晨我早饭吃得很早——我记得自己当时突然产生了一种空虚感,于是就在公园里流连起来。看鸟儿歌唱,看阳光,他们似乎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坐在长椅上,开始想世上还有什么能比坐在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石灰小径上、吸着烟、想想巴黎和自己更舒服的事。

每一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一个人(或许要排除掉上流社会)都知道巴黎主要的林荫大道——和平大道啦,香榭丽舍大道啦等,人人都知道卢森堡公园;看着四月温暖的阳光,听着小径尽头从一尊雕像手中的瓶子里流出来的水声,我不禁想起了一处府邸,现在这处府邸成了一家博物馆,但很少有人前去参观。一周前我曾和米勒德瑞德一起去过那里,但却发现她根本没有听

说过德·塞维尼夫人,也根本不关心她住在哪处府邸里。我向她谈到维斯勒广场,告诉她那儿一度曾是法国贵族云集的地方。我说着说着,眼前就出现了它的色彩:黄色或棕色的砖透出一种美丽格调,还有熟铁做的栏杆,高高的屋顶,高耸的烟囱,一切都历历在目。我试图回忆那儿是否有什么柱廊之类的东西,结果徒然无获。据此我想到,一种民族思想的形成就像山岩的形成一样,要经过一系列缓慢的积聚,或者说,要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才能形成一种像维斯勒广场一样独特的思想。在观赏它时,人们无法不——至少我无法不想到伟大的君主政治时期,不能不想到我从巴尔扎克的小说和法国历史中了解到的那些生动别致的名字。但在这里我不想赘述这些名字,因为我认为最严肃的事是要找出谁在维斯勒住过,但这种寻找恐怕会是冗长乏味的,或许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即使我提到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在这儿住过,那也一定有其他同样高贵的人在这儿住过。

“它的外表,米勒德瑞德,几乎和17世纪时一模一样,但现在住在里面的则是本区那些小商人,最后一个住在里面的伟大人物是维克多·雨果,他的房子已经改成了一家博物馆,这位伟大诗人的最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的遗物都保存在那里。”

我的热情引起了她的兴趣,她答应与我一起去看看维斯勒广场。对我这样一个感伤的寻觅者来说,她并不是个理想的伴侣,但那天我无法拒绝别人的陪伴。看完后,我们又一起参观了“我们的贵妇人”,参观了码头和一些旧街道,但米勒德瑞德恐怕是缺乏历史感,因为当我们沐着落日的余晖往回走,当著名的塞纳河露出其最美丽的芳容时,我却听到她沉思很久后说的第一句话:作为一座老城,巴黎还不错。当我看着撒满四月的阳光的小道上那一派浓绿时,正是想起了这句有点粗俗的话,这使我唇边露出了一丝微笑。

在卢森堡公园,看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四月春景,我不禁浮想联翩。周围的美让我沉迷,巴黎的一切都让我流连忘返。

迷迷糊糊之中,我好像正踏着一条石子铺就的小径,向一个孤独的仙女走去。“我以为你正在美术馆里画画呢,”一个悦耳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但你却在这儿”,那个声音接着说,“在这条美丽的小径上闲荡,到晚上你则会告诉我们说你一整天都在忙着工作。”“你是来散步的吗?”我回答说,心里想她可能对公园感兴趣了,如果不是,那就是公园里的人让她感兴趣了。我们该去看那个教麻雀从唇上啄食的男人们了,在我看来,米勒德瑞德似乎不愿意看那些在她脚边跑来跑去的小鸟,于是我领她去那个训鸟人常去的地方。如果幸运的话,我们说不定还能碰上罗宾汉呢,因为当时常有一个穿着逃犯的服装在公园里走来走去,而且手里还拿着弓和箭,据说他就用这把弓和箭射死了不少麻雀。我们甚至可能碰到一个穿着13世纪的美丽的链子甲的男子坐在凳子上吃午餐,头盔就放在他旁边。

我和米勒德瑞德一起在卢森堡公园散步的那天,我们没有碰到任何一个这种著名人士,但在走下一段台阶时,我们看见了一位老人在和他的妻子踢足球,他们是一对老夫妻,几乎有70岁了。在4月美丽的阳光下,看这对年已古稀的老夫妻嬉戏真是件愉快的事。我叫米勒德瑞德仔细地看他们,并告诉她说,在公园另一角有三个老女人就要来跳舞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可以说是公园里的著名人物;但看到米勒德瑞德对这些毫无兴趣,我只好给她谈点别的。她对这个区居民的生活,对学生和年轻女人的风流韵事更感兴趣。我看到她正盯着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一个学生,他修长的身体上穿着一件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的长礼服大衣。她此时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周前我们乘船从弗克斯通到布伦去时她对船上每一个男人都感兴趣一样。

我一上船就注意到她了,她那朴素、整洁的服装虽然并不是英国女人常常买但又穿不出效果的那种华丽的法国服装,但肯定也是法国式的。她穿的紧身胸衣我想一定是那种没有几根骨架的小丝带胸衣,当她走上走下时,她一直用手紧紧压着她的皮

腰带,以保证其能安心呆在其位置上。她不停地从这个人的肩膀望到那个人的肩膀,其姿态让我想到一只鸟。她的动作很快,又很警觉。严格来说她并不美:她的嘴闭得太紧,下巴几乎没有,眼又有点斜,眉毛是黑色的,几乎又缩成了一团。

我第二次见到她是在晚餐时间,她正好坐在我旁边——我们碰巧住进了巴克街上的同一家小旅馆。她与母亲住在一起,她母亲是一位稳重的英国老女人,她女儿同她说话时总是充满亲爱之情:“是的,最亲爱的妈妈”、“不,最亲爱的妈妈”等。她的声音是快乐的,虽然她从不发笑和开玩笑;但她脸上有一种悲哀的神色,并且不断地叹息。晚饭后她母亲走到钢琴旁弹奏起——带有很多杂音——“布罗克隆步态舞”。

“在尼斯我们常常伴着这首曲子翩翩起舞。噢,亲爱的妈妈,你还记得那种可爱的二步舞吗?”

她妈妈点点头笑了,并且开始演奏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但还没弹几个小节,她女儿就又说话了:

“好了妈妈,不要再弹了,来和我们谈谈话吧。”

我问她是不是不喜欢贝多芬的曲子;她耸耸肩,脸上显出一种生气的表情。她或者是不想谈贝多芬,或是她根本没能力对贝多芬作出评价。揣摩着她对“布罗克隆步态舞”有兴趣,我问她:

“步态舞比较轻快,对吗?”

她脸上的嘲弄表情似乎消失了。她坐着看着我,眼里闪出一丝迷茫的神色,我觉得很难说她的那种神色是冷淡还是愚蠢。

“米勒德瑞德弹贝多芬的曲子弹得很美,我女儿喜欢音乐,她拉小提琴比你听过的任何人拉得都好。”

“那她一定拉得很好了,我听说过……”

“只要她愿意。”做母亲的催着女儿为我拉一曲。

“我没带钥匙,它们都在楼上;不,妈妈,不要麻烦了,我在想着别的事情。”

她母亲回到钢琴旁继续弹起奏鸣曲。米勒德瑞德看看我，耸耸肩，然后就翻起报纸来，并说报纸上全是蠢话。我从她口里得知：她更喜欢欧洲大陆，而不是英国。英国的服装令人厌恶透了。她也遇到过一些很不错的英国男人，但都是守旧的新英格兰人。——噢，新英格兰人！比亚瑞兹就有一个这样的新英格兰人。你知道比亚瑞兹吗？不，不在意大利。意大利人不错，不对吗？加纳斯也有一个。

“不要以为我不喜欢听人谈论绘画，因为我确实喜欢，但我一定要看看你的戒指，你戒指同我的真像。我这只是个爱尔兰男人给我的，他说，如果我丢掉它，就会遭玛琳·杜的诅咒。”

“但谁是玛琳·杜？我从未听说过她。”

“你不必问我，我不是个聪明女人。人们只要连续两天看见我就会厌烦我。”

“我很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就不会说了。”

“为什么不说？如果不是真的我才不想说呢！”

第二天晚饭时间，我注意到她比平常穿得讲究得多了；她穿着奶白色的外衣，腰间扎一条樱桃红的腰带，领口则扎一条樱桃红的蝴蝶结。我还注意到她说话少了，而晚饭后她却显得焦虑不安。我想，她一定是在找借口劝她母亲去睡觉。

“妈妈，亲爱的，你不给我们弹弹‘英雄交响曲’吗？”

“但亲爱的米丽，你知道我不会弹。”然而米勒德瑞德坚持让她弹，并且说她若不把她新学会的曲子全部弹完就不能离开钢琴。在她正弹着锡德尼·斯密斯的某首曲子时，门开了，一张男人的脸闪了一下。我想起来米勒德瑞德对男人感兴趣，就说：

“你看到那个人了吗？多么漂亮、清秀的小伙子啊？”

她把手指放在唇上“嘘”了一声，在纸上写道：

“不要说话。她是我的未婚夫，我母亲不知道他在这儿，她不赞成我们的婚事，因为他一文不名。”

“谢谢，妈妈，谢谢，你弹得太好了。”

“你不弹弹吗？亲爱的？”

“不了，妈妈，亲爱的，我觉得很累，这一天太长了。”

母女俩祝我晚安后走了，客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写一封信。我刚要在信尾签名，她进来了。她看起来很快活，甚至有一点点恐惧。

“这不太可怕了吗？”她说，“我和我的年轻人正在餐厅接吻，却被侍者撞见了，我不得不恳求他别告诉我妈妈。他说‘一定照办’，因此我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把你的心上人领到这儿来？我就要去睡觉了。”

“噢，不，我不想把你赶走。我要在我卧室里见他——这样更安全。只要心胸坦荡，管他谁去说吧。”

又过了几天。有一天，我刚把画箱扛在肩上，就听到走廊里有个人走着走着停下了，并透过门缝对我说：“杜纳德往门里探头看的那天晚上你真是太有绅士风度了。我知道你一定认为那真是太厚颜无耻了——我是世界上最厚颜无耻的女人——但你是否介意我对妈妈说我要和你一起去看画？你不会拒绝我，对吗？”

“我绝不会出卖任何人。”

“我可怜的爱人应回去了。他是从办公室里偷跑出来的，可能因此会被开除；但他还要在这儿呆一晚上。现在你能来吗？妈妈正在客厅里。你只需来给他说一句话我们就一起出去。杜纳德正在拐角处等我们。”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刮脸，听到有人敲门。

“请进！”

“请原谅，但我不想被落下了。我在客厅等你。”

我下楼梯时，她让我看一只结婚戒指。她已嫁给杜纳德了，或者说，她说她已嫁给杜纳德了。

“昨晚他到我房里来了。噢，我累了。我真是过了一个空洞

的晚上,现在妈妈又想让我陪她去买东西。你能不能留下来与我说说话?过后我们可以偷偷地一起出去,到某个地方玩玩。你今天画画吗?”

“好吧,我今天不画画了,但要去一个很远的博物馆,我还从未见过德·塞维尼夫人的府邸。”

“她是谁?”

“一个著名的女作家。”

“我怕只会惹你烦,因为我不读书。”

“你最好去,你不会整个上午都一个人呆在旅馆里吧?”

因为某种原因,那天早晨她不能与杜纳德一起外出。读者或许还记得我曾对她说过我要去参观德·塞维尼夫人的府邸(读者也应记得,我们不仅参观了德·塞维尼夫人的府邸,而且还走访了维克多·雨果在孚日省的住宅。你或许还记得那晚当我们沿着码头返回时她说的‘作为一座老城,巴黎还不错’这句话)但读者至今还不知道我为什么对米勒德瑞德那么冷漠。“对待她,”当我们短暂漫步后回到旅馆时,我自言自语说:“对待她就得偶尔像对待一只流浪的狗一样。”当我坐下来想想我们的结识经过时不禁哑然失笑,想到自己给她谈什么德·塞维尼夫人的作品和让·雅克·古荣的雕刻,谈过去的巴黎以及她从未听说过也不会感兴趣的人或事,不禁觉得啼笑皆非。我不敢肯定她是让我高兴了呢还是让我厌烦了,于是决定在两天之内不再见她。到了第三天,当我坐着欣赏卢森堡公园的美景,借四月温暖的阳光摆脱工作的烦恼,借清静的小径上小鸟的歌唱忘却尘世的烦忧时(我已经提到过这些,但还值得一提),我突然想到了米勒德瑞德,并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怕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就在我开始觉得想和她一起在公园漫步时,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巧合是经常发生的,而我们却总觉得其中有什么奇怪,甚至觉得是出于神助。读者可以想见我是怎样站起来迎接她,以及怎样邀请她与我一起去公园散步的。现在,为了狗

尾续貂,我再说说我是怎样在米勒德瑞德一再要求下与她一起去博物馆的,因为她一心想取悦我,就暗示我应该带她一块去博物馆;我不想拒绝,虽然我知道某些画和塑像会干扰我现在想得到的结果:即弄明白杜纳德是不是她第一位情人,她那可爱的妈妈对此是否有所察觉。

“那么说你母亲对你们的婚事一无所知了?”

“一无所知。他应该回去了,但他还要再呆一个晚上。我想这已告诉过你了。我可怜可亲的小妈妈,她从未有过丝毫怀疑。杜纳德就住在我隔壁。今天早晨侍女送热水时他正睡在我床上。但她说她决不说出去。”

我们向博物馆走去,在途中我逐渐知道了一点杜纳德过去生活的情况,并偶尔听说他父亲还很有钱,但杜纳德被认为是个不可救药的人。他16岁就离家到了海边,在一艘商船上做过三等水手,在美国一家旅馆做过擦鞋匠,就在他来巴黎之前,他还和一个喝醉的司炉打了一架,赢了一个内装五英镑的钱包。

她问我哪幅画最好,但总是心不在焉,她还试图记住画家的名字,这真是既让人同情又让人可怜。“安格尔,你是说安格尔吗?我必须想法记住。皮维斯·夏凡纳?多奇怪的名字!但我不喜欢他的画。他画的那个人的肩膀与杜纳德的一样。”她说着拉住我,让我看一幅画着一个年轻裸体男子的画。画上的男人坐在灰色岩石中间,周围是灰色的树,头上是灰蒙蒙的天空。画上的年轻人有黑色的卷发,米勒德瑞德说她愿意坐在他身边,用手抱着他。“他像杜纳德一样肌肉发达,我喜欢强壮的男人,我讨厌小个子男人,而杜纳德有6英尺多高,杜纳德的胸部长满了胸毛,他的手臂上和腿上也都毛蓬蓬的。多么可爱!昨天晚上我们还一丝不挂地并肩站在镜子前。站在他身边,我看起来确实有点小。把手放进一个长满粗毛的胸膛上,感觉真快活。我不知道为什么给你说这些,以前我从不敢对男人说这些,但你是那么有同情心,所以我愿意实话实说。不知怎么地,我觉得你也

有过美好的时光,如果你没有过,你就不会这样富于同情心了。”

我们不停地走着,谈着爱 and 情人,但我们的谈话偶尔也会被打断,因为不管我对米勒德瑞德多么感兴趣,但有时看到的一两幅画也会把我的注意力从她身边移开。当我们来到雕刻馆时,我发现她对雕刻比对绘画更有兴趣,因为她突然停在了罗丹的“青铜时代”面前。我开始想弄清楚她是真能理解雕刻艺术的美呢,还是纯粹只对罗丹雕刻时站在他面前的男模特感兴趣。与绘画相比,雕刻是一种更原始的艺术;雕刻和音乐是两种原始的艺术,因而即使一般人也易于理解和欣赏——至少我现在是这样把米勒德瑞德和罗丹联系起来的。与此同时我又想到,像米勒德瑞德这样对性感兴趣的女人是不会不对艺术产生兴趣的。因为虽然性确实先于艺术,但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是服务于性的,通俗一点说,意识自出现以来一直是为自由服务的。甚至在当今时代,虽然人类发明了电话和汽车,但我们开始谈情说爱时仍要借助于艺术。今天的男男女女开始相爱时仍是互相赠送书,而在书出现之前,恋人们则是用音乐来服务于这种目的的。因为当男人无法赢得女人的芳心时,他就会走到河边,砍下一节芦苇做成一只芦笛,吹奏幽曲以取悦于她;一旦他用音乐赢得她的芳心,他就开始转而只对乐曲本身感兴趣了。杜纳德一定会成为潘的一个出色的模特的,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从我所听说的有关他的情况来看,他似乎就是个返回地球的神,如果他以前确实离开过地球的话。多毛的神是在天上,而非罗丹梦想的那种纤弱的男孩子,那种像百合花一样在盛开的狂喜中摇摆的男孩子。而米勒德瑞德似乎对两者都同样欣赏。

“我发现他惟一的缺憾是小腿太短,而大腿又似乎太长,我喜欢从膝到脚能长一点,而不喜欢从膝到臂长一点。好了,我说什么蠢话了吗?”

“一点也不。我想你是对的,我赞同你的审美标准。大腿长确实不美。”

“我敢肯定，意大利小伙子都是小腿长，”她脸上出现一种沉思的神气，“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告诉过你，我们下周要去意大利了？”

“是的，你告诉过我。”

“但我还不曾告诉你我是怎么认识杜纳德的。”她靠在雕像上，开始给我讲他和杜纳德的认识经过。她和母亲以前曾住在一套寄宿公寓里，而杜纳德的父亲正好也住在附近；她们常常在住所附近散步。一天下大雨，她正往家跑着，他拿着伞来到她身边。那是7月的一天，几天后她就去特拜过了一月。在特拜她和一个叫图拜·威尔斯的男人亲密起来，就是他使她把杜纳德忘了一段时间。“图拜的母亲也在那儿，我们常常把两位母亲借故送走，让她们去乘车兜风，这样整个下午餐厅就完全属于我们了。”

“但你更爱杜纳德，对吗？”

“当然是这样，他来这儿是为了娶我，噢，真的，我把图拜全忘了。你知道，我是在回到伦敦时遇见杜纳德的。”“你回到伦敦时？”我重复了一句，接着听她讲到，她和杜纳德为了不被人追踪到，是如何常常在城市的不同地方不断租房子住的。

“为了找到合适的住处，杜纳德有时常常不得不跑遍彼莫利科。我总对他说，如果可能就租妇女商店上面的房子。我们通常一周约会两次，一两个月后，布卢姆斯伯里所有可租的房子都被我们租过了，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只呆一次。我们常常一起呆上半天。我从12点乘上一辆马车，直到下午5点才停下。有一次我们把托盘放在了地板上，而我们又忘了这回事；房间很黑，我从床上跳下来时，一只脚一下子跳进一盘果酱里去了。但我们还是看看那位女人的背部吧，看看她的头的位置。我不知道罗丹为什么让这个女人摆着那么一幅姿势。”

她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一种好奇的探询的神气。我突然感到一阵羞愧，赶紧让她相信那尊雕像名叫“斑蝶。”

罗丹的艺术作品中常包含一点性方面的东西,他的雕塑有时也可以称作“巴黎的商品”。他的作品常常受到某种感伤情调的损害,这一点是古诺最早发现的。

“你见过一幅叫‘眩晕’的画吗?——画上一个女人躺在沙发上,沙发后,一个男子正俯身吻她。杜纳德说他亲吻我时我总是闭上眼,就像画上那样。”

“我看昨夜确实令你回味无穷,你说话做事总离不开昨天晚上。看来今天与你一起来画廊漫步确实不太合适。来吧,还是让我们坐下来谈点轻松的事情,谈谈恋人们吧。把你的他们介绍给我你不介意吧,你知道可以信任我,来吧,在杜纳德之前你有多少情人?”

“噢,好吧,有12个,但我想,不会有人因为你这样做而看不起你的,我总是很老实的。我向杜纳德承认我有过两个情人……但当然,我曾是一个魔鬼,我第一次失身是在我16岁时,我哥哥的一个打猎的朋友每天都骑马来看我,他穿着猎装看起来真帅,他常常吻我——当然我很喜欢这样。一天,就在草料棚上,我们……噢,干草堆里可真热!自那以后我们又多次做了那事。”

“这段风流韵事是怎么结局的?”

“他不得不离开我,当然又有人取而代之。”

“每次你都幻想自己是在恋爱吗?”

“噢,我的天哪!当然不!我对杜纳德倒抱有很大的幻想,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但这都是过去的爱情了。”

“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完全投身于你的男人。所有这些已逝的激情都将会转化为一股永不会改变的激情。”

“你这样想吗?我倒没这样想。”

“你怀疑吗?”

“我认为没有哪个男人会完全钟情于我,没有一个男人会填满我的生活。”

“甚至杜纳德也不能？”

“杜纳德真是个妙人儿。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到他跟前喊到：‘噢，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有时他像个粗野的印第安人。你还记得我们到这儿后的那个早晨吗？”

“你的新婚之夜？”

“对，我的新婚之夜。”

任何一个本真率性的男人或女人都会让我们感兴趣，这个女孩子显然就属于这样一类人，并且只是这样的人。与她那从不疑心的安静可敬的妈妈到处周游，也真是舒心。她似乎代表了某一类型的人——类型也不算最合适的词，因为她又是个例外。以前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人，包括她的坦率和大胆：她至少是个有勇气面对自己本能的人。她是会令男人疯狂的尤物，如果你愿意，你都可以拥她入怀。但不时地我好像又看到了另一个米勒德瑞德，那是在她叹气的时候；当她脸上出现那种小小的不满神色时，另一个米勒德瑞德只是一闪而逝，就像溪流上的水花或小草一样转瞬即逝。

“我有时非常恐惧，我倒愿意嫁给一个男人，面不想未婚有子，有时我实在太害怕了，就祈祷上帝，我告诉上帝，只要让我过上安全稳定的生活，我以后再不那样做了。但我不知怎么回事总还是那样做。你知道我确实想做个好女孩。我想做人就应该做个好人。但实际上，如果你读读《圣经》——噢，你要走吗？——与你谈谈这些事对我来说真是一种解脱。今晚我还能见到你吗？旅馆里没有一个可以与我谈谈心的人，妈妈只会弹钢琴，她弹贝多芬的曲子时我头都炸了。”

“你会拉小提琴，对吗？”

“对，我会拉。”我认为她的典型特征就是那种独特的悲哀神色，现在那种神色又开始出现在她脸上了。我问自己，她这种突然出现的悲哀表情是应归因于她的愚蠢呢，还是应归因她的一种突然想法或冲动。“很遗憾你不在旅馆用晚餐。”

“我也很遗憾,我要与学生们一起就餐,他们会让你感兴趣的。”

“我是个年轻女人就好了。”

“如果你是,我会把你带去的。现在我必须跟你说再见了。我不得不继续我的绘画了。”

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旅馆,第二天早晨很早又离开了旅馆。但第二天她在公园里又遇见了我。我们一起漫步时,她告诉我杜纳德已走了。

“他不得不回去,这你知道,他是偷偷地从办公室跑出来的,他只拿两英镑,可怜的人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他是借了200镑来这儿的。”

“没有,你把这件小事漏掉了。你知道,你太全神贯注了,太情深意长了,你认为所有这些东西对你和其他任何人都一样有趣。”

“现在你就不太友好了,”她略带责备地看着我说,“你这是第一次对我不表同情。我给你谈这些,是因为我想你会对我的谈话感兴趣。而且,我相信你对我有点兴趣,我一直是这样看的……”

米勒德瑞德常常发这样的小脾气,我知道她的脾气很快就会消下去,只要我一给她谈到杜纳德,这些小脾气就会迅速烟消云散的。

“我不想谈他,你冒犯我了。”

“很遗憾你要离开巴黎了,米勒德瑞德,这是美丽的一个月,在这儿是多舒适啊——空气温柔又温暖,阳光在树叶间闪耀,小路尽头又有水声。但你不要回答我,来吧,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带来你的提琴盒。”

“我是因为想到有可能碰到你才带的,我想你可能喜欢听我演奏,我们明天早晨就要离开了。在那家旅馆里,在那间乱糟糟的小屋里我无法演奏;妈妈想陪着我。只要喜欢这儿,在这儿可

以做任何事，没人会注意到别人。”她用阳伞指着一个又高又瘦的诗人说。那个诗人长发披肩，正在小路的另一端走来走去朗诵着他的诗。

“你的演奏可能会打断他的诗思。”

“噢，如果他不愿听，他可以走开。但我不想演奏，当我心情不好时我无法演奏，要想让我有心情演奏，除非你说……”

“说什么？”

“你心里很清楚。”她回答。

我们继续争吵着，但这种小小的争吵既不是情人间的，也不是朋友间的那种争吵（就我来说，我把这纯粹当成一种文学式的争吵），直到看见两个女人在撒满阳光的小路尽头在光影中进进出出，我们才停止了争吵。她们是在跳舞，另一个女人正斜靠在树上拉小提琴，跳舞的两人则不时停下来与音乐的节奏协调一下，显然，她们三人是姐妹。

“她们就是这个区里人人都在谈论的舞蹈家，”我说，“来吧，米勒德瑞德，我们去看看吧，她们好像在迎接清晨。”

“我知道那是加伏特舞，”她回答，“如果她们愿意，我可以给她们伴奏。”

刚开始人们并没觉察到米勒德瑞德在拉小提琴，等她拉了几小节后，三姐妹中比较年轻的那个看米勒德瑞德的演奏和自己一样好，她就把自己的小提琴交给身旁的一个人。加伏特舞在继续，三位老女人优雅而庄重地旋转着。

“她们为什么在这儿跳舞，她们是何许人也？”我坐在凳子上沉思起来。我开始为她们编织一个合适的故事。我对自己说：她们是一个逐渐败落了的贵族之家的后裔，家里没有任何收入。到她们这一代，她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向上帝祈祷。我好像听到她们在一起祈祷的声音，年长的姐姐正跪在一群祈祷的人中间，年龄最小的那个则在试着借谱曲以谋生。“我们的家庭不应是这种命运，”她说，“我们应结束乞讨生活了。我们必须走出这

套大房子,我们必须离开这儿,但不是去乞讨。”年龄居中的那位并不相信她们能这样做,但当她们把最后一面包也分光时,那位坚信她们可以走出家庭的妹妹碰巧见到了一封旧信。“我告诉你们,”她说,“我们能得到拯救,伟大仁慈的上帝不会把我们赶到街上去乞讨的。这封信里说,我们的祖先住在孚日省时就常有人跳加伏特舞。”

“但会跳加伏特舞对我们又有什么用?”二姐喊道。

“很有用,”年龄最小的妹妹严肃地回答说,“我会拉小提琴,我们都可以学会跳舞,天气好时我们就可以在卢森堡公园跳加伏特舞,就像德·塞维尼夫人乘着六匹马拉的豪华马车来到装饰着让·古图浮雕的旅馆时,旅馆庭院中人们所跳的那样。”

这个故事是我坐在长凳上听着乐曲时所想像出来的。这曲调不再像落叶刮着小路时的沙沙声,因为这是没有音调,也没有节奏,而是像春天一样轻快、美丽的声音。米勒德瑞德的琴弓有时拉出激昂热情的曲调,有时又低回婉转,如怨如诉。她拉的是旧时代的节奏,使人想起了假发、长剑、弓和好勇尚侠的骑士!多么高贵!多么迷人!她对曲子的理解是多么好啊!而老女人们又配合得多么好啊!每个人都是多么欢乐啊!她不停地拉着,直到三位女人跳不动了,只好坐下来听她演奏。在试拉了几节我不懂的乐曲后,她的演奏使我想起了一种我熟悉的音乐——对,就是在教堂听过的那种音乐。她先是拉了一段舒缓、低沉的音节,然后突然如山洪倾泻般奏出一连串似乎永远不会停止的音符。她的演奏缜密严谨,很容易使人想起庄严肃穆的教堂。在她的音乐声中,我好像看到一个灵魂走到上帝的审判台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乞求上帝的救赎。但米勒德瑞德不会理解这种宗教感情,只是她的演奏在我身上产生了这种效果。她受过专业训练吗?她是在模仿他人的思想吗?她的演奏听起来不像是模仿,而似乎是从她心底流出来的,或是从某种无意识的自我中流出来的。

她不停地演奏着,演奏着,似乎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还要演奏什么,突然,她似乎受到了一种新的情绪的激动,开始演奏起一曲非常简单、发出嗡嗡声的旋律,在我听起来,就好像不时有某种焦虑不安的情绪打断了她的演奏。我似乎看到一位身穿白衣的女人在日暮时分在阴暗的闺房中徘徊,这是阿弗雷德·斯蒂文森笔下的女人,只是稍整洁些。她的恋人背叛了她,或是她厌烦了自己的情人,因而她不知心何所依,不知是去修道院还是去舞场。噢,这美丽的挽歌——米勒德瑞德拉得多好啊!——曲调时而激昂欢快,时而婉转低回,时而高潮迭起,时而又如小河流水幽暗呜咽,如怨如诉,如泣如慕,颇得贝多芬的神韵,惟一不同的是形式。我说:“你的演奏更轻松、优美,也似乎更肤浅一些,但也同样深刻,因为当我们探寻到事物的根本时,一切事物都是深刻的,事物与事物之间都同样深刻,就像一切事物也都肤浅一样,事物与事物之间也都同样肤浅。”

人群围拢过来听她演奏,因为她的演奏奏出了每个人的灵魂中隐藏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但存在于轻浮之爱中,也存在于圣洁之爱中。她不停地演奏着,显然没意识到自己身边正聚拢过来越来越多的听众。

“你演奏得太美了,为什么你说你不喜欢贝多芬?”

“我没说过不喜欢贝多芬,你知道我妈妈不会弹奏‘英雄交响曲’。”

“为什么你不一直像现在这个样子呢?”

“我不知道。人不可能总是一个样,我演奏时感觉就不同了,这种情绪只是偶尔才有。过去我常常演奏,现在只偶尔为之了,只是在我想演奏时才拉。”

我们走过两边立着雕塑的小路,心里想着的还是音乐。

“我必须回去了,”她说,“你知道,我不得不去打包了,妈妈从来不会打包,我不得不替她做。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还能再见面。”

“那有什么用？我只是喜欢拉着小提琴的你，而你又不是常有这种雅兴。”

“我很抱歉，如果你对我多一点了解的话，或许……”

“现在你要结婚了，我想杜纳德会到罗马找你的。”

“噢，我想他不会。他没钱。”

“你会爱上别人吗？”

“当然，可能会这样，但觉得下一周不会。”她突然在一家内衣商店门前停下来，说，“我喜欢那些衣领，那些可翻折的领子。你是喜欢这种衣袖，还是喜欢那种有三寸高的直领？这些直领流行时，穿这种衣领的男人们头几乎动都不能动。”接着她又谈起领带和她最喜欢的颜色——紫罗蓝色。“是的，紫罗蓝色的确很美。可怜的杜纳德！他是那么潇洒！我真想给他六条内裤，因为他只有一条，他的鞋也很糟糕，可怜的人儿。”

从内衣商店走出来后，她就没再谈到音乐，而是谈了很多与杜纳德有关的事。一路上，她的嘴上就没离开过杜纳德。“忘了杜纳德吧，”我说，“给我谈谈莫扎特、肖邦吧，但不要再谈杜纳德了。”“我不会谈论音乐，”她回答，“我只会演奏音乐——这也要看有时候。”她连上旅馆的楼梯都害怕。我完全被这个我一点也不厌烦的米勒德瑞德吸引住了。她要妈妈弹奏“布罗克隆步态舞”，而她则跳起她在尼斯学会的“可爱的二步舞”，而这只是为了取悦于我。我注意到，她在房里踢踢蹦蹦跳着舞时，脸上显出一种极其滑稽的神色。她的下巴有点斜，这使她的脸上总是显得有点滑稽。她与我一同下了楼，在旅馆门口，她站住了，对我说：“我想告诉你我和妈妈昨天一块出去时发生的一件事。事情发生在一家餐馆。当我和妈妈走进去时，我看见了一个美国佬——噢，他穿得可真漂亮！多可爱的皮靴！‘噢，亲爱的，可爱的人啊，他不会看我的。’我想。但他很快就看到我了，他向我做个暗示，只是一个小小的暗示，是用舌头做的暗示，这你懂。随后他就掏出名片盒，折叠起一张名片，放在他身后的一个壁架

上,然后看看我走了。于是我走过去拿起名片。妈妈一直没看到名片,但服务员看见了,我怕我的脸都红了。他在剧院街有套房子,他一定很有钱。我到家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因为看出他是个美国人,所以我可以原谅他的失礼,尽管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明天就要离开巴黎去罗马了,如果碰巧他也去的话,他可以在 C/O 托马斯·库克街找到我,然后签上了我的名字——但他当然不会来。”

我已经忠实地向你们报告了米勒德瑞德生活中某一特殊时期的故事。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从她的生活中我似乎看到了生命的神秘,而我是不会去破坏这神秘的。

第十一章 农舍里的圣母

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宽大的威斯敏斯特大厅里——我只看见她的尖脸、红发和白齿。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她家里——一个刚重建的农舍，有一座别墅的一半大。房子后面是麦秸垛，一台嘈杂的脱粒机和一只鸽笼；大马厩里的马不安地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并不时发出一两声嘶叫。在一个长满冷杉的花园里，她每天都要来照料她的花。晚上我们聚在她家的客厅里，她的丈夫静静地抽着烟斗，金发披肩的姑娘们在跳着华尔兹；她一个人说着话，像喷泉喷发一样一发而不可收，并不时爆发出一阵爽朗明快的笑声。我那时刚刚 18 岁，对宗教问题很感兴趣。有一天我告诉她我口袋里装着的那本书（并且有时还装作在读）是康德的《纯粹理性之批判》，然后向她介绍这本书如何如何有价值，但她并不以为然，她对探讨宗教问题缺乏兴趣，这令我颇觉奇怪，因为她一向被认为是信教的，而我不理解的是，单纯的信仰怎么会让人满足。一天我散着步走进温室，她走过来，看到书中题为“范畴的演绎”的一章，突然大笑起来，她从此以后就叫我康德了。她家里的其他人并不接受这个绰号——他们发明了另一个更能激发他们想像力的绰号——但她坚持用她给我起的绰号，在我们漫长的友谊中，她再没叫我别的什么名字。

没有什么理由能说明我为什么会和这些人交朋友。在性格和性情上我们都是相反的，但不知怎的我们又似乎很相投。我们双方都极少有相似之处，至少就我本人来说是这样。我的青

春是一种模糊的梦,我那时还不会思考,我就像躺在高高的草堆上看天上时离时合的云彩那样看着他们、理解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中,我一次次地拜访他们,在我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的时候,那个常在乡间戴着高帽子走来走去的老绅士死了,我的朋友们都搬到了大约 100 码远的新家里——新居是意大利式的,就掩映在沿海边生长着的榆树之间。在他们的新家里,我觉得他们变得真实起来,而不再像影子一样了,他们那时就像舞台上的人物,他们新建的侧房和新开的花园就像一出戏中的某个情节那样吸引着我,而每当我从他们身边离开时,就像看完戏回家一样,随后就忙着其他事,很少再想到他们了。几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在国外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在伦敦偶然又碰见了他们。

于是又是一次接一次的拜访,我的那些朋友们与我当初离开他们时一模一样。他们的房子依旧,生活起居依旧。直到有一天我和其中的一个姑娘一起在花园散步时,我才意识到一种新的变化,那就是我有了一种家的感觉。我似乎一直认识这些人,他们已成为我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突然而甜蜜的爱觉醒;生活似乎像拂晓的原野那样无限延伸着,并以许多新奇得让人无法想像的方式变得清晰明白、变得活生生的。首先,我惊奇地发现我自己喜欢她,而在 15 年前,她在我面前只不过是那个邈邈的小女人。她现在 55 岁了,但这样的年纪似乎不可能再有这种女孩子般的体型和这样年轻而有感染力的笑声。然而,我确信她比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已大了 15 岁,但那 15 年带来的变化却是我们彼此都能理解和同情的。我们成了志趣相投的同伴。我注意到她穿的衣服,并告诉她我最喜欢她穿什么衣服。她只生过我一次气,就是在盆栽棚里我看到她戴着一顶旧式女帽,帽子挂着一朵已凋谢的花的那一次,因为我对她的装扮表现得大惊小怪了。自那之后,她常对我喊:“不要看我,康德,我知道我像个老吉卜赛女人。”

“你看起来很迷人,”我说,“特别是戴着那顶旧帽子的

时候。”

她放下水壶，笑着把帽子从头上取下来，“这只是顶平平常常的帽子。”

“一点也不寻常，你在暖棚里忙活时真是迷人极了……我更喜欢你这时的样子，而不是你梳妆打扮去布赖顿时的样子。”

“真的吗？……我以为你最喜欢我穿那套新做的黑丝绸衣服。”

“我喜欢任何时候的你。”

我们彼此对视着。我们的友谊中有一丝爱的味道。“奇怪的是，我第一次认识你时，还没有现在一半喜欢你，这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会这样呢？那时我可是很年轻啊。”

“对，”我很后悔自己说过的话，“但你看不出来吗？我那时只是个小孩子——我生活在梦想中，几乎看不见周围在发生什么事。”

“当然是这样，”她高兴地说，“你那时太年轻了，你眼中的我只不过是个身边带着个成年儿子的女人而已。”

她的衣服用别针别住了，她手里拿着那顶她自己说戴着看起来像个老吉卜赛女人的帽子，阳光洒在她现在稍显稀疏的红头发上，但她满嘴皓齿仍粒粒如精致的雕塑品，而雌狐般妩媚的脸上则没有一丝皱纹。从她的体型根本看不出她的年龄，如果她和她的女儿站在一起的话，估计人们喜欢看的是她而不是她女儿。

一天，我正在储藏室里找一张牛皮纸来包书，却遇见了一堆旧的《雅典娜神殿》。即使我现在碰到拉斐尔的一套画集也不会感到那么惊奇。房间里不只是一份《雅典娜神殿》，而是有20份，而以前从没有人在这间房里读过书。我看看日期——是33年前的。这时她正从地板上把一些已皱的苹果收起来。

“谁会把这些《雅典娜神殿》放在这儿呢？”我问。

“噢，这些是我的，”她说，“当我快要嫁给巴特莱特先生时，我常常读这些东西。你一定听说过他——他写了一本著名的关于幼发拉底河的书，那时候我很喜欢读书，他和我常在华兹华斯

的旧花园里谈论我们读过的书,现在一切都完结了。”

对逝去的生活趣味的同情似乎把我们拉得更近了。在静寂的储藏室里,在苹果的香味中间,她的脸上现出女孩子才会有的那种活泼与可爱。我觉得自己像是与她一起生活过似的理解她。

“你过去一定是位快乐的姑娘。如果我那时就认识你的话,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向你求婚的。”

“我相信你会,康德……你是不是认为,既然我现在不读书,那我以前也不曾读过书?你不知道我曾是多么喜欢书,如果我嫁给了巴特莱特先生,我相信自己现在已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女才子了。但随后狄克就出现了,我父亲认为我们才是比较合适的一对,于是我就有了孩子,就忘了书了。我们那时很穷,而老乡绅又从不肯帮帮我们。”

这次我似乎要一直与我的朋友们在一起了,我高兴时,就去拜访她们,有时在他们那儿呆一星期,有时则呆六个月,但不管我呆多久,他们都说我呆的时间太短。如果乘5点的火车,从伦敦到他们那儿刚好赶上吃晚饭,到那里我就跑到我房间里,好像我是他们家的成员一样。如果我没有赶上5点的火车而改乘6点的火车,到那儿时他们正在吃晚饭,摇曳的灯光似乎使我们更加亲密相爱。我绕着圈与他们依次握手,心里感到一种特别的快乐。有一次我发现她没在饭桌旁,我就问:“你们肯定是想让她在晚饭后的散步时间再见我?”他们告诉我:她病了,已经有两星期没离开过房间了。

又是几天过去了,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她的病;接着又听说当地的医生不再想给她治病了,而是建议她找伦敦的外科医生看看。但她不愿因自己花这么大一笔钱,所以说她自己完全可以独自去伦敦。

她坐着小马车到了火车站,我看见她裹着头巾坐在候车室里。看到我她觉得有点羞愧,但实事求是地说,她的病并非像她想像的那样给她带来了多大的变化。有些人的美丽是疾病也赶不走的。

她过着如此高雅的生活,即使站在坟墓上,她也会对你微笑的。

我们以为从此将与她永别了,但没想到她又满怀希望地回来了。据说手术本来是不必要的,但她仍在房里呆了许多天,直到她有力气下楼,我们才又见到她。大约一个月过去了,她又出现在大家面前,并且看起来出奇地好。她一天天好起来,慢慢又恢复了姑娘似的体型和动作的敏捷,使老房子里重又在安静与平和中增添了一种优美与欢快。她的优雅与轻快是令人惊奇的。一天,她穿得整整齐齐去坐马车,她竟是跑着穿过图书室,打开自己的写字台,在数不清的抽屉里找她裹在纸片中的一笔钱。

“你看起来真漂亮!~你现在好多了,你的体型看起来像个15岁的小姑娘。”

她转过脸看着我,脸上带着那种老妇人对一个半像儿子半不像儿子的年轻人所抱有的爱,就像夏天的红光徘徊流连在秋天的面孔上一样,我们之间的这种爱也漂浮着一丝性的意味。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对她魅力的渴望中有种温柔得让人觉得奇怪的东西,他往往把她当作母亲看待,而她同时则又使他想起某个姑娘,这个姑娘,如果时光不曾夺去她的青春,他一定会爱上她。这种亲情中有一种让人难以琢磨的东西,而循规蹈矩的男人是不会知道的。

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漂亮的闪现也让我见到了。不久,我们就注意到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了,而我们刚开始还以为这是她不按时服药的缘故。她一个人要在暖房里呆很长时间,阳光直射到她的背部。我们在心里默默祈祷——我是众多祈祷者中最虔诚的——她不要再拿着沉重的花盆走来走去了,不要再拿着水壶从水缸里往外灌水了。为了挽救她,我开始替她浇花。但她是那种一切都要自己做的人,她是那种自己不亲手关上门就不相信门已关好的人。她不停地谈到她的工作。“如果我离开我的工作,”她会说,“哪怕只离开一星期,一切都会乱了套,而我恐怕再没时间弥补其中的损失了。更糟糕的是,没有人

能够代替我做留下的工作。”随着病情恶化,她的这种念头竟发展变化成一种偏执。最后,考虑到我们友谊的力量,我告诉她说她的生命也属于她的丈夫和孩子,她没有权力这样糟蹋自己的生命。我要她保持足够的耐心,这样她或许还能活20年,但如果她像现在这样浪费自己的元气,她就不会活太久的。我说得很苛刻,但她并没生气,因为她知道我是多么爱她。在我看来,她一定是因为知道了自己去日不多,所以才要把她的最后一个夏天都交给她的花。看到她可怜的样子,想到她即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不禁悲从中来。她常常一个人坐着度过漫长的白昼,任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在自己身上。我记得她常常在晚上精疲力尽的走进房子里,躺在她那张小沙发上;她的丈夫眼里流露出一种焦急、安静而又善良的目光,常常用衬衣盖住她的脚,然后静静的坐在她身旁,温柔地、爱恋地握着她的手安慰她,似乎他们不是结婚已30年的夫妻,而还只是恋人。那时我们都求她同意我们把她送到伦敦去治疗,我记得她抬起头对我说:“很好,康德,一切都会像你希望的那样。”我还记得自己在路旁的小树林里痴痴地等,因为我相信在这儿能遇到从火车站走过来的医生。老榆树葱绿怡人,天空湛蓝得可爱。我和医生散着步,看着有羊群正安详地吃着草的美丽平原,夏日的阳光温暖地照在我们身上。我们谈着垂死的她。

“真不可救药了吗?”

“没有什么救药不救药的事……我们无法创造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激活现有的活力,而每次激活都只会削弱我们自己,直至耗尽最后一滴血。吃药只会加速我们的死亡。”

“那么没希望了吗?”

“恐怕没有了。”

“她还能活五年吗?”

“这是极不可能的。”

“你认为她还能活多久?”

“你们问得太多了……要我说大约只一年。”

医生穿过枯叶遍地的小路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看着愚蠢的羊群发呆。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她坐在一张低矮的椅子上,病得确实很厉害,她的声音很微弱,但仍年轻而纯洁。她说:“是你吗,康德? 来这儿让我看看你。”随后我就去了伦敦。在伦敦工作期间,我常常收到朋友的来信,他们在信中告诉我她的病情的发展情况,每一封信都给我一种死亡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感觉。没用多久,有封信告诉我:“妈妈估计活不过今年冬天了。”很快另一封信又告诉我:“妈妈活不过这一月了。”随之就是一封电报:“妈妈快死了,马上回来。”

那是隆冬的一个凄冷的下午,寒风呼呼地刮着。星期日的火车站站停,摇啊摇啊一直走了四个小时才到目的地。小站上人很少。我走出车站,风在凄厉地刮着,像铁一样打着我的脸。我急匆匆地走着,边走边在树叶间寻找闪烁的阳光,因为我相信,只要有阳光,就证明她还没死。谢天谢地,阳光正在树叶间闪烁。在她家门口,我遇见了她家的管家,我问:“她怎样了?”

“确实很糟,先生。”

那天晚上她并没死,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没有,当我们等待着正缓慢而坚定地走来的死神把她从我们身边带走的过程中,我常常想,正在周围徘徊的死神什么时候会降临到我们这些旁观者身上。但不管我们是多么悲哀,我们总还要吃要喝,甚至还必须谈谈我们将要失去的所爱之外的事情。我们一边吃着喝着,一边谈着每隔一小时就从病房里传过来的消息:“妈妈活不了一星期了。”几天后则是:“妈妈恐怕活不到星期天了。”第二周则又说:“妈妈活不过今晚了。”午餐丰盛得惊人,我常常想:“楼上的她要死了,楼下的我们则在吃着水果馅饼。”

一天,我不得不出去送几封信,等我回来时,在马厩里碰到她的儿子。他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亲爱的老朋友,事情都完结了,她去了。”我抓住他的手,泪水夺眶而出。接着她的一个女儿

走下楼,她告诉了我她母亲去世的情形。在她临去世前的几小时,她要人给她拿来一根丝线,因为她睡觉前总要在她美丽的牙齿间绕上一根细线。她可怜的双手颤抖着,瘦骨嶙峋,还没有小孩的手大。她颤颤巍巍地抬起身,接过丝线,照着镜子,但她看到自己眼里透出死亡的光,她精疲力尽地躺下了。随后她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最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要死了,她狂乱地四面看着,但并没看见围在她床边的人。她说:“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就这样死了。没有我他们怎么办啊?”

我帮着写唁电,她的女儿们则在为死去的妈妈编花环。她们去楼上看看她们的妈妈,回来告诉我说,她们的妈妈着起来美极了。在那悲伤的日子里,我有多少次拒绝看她啊!死了!我记忆中的她却还是栩栩如生的,我无法相信自己已永远失去她了。午餐仍很丰盛,人们抽着烟,吃着价格不菲的羊腿,以及冬天难以捕获的猎物,悄悄地谈着死者的美德。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纯净透明,已经露出春天的气息。送葬的队伍沿着光秃秃的海边小路蜿蜒前行。光秃秃而凄凉的海岸边的每一条最窄的小道和它的每一种颜色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丧礼结束了,人群很快散去,死者的亲戚和朋友一回到家就忙着找最富有同情心、最可爱可亲的朋友谈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去了。那些远道而来的人则不时地看着表,眼里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遗憾,把时间花费在他们生活之外的事情上显然并不是他们愿意的事。海边阳光灼人,田野里的玉米幼苗密密麻麻,树枝上开始绽出新蕾,云雀则飞得越来越高,直至消失在苍白的天空中。我走在叽叽喳喳送葬的人群后面,看着悲凉的春野里丛生的杂草,不禁想起我爱了那么久的她。回忆就如圣地,我们可以毫不羞愧地崇拜。我想起了我们的友谊,想起了正是这种友谊使我们回避了自己的自然本能;我记起了我们之间那种超脱于夫妻之爱的爱。我知道自己对她的爱是多么强烈、多么奇特,这种爱,远远超出造物主给予他的创造物的爱。

第十二章 在灌木丛中为情人诵诗

太阳在闪耀,天空是湛蓝湛蓝的,白云缓慢地流动着,在他眼里就像一面面快乐的尖角棋。阳光明亮令他很高兴,因为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预兆,一切都是奇迹。他给她写的诗就装在口袋里,他必须给她读读这首诗,但在哪儿读呢?那儿是一片荒草,他应在灌木丛下给她读诗;而在走进浓密的灌木丛中时,他们不禁又抱怨灌木丛的枝枝蔓蔓了,因为恋人们总认为这个世界就只是为恋人们而存在的,恋爱是严肃的使命,是一切音乐和诗的主题,是雕刻和绘画的题材。艺术的惟一任务就是去激发爱、赞美爱、创造爱。蓝天万里,白云飘飘,绿树成阴的维森尼斯被这些恋人们当成了他们追逐风流韵事的天然胜地。

那位可爱的小妇人坐在温暖的草丛上,尽可能躲在一些灌木丛后面,黑绸裙遮着她的脚,或好像遮住了她的脚。当时流行穿白袜子,她穿的就是白袜子;在她那小巧的黑色鞋子里,白袜子显得多么漂亮、迷人啊!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黑袜子,只有中年人才知道白袜子的魅力。但那个年轻人必须给她读他写的诗,他之所以想让她听他的诗,是因为他喜欢这首诗,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诗能帮助自己获得她的欢心。当她问他晚上是否想到她了时,他不得不回答说,她散发着紫罗兰香味的手绢令他多次辗转难眠,但他并不觉得痛苦,而是觉得甜蜜。他什么时候上床睡觉?当然很晚,因为他连夜给她写了一首诗,想告诉她她的金发是多么美。

解开你的长发吧，小姐，
你那瀑布般长而美丽的金发，
比5月的花还要甜美，
并要落在我的脚旁。
解开你的长发吧，小姐，
你那又长又美的金发。
在你圣洁的额头，
金发卷环绕盘旋，
连皎洁的月光，也没有你那金发美丽。
暗淡适宜，光彩照人。
解开你的长发吧，小姐，
那样长而美丽的金发。
解开你的长发吧，小姐，
那样长而美丽的金发，
它们在你圣女般的额上，
结成一张金色的网。
解开你的长发吧，小姐，
那样长而美丽的金发。

“一定要让我看看你的诗，它真太迷人了。但你说的‘比5月的花还要美丽’是什么意思？还有‘织成一张金色的网’？还有‘解开’——你的意思是让我披散着头发吗？”

“‘解开你的长发吧，小姐，
那样长而美丽的金发’（原文为法语）
这首诗不适合用法语写。”

“我不懂法语，但我喜欢你的英语诗。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喜欢它。”

在这种情况下，诗是很容易被人赞美的。对年轻女人来说，

贺拉斯最美的颂诗也没有她所爱的人写成的平庸之作更令她喜欢。他在记忆中追索草丛和凌乱的灌木丛给他带来的温暖,并试图记起他是否在她读着诗时把手放在了她的脚上。他记得自己是这么做了,而且还记得她突然不读了,并且非常生气。她像只猫那样宣布:他不能那样做,如果她知道他这样举止不轨,她就不会跟他出来的。但她当然并非真生他的气。她会与赞美她的金发的他在一起吗?她是否在意他的诗都是从别人那儿借用来的?她关心的是他认为她的头发是美丽的。年轻人请求她解开头发,让头发随意披散在肩头,说他的诗一定要受到褒赏,他愿接受的惟一奖励就是看着她解开头发。

“但我一般不‘解开’头发。还有别的奖励方式吗?”她微微倾身,盯着他说。他现在能看清她那明亮清澈的双眼了,但却记不得她的双唇是丰满还是单薄了;啊,他记得自己亲吻她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个小伙子吻了一位年轻女人!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人们或许才会怀疑她还会不会再与他一起出来。但维森尼斯的情人们不得不小心行事。因为她刚刚看见一位中年绅士正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坐在不远处的一条长椅上。

“嘘,别出声,我求你了。我敢肯定他看见我们了。”

“他看见了又有什么关系,他只会回忆起他的孩子出生前的那段浪漫日子。而且他看起来似乎很善良。”

后来这对恋人自己去与他搭话了,因为即使对恋人们来说,时间也是要流逝的,他们想吃晚饭了,而那个看起来很善良的男人则给他们指出了去餐厅的路。他甚至坚持要送他们一程,从他口里,他们了解到这家餐厅刚刚开张,但旺季还没真正开始。他向他们保证:他们是能搞到些东西吃的,如煎蛋饼啊,炸肉饼啦什么的总还是有的。

聪明的作者,你现在该注意这家餐馆了;你的目光或许已经盯住了一间特殊的小房间。如果你是个自然主义作家,你会高兴地想到他们的名字已被写在餐馆的记事板上了。他们叫什么

名字？你会给他们选择两个最丑的名字。但是，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想在这个故事里出现一个“特殊的小房间”，然后还要在里面发生什么风流韵事，那你最好马上翻过这一页，因为这个故事中不会出现什么让你敏感的神经震惊的事。当金发的诗人和长着淡黄色头发的美国女人在维森尼斯吃午饭时，他们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窗外是一片湖光山色。中午的阳光穿过高高的幼树。恋人们欣赏着窗外的美景，也欣赏着自己嘴里的甜言蜜语。天鹅在湖上盘旋。聪明的读者或许要喊到：“如果在餐馆里也没发生什么风流韵事，那故事如何收场呢？”故事为什么要结束呢？难道色情的结局要比情人们遇上大雨更刺激、更吸引人吗？当他们离开餐馆时是可能发生这种事的：在4月末5月初这是最可能发生的事。在我的想像中，维森尼斯的情人们正冲向一家别墅的门房去避雨。

“用不了几分钟雨就会停的。”他们说。

但没多久，一个仆人手里拿着三把伞出现了；她给了玛丽一把，我一把，自己留一把。

“但她是谁？你说过你在维森尼斯没熟人。”

“我没有。”

“但你一定认识住在这儿的人；仆人说他的主人认识你。”

“我向你发誓，这儿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们走吧，天很快会晴的。”

“但我们怎么向别人解释呢？说我们是亲戚？”

“没人会相信我们是亲戚，就说我们是夫妻？”

两人穿过台阶往别墅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争执着他是否认识这儿的人。这座房子的主人是谁？似乎是个趣味平庸之人。两人一边在房子里等着房主人，一边仔细地审视着房里的土耳其地毯、富丽堂皇的沙发和椅子。

两位情人的光临令这一家人非常高兴。窗外的雨仍如倾盆瓢泼，他们无法返回巴黎。他们为什么不留下吃晚饭呢？晚饭

后,房主人又把邻居们请来,为他俩举行欢迎晚会。他们唱啊,跳啊,欢声笑语不断,而两位情人呢,则坐在远远的一角窃窃私语,好像忘了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邻人们颇有兴趣地看着他们,故意不告诉他们12点以后这儿就没有火车了,当然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好意。最后,当这对情人决定要离开时,他们才告诉这对忘了时间的情人说,最后一班火车一小时前就开走了,当晚他们不可能回巴黎了。这样的情节最好发生在舞台上——在法国舞台上。对已狂热地爱上了这位年轻男子的年轻女人来说,当她发现自己站在这个舞台上时,她一定是既美丽又悲伤的。她很后悔自己让他把自己当作妻子了,她想这是失礼的。但作者想让读者相信,在那样的情况下,她那样做是合乎妇道的。我并不想说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让我说这个美丽的美国女人正在热恋是再愚蠢不过的事。我的想像所创造的情境是再巧妙不过的,只可惜它并没有发生。我相信,这对恋人离开维森尼斯时,只是心里有点不安而已,而读者想知道的可能是他们是否约好了下次再见面的日期;如果约好了,那一定就是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因为她动身离去的时间已经定了。她不是说过本周末就要回美国了吗?“几天后大西洋就要把我们天隔一方了。”他叹息着。这件事让他们很觉得悲哀,因为大西洋可不是件小东西,而是不容忽视的东西,特别是在爱情方面更是如此。如果诗人接受了房主人的邀请,与他们共进晚餐,情况或许会好点;朋友们会来给他们举行舞会,雨或许又开始下了——总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错过了火车,然后他们被邀请留下来过夜。女情人不会说法语,男的会说;也可能是他和房主人商量好这样做的,而可爱的小女人却可能永远不知道正等待自己的命运——噢,幸福的命运!——直到他们该进自己的房间时她才明白过来。但他这个笨伯却错失了火车给他创造的这个机会,只是信誓旦旦约好下一年再回来相见,再一起跳波士顿舞。在这期间,他手臂上一定要一直搭着她的吊袜带。把她的吊袜

带给他这个主意是他想出来的,还是她?是在他们离开维森尼斯的车厢里给的,还是他们下次在巴黎见面时给的,回答这些问题对我们的故事毫无帮助,我们只需知道,她把吊袜带缠在他手上时说,袜带至少要在他的手臂上缠一年,这就够了。这样,当她拿过他的手臂发现吊袜带还在他手上时,她就能知道这一年内他是忠于她的。她还给了他一条小手帕,要他一定保存在抽屉里了。经过这漫长的一年别离,它或许还会留有自己的芳香。我相信她一定让他给自己写信了,但粗心的他却给她写了诗。于是这次风流韵事最后的结局就成了:她写了一封愤怒的信表示与他永远告别,她在信中说他不配接受她的爱,因为他错过了驿站。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20年前,现在什么都没留下来。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变化——我们所谓的死也不过是一种变化——生与死总是交叉重叠,相互融合的,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变化之流,只不过有时变化是愉快的,有时是不愉快的;而不管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都没有任何目的。漫长的20年之前,我没有希望,一点希望也没有。

我情绪沮丧到极点,一种伤心之痛让我跳了起来,我环视四周,不由喊道:“这房子太黑了!为什么没有光?拿灯来!”

第十三章 为得克萨斯分娩文学

“拿灯来，安尼丝，”我喊道，“快点拿灯来。”等她一离开房间我就自言自语说：“好了！她又该在食品室里流连忘返了，又要把我自己留在这种灰蒙蒙的黄昏中，像幽灵一样弥漫在整个房子里的黄昏中。”我不敢往四周看，只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黄昏再一次让我想到，我不应因为那些旧式灯很美就一直保存着它们，这种灯很难点，而会点这种灯的男人又已经死了，自那以后它们再没有被完全修复过，而根据安尼丝的智商，她似乎掌握不了点这种灯的复杂过程，她似乎从没有完全理解该怎样点这种灯，她总要先旋下灯罩，等灯油流出来时才想到用火柴点灯芯。

像安尼丝这样心志不全的女人真是不幸，但谁都难免有错误，这一点是我们必须牢记的。我轻松地看着这个黄发、肥臀、窄肩的粗壮女人拉起窗帘。躺在已有灯有火的房间里，我在圈手椅上试图拾起我的记忆之丝，我想起了在维森尼斯的一次爱情冒险，我是在仍流行穿白袜子的 70 年代末与一位美丽的女人一起到那儿的。许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一条吊袜带和一条花边手绢，还有她写给我的三封信。但在那些日子里，我的信函混乱无绪，结果现在她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她或许已经改过的名字。奇怪的是，事隔多年，我仍记着她的地址：巴尔的摩，教堂街 17 号，但如果这条街也已被铲平了的话，那她就什么也没给我留下了。巴尔的摩是个大城市，但在我的记忆里却很难留

下什么具体的印象,况且我从来没到过那里。如果我去过巴尔的摩,或许我就会娶她,而如果我娶了她,我的生活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我可能会进入商界。巴尔的摩使人难忘的是什么?玛丽·布鲁格瑞怎么样了?在晚饭开始前,当客厅里点上了灯,窗帘也拉上了时,老年绅士们总喜欢问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正当我思考着自己在爱和文学之间如何选择时,我的眼睛看到了墙上挂的画,靠墙放着的柜子、华贵的桌子和椅子,桌上放着的玫瑰花。这些家具虽然摆放得并不完全合适,但一旦把它们移动位置又只会打断我的梦想:“椅子是必要的,”我说,“虽然它们会影响我充分享受美丽的地毯带来的温馨。”

说完这些陈词滥调,我又想到她或许就躺在某块雕像后面呢。我的眼睛懒洋洋的盯着某个柜子中排放得整整齐齐的东西,“其中的抽屉里,”我说,“存放着许许多多信,但却没有一封是从住在教堂街的她那儿来的。”她写信很少,她的信都在那儿——只除了第一封信。这些信都长达四页六页八页,在这些信中她把一切都告诉给了我,把一切面纱都撩开了。我记得她信中写到:“你不必道歉,你人到中年恰是你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我确实不喜欢年轻男人,你能写书是你最优秀的品质,因为你写的都是美丽的书。我们以后要多谈谈《伊芙琳·伊尼丝》。明天我们在展览馆相会,后天我们则要愉快地驾车兜风,最后一天你就会来看我了……你会很喜欢我,这是当然的事,因为你不会不喜欢你自己的女人。但我个子很高,如果你个子矮,这会让你生气的。”

“她谈到自己机警的小眼睛、金发和小雀斑时用的词多么引人遐想啊!”我说,“她写信就像一个人在低语。如果我懂德语,我应能辨别出她那独特的、温柔的德国南部口音。更让我浮想联翩的是,她在信中告诉我,我在见到她之前,必须在来客登记簿上登记;她还让我一有空就给她写信。‘我们可以谈谈《伊芙琳·伊尼丝》’,她在信中说。‘你一有空就要给我写张小便条,告

诉我你的房间号,以及你希望我几点到你那儿,随后我立刻就来找你。这是多妙的事啊!我会在你房里呆一个半小时,可能我们见到面时会略略有点失望,但即使这样我们仍会非常开心,因为一个女人去见她以前从未见过的绅士这件事本身就是件有趣的事。你以前听说过这种有趣的事吗?”

一大块煤燃成了灰烬,我一边往火里扔煤,一边想:邮差从没给我送过比这更令人快活的邀请信了。唉,我竟然没回信。从那以后,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没去找她。是不是因为她在信中过于赤裸裸地袒露了自己肉体 and 灵魂方面的渴求?如果是这样,我就不会匆匆去冒这个险了。现在再去找她已太晚了;我最好还是请她带上一顶旧帽子,而不是来爱我。我怕遇见的她是位老处女,她会伸出慈爱的双手说:“我理解你,你也理解我;我们到柳树下去哭泣吧。”但她不是老处女。她是在读过《伊维琳·伊尼丝》之后受到感动才写信给我的。她的故事是由一封封长信连缀而成的,现在她的故事被打成包塞在书桌的一个抽屉里了。在这个充满火光和回忆的时刻,她的故事似乎属于悲伤的那种。每个男人的记忆中都有关于已死女人的回忆。爱茉莉来欧洲时尚是个少女。她在信中说她来自澳大利亚,是到莱比锡学唱歌的。她第一次在旅馆吃饭时,恰好坐在她未来丈夫的对面,你说这不是‘命’吗?她认为自己从没看见过像他那样让她不喜欢的男人,她发誓,如果她事先知道这个男人会坐在她对面,她宁愿呆在自己房里吃饭。但我们谁也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她尽管满腹不乐意,但还是被坐在她对面的男人带到了法兰克福,并一直就生活在了那里。她在那儿像一棵树一样被周围的环境塑造着,她从未在那儿使用过英语,只有在给我写信时才用。她的英语依然清新纯净。她告诉我,有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多年来一直爱着她,每年夏天她都要在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小城与他幽会。当时她是罗马天主教徒,对自己的行为她心里一直怀有一种罪孽感。一天,在赴情人的约会途中,她的良心把她

折磨得痛苦万分,于是在一家教堂门前,她停住了脚步。这时她正好看见了一位牧师,于是就跟着他进了忏悔室,坦白了自己肉体的渴望。“我现在去见我的情人,”她说,“目的就是想告诉他我不想再见他了。”“我的女儿,”牧师回答,“你最好别去见你的情人了。”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必须穿过一片树林。走在树林里,她总觉得树林里一定会出现某种暗示、某种奇迹让她有力量抵制诱惑。但树林静悄悄的,树叶一动也不动。坐在火车上,她思前想后,火车每次停下,她都决心乘下一列车返回去,最后她再也受不了这种心灵的折磨了,就在一个路边小站跳下了车。但她的情人恰好也正在那个车站,他是因为在他们预约的地方等得不耐烦了才到中途来见她的,就是从这一刻起,她才相信了任何神灵都无法阻挡她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我脑中浮现出她信中的几句话:“我再想不出比我们更完美的结合了,它满足了我们灵魂的每一种渴望,满足了我们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需要;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未吵过架,甚至一点点误解都没有;我们的日子似乎是越来越好了,总有一天我会相信爱是永恒的。(尽管我心里对此持怀疑态度)”

但有一天,她的情人向她坦白说,他的良心觉醒了,他必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是个毫无宗教信仰的男人,”她说,“但现在他好像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过着一种不道德的生活,于是他要重新做人了。”——等她给了他自由,他立刻就娶了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女教师。她就是在这段恋情结束之后,读到了我的《伊维琳·伊尼丝》,随后她就写信邀请我去法兰克福,但因为无法成行,她就去了一度曾给她带来幸福的巴伐利亚小城。“由于摆脱了家庭的烦忧与忧虑,她开始沉思回忆自己的生活,”我说,“就像我现在坐在椅子上思索一样。”“每一年她都要想方设法回到那座小城,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没力量回到那儿了,于是她就坐在自己的火炉边追忆它的街道和田野。”

我只是不想见她。我在慕尼黑欢娱时仅仅是出于礼貌才写信请她来见我,或让我去见她,但她托故不见我。“你问是什么原因吗?”她在信中说,“好吧,坦白地说,我得了严重的肝病,每天怀里都要揣着个热水袋,这让我寸步难行。我敢肯定,你不愿意见到这样的女人,我也相信自己也不会因为我们没能相见而感到失望的;你是个男人,你需要的是女人身上的其他品行。你不能,即使你愿意,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所牵扯到的肉体方面,除非你回避女人。别见她了,你只在相像中描绘她的形状吧。”真是个好诚挚的女人。我收到她的信已是几个月后的事了,或许自那以后我再也收不到她的信了;如果她的恋人没娶个意大利女教师的话,我们或许还会一起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猜测,当然这只是猜测!但我在慕尼黑时,她拒绝见我显然是对的。然而,没见到她毕竟是个遗憾,我很后悔没有突然造访她的住所,没有向来客登记簿上写上一个假名字。与她在餐厅相遇一定是件很有趣的事,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散步,一起坐在她曾和她的情人相依偎过的树下,并设法让她告诉我有关他的一切。火光中我面前似乎又拉开了一场喜剧的帷幕,很快,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另一张脸:一个美国女诗人的脸。她鼻子高直,双眼明亮。她怕我觉得生活无望,所以在与我通了很长时间的信以后,她突然给我寄来了她的女朋友给她拍的一叠照片。照片是她在溪水里洗澡时拍的。她在信中邀请我两年后去巴黎看她,她会热诚欢迎我。看,这又是一次欣赏崇拜我作品的女人胴体的机会,于是我去了巴黎,并和她见了面——这也是我们惟一一次会面,她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我不再是你的裸体女人了。”——那是巴黎的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收到过她的信或诗。什么也没有。

我一阵冲动,从椅子上跳起来。我在一堆堆书箱里翻找她的信,但那天晚上要读的东西太多了。找着找着,我看见了一封字迹很奇怪的信。我说:“这会是誰写来的信呢?”但字迹我并不

完全陌生啊,我以前一定看过了。我总共收到她三四封信,就这么多。我又坐回椅子上,决心忍住不把信从信封里拿出来。我长时间坐在椅子上,两眼盯着火光,思索那封信是谁写的。最后我终于想起来了,我喊到:“就是她!”我的思绪飘回到10年前。一天,我的女仆安尼丝手里拿着一封信走进来,说信是刚从希尔伯恩旅馆送来的,写信人说她是从得克萨斯来的。“一个足够浪漫的开头,”我喃喃自语,“‘我来欧洲的目的就是想认识你。’这确实比一般的信来得突然。”我说。但这也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别的人总要先提出约会什么的,但这个女人却直接来找我。她就住在离我儿码远的地方,几乎近在咫尺,就在公园的另一面——就在无聊透顶的希尔伯恩旅馆里。但她是从得克萨斯来的啊。我内心非常渴望见到这个写信写得如此直接简明的女人,她什么弯子也没绕,开门见山就告诉我她来自得克萨斯,她此次来欧洲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见我。我自己一向引以为骄傲的是我从来没接受过别人信中提出的约会,但得克萨斯远在几千里之外,一个女人千里迢迢来见我;并且是因为我的小说魅力而来,若我拒绝见她,似乎显得太卑琐、懦弱了。“若是这样的话,我在自己眼里也将永远是一个无趣、懦弱的人,如果我……”一种渴望见到她的欲望攫住了我,我打铃叫来客厅女仆,非常严肃地对她交代这件事,惟恐她理解了我让她办这件事的目的。

“安尼丝,你知道,许多人来这儿看我都是因为文学方面的事,而送来这封信的女士来这儿可能是想与我谈谈文学方面的事。现在我的时间很宝贵,不能白白浪费在回答愚蠢问题上,也可能她此次是来谈关于我的著作的连载问题或版权问题的。我想让你去趟希尔伯恩,如果你看她是位聪明可爱的女人,一个不会让我厌烦的女人,那就交给她这封信。我知道你是判断人性格的行家,她的外貌能让你判断出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你回来后要给我详细描述一下她的外表,你是比我还优秀的裁判员。她不会骗住你的。”

“如果她是个老女人呢，先生？”

“那么就告诉她我不住在这个城市，并代我致歉。当然，这确实很遗憾，安尼丝，因为她是从几千里之外的得克萨斯来的。”

“先生，我听人说，得克萨斯来的女人都很有钱。”

她的话让我吃一惊，因为她说话时的口气非常快活。我看着她上了路，发现她显然非常高兴自己参与了这种浪漫冒险。她到了希尔伯恩旅馆后，旅馆的人告诉她那位女士正在房里，她站起来说要亲自把信送到楼上。她乘电梯到了楼上，那位女士说：“请进。”我记得她在给我讲这些事时非常开心，我也记得自己在安尼丝向我描述那个女人的浑圆的肩膀以及肩膀上垂落披散着金色的长发时也非常开心。“她没穿外衣，先生，我看她顶多25岁。她只看了一眼信就说好吧。”在我吃晚餐时，安尼丝在我椅子后继续喋喋不休地谈着明天的来访者，晚饭后她生火时又让一片木柴划过我的腿。我自己坐在窗边等她可以说是一幅朦胧的图画，而我自己跑去给她开门却是清晰明白的一幅图画，就像照镜子一样清清楚楚。她进来说的第一句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响起。我请她到楼上来。我跟在她身后，边走边谈莫奈的风景画，想以此打发掉前五分钟的尴尬。但她显然太专注于自己此行的目的，根本无心听我谈什么画。她坐在椅子上，显得既紧张又不安，两眼不停地看着房里的玫瑰花和紫红色的地毯和家具。我试着谈谈瓷器，但她说对瓷器一窍不通；我又谈隔壁的拨弦古钢琴，但也没超过三分钟；我记得自己随后在心里说：“那就试试谈文学吧。”于是我让他看我书架上的原版《人间喜剧》，并拿下一本让她看。

“对我来说，你的书与其他作家的书没什么区别。”她说。

为了让她放松，我问她喜欢我的哪一部作品，我以为她会说《伊维琳·伊尼丝》，但她却说，让她对我产生兴趣的是《特丽萨妹妹》。我对我的来访者越发感兴趣了，我催着她给我谈谈她的事。她告诉我她18岁时曾想做个修女，并且已经通过了见习期

和接受了白面纱,但随后她就发现自己对宗教并不负有什么使命。我很难让她开口谈修道院的生活,我也怕自己一再催问这个问题会让她不高兴。但她的谈话仍让我充满希望,因为据说所有最伟大的浪漫故事都是从一个男人和女人谈早年生活开始的。“我发誓放弃生活;我发誓放弃它,献身于天堂。”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愤怒的味道,这表明她自离开修道院后更加憎恨那种生活了。为了平息她的愤怒,我赶紧说:“你见习过、发过誓,然后又说‘这不是我要过的生活’,于是穿过修道院的门槛来到广阔的世界,来到田野里听小鸟的歌唱。若你没有体验过修道院的生活,你又怎能更加觉得外面世界的美好呢?可见修道院生活对你并非全是坏处。”我的话似乎对她没起一点作用,她仍只是喃喃地说她不愿意再想到自己竟把两年大好年华浪费在一群修女中间了。

“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我说,“我记得你说过最喜欢我的《特丽萨妹妹》。”

我本想通过她证实我的推测,但她不想谈修道院了,我只能理解为她内心非常痛恨修道院。于是我的想像立刻开始编织一幅她与一个牧师私通的画面,但我不愿承认这种简单的假设有可能发生,所以我就又希望是一种朦胧的性意识使她无法忍受修道院的生活。我提醒她说:据说上帝只能接纳男人不想爱的女人。她对我的这句格言也未置可否;于是我所能做的显然就只能是尽量说些带引诱性的甜言蜜语,并向她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只为了了一件事——享受人生。我们的第一本能是性,因此,女人的使命就是去爱男人并为之牺牲自己,就像男人的使命是为女人牺牲自己一样。我的努力得到了鼓励性的反应;她似乎对这种话题很感兴趣,因为她明显活跃起来。她的脸变得越来越生动。她听了一会,脸上忽然又愁云密布,她羞怯的向我坦白说,离开修道院后曾有不少男人吸引过她。她甚至暗示说有一次风流韵事——当然这都是符合常情常理的事,幸亏

她及时发现了他不值得她爱。

“但我不能谈这个。为什么你……”

我感到必须换个话题了。我脑中浮现出得克萨斯的大草原,以及草原上驱赶着野牛的数不清的牛仔。我请她谈谈是否用套索套过一头小母牛的后腿,但她对得克萨斯的全部了解就只有一个奥斯汀——我感到很失望,因为在我的想像中,得克萨斯大草原上有许多小棚屋,牛仔们就是从这些小屋里走出来跳上马或扣动左轮手枪的扳机的。但经我的来访者指点,我才了解到奥斯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她和她的姐妹们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之后,又做日用品生意积聚了一份财产。我们的谈话突然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我知道了眼前这位女人叫奥娜,她的两个姐姐都没有特别的聪明,她们一个是不错的女商人,但却不会买东西;另一个则是伟大的讨厌鬼,她离开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个妹妹。离开她们后,她决定用自己挣的钱去游览欧洲。我用了很长时间才使她不再沉默不语,我们又用了很长时间谈论把生命浪费在积聚钱财方面的愚蠢,直到我们快要结束谈话时我才了解到奥娜还没结婚。至于她为什么一直独身,她的解释似乎也并没脱俗套。我真要对道德家表示敬畏了。她说:“一个女人一旦决定嫁人,她就必须想到她要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我想她说的不过是孩子将来的职业问题,但这种话估计不会让她高兴的。我接着听她又说道:女人若是图一时欢娱而投入男人的怀抱,那她生出来的孩子心智都不会健全,这是应受指责的。她承认自己需要的是智慧型的伴侣,她无法爱上一个蠢汉。在得克萨斯这种蛮荒之地,一个女人想在婚姻之外生孩子是得不到别人的理解的,她在得克萨斯也没发现一个配做她孩子父亲的男人。她的孩子应是优秀的,应成为一个天才的男人,一个画家、诗人或音乐家。

“一个音乐家!”我不禁喊起来。于是我们谈到《钻戒》,但尽管我对之推崇备至,她显然更倾心于文学而不是音乐。

“你遇到过这样一个男作家吗？即能……”

我这句话可能永远都没说完，即使说完了，我也忘了最后半句是怎么说的了，我只记得我们的谈话突然变得紧张、困难起来。我们开始没话找话。我胆战心惊地问她心目中是否已有了那个可作她孩子父亲的男人的雏形。她抬起眼看着我，然后用一种从内心深处浮出来的声音，一种像微风吹起的涟漪一样的声音，幽幽地对我说：“我只是想把文学移植到得克萨斯，以前我从没有明确地想到什么人，但当我读到你的书时……”

“你想到了我？”

她把我当作她未来孩子的未来父亲真令我受宠若惊，她竟把得克萨斯出现文学的重任交给了我与她生的孩子身上。我的好奇心从没这样强烈过，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强烈。我问她是怎么想到要让得克萨斯拥有与其地位相称的文学的，而且，如果她对我的理解只纯粹限于文学方面，并且仅是从读我的书中得到的，那她怎么又想到我了呢？

“例如，你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年龄已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了……”

她的回答很简单，她说在动身来欧洲之前已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又进一步问她说：

“但你一定在心里问过自己，我的长相是否会让你过于讨厌？那种你不可抑制的讨厌，虽然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我一登上汽艇就不停地想这个问题。”

我必须提出另一问题，一个最微妙的问题。我问：

“我是否可以弄清楚我的长相有没有让你讨厌？”

“对，我认为你不讨厌。”

说完这些话，房间里似乎一下子充满了危险。我们静静地坐着，我自己则拼命地想找点话说但却无话可说，一切都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若我感谢她对我的好感，那只会使我自己显得更

加无聊。我必须勇敢地走过去吻她或请求尽快地再与她约会。在通常情况下,这都是一种大胆的权宜之计,一种庸俗的权宜之计。“从现在的情况看,她不会拒绝我的。”我心里说着,充满希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但她同时也站起来了。她抬起那张好像充满青春的脸(我说“好像”是因为她正背对着灯光),伸出一只真诚而大胆的手。

“现在我必须走了。我怕已占用了你太多宝贵的时间,真诚地感谢你接待了我。”

“但我希望还能荣幸地接待你,今晚我有约会,但你明天晚上能来,我将很乐于与你共进晚餐。”

她优雅而高傲地走出我的房间,留下我自己在那里思量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好事还是坏事。“她是美国人,这错不了,”我自问自答,“但她为什么倾心于我而不是倾心于梅瑞狄斯、斯温伯恩、叶芝、亨利·詹姆斯或戈斯呢?戈斯是英国文学艺术的灵魂,他对文学艺术的爱纯洁而公正,他不会拒绝……一定是我作品中的某种东西吸引住了她,而这种东西并不是我作品的风格,也不是我选择的主题,而是某种我并不追求但弥漫于我全部作品中的两性之间的亲昵关系,当然我自己并非没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这就是她选中我而不是戈斯的原因。无疑这是一种奇怪而有创意的情节,聪明的作者会把这种情节放到15世纪的背景中,或15世纪前后的背景中,或许还要再往前推几百年——因为这种故事与20世纪的的天才们是不和谐的。如果那位女士送给我一本签着她芳名的我写的书,那也是很正常的;如果她带来一部小说手稿让我帮她修改情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她甚至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只带着脑子里的一个剧本或小说构思,请我与她合作,这也是可行的。但她来这儿却是与我合作……”她那样的想法已远远超越了世俗的传统,超越了只追求金钱或性的满足的粗俗男女的浅薄欲望。我们无法知道驱使贝蒂娜走向歌德的动机。文学作品中最接近我目前境况的情节可在《忏悔

录》中找到，即华伦夫人领着让·雅克到花园里，并告诉他，他已成为一个男人了那一段。她没有引诱他，而只是得体地告诉他不必急于做出决定。她给他八天时间考虑这件事，他描写这一情节的几句话堪称最真实最独特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中这种奇妙的情节与我现在的情形并不相似。华伦夫人是寡妇，而奥娜可能还是个处女。如果不考虑她此番来欧洲的不同寻常的使命，那就没有什么让我相信她不是处女。我已邀请她明天与我共进晚餐。在这种情况下，晚餐意味着……

“上帝！”我喊到，“为什么我不让自己大胆去追求呢？去追求这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或听说过的女人，一个我还没完全看清她的长相的女人。她留给我的明确印象是鲜活而迷人的，但那天上午天太暗，街上又有雾，而她又戴着一顶大帽子，并一直背对着光线坐着，当然，是我让她坐那把椅子的。但为什么在我向她走去时她要起身告辞呢？她一定是猜到了我要去吻她。但如果她真想把文学移入自己国家的话，她一定知道吻是文学的序曲。”

上百种想法纷纷出现在我脑子里但最后又都化为无——我突然觉得自己需要见见她，一种像流行感冒一样的感觉攫住了我。我构思了数不清的信，并写好了一封，但并没有送去。这真是一种精神折磨，我完全被自己的本能欲望控制住了。与这次艳遇相比，我以前所有的风流韵事都好像俗不可耐，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学情缘，与之相比，缪塞与乔治·桑的爱也显得浅薄、没有韵味。风流韵事总是花开两枝，而这次却是花开三枝，如果把得克萨斯也考虑在内，则是花开四枝了。就这样，我胡思乱想消磨着约会前这段难耐的时间。随着约会时间的迫近，我的希望带给我的折磨也越来越剧烈了；我上百次地问自己是否把约会时间给她说明白了。当她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正准备送信到希尔伯恩去问一问。她的美超出了我的期望——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因为看到她时我没想起一句戈蒂埃常用的比喻，所

以我这里没法引用他的话,而只能尽可能地回忆她雪白的前额在我心里的感觉。她的前额又高又圆,上面覆盖着浅黄色的发卷;她的脸颊则像雪地上一枝最娇弱的玫瑰。她的眼睛是淡蓝色的,而我则觉得以前好像从来没见过这种淡蓝色眼睛。在吃晚饭的过程中,我一边盯着她雪白的手臂和杏仁一样的指甲,一边尽量不让谈话中断,这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安尼丝几乎没离开过房间,我只能这样勉为其难。我的来访者似乎是在阿尔卑斯山顶上说话,她美妙的脸上不时浮现出一种愉快的笑容。她的话虽然简单,却并不愚蠢和微不足道。“放松点。”我对自己说,并开始有点怀疑自己耳朵的功能了。看到她那么沉静、有条不紊地吃着、谈着,似乎让人难以相信她就是昨天那个请我通过她赋予得克萨斯文学的女人。看来要让她自己主动打破僵局已是不可能,而遗憾的是,我感到自己也难以胜任这一任务。我跟着她上了楼,看来我已难以相信她会屈从于人间之爱了,她似乎超凡脱俗了一般。或许她对人间之爱一无所知,而是相信用什么铁片、木片的就可使孩子生出来。在安尼丝端来咖啡前五分钟,我在客厅里如同在地狱里一样痛苦。当她把咖啡端上来时,又用了长得让人难以忍受的时间挨个端给我们。终于,她关上门走了。我口干舌燥,似乎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我想走过客厅时,地板似乎在我脚下滑动起来。于是我只好不停地换椅子坐,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张美丽的雪白的前额。如果我俯身亲吻她的肩膀,她一定不会觉得震惊——但绝对会冒犯她。她显然也希望我以这种方式打破僵局,然而,我并没去亲吻她洁白无瑕的前额,而是站在她身边谈起与她相像的一幅肖像画来。

“那是一幅尤其诺的肖像画。”

她抬起纯洁得像天使一样的眼睛看着我,我的话也就憋在喉咙里没出来。但幸运的是我的手碰巧落在她膝盖上。她立刻移开膝盖,我立刻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流氓。看到她神色一变,我不禁就要为我的手向她道歉了。

“请原谅，”她说，“请原谅我把膝盖移开了，你看我又把它放回原处了。我不想让你把我看成小傻瓜。”

好了，可怕的时刻已经结束了，她似乎突然浑身充满奇妙的温柔，使她活跃起来的不是我们所说的爱，而是某种深沉的结合的感觉和命运感、责任感在起作用——这种感觉更容易出现在印度女人身上而不是北美女人身上。第二天晚上，当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她走去时，她几乎是冲过来迎合我，几分钟后她就跪在了我那宽大柔滑的圈手椅中了。她把脸贴着我的背，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姿势，因为这正好可以让我看到她束成髻、上面插着把大玳瑁梳子的淡黄色头发。她的头发那么光洁明亮，当我弯下身时似乎从中看到了我自己。我把她的脸捧在我脸前，畅饮着她舌尖上的琼浆。

马奈的白是最罕见的白，只有他能画出令牡丹也为之羞愧的粉红色的胸花，但马奈的白是世间的美，而奥娜的白则总好像是圣洁和永恒的美。尤其诺《维纳斯》的白是海里泡沫那种白，但她的白是空灵的、虚无缥缈的白，比弗朗西斯卡圣洁的白还白。当我们穿过闷热的九月之夜往她住的旅馆走去时，奥娜越来越使我把她与那个天才画家的杰作联系起来。

“你还让我再来见你吗？”她在公园门口停住说。

“但你为什么还要问呢？你问就说明你还有疑虑，要么就是我接待得不好？”

“我不想假装与你共度良宵令我不快，如果我有点心不在焉的话，也请你原谅。”

“但奥娜，你也知道文学在销魂的狂欢中仅是一个借口而已。”

“除此之外，我还必须不打扰你工作。”

她的严肃令我困惑。许多年后，当我再回头看看这段人生插曲时，我记得在她呆在都柏林的六周内我只见过她七八次——顶多有十次。有一次甚至一个星期我都没见到她，为此

我还惊慌不已,赶忙写了封信送到希尔伯恩问她,她回信说她很乐意与我共进晚餐。有一次,也只有那一次,我劝她与我一起散散步。我们就沿着都德河岸漫步游览,边走边谈着我们见到的250年前的旧农舍。那晚她在我房里呆到很晚,比平常都晚,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才感觉到不管我抱她抱得多紧,都必然要与她分手,某种比大西洋还宽阔的东西把我们分开了。在我们的交往中,只有一次,在她与我道别时似乎才算回复了一点人情。

“离开你我很抱歉,也很遗憾,因为你一直都那么好,一直是我读你的书时希望见到的那个男人。”

“但你不是真的要离开我,对吗?”看到她冷静的目光,我一阵惊慌,赶忙又说:“我真的再也无法亲吻到你这雪白的手了吗?”

“现在你也没理由亲吻我,”她抽回手回答说,“为什么非要让这次分手变得那么艰难呢?为什么要强迫我说会伤害我的话呢?我们相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

“我有很多理由要坚持把你留在我身边。”

“你不会让我因一时情感冲动而牺牲我此行的使命吧?”

“一时情感冲动?!”

“你自己也不敢肯定你明天的想法能否与今天一样,即使一样,你也迟早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是肯定的。如果你不懂得如何牺牲某些感情冲动以追寻命运为你安排好的道路,那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儿了。你是否想让我相信如果我不曾来这儿也一样?但我知道你现在只是在想:看到她真是遗憾,因为我毁坏了你的生活。你明天就可以重新开始写作了。你爱我远远不如爱写作,如果我扔下皮衣说‘我不走了’,你心里一定很失望。你会因此看不起我。对,对,在你眼里我就只是一个没有使命、没有职业、也没有日的传统女人了。”

我至今仍清清楚楚地记得她说的每一句话,她那悦耳的音乐般的声音,在房子里生起火点上灯时,仍栩栩如生地在我耳边

回响。

“你种下的种子将来一定不能让他知道自己的来历，”她说，“我们两人都必须为我们的孩子做出某些牺牲。我要牺牲的是我在得克萨斯的尊严，而你则必须忘掉你的儿子，你的名字与文学和艺术联系得太紧密了，发誓。”

“我发誓。”我们用我们的最后一晚在伊利广场的火堆旁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因为我们必须起一个与奥娜的姓相配的名字。最后，我终于想起了一个——一个可能让人想到绘画而不是诗的名字。

“但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个男孩？”

她总是那么自信，她什么也没说，笑笑走了。我手里现在只有一封她告诉我儿子已出生的信，如果没有这封信，她的来访或许只是昨天晚上的一场梦。

现在我要在这张舒适的圈手椅里打一小时的盹，在梦里去到得克萨斯寻找我的奥娜和她的儿子。

第十四章 想有个小小的偶遇

只有单身汉才会问：“今晚到哪儿吃饭去？是花两先令到排骨餐馆，或花五个先令到俱乐部，还是花十先令到皇家咖啡馆呢？”而结过婚的人从来没有这种徘徊不定的情绪。多花两三个先令，你就可以坐在萨瓦的阳台上欣赏河边夜景，看桥上码头的灯光和波涛中起伏的货船。结过婚的男人总能知道和谁共眠，而单身汉，或老处女却并不能这么自信；这是一个我们不需进一步探究的次要问题，因为只需提到这个问题就足以在读者面前表露出单身汉与结过婚的男人之间生活的极大不同。唉，结过婚的男人啊，从早饭时间到晚上6点都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而在此时，说心里话，我们则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当然也有一种孤独感。生活当然从本质上说是孤独的，结婚的和没结婚的人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是在独自一人时感到孤独，而他们则是在人多拥挤时孤独。

晚上6点半，工作了一天的单身汉不得不收拾一下房间和自己了。如果他是画家，这时他就只好把画放到一边；如果他是作家，他就只好把他的文章放到一旁。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与谁一起吃晚饭？他的思绪滑过贝尔格莱维亚区和梅费儿区，又迅速在普特曼广场匆匆掠过，往北飞到摄政王广场，想在那些华贵的房子里寻找一个会邀请他共进晚餐的人。在某人那儿总可以吃到一块牛肉和冷鸡肉馅饼，而在某某人那里开始总是喝汤。但吃什么并不重要，他寻找的是一个有趣的

伙伴。

我是在上一星期才第一次认识到结婚的人和没结婚的人的生活是多么不同。那天是星期天,我写了一天。6点左右,周围开始安静下来,这时我才想起当晚的晚饭还没着落。我在4点半左右通常要喝一杯咖啡,这杯咖啡可以让我再工作一小时,但6点一过,我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我的脑子开始发晕。现在不仅是“到哪儿吃饭”的问题,而是如何打发晚饭前这一小时的问题。第一件事当然是穿衣打扮了,在穿衣服的过程中我才想到自己已很长时间没去圣·詹姆斯广场了,而从我童年时代起,这个广场就一直深深地令我迷恋,而在我们年轻时代吸引过我们的东西可以说会永远吸引我们。圣·詹姆斯广场最美的时候或许是在日落时分——那座湖还在,我还记得在湖而上看过的几次晚景。上星期天,就是受了这种回忆的牵引,我从维多利亚街出来,进了它的东门。大自然的美深深地迷醉了我,我在想像中又看到了苍穹下雄伟的大树,以及湖里的小生命——来来回回忙碌着的鸭子,每一只鸭子似乎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专注于自己的欲望。我很幸运,因为上星期天公园里的灯光效果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美。公园里高大的法国梧桐树的树枝遮挡着草坪,厚厚的落叶在苍白的阳光下几乎一动也不动。我注视着眼前的树,一点也不讨厌它们情绪的喜怒无常——在漫长的雨季它们显得严肃、安静,绿得奇怪,而微风吹过则又发热似的激动——像温暖的天气里的漂亮女孩。她们即使在衰落的时候也仍然漂亮,比花儿满枝头时还漂亮,我永远不会忘记上星期天她们的可爱模样;出墙的长树枝和大羽毛一样高贵的梧桐树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四周的声音渐渐安静下来,光线也慢慢暗下来,枯萎的落叶像记忆一样在低语,我似乎听到了18世纪的声音。

随着黄昏降临,我的幻觉变得更加迷乱和病态。我眼前的一切使我想起一幅风景画,但我却记不起来是在那儿看到的那幅画,是在杜威治展览馆呢,还是在卢浮宫? 画中是一群坐在水

边的骑士和妇人,淡蓝色的薄暮正穿过高大的树笼罩在他们身上。我眼前的画面就像那幅画,只是树和草坪的位置和大小稍有不同。一枝疮痍的大树刚被砍去一条大树枝,阴郁苍劲地立在19世纪的大自然中,使我立刻想起了柯罗画中的幽灵。在这株树的后面就是温柔的轻盈的天空,像花心一样纯净透明。当落日的余晖照到水面上时,我的灵魂说这是一幅画:《湖》!在这幅画上,山阴郁的阴影覆盖着湖的两边,画的中央则充满一缕光线,一缕越接近地平线的边缘越细的光线。但这座伦敦湖两边的树行比那幅题为《在水边》的画中超越世俗的树要密些,也没画上的树美。随后我想起了《山沟》,因为正变得越来越暗的岛使我想起了画上的山坡,但圣·詹姆斯花园的天空没有《山沟》中的那种纯净的光,因为后者的光线调配得非常美,光线位居画的下方,就隐在从右面突出来的一些幽暗树枝后面,在我看来,柯罗和大自然的不同比真柯罗与假柯罗的差别还要大——自然没有任何不真实的东西,但只是缺乏个性,因此就常常有点粗俗,特别是她的落日,当然就没有画家笔下的美了。

我不禁叹息起来,因为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地消失了,日出接着日出,黄昏接着黄昏,夜晚接着夜晚,我们就像水面的蜉蝣,或许还不如它们,不管我们是诗人还是牧师。

时钟响了七下,提醒我到晚饭时间了,而我当晚只得一个人吃晚饭了。为了避免单独吃晚饭,我就应早点离开圣·詹姆斯公园,但一离开,我就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沉思机会,而有些人必须沉思,就像某些人必需苦艾酒一样。我想有个小小的偶遇——即碰见一个很久没见过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并没关系,这样我就有借口在树丛间的薄暮中流连不返了。我满怀希望,几乎可以说是满怀渴望的走着,但一直等我走到圣·詹姆斯街口,也没发生什么事,可我一走到街上,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个画家,他的画有时也会吸引我,于是我们一起到一家餐馆去谈论艺术。

“晚饭后，”我说，“我们会抽着最好的雪茄绕着环形广场散步。每个星期日晚上这儿都是人头攒动，我们会看到匆匆忙忙去寻欢作乐的女人。温暖的夜色中她们的白色衣裙忽隐忽现，月光下的白衣裙总是撩人情怀的。你喜欢不喜欢那种几乎拖到地上的服装？我喜欢。来来往往忙着自己事的水性杨花的女人令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不法行为盛行的时代，她们，以及吉普赛人，都是旧时代的最后遗物。现在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多多少少都要关注为人人所赞同的社会职责的执行情况。我认为，若有人知道自己生活在社会之外并只按自己的本能行事，那对他来说真是一种解脱。我喜欢这个伦敦，喜欢这个午夜的伦敦，圆月在摄政王街上空冉冉升起，热情似火的朱庇特像鹰一样飞上天空，去追求它自己所需要的——只不过我们的追求渺小，它的追求伟大而已。

“夜晚很闷热，一丝风也没有，就像一股烟；在温柔天空的映衬下，乱哄哄的环行街道像圆形剧场一样环绕盘旋。夜色温柔，一点风也没有；教堂的尖顶和居民的屋顶间不时有光闪烁，公园里灼人的热浪与桃子的香味混合在一起，让人迷醉又让人烦恼。这样的夜让我想起一个悄悄走进小酒馆的黑眼睛的波希米亚人，他悄悄地站在一角，奏起悠长、粗犷、令人陶醉的乐曲。我并没看见他，也没听到他的音乐，我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我的灵魂沉睡了，我只希望加到我身上的咒语不被打破。但我感到他的黑眼睛正看着我，于是我不由自主地一点一点地醒过来了；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正与我一起生长着；那种我没意识到在自己身上、我也乐于否认其存在的思虑和欲望，迅速或缓慢地走过来，在我体内驻留下来，并逐渐被我吸引，成为我的一部分。一种恐惧感笼罩了我全身，但我又无法停留；我急急地走着，拒绝它显然是不可能的；乞求和挥手也是徒劳；上帝已经抛弃了我；我内心的邪恶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我看着它从我内心深处浮出来飘走了，只留下一堆粘稠的残渣，但我却束手无策。上帝已把我

抛弃了，我成了那个有着黑而多情眼睛的波希米亚人和他可恶的小提琴的俘虏；我抓起自己的银行支票和我所有的钱向他扔去。我请他离开，并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地。给我《指环》，给我《指环》，它里面乌云笼罩的宫殿、它的海洞，它的森林和森林里的生气，它的巨人、矮人和仙女，它的人和神——无疑这种生活才更接近真正的生活！噢，让我和贝多芬一起走进草地，去听云雀和黑鸟的歌唱！躺在绿阴映照的溪边我们才更接近生活，听着草丛中鹌鹑和灌木丛中不知名小鸟的鸣叫，我们才更接近生活，才比现在站在憋闷的天空下更接近生活。这条街就像克林格萨的花园，这儿是处女花——茉莉、蔷薇和天竺薄荷，这儿也有柔情万种的气氛。来吧，我们走吧，让我们去寻找纯净的乡村、寻找月光馥郁的小山谷吧！你是否曾在夜深无人处静静地看着树丛间的月光？是否想像过一出由优雅的骑士和美丽的女人合演的喜剧？现在他们都已各就各位了，你可以敲响开场的锣鼓了。”

“亲爱的朋友，你说得太多了，都没看见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那个刚才回头看的姑娘有一种天菜花的香味；现在空气中仍有这种香味，她与你想像中的那些演戏的人一样漂亮。喜剧总是大同小异；人们看的总是同样的喜剧，而其中喜剧总是逗人开心的。在闷热难耐的夜晚，圆月辉照下的圆形剧场确实很像克林格萨的花园。但来吧，我们还是回去吧。”

第十五章 葬礼上的遐思

我哥哥写信告诉我母亲病了时我正在伦敦。他说母亲没有直接的生命危险,但若她病情恶化,要我必须回去的话,他会拍电报通知我的。收到信还没过几个小时,电报就到了我手上。信上只有五个字:速回——莫瑞斯。“这么说母亲快死了。”我喃喃自语,脑子中一片空白。我似乎看到自己正被护士领进她房里,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也似乎看见自己不得不抓住一只伸到床沿外的手,直到死钟敲响、看着她的脸永远归于平静。

这是我接到电报时的第一幻觉,但在我准备行李的过程中我才想到母亲可能还要多活几天,因为我的一位临死的好朋友就一直拖了好几个星期才死,她的丈夫和孩子每天都看着他们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慢慢走近死亡。为什么这样的不幸也会降临到我头上?我不知道向哪尊神祈祷,但在火车上,在登上船时,我一直都在祈祷,在布罗德斯特通登上火车时我仍在祈祷。但还是谈谈我的旅行吧,怎么说呢?我旅途中的第三段路一定是最痛苦的,因为沿途的一切我记得最清楚。由于突然认出了自己长期遗忘的东西,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痛苦。眼前的树和沼泽地,眼前熟悉的乡野使我的思绪飘飘悠悠回到了童年。我的思绪像燕子一样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小鸟们无疑正欲回巢,现在正沿着杂草丛生的老运河的两岸轻快地捕捉着小昆虫。火车沿着那条杂草丛生的运河奔驰着,把我的思绪也带回到我生命的初始阶段,那时我往往站在马车的窗户边,缠着父母亲问运

河中来来往往的驳船的生命问题。让我恐惧的是,当我从这种回忆中突然醒来时,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往西去看着我母亲去死的。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她死或阻止我看到她的死。“除非我在下一站下车,”我说,“否则什么也阻挡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我想像着自己乘着马车到处乱跑,但就是到不了莫尔庄园,但这样做会被人看成疯子的。“人是被绑在轮子上的。”我喃喃地说。我想,被宣判了死刑的人一定常常想弄清楚为什么他们被特地选出来接受这样的命运,他们最大的痛苦或许就是要破解这个秘密、这个谜。我去梅瑤的那天早晨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早晨,我常常发现自己想找华丽的辞藻描述它(我们谁也无法束缚自己的想法)。在我看来,地球好像是一个鸡蛋,在苍白的天空下看起来是那么温暖,像鸽子的胸羽一样温柔。这种突发的文学抒情让我觉得自己想踢自己一脚,但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思索某个问题。想过这个问题之后,我又陷入另一种迷惑,我不禁问自己是否就该坐在母亲的死亡之床旁边看着她死去,接着我突然想到自己好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患者,思想嗡嗡叫着,使我好像看到一只苍蝇正上上下下嗡嗡叫着,飞着。“我从来就像只在玻璃渣上嗡嗡叫的苍蝇,但是谁造成了这堆玻璃渣?为什么要弄这堆玻璃渣?这是愤怒的尼罗河的报复。”我说。

在这种极度的困惑中,谁都无法忍受别人提出什么问题。每当看到行人中有似曾相识之人,我都要赶紧缩回到车角里,我精神上的紧张也随着一英里一英里地接近家而逐渐加强。当火车驶入西部乡村时,火车站名也变得越来越熟悉了。在罗斯考莫站,我试图想起距我的下站克莱罗莫瑞斯还有多少站。大约一小时后,火车慢了下来,列车员喊到:“巴勒豪尼斯站到了。”那下一站就是克莱罗莫瑞斯了。我看着窗外的每一块土地,好像看到了一条长长的路,路上的一辆马车,我在马车的这一边,那一边则坐着车夫,我们静静地走了两小时,或是一路交谈着——因为,如果我母亲生病的消息传到克莱罗莫瑞斯这么远的地方,

他可能会告诉我一些我母亲的情况。

在我租到马车的那家酒店,我问有谁知道我母亲的情况,但一无所获。我母亲得的一定是突发病——但是什么病呢?我没听说过她生病啊,我不记得她生过病。马车来了,我们沿着梅瑶窄小的路颠簸前行,终于,路边的树使我想到了我们快到巴勒格拉丝了,我的思绪于是飘到了山那边的一条长长的大路,我看到了(难道我们不是常常看到记忆中的东西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吗)那两匹奶油色的小马,象牙和报春花,母亲过去常常驾着它们拉的马车,而我则在车厢里好奇地看着四周的一切,特别是邮车。人们很远就能看到它走过来了,车上满载邮包和行李,邮寄员吹着号角,马则潇洒地踏着小步,长长的缰绳优雅地摆动着,车夫则稍向一边偏着头,以免他那灰色的厚帽子被风吹走。那些年里,最盛大的事就是去巴勒格拉丝,但不是去看邮车从那儿经过,而是登上邮车,因为当时火车只通到阿瑟瑞。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看到运河,并听说很久很久以前,至少是在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人们总是成群结队地乘船去都柏林。等我从这些沉思中醒过来时,我发现离莫尔庄园只有二英里半的路程了。“半小时后就可以知道她是活着还是死了。”我说。我看着小跑着的马,饶有兴趣地看着它拖拖沓沓的步子,或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情况。人在紧张的时候一切都会引起他的注意。马车现在到了一座森林,一会儿就会是某某的农场,再一会儿就是一片棉田,还会有一片树林,再往后就是我的门房了,现在里面住着一个老裁缝——我希望马车的声音不要把他吸引出来,因为看到他只会让我更加忧伤。

在过去的30年里,路两边的冷杉只长高了一点点。我们来到桥上,又把桥抛在后面,我们到了门房,驶入车道,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树林展现在我面前,上帝!这一切的重现真是太可怕了。现在掩盖了过去,但有时现在却根本不存在,当一切迷雾都烟消云散之时,就只剩下过去赤裸裸地袒露在我们面前。车

道起始处的山只是座小山,但对我来说则意味深长,因为它与我童年的痛苦和欢乐都紧密相连。所有这些地方过去都是我的陷阱,现在却只是庸俗的现实。看,那儿是丁香花丛,30年前,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要和妈妈一起去那儿,回家时我们两手都拿满了花。又转了两个弯,我们应能看到我家的房子了!人在被宣布了死刑时总爱这样胡思乱想,对此我深信不移。山顶上的两朵美丽的金链花现在只剩下了残骸。我让车夫驱车上山,因为我看到有些农夫正站在庄园的门阶上,毫无疑问,他们是在等消息,或者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消息。“我们有坏消息告诉你。”他们以西部人特有的哭腔喊到。

“并不全是坏消息,”我心里说,“我妈妈死了,但我却可以免除了无用的痛苦,免除了必然要忍受的折磨。”月季花过去常常开在门档上,当我跑上高高的台阶时就看到了几枝花,我边跑边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把过去抛在脑后。当我推开大门时,“现在”离我更远了,而“过去”则离我更近了。庄园里涂成灰色、蓝色的石头铺就的路让我激动不已,因为已有整整三代人在这里嬉戏过;就是在那个角落,我第一次学会了纺毛线,我当时不停地纺啊纺啊,连父亲都为我的冷静感到惊讶,他说:“如果乔治在其他方面也有这股冷静的话,他将是不可战胜的。”他下楼去马厩看他心爱的赛马时总看到我在不停地纺啊纺啊。“他就是把帽子和手套放在那把椅子上的。”我说。那时农村盛行戴高帽子,他的贴身男仆的工作就是每天把他的帽子刷得干干净净。我还记得那个小个子男仆常常盯着我,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反对我纺毛线的,因为他怕我打翻放帽子的椅子;当然这种事有时确实发生了,然后,噢,天啊!

我打开客厅的门找找有没有人。我的姐姐在里面,在为我们的母亲哭泣,她是当天早晨死的。我们都悲痛欲绝,当然也需要将这种感情表现于外,特别是悲哀的感情。如果这种哭泣不伴有叹息和眼泪的话,我们自己都怀疑其真诚性,我想这就是我

为什么欢迎我姐姐眼泪的原因,因为,说实话,我的无动于衷令我自己都感到震惊。我这样做当然很愚蠢,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我们并不是在不幸发生之后就立刻感到痛苦的;一切都需要时间,无论是悲哀还是痛苦。但在我正描述的这种可怕时刻,人是没时间思量的,人们总是习惯于认为悲哀和眼泪就像烟与火一样是不可分的。即使我不会哭,我的姐姐还在哭,我把她的眼泪看做是对我们母亲一生善良的最好报答——我母亲的善良会不朽的,因为它出自她的本能。我甚至很遗憾。我姐姐尼娜擦于眼泪后,把母亲死亡前后的一些悲哀的情况告诉了我:她是什么时候死的,死于什么病,专家没及时赶到,等等。我了解到,在我母亲的治疗过程中出了不少差错——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妈妈已禁不起手术的折腾了。

我一边听她讲着,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们过去是怎么谈论一个濒死的可爱的妇人的。她当时在楼上已奄奄一息,而我、她女儿、儿子和丈夫则在楼下悲哀地谈着她。我们都很受感动,我至少很欣赏自己对她的爱。但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就会突然从她身上游离到别的事情上去,或者是男仆来告诉我们说午饭准备好了。这些事与我们美好的感情是多么不一致啊!它们似乎使我们的生活堕落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耻于活着的,并不得不得把生活本身也看做一种羞耻了。

我预感到我们之间也会出现同样的不和谐和偏离,在我们这座建在山顶、俯瞰着一条长而弯曲的湖泊的乔治家园里,也会出现我朋友家出现的那种事情。不需很久就会出现这些不愉快的偏离的。我姐姐告诉我现在这座房子里有谁:一个姨,还有一个舅舅明天就到。你很容易猜到:单单提到这些名字都已无法让我们集中精力于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了。而且,这座房子本身就充满让人分心的东西:所有那些旧家具、墙的颜色、房间的气氛把我的思绪带回到童年时代。我姐姐现在坐着的沙发是好久以前就被划破了的,我不由得想起它是怎样被划破的,又是怎

样被拿到修理铺去修的——我不知道是谁拿去修的了,最可能的人是妈妈,因为她什么都管。我刚才说过我是经过漫漫长途才到的,我姐姐当然首先要谈到午饭问题。我们走进餐厅,吃饭中间我哥哥进来了。他脸色阴郁,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特意装出来的——我是说他可能是不自觉地夸大了自己的悲哀表情。我们悲痛欲绝,真实的感情和虚假的感情交错混杂,浑然难分,微妙得让人难以分辨这种感情是如何结束的,那种感情又是如何开始的。我哥哥一坐下就告诉我妈妈治疗过程中的一大失误:找错医生了——错误总要归到某人头上,不管是谁,这个问题总让人伤心,所以最好还是免提,但他除了妈妈外不敢谈别的,这弄得我们只好尽可能不停地谈这个话题。但我和哥哥已好多年没见面了,他是在印度呆了很长时间后才回来的,我和姐姐也是自他结婚后就没见过面,而他结婚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都有孩子了,我是第一次看到中年模样的他。我们急于想问问各自的情况,听听各自的经历,当然也急于看看好久没看过的景致,而我们至少很多年没一起去欣赏周围的景色了。草地上漂浮着的温柔阳光吸引着我们,这是一个有薄雾有太阳的下午。我在心里说:“妈妈一定是在一个我们看到过的最美丽、最迷人、最洁白、最人性的日子里死去的,一个像在小路上采满结婚用的山楂花的小姑娘一样充满爱的日子。”接着我想到为什么死亡非要在这样一个新娘样的日子里降临到人们头上,但马上我又想到自己真是一个傻瓜,竟然企望大自然为配合我们的情绪而改变自己的容颜。

我们无法摆脱自己的原始本性,尽管我们也知道自然根本不关心我们,我们的痛苦与她没一点关系,因为我们的本能已回到了太阳当空照、天使到处跑的时候了。我的哥哥显然也被悲伤的死亡与鲜活的太阳之间的对比震惊了,但他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不但是他,我们谁也不敢说出这种念头,因为我们深以为耻,尽管我们深知这种情绪是从我们内心深处升起来的。

眼前的美景无法用一般语言来表达,除非我们是诗人或农民,才能尽情欣赏诸般美景。日子像新娘一样从下午移到晚上,原野上满布着鲜花与绿草。我和哥哥并肩走在草地上,虽然羞愧但仍忍不住谈起我们彼此别离后的情况。

在这么多让人分心的美景中,人怎么能被悲哀压倒呢?我看到的一切都同时既是新的又是旧的。时隔这么多年,我又突然回到哥哥和姐姐中间,这是我们经历过童年时代后的第一次见面,我们又重聚在生育过我们的房子里了。我的眼睛被长满房子一面的常青藤吸引过去了,我也注意到草地上的冬青不见了,树林里的一条沟也没有了——这些现象倒是新鲜的。但那个我自小就已看熟了的湖就不必看了吧,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它的每一处湖岸都是弯曲的,我也熟悉它的每一处小岛。我的第一次爱情冒险就是在那条狭长的黄色海滩开始的,我不用扭头看也能知道它的坑坑洼洼,知道它上面的每一棵树;我也知道树林里每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那个点缀着杂草和灌木丛的海滩是我的第一座乐园。但当我哥哥提议到那儿去时,我却托故不愿去,为什么要去呢?为什么要让现实破坏我们的梦境呢?但我却羞于提出自己的想法。什么样的现实能够与我记忆中有兔穴的冷杉相提并论呢?什么样的现实能有我记忆中与湖水遥遥相望的狭长海滩美呢?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它的黄沙滩,有些地方像客厅的地板一样又硬又平。那儿的水很浅,所以我们的女仆常发善心让我们随意跑来跑去,甚至可以跑在她们前面去追赶矶鹬。小鸟低声叫着飞来飞去,我们常能断定这只小鸟一定受伤了,或者是为了引我们离开她们的巢而故意装做受伤了。我们不指望湖水会有什么新容貌,然而我们看到的湖水却真的是我们以前不曾见过的,它是那么安静、那么温柔、那么阴郁,就像一块白色的薄纱围巾,弯弯曲曲地流过小岛和小岬。这儿无际的沉静让人想起很久以前的神话故事,想起沉睡的森林和鬼魂出沒的城堡;在烟雾缭绕、像梦一样轻柔的湖中小岛上就有这

样的城堡。在高大的落叶松树之间，苍头燕雀不时发出一两声尖叫，而芦苇丛中的野鸭也在不失时机地窃窃私语，声音还没有微风吹过芦苇时的声音响。小鸟和芦苇的影子似乎永远固定在魔镜中了——这面魔镜，有人在它面前梳妆，有人在它面前听到了湖水的轻柔的低语。在它面前，我们似乎听到了永远千篇一律的悲哀低鸣。

用不了几天，这片土地上就会新添一具新棺材了，拉灵柩的马也一样被披上黑布，亲戚和朋友组成的送葬队伍全部臂挂黑纱，手上戴着黑手套，其中大多数人在想着还用多久他们才可以回去做自己的事。

因为害怕过早被埋掉（这种恐惧是常有的），妈妈要求尽可能推迟她的葬礼，直到她的肌体出现自然变化，证明她确实死了，才可以埋掉她。在她死亡和葬礼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我都是在湖岸上度过的。每天都一样的天气。我发现自己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来表现芦苇和小岛的灰色倒影的美，蜿蜒游走的轻柔的湖岸的美、湖岸四周的静美。“这种静好像发自事物的内心！”我说着不由停下脚步倾听着，像一个走到世界末日的人，然后开始穿过灌木丛、蔓生的杂草丛，这里的空旷与沉静让我感到震惊。我在树林中走着，不时会碰到弯腰捡柴的可怜女人。想到自己可能认识她们——她们显然也是村里人；如果真是这样，我孩提时一定认识她们——某种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恐惧或羞怯攫住了我！这种感觉无疑是因为我感觉到了时间在我们之间造成了巨大差别：她们还是老样子，但我却变了。我读过的书看过的画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她们依然心地单纯。意识到人的命运的不公，我看着她们的眼睛时心里有一种痛心的感觉。因此我更愿意从灌木丛后悄悄走过去，悄悄躲进树林，不让她们察觉。

我眼前出现了一片适宜的空地，一片比流连在记忆中的空地还令人愉快的空地。现在虽然只是5月初始，但草丛已很暖

和了。我躺在地上,听苍头燕雀在树枝间啁啾婉鸣,周围的美景使我想起一位老爱尔兰诗人的诗句:“树林是弹竖琴者手中的竖琴。”只看着树枝、听着鸟叫就让人快活似神仙了。我欣赏着低垂的天空、棉絮似的白云和开始点缀着灌木丛中的白花。一定是这种五月花使我突然想起我永远失去的所爱的姑娘。妈妈的死使那个伤口稍微愈合了一点,但很快,所有的痛苦和悲哀又重新出现在我心头,伤口重又裂开,血流不止,无法弥合。

一个男人不能同时哀悼两个女人。仅仅在一个月前,我生活中一件最美丽的东西,一种我一开始就知道命中要追随的东西,一种仅与我相随瞬间的东西从我身边滑过——那是一种爱,一种表达了我年轻时代的所有偏爱的爱。谁能说出时间也无法改变的爱的秘密呢?哪个词能表达出命运的含义?数百万计的女人都有浓密的金发,或灰或蓝的眼睛、小而坚挺的乳房,但她却有力量加强我的感觉,她在我身边时我就觉得自己活得充实、生动,而她一旦离开我,我就变得庸俗乏味。她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生活的激动,这种激动能将我们必须失去的都保持住。在这样的一天,看着波光涟漪的湖水,听着树枝间小鸟的低鸣,我无法不想起她的神秘的美,但迤逦南倾的阴郁的山脉却一点也不像她,而我只想说说像她的东西。在我对她的深深思念中,一种极度的失望出现了又消失了:那就是我再也无法占有她甜蜜的人格了,再也无法把她椭圆形的俏脸捧在我手中了。她的一切可爱的品性现在只能留在我记忆中了,我再也无法亲手触摸了。只有在这种情感激荡的思念时刻,人才能体验到真正的悲哀,一种在艺术中无法表达的痛苦,即使周围的景色,此时也只让人更加失望。就是由于这个姑娘在我心中造成的痛苦,使我没能像我应该做的那样悲悼我母亲,她是值得悲悼的,因为她是个善良女人,她的美德年复一年地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如果我与她生活在一处,如果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与她生活在一处的话,她的死会让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在她死那天我在伦敦

就会表现出应有的悲痛。当火炉里的火光渐渐暗下去,甜蜜的回忆悄悄从我身边溜走时,我才认识到我丢失的东西就是失去了她。我们为死者悲悼,并非因为她们被夺去了生活的欢乐(如果这种生活是一种欢乐),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失去了他们。但有人会责备我们的这种自私呢?因为这是我们最优秀的品行,是我们真正的自我。想想看,如果一个男人对他的情妇说他只是出于仁慈才爱她,想想她会多么羞愤吧,她会因他的这种利他主义而恨他,会扭过脸不再理他。或许只有某种占有欲才会再把她送到他身旁。

我们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想到我们自己。当我出于羞愧不敢面对那些割草女人时我想到了自己,而她们可能根本想不到我去享受世界、她们被留在田野里劳动有什么不对;又看到我只会让她们觉得有趣,我只需说几句好话,她们背上的重负就会轻许多;但我忽然又想到:这种不公无疑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谁也无法逃避这种不公,丝毫也不能。我们最好、也必须默认这样的事实:只有我们内心对老年人的悲哀才是一种温柔的悲哀,但我们不会悲痛欲绝,心如刀绞,我们无法做到习俗所要求的那种悲哀——我们还要穿上奇怪的服装,臂挂黑纱、手戴黑手套,这种做法本身就使我们与自己真正的自我分离了,我们因此面不再是我们自己了,我们都成了戴着面具参加假面舞会的化装表演者,而不戴黑纱我能更好地悲悼我母亲。“在人类的种种发明创造中,再没有比现代葬礼更可怕的了。”我不由喊道。我眼前出现了棺材和一群默不做声的人。就在这时,我头顶的树枝间又响起苍头燕雀的鸣叫,是那种尖利、单调的鸣叫。“这是什么鸟?”我喊道,“竟来打断我的沉思。”我站起身,抬头看鸟儿藏在哪条树枝间,结果却听到它又在不远处的另一棵树上叫起来。我循声追去,它却蹦来跳去,领着我绕过山坡的树林,一直走到一座古墓前。我想起我父亲被埋葬后,就有一个牧师爬上、或是被人群抬到这样的墓顶上,发表了一番沉痛的演说。

坐在平静的湖水前,我不禁思忖:“20 或 30 年后,我也肯定要进入那种可怕的墓穴中的,谁也救不了我。”于是,我觉得现在又一次从我身边滑过,我的心又变得明镜一样透亮了;现在只存在于潜意识中,若不是如此我们就无法生存。这些话以前我全说过,现在我看自己似乎又成了一只趴在窗格玻璃上嗡嗡叫的苍蝇,飞起来,又卧上去。听着湖水拍打湖岸的声音,我想像着自己在与墓中人进行一场可怕的对话,他的话和我的话都一齐涌进我脑中。“上帝,”我喊道,“一定要想办法摆脱这种幻想。”我纵目往湖上看去,看到了湖中小岛上一个威尔士人建造的城堡。我看到一直到水边都是树林,而我记得以前并未看见过这些树。山坡上的落叶松突然全部落入我的眼底,我想完全可以用它们做成一个火葬用的大柴堆。在过去的 30 年里,从来没有人伐过树;如果我还可以再活 30 年的话,那我就可以有一座高大的火葬柴堆了,这个柴堆应该有 50 英尺高,上面浇上油,我和我所有的书(它们可以当我的好枕头)都躺在上面。古代的英雄总是两手空空地躺在柴堆上,他们的马则被屠宰掉,以保证它们的灵魂能到阴间继续为自己的主人服务。我火葬用的柴堆应堆在对面这座岛上,点燃后应在数英里外都能看到其燃烧的火焰;整个湖面都应该被火光照明,我的肉体将变成灯塔上的明灯。这样的葬礼也不会花钱过多——或许只需几百英镑,也就是一千棵松树和几桶香油以及一次盛宴的价钱,因为当我在燃烧时,我的送葬者应该吃烤肉、喝酒、穿快活的衣服——男人和女人都这样;与此同时,我的葬礼上还要奏响最开心的音乐,应是《费加罗的婚礼》中的选段,以此作为一天的结束。如果真能这样的话,倒是件好事,谁也没理由不这样做,除非法律明文规定不许火葬。我满脸愁云,我的灵魂亦然,我变得像湖水一样忧郁,像南倾的群山一样沉默,像爱尔兰的歌曲一样忧伤,因为我所梦想的这种葬礼可能永远不会实现。我可能归根于英国的公墓——在爱尔兰没有公墓——爱尔兰仍相信肉体可以复活。我自言自

语说：“在我决定自己采用哪种葬礼前，我必须弄明白现代法律和基督徒道德准许市民采用哪种葬礼。”而这只有等我回到都柏林才能弄清楚。如果法律允许，我的送葬者会坐着小船到岛上参加我的葬礼，那一定是很隆重热闹的场面，但法律并不允许烧掉人的遗体，那我只好退而求之于公墓了。但不管在哪儿烧掉我，也不管在什么时候，我总能决定如何处置我的骨灰吧。在这种幸福的遐想时刻，我又想起了希腊的花瓶，并且开始在心里回想我看见过的各种各样的希腊花瓶。所有的希腊花瓶都很美，即使罗马时期的希腊花瓶也是美的；这些花瓶有时显得很笨重，但雕工和花饰都很精美。我决心已定，任何希腊花瓶都会让我的骨灰满意的，当然，购买这种花瓶也要花钱，我无疑是在要求我的继承人拿出一大笔钱——因为越来越难买到真正的希腊雕塑品了！因为考虑到死后的节约问题，我想干脆换成花岗石做的希腊花瓶的复制品好了。我拿过纸和笔，高兴地写下自己所记得的各种各样的花瓶的名字，画出上面各种各样的图案：有的上面是一群拿着酒罐的男人，中间混杂着跳着优美的舞蹈的姑娘；有的上面是踩水车的年轻小伙子，旁边是第一次给羊挤奶的姑娘，我记得最清楚的花瓶是在天鹅颈上伸出笔直把手的那种，这种花瓶直立着有大约两英尺高，或许还要再高点，它的肚子应该能容下我的骨灰。从我唇上的笑容中，没有人会看出我在想死后的那一小堆白灰。

“噢，死啊，你在哪里？”我喃喃自语，铅笔不知不觉从手中滑出。

如何处置装着我的骨灰的花瓶？这颇让我费了一番脑筋。我预感到：如果我想不出能永远使自己的骨灰花瓶不受到损害的办法，那我的一切努力都将只能是事倍功半。我正坐着胡思乱想，忽然听到楼梯上响起乱糟糟的脚步声。“他们在往下抬我母亲的棺材。”我说。与此同时，门被打开了，有人告诉我送葬的队伍正等着我。我的哥哥，各种各样的亲戚和朋友都在大厅里

等我，每个人都戴着黑手套，每顶帽子上都挂着黑纱。“一切装备完毕，”我咕哝道，“但都毫无必要。”我内心深处极其反感这种滑稽表演。“但我为什么要可怜我母亲呢？她自己愿意躺在自己丈夫身边，我决不应该指责她的这种愿望。”

棺材被抬上车。我家一个过去的家丁走过来问我想不想有哭声。刚开始我没听懂他的意思，等他给我解释后，我才明白，他说的是西部农民哭着跟灵车到墓地的那种习俗。真是可怕的野蛮、愚昧！我命令谁也不准哭，但有三四个女人实在忍不住，走到灵柩前哭起来。我很难阻止她们，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我想现在每个人都在抬头看天上是否有乌云，因为到教堂大约还要走一英里半路程，我们至少还有三英里的路要走，如果天下雨，我们可能会得重感冒的。但看来天不会下雨的。有城堡的小岛在雾霭中隐约可见，使我想起自己心里想要的那种美妙的葬礼，当然其前提是法律不干涉我做出这种选择。我们沿着爱尔兰沉闷的灰颓颓的路走着，不时看看路两边贫瘠的田地，（这些田地似乎就要变成沼泽了）和贫苦人家的房屋，而我则还在绞尽脑汁设计着保护我的骨灰花瓶的计划。但连拉美西斯二世都难保自己的尸体被人掘墓污辱，我在斯特兰德大街见过他的照片——既然连他都没成功，何况我呢？

20个牧师在为我母亲做弥撒，在他们诵唱的过程中，我的思绪继续自由地飞翔着，去寻找那无法得到的，连拉美西斯二世都没能找到的藏尸之所。就在牧师们开始诵唱主祷文时，我想到只有深海堪作容纳我的骨灰花瓶的惟一清洁神圣之地。即使我的骨灰花瓶被扔到海的最深处，它也不会沉到底，而是停留在黑暗的、只有一些鱼在游动的某一静止的深海层，这是一座冷清、深邃的墓穴，“是非人工的、没有污染的世界”，四周环绕着一群群可爱的酒神崇拜者，既有小伙子也有姑娘，还有树林里的野生动物，以及保持着原始本能的人。但世上没有永恒的东西。数百万年后，大海开始干涸，盛着我骨灰的花瓶开始下沉（我希

望落到某个安全的石基上,立在没有空气也没有水的沙漠上——整个地球到时都变成了沙漠)。拉西莫斯失败了,但我成功了,我被一群跳着唱着的少男少女环绕着,我的坟墓会立在已消失了的大海中间的一块高高的岩石上。又是数百万年过去了,地球把许多死者留在了漫长的冬季,它也将和所有其他运转着的星球一样被吸入更伟大的太阳,而太阳本身则被融入更伟大的太阳系。数百万年也只是弹指一挥间,即使数亿年对我们也意义不大。在数亿年之后,世界万物都完成了各自从生到死的循环,从那时起,潮水将会又开始涨落,万物又开始了永恒的分合过程;数百万年过去了,地球又变冷了,人又被用泥造出来,然后又有了鱼、有了各种动物。我相信,在数亿年后,在数亿年的数亿年后,我将坐在我现在坐的这同一个房间,写着我现在正写着的同样的文字;我也相信,数年后,我的骨灰将会摇荡在静止的、平静的大西洋底,那同一群人、同一群仙女、同一群神还会围着我跳舞。

译 后 记

开始想到翻译乔治·莫尔的这部回忆录,是受到我的良师、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的启发。先生是个极重情义的人,他之所以向我谈到乔治·莫尔,是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他的一位好友邵洵美曾在20年代译过这部书,是1929年由上海金屋书店出版的,只不过邵先生的译本只节选了原著的一部分。也许正因此,先生念念不忘要把全书译出来。在先生的意思,一方面是代老友完成未竟的事业,另一方面是将乔治·莫尔这个一向为人遗忘的英国作家重新介绍给中国读者(我翻了好几种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教材,都对莫尔只字未提,倒是翻译的外国文学教材中略为点到,但也仅是生平创作简况而已),以期人们重新了解和认识这个普遍受到遗忘的文学天才。

我欣然从命,特别是仔细研读过这部回忆录后,更是感觉到尽快把这部著作、把乔治·莫尔重新介绍到中国的必要。可在搁笔定稿之后,却总觉得还有很多话不吐不快,原因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不断想起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个英国作家王尔德,想起两人的历史地位和实际待遇,越想越难抑心中冒起的一股不平之气:莫尔的文学成就和他在中国以及世界上所得的实际地位反差太大了。与王尔德相比,莫尔显然缺乏前者那种惊世骇俗的举止,虽然他同样也不乏风流。王尔德的身前身后名,当然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有直接的关系,但谁又能否认他的名扬世界与他一百年前闹出的那场同性恋官司也同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呢？我敢肯定，若没有那场官司，若没有他在生活上的惊涛骇浪以及因此造成的颇具神秘色彩的命运，王尔德绝对没有现在这样的风光：在王尔德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在世界范围内不由自主地兴起一股王尔德热，不仅伦敦街头竖起了一尊名为“与奥斯卡·王尔德聊天”的塑像（1998年），使这位客死异乡的昔日的社会反叛者的灵魂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而且与王尔德有关的一切资料、图片、书信都普遍重新受到重视。在中国也是这样，介绍研究文章很多，《王尔德全集》也得以出版，各种有关王尔德的消息和研究文章也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与王尔德受到的这种礼遇一相对比，人们，我是说还有同情心、恻隐心、公正心，并且了解王尔德和莫尔的人们，一定会为王尔德的这位同乡感到委屈甚至愤怒了，甚至会生出这样偏激的想法：人家莫尔除了没有搞同性恋之外，哪一点比他王尔德差了？他们甚至还会联想到世界上目前的所谓精英文化和媚俗文化之类的争论上去，联系到目前的同性恋文化渐成气候上去，而莫尔则是一个清教徒，一个严肃文化的代表，在俗雅之争已分出胜负的今天，莫尔的受冷遇从某种角度上讲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莫尔比王尔德大两岁，1852年生爱尔兰，王尔德也是生在爱尔兰，两人都是小说家、剧作家，都对爱尔兰的文艺复兴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不过从文学创作样式上看，莫尔显然比王尔德进行了更多的尝试，虽然就某一方面来说，如在戏剧创作方面，他不如王尔德的成就高，但在一个探索比成熟更重要的过渡时代，莫尔显然更带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也更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创作风貌，而这是王尔德所不能相比的。

莫尔是个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创作风格不断变化的作家，特别是在巴黎学画的10年，使他深受唯美画风的影响，而在同时的英国，以王尔德为中心的唯美主义文学也正风行。受这种时代文学背景的影响，莫尔形成了以唯美主义为主，兼顾其他艺

术风格的艺术特点。这部回忆录可以说综合了莫尔的所有艺术特点,其中唯美色彩特别明显。只不过他的文风没有毛尔德那样流畅华丽,也没有他那种一泻千里的情感激荡,而是采用不动声色的自然主义的纯客观叙述方式和意识流的情感描写方式,把他生活中的几段难忘的、不乏颓废色彩的情感生活赤裸裸地展露出来,从中不仅可以让人看到他的精神追求、矛盾,他的生活的无聊、空虚,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他那一代英国作家是怎样生活和创作的,了解他们所代表的生活观、艺术观在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想,这才是我们重新认识莫尔的主要目的。

莫尔的文笔比较枯燥、单调,这是因为他采取的是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但为了保持作品原貌,我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对一些特别拗口、特别乏味的部分作了一些语句方面的调整外,基本上是根据原文译出来的;另外,莫尔还在这部作品中,以很大的篇幅,对爱情、生命、存在、死亡等问题作了一些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这是需要读者耐心阅读后才能领会的,也是译者需提醒读者注意的。

这本译著于我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它是我告别 20 多年的学校生活、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第一部译著,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和女儿甜甜的微笑中完成的,其中蕴涵了我对过去和将来的无穷的思索和情感寄托。希望这是我新生活的一个良好开端,也希望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的关心和帮助。

当然,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尽管已尽了最大努力,但错误和缺憾一定难免,还请方家不吝指教。

译者

2000 年 4 月于同济大学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

作者 =

页数 = 2 2 2

S S 号 = 1 0 3 5 0 7 6 4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